

赫爾回憶錄

上海申報館印行



南京東路河南路角

老介福

綢緞

呢絨

顧繡

布匹

## 譯者前言

中報編譯室

美前國務卿赫爾以垂暮之年，把他秉政時的事迹，寫成一部回憶錄，用廣流傳。此書由紐約編輯人新聞社負責辦理發表事宜，於本年一月廿六日刊載紐約時報，同時該社把上海的發行權交付本報，亦於同日起刊載。上海時間較之紐約時間為早，故吾國人反得先見此書。全書共分四十二天刊畢，即印成單行本，以餉讀者。

從現在回想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的種種，都成為過去的史迹，即我們身處其境的，也僅僅記住了一個輪廓。由此推想，到後來學者如欲對此次戰爭作一專門研究，必須下一番蒐集史料的功夫，更須下一番考訂史料來源的功夫。「知人論世」，這是史家應用的科學方法。

若把這點來衡量赫爾回憶錄，我們當認它為第二次大戰中最可珍視的史料。赫氏自一九三三年出任國務卿後，前後歷十餘年，在美國要算是秉政很久的一人，而在這十餘年中，世界歷史又正當改造之際，他把自身的見聞，一一追述，其親切有味，當非道聽塗說者所可比。自來史家考訂史料，多以出自直接觀察者為可貴，而作者所處的地位，是否有利於此種觀察，也為估定其價值之一端。這從來源方面說，正合乎史家所需要的條件，然而這還不是使後人敢於徵信的唯一理由，尤可貴者，乃在於他的真摯態度。當他寫這回憶錄時，退休已久，不但毫無得失之念存乎其間，即就一生事業而言，亦無所用其顧慮與掩飾。史家大都推求作者秉筆時的心理，以測其立言的價值。故此書雖為主觀的回憶，而無礙其為客觀的紀錄。今試讀其原文，資樸而簡單，絕無雕飾之處。赫氏平生說話，最有分寸，往往躊躇半天，竟取適當的字句，以表達其意思，即在盛怒之下，罵走野村來柄之時，出語仍求其蘊藉。故讀此書，幾令人忘其為縱橫捭闔的外交家，與一般「華僑」之交，「事增其實，辭溢其真」，為史家所痛斥者，不可同日而語。

然而欲從回憶錄中，以推論赫氏一生的成就，在這時期，仍不易輕下斷語。美國國務卿的地位，雖與英國首相大不相同，但在就任時，他曾提出過一個附帶條件，說他不願意僅僅做美國政府與外國政府之間的一個傳遞消息者，他要充分參與訂定和實施外交政策的工作。由此可知他對美國外交政策，確是很有關係。即聯合國的組成，其中也有不少他的理想計劃在內。他對於國際組織的期望，推誠相與，是那樣的殷切，然而歷史尚在演進之中，此時欲估計其歷史上的貢獻，似仍嫌其過早。所可說的，乃在此書的字裏行間，處處流露出他的長者態度，老成持重，印象很是深刻。

歷史是循環的。在前一時代所遭逢的，在下一時代也許有重演的可能，雖未必全是亦步亦趨。所貴乎讀史者，即在從已知而推測未知，從過去而推測將來。二次大戰已成史迹，三次大戰似乎又近在肩踵。讀此書後，我們知道了許多不曾知道的事實，美國外交關係的轉變，國策的形成，一切都可以使我們增加更深一層的認識與了解，對於觀察現在，應付將來，當有不少的啓示。這是在善讀此書者之推求因果，「一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了。



國 務 卿 薩 爾

## (一) 羅斯福是具有魅力的人物

在我任職國務院的十二年中，總統和我，從來沒有用不客氣的說話交談過。當然，我們之間有時也發生一些重要的爭論，但是總能誠懇地，直率地，用友好的精神消除異見。大體言之，我們的相處是極相得的。

總統尊重我在受任國務卿時所提出的附帶條件，就是說，我不願意僅僅做我國政府與外國政府之間的一個傳遞消息者，我要充份參與訂定和實施外交政策的工作。

對於國際關係各項問題，他和我在大多數方面具有相同的見解。假如我們不在一起時突然有新的發展，我們兩人中的任何一人往往可以猜到另一人將採取的行動。這種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意見相似，乃是我們之間工作關係良好的一大因素。

在以下這些回憶中，我將要寫的是以我國政府處理外交事務的工作為主。我不擬敘述羅斯福政府在內政方面的成就。關於這些工作，總統是主要的設計者。羅斯福政府從上屆政府承繼下來的國內恐慌局勢，以及在他領導之下所訂定的補救辦法，和實施的空前軍大改革，已足以使他在我國的內政史上，獲得一個高超和永久的地位。我也不擬敘述總統在最近一次世界大戰中，担任我國武裝部隊總司令而獲得的成就，除了有關外交軍事聯合政策的若干方面偶然有所涉及。他在軍事方面的出衆成就，又使他成爲我國歷史上才能卓越的總司令之一。總而言之，他是一個真正偉大的總統。

在我任職國務院期間，我發覺在大多數情形之下，我必須自作決定。雖然在有關政策的重要問題上，國務卿例應和總統商酌，並且是總統在外交事務方面的代理人。但在實際上，國務卿往往依照他自己的意思行事而自負其責任的。我可以向美國派在國外的代表頒發訓令，要求駐在我國的外國代表提供解釋，向外國政府發出外交照會，以及和這些政府談判條約。

我必須運用我自己的判斷，藉以決定某些政策或者發展是否相當重要，應該讓總統注意。有時候我把一個牽涉新政策的問題呈於總統之前，並附以適當的建議。在另外一些時候，某項問題雖亦有關於政府的政策，但是並不十分重要，毋需促使他注意，或者這個問題在一個總政策或者一種已確定的思想範圍之內，而這個政策或者思想，他是早已表示贊同的。

譬如說，在義阿（義大利和阿比西尼亞）戰爭期間，我主張道德制裁，心裏特別注重義大利。當時總統在墨西哥海岸附近的一艘巡洋艦上，我告訴他假如他贊成的話，我們建議用他的名字宣佈制裁，他當即表示同意了。

另一個例子，就是我們在蒙吉維多泛美會議中爲調解察科戰爭（Chaco War）而作的努力。我把這件工作，當做

大會促進和平各項程序中的一部份看待，並且採取了適當的決定。我把工作進行的一般情形隨時通知總統。

還有一個例子，就是我和英國談判從紐芬蘭和英屬畿內亞租借根據地，以交換美國五十艘過齡的驅逐艦。總統和我就此一問題商談一過，獲得了一般的諒解。於是他就把和英國進行談判的工作，移交給我辦理。爲這樁工作，我整整化了十天，把談判的情形隨時通知總統。當談判結束的時候，我就負責代表政府簽字其上。此外，我還負責和邱吉爾交換過一次電報，當時他正式保證過英國海軍在任何情形之下，決不任其落入德人之手或者自行擊沉。

其他的例子很多，不勝枚舉。最後一個例子，就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前九個月中，和日本大使進行的談判。我和日本大使舉行了四五十次會議，大部份是在我旅館的公寓中舉行的。我隨時把討論的要點通知總統，同時替總統佈置與大使舉行會議，準備資料。

無論是總統或者我，對於處理外交事務的技術方面，都沒有太多的經驗。由於我們立即遭遇到無數問題必須應付，我們很快地獲得了這種經驗。實施政策以及將基本原則應用到國外亟需解決的種種極端複雜的問題上去，這種重大的工作，大部份落在我的肩上。尤其在初幾年中，由於內政局勢上不可名狀的混亂，需要總統每天加以非常的注意，因此我的工作變得更繁重了。

在羅斯福總統的第一任期中，他浸沉在大量的內政問題中，結果幾乎讓我來完全負責外交方面的工作。我隨時把一切重大的發展充份通知他，但是他希望我在政策和行動方面，發揮主動作用。從他的第二任起，他對於外交工作的興趣和實際的參與，大見增加了。

羅斯福對於國外情形的知識，是極廣泛的。自從傑弗遜和阿特姆斯以來，沒有一個總統對於國外的人民和狀況，具有更廣泛的知識。雖然有時候他直接和別國政府的首長去接洽，使我們不容易應付。此外，他忘記了他軍事決定的外交含義。但是他對於世界的觀點，是進步的，具有眼光的。

他是一個在性格上具有極大魅力的人物，在談話之中時常能够使他自已可親而有吸引力，這一點，對於我們應付外國政府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頗有助益。他對於人類心理，具有一種罕有的判斷力，時常能够把一種主張或者呼籲，最有效地傳達給大眾。在這方面，前輩中除了提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之外，我以爲沒有一個人比得上他。他最得意的表現，就是以極具戲劇性的形式，向世界宣佈偉大的口號和原則，如四大自由之類。他對於人物的廣泛知識以及他的活力，和一直是很準確的判斷，使他極適宜於擔任領袖。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總統在我任職國務卿的十二年中，簡直不大能够對我關心得更周到的了。他幾乎毫無例外地核准我的意見或建議，這些意見和建議往往是牽涉到重要的外交政策的。除了他和邱吉爾和史達林舉行在他看來主要是屬

於軍事性質的會議之外，他在外交關係方面採取重要步驟之前，簡直總來徵詢我的意見或同意。在許多許多次情形之下，他希望我供給有關外交演說的題材，或者協助他起草咨文，以及向邱吉爾，史達林和其他政府首長提出答覆。

霍普金（Harry Hopkins）有一次對我說，任何人替羅斯福總統服務，不論多久，總統永不會謝他的。但是霍普金接下來又說，事實上羅斯福對於這種人替他所做的一切工作，總是感激的。我回答說，我同他的關係一向沒有間隙，從無間言。我還說，在許多情形之下，他對於我工作的若干方面，表示充份的欣賞。

當總統或者我從旅行回來，或者隔了一個時期之後，他幾乎總來通知我，請我到他的辦公處去吃中飯，因此我們更以談論各種問題和情形，不受擾亂。

午餐拿了進來（沒有酒類），放在他橢圓形的辦公室中的大辦公桌上。這個辦公室對我是很熟悉的。就在這個房間中，我第一次遇見威爾遜總統，其後又遇見柯立芝和胡佛總統。

我們的談話是非正式的。總統時常有一只剛聽到的有趣的故事，講出來聽。其後，我們就可以談論當前的問題約一小時。我們總祇有兩個人，極少打擾，雖然有時候重要的人打電話來時，總統須去作答。

在談話中，他一直是顧到對方的。有時候我們對重要問題意見相左時，我從反對的方面辯論，他從沒有表示沒有耐性過。他注意靜聽，直到完畢，不來打斷對方的說話。當我們中間一人知道對方經過充份考慮而抱有確定的信念時，就會在適當的時間，避免過份的辯論的。

我們的談話幾乎是完全關於外交事務的，但有時候我會毫不躊躇地對內政上的一般問題表示意見。有幾次我彷彿這樣說過：「從我青年時代起，我會經研究過自由思想的導師傑洛克，密爾登，庇得，柏克，和格蘭斯登以及魯意·喬治學派。我會受過威爾遜的自由思想的薰陶。我前在國會中的工作記錄，有百分之九十至一百涉及勞工，主要是關於進步的立法的。但是我還不能不覺得你在若干內政改革方面進行得太快太遠，沒有充份的時間去適應國內的條件。民衆沒有時間去消化它們。我認爲國家週期地需要時間去適應若干激烈的新政策，並且在若干方面，政策本身似乎太激烈一點。」我並且說明，我並不贊同政府永遠費去大畧金錢去應付國內問題的政策，一向主張根據進步的切實的政策，來達到預算平衡的目的，國家在各重要方面的合理進步，均需以此爲健全的基礎。

總統的態度總是非常尊敬，聽我講完。其後，他就繼續吃飯或吸煙，不說什麼話。經過幾秒鐘的靜默之後，他或者我提起一些其他的事情，談話於是轉入了另一個方向。

## （二）白宮團體玩弄「自由主義」

我時常有機會在清晨去見總統，那時候他還在床上。通常他已經起身過，用過早餐，再回到床上去處理一天中最初的工作。我發覺他的床上攤滿了報紙，文件，信札和電報。我就近拖一只椅子坐下，我們就開始討論手頭的問題。這種辦法，在我任職國務院的許多年中，是習以為常的。

一般地說，我在社交方面並不是總統的密友。我並不被邀參加白宮的宴會（除了官方正式的宴會），或者乘坐羅斯福先生的游艇作週末旅行，或者赴海德公園。羅斯福尊重我的決心，就是我不願意分散我的精力於社交方面，而欲保存它們來處理公務。此外，我老實不歡喜被邀參加白宮中的團體，那裏時常玩着「自由主義」的把戲到極端的程度。

大家知道我並不是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也不是半激進主義者，好像若干接近總統的人那樣。我和他們聚在一起，對於我猶如對於他們一樣，是很難堪的。

在我覺得更富有意義的，就是有好許多次我單獨和總統舒適而寧靜地一起進餐，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至少可以促膝而談一小時，不必咬文嚼字。

我和總統的母親薩拉·丹拉諾·羅斯福夫人的關係，是最誠懇的。依我看來，她是一個卓越的女子，已經把她的一切獻給了她的兒子和她的國家。我第一次知道她，乃是因為聽說她時常支持我和我對於公務上的見解。她變成了我熟悉的的朋友，並且在我們的談話中，她對於國際問題和現狀，一直表現着廣泛的知識和精確的理解。

羅斯福夫人比我更左一點，我同她的接觸是極有限的，雖然已經能够使我欣賞她的能力。她是爭取和平的勇敢戰士，對於和平與其他人道工作，她在美國和其他國家中發揮了廣大的影響。

我相信總統對我是完全坦白的；雖然我並不出席他純粹軍事性質的會議——除非討論的問題也牽涉外交的——或者內政會議，我從來不問他一個有關軍事或內政局勢最機密的問題，祇要他不立刻毫無保留地把全部詳情告訴我聽，我就此打住。我們有幾個大使，尤其是駐莫斯科其後駐巴黎的蒲立特，駐倫敦的坎納狄，駐莫斯科其後駐白魯塞爾的戴維斯，因為他們都是總統的老友，時常越過了直接寫信給總統，討論有關政策的重要問題。由大使和公使直接和總統通信，一向是不宜的，我會就此點和羅斯福力爭過。但是雖然如此，我却想不起任何重大的實例，可以證明國務院的觀點和方針，會因這種行為而受到重大的妨礙。

總統喜歡使用一種辦法，對於國務院往往是很為難的，那就是以他的私人代表的資格，遣派特使到國外去和外國政府首長談話，或者履行某種任務。在這些特使中有霍普金，華萊士，哈里曼，赫爾利，杜諾文，戴維斯諸人，他們都被派出去一次或二次。在許多情形之下，派這輩特使出去，往往在我國駐派在各該國的大使和公使中引起紛亂。然而，他們的任務極少干涉到政府嚴格屬於外交範圍之內的工作。



總統和我，時常商量任命國務院中我的重要助手以及駐派在國外的大使和公使。隨着時間的進展，總統對於這一類任命往往提出許多建議。但在極大多數情形之下，總是國務院向他建議，經過適當步驟之後，他就表示贊同，偶然有幾個例外而已。

他自己向我提出的建議，往往是簡明的，用鉛筆或者鋼筆寫在白宮小小的便條上，並沒有日期，往往像這個樣子：

「史密斯派重慶」

「瓊斯派巴黎」

「勃朗召回」

「○」

在土耳其的首都從伊斯丹埠遷到安加拉之後，我收到他一張用鉛筆寫的便條：

「C.H. (Correll Hill) 的縮寫——譯者」

「爲什麼我們不可以把我們的大使館從伊斯丹埠遷移到安加拉呢？」

「FDR」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的縮寫——譯者）

我就在底下用紅鉛筆寫道：

「深表贊同。」

「C.H.」

在羅斯福成爲總統之前，我一直稱呼他「富蘭克林」，其後，我就稱呼他「總統先生」，因爲有一個理由，就是我看見他的時候，他時常和別人在一起。但是甚至單是我們兩個人在一起的時候，我也稱呼他「總統先生」，雖然我們使用銜頭的機會是極少的。他一直稱我「柯吉爾」，在出任總統之前和之後，始終如此。

總統祇到過國務院一次。他到國務院來之前，先在上面一層樓上替他幾個「人家不知道他們名字的助手」找辦公室，找了好幾個鐘頭。

我向總統建議不止一次，主張他召請前總統胡佛來會商若干問題，諸如國外的糧食情形等。我自己從不猶豫和我的前任史汀生先生商量，我從他那裏獲得有價值的幫助，在貿易協定的立法方面尤然。但是總統和胡佛的關係已經變成很惡劣，結果前者從沒有邀請後者前往白宮。

我自己曾和胡佛非正式地商談過幾次，雖然不是正式在國務院商談的。遵照胡佛的建議，我們的談話是在前副國務

卿卡斯爾（William Castle）的家中舉行的，我就把商談內容報告總統。胡佛對於公家事務表示最熱烈的興趣。至於他對羅斯福極端的仇視是否使他政黨的氣味更激烈，我不能說。無論如何，這是一種相互的仇視。

若干具有極端左翼色彩的人時常挑撥總統對國務院的關係；並不是羅斯福先生本人對國務院有所為難，而是少數具有左翼色彩的人時常到他面前去抗議，因為我不接受他們命令的原故。他，除了偶然為國務院「走漏消息」而訴苦外，從來沒有向我說起過「憎恨」國務院，猶如一二個人後來所傳說的。他知道他大多數有關外交政策的演說，聲明和信札，是由我和國務院的官員建議或者徇其要求而草擬初稿的。他對於我們這樣做，引為滿意。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大約在我進國務院十一年之後，他送一張條子給我，值得加以一引：「這裏，我送給你一份我送給邱吉爾的備忘錄。（這個備忘錄是附同於我先前送給總統有關自由法國委員會和義大利的關係的一個備忘錄的。）謝謝上帝，我和國務院並沒有他和他的外交部所發生的同樣困難！F. D. R.」

一般地講，總統的內閣在擬訂外交政策方面發生極小的作用，在內閣會議中，我發覺有關外交關係的並討論，不像想像的那麼多。

關於重要秘密，我對內閣往往保持緘默，因為曾有把這種消息走漏給受寵的新聞記者和廣播家的事情發生。據我所獲最可靠的消息，這種走漏僅限于極少數的閣員。

若干閣員時常侵犯另一個或其他閣員的職權。這種情形，以後曾有幾次使我感覺極不舒服，例如在討論對日禁運時，以及在華萊士的經濟戰爭局設法分配國務院和其他機關有關經濟戰爭的主要任務時，就曾有這種情形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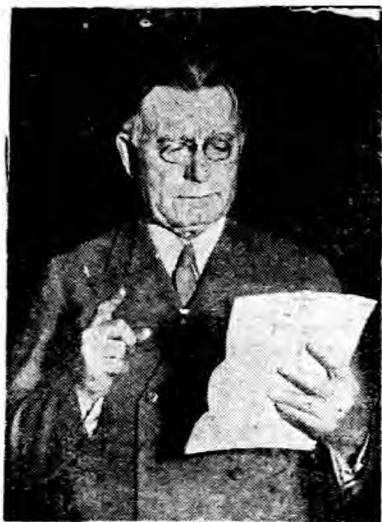
使外交工作和內政劃分開來既為我一貫政策，總統又專門辦理內政和純軍事的工作，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和總統個人相處並沒有若干閣員那麼密切，這是很自然的，因為辦理內政工作的閣員需要經常和他舉行會議，商討隨時發生而又幾乎數不清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產生一個由幾個人組成的所謂內部廚房內閣，也是很自然的。這些人往往用總統或者其他名義想干涉其他院部的工作，似乎不必獲得總統的吩咐。令人費解的是有二三個閣員以及若干白宮的隨員一直用總統名義，有時候來攻擊國務院的政策，而就在這時候總統和我却正和諧地在一起工作。這是我們這輩閣員中若干人必須忍受的若干不愉快經驗之一。

在這些內閣會議中，總統是輕快的，有趣的。他可親的人格令人充份地感覺到。他喜歡軼事並且喜歡講它們。他幾乎一直是很高興的，談起話來既輕鬆而又有情趣。

有一天，他一面露齒而笑，一面走進來參加內閣會議，稍為遲了一點。他說他剛才遭受到一個親屬的一點小小的無禮舉動。這個親屬對他說：「先生，你講得這樣多，以致我們永沒有說話的機會了」。總統一面講這樁趣事，一面大



赫爾及赫爾夫人



員 議 參 拉 巴



員 議 參 埃 那

笑，繼而回轉頭來對我說：「柯吉爾，你同意這種說法嗎？」

我回答說：「哦，總統先生，今天方才我來參加會議之前，有幾個新聞記者遇見我，並且對我說：

「部長先生，近來盛傳白宮的食物極為不佳。我們想知道你的意見」。

「我從來不吃白宮的東西的，」我回答說。

「什麼！」他們大聲叫喊起來。「我們知道你時常到白宮去吃中飯或夜飯的。」

「這的確不錯，」我說。但是在我到白宮去之前，總是先吃中飯或夜飯的。如此，當總統在吃東西的時候，我可以有稍為講幾句話的機會。」

總統跟大家一起大笑。

### (三) 整整十二年在緊張中生活

向來的習慣，國務卿幾乎每天總要去參加午宴或者晚宴，特別是晚宴。不論這種習俗究竟有什麼好處，消費許多間和更多的精力，是毫無疑義的。對於社交問題，我毫不猶豫地作一決定。我對外交團的人員說：

「我不能幾乎每天和你們一起出去參加午宴和晚宴，如此做來，將使我無法和你們會晤和商談，就是可以，時間也極有限；你們勢須去看我的助理國務卿了。或者，我可以拒絕和你們一起出去參加午宴和晚宴，結果將使我可以和你們有更長時間的會晤和商談。我喜歡後者。」

這個辦法獲得一般的贊同，並且我以為結果對於一切有關係的人物，都是頗有好處的。我的晚上可以比較自由一點，可以研讀我帶回家去的文件。白晝也可以更自由一點，可以和大使，公使以及國務院中的人員商討問題。在我以後的十二年中，我一直照這個辦法行事，除了官場上和外交上極需要時，偶然有幾次例外。

關於社交生活上免不了的一部份，赫爾夫人担当了起來，使我權益匪淺。她親自設宴招待外國來美訪問的政治家，以及辦理招待總統的內閣年宴。當我赴國外加參會議時，由於我不能親往訪問各國的代表，她就向代表的夫人們作社交上的訪問。

有幾個任職公家的人，往往經由相互諒解的辦法，不願將他們政治上和公務上的秘密，向他們的妻子透露，讓她們自滿於她們自己的社交生活，或者專負生男育女的責任。但是我，對於與我具有一些重要性的任何問題或人物，總隨時告知赫爾夫人。她謹慎地保守每一個秘密。無論在國外或國內，在她和外交家和政治家的談話中，我從沒有發現過她一次錯誤。

雖然我儘可能避免社交活動，但是我却允許自己有一種娛樂，這證明對於我的身心有極大裨益。

一星期中有一二次，選擇天氣好的日子，爲了澄清我的思想，鬆懈一下體力，以備應付尚待處理的工作，我就在下午四五點鐘約三個同伴，和我一同到「荷特萊」的草地上去玩槌球——該處是史汀生的住所，助理國務卿貝爾在他任職國務院的大部份時間中，曾把它租借下來住用。槌球變成我唯一的運動，在不大玩槌球朋友的眼中，我彷彿成功了一個專家。

對於某些人，槌球似乎太斯文，但是實際上是一種極科學的遊戲，玩槌球者必須全神貫注，不然就沒有獲勝的機會。一季中有四五次，我可以跑遍球場，不稍停頓。我讓二個或三個其他的玩球者首先開始；於是我從第一個門口出擊，開始和他們接觸，使他們跟我跑，然後一舉予以擊潰。

有一次，從前是我的助手後來擔任華盛頓國家藝術陳列館館長的麥克勃雷特，帶來了一個「能手」，把他當一個老朋友介紹給我。後來發覺他是美國某部的槌球選手。但是或許由於該選手對於當地的場地不熟悉，結果我勝了。

我不大能够玩一次槌球中間不受間斷。有時候史汀生走出來和我談話。另有些時候，我從國務院甚至從總統那裏接到緊急的電話。時常有國務院的官吏帶了文件跑來，要我在他們晚上離開國務院之前，把它們看過，並且簽過字。

槌球極使我滿意，因為它能暫時使我忘却工作，並且可以使我出去和空曠的空間和陽光接觸。但是在我任職國務院的最後幾年中，由於工作的日益繁重，我的醫生要我放棄這種遊戲。或許這種遊戲比大多數人所想像的，更費力些。

在我任職國務院的十二年中，事實上任何一天都可以說是緊張萬分的，各項緊急問題大量的擁擠進來，需要我的同事和我自己奮力去應付。我的整個任期簡直可以稱爲一個緊急時期。世界各部份人類性行的每一方面，都在我們面前經過，而我們則努力對每一重要問題作適當的處理。

每天早晨，我總設法在九時至九時十分之間到達我的辦公室，往往從我的旅館步行到國務院。我首先接見我的首席秘書。在最初幾年中，他就是麥克勃雷特（Harry McBride），他的經驗，判斷，能力以及應付國務院內外各色人物的手腕，對我極有助益。其後，則由格雷（Cecil W. Gray）繼任。格雷的細心，效能，忠誠以及服務上的各種良好品性，可以嘆爲觀止。

麥克勃雷特或者格雷帶給我來自世界各地各色各樣的大量電報和其他信件，並就我國駐外使領對各項局勢發展的估計，提供分析。其後，他就把上一天國務院內部所發生的任何重要事件，機密地給我敘述一番，並提出適當的建議。其次，他就把當天各項約會的一張表格，放在我面前。

當我閱讀放在我面前的一大堆文件，電報和公文時，如屬可能，我就隨時有所決定，不再舉行會議或進行調查，並

同時向國務院有關官員發出訓令，予以執行，我必須決定何者頗關重要，應通知總統或者由他裁奪。

於是，我就請副國務卿費利普（William Phillips）進來，其次是韋爾斯（Sumner Welles），最後是史坦紐汀斯（Edward R. Stehinius Jr.），而將對於他們執行職務有用處的情報，全部告訴他。其次進來的，就是各助理國務卿和國務院的其他機要官員，就有關他們工作範圍之內的特殊問題，進行討論。

一天之中，主張在我辦公處舉行緊急會議的要求，幾乎一直有得來的。其後世界的不安一年一年加甚，我們的困難也隨之擴大，因此我和國務院內機要人物舉行會議的次數，也愈來愈多。一有嚴重的問題發生，我就召集國務院中每一個有關人物，從上至下，並不遺留。凡是能對該項問題的任何方面有所貢獻的人，都被召集，並且給他一個表示見解的機會。經過最充份的會商和研討之後，我時常歡喜坐下來，作我自己最後的決定。

偶而，一個行動迅速的人會指責我考慮太周到，意思就是太慢。我對這種批評的明白答覆，就是說羅斯福時代在處理公務上所發生的錯誤，都由匆忙和缺乏考慮所致，而我所遵循的政策——就是一方面周密考慮同時又及時辦到——結果使許多熟悉內情的人都證從未造成重大的謬誤。據我所知，總統認為我從沒有使他陷入重大的困難，無論他在國內或者離開首都的時候，都是一樣。

我在起草或者閱讀文件時最喜歡用的一種文具，就是一枝紅鉛筆。我經常在我的襯衣袋中藏有四五枝，致使赫爾夫人大為頭痛，她力說紅鉛筆的污跡是難洗濯清楚的。

有一天，國務院的一個官員到我那裏來，表示拒絕前往出席在另一個地位比他低的官員那裏舉行的會議，我就對他說：「假如在會堂外邊的那個黑人脚夫能對我發生興趣的任何問題提供一些有用的意見，我一定高興走到他放在走廊裏的桌子那邊去和他談過。」

當我有些機密性質的東西告訴我任何一個助手時，我有時候對他說：「我是私下告訴你的——這不是說你可以私下告訴你第一個遇見的人。」

在接見外國的大使或者公使時，我早就採取一種不拘禮節的友好方式。假如我的總辦公廳適因舉行重要會議而容人太多時，我就在我的辦公室和秘書的辦公室之間的一個狹小房間中接見外交人員。後來我和英國大使洛齊安談判以美國驅逐艦交換英國根據地，就是在這個陳設幾乎是原始式的小房間中進行的。從此以後，假如一個外交家因為我在這個簡陋的房間接見他而稍露不愉之色時，我就會向他提起英國大使和其他最高級的外交人員和我一起坐在這裏舉行最重要的會議時的愉快情形。

在接見外國外交家時，我總設法用接待任何其他訪客時同樣誠懇和不裝腔作勢的態度。我對待他，猶如對待在我元

長的政治生活中所接觸的美國人一樣。一般地說，爲了一國政府的優點而就對它的大使讚美，或者爲了它的過失而就歸咎於他，我認爲這種辦法是不公允的。我的謙恭有禮也有少數例外。當另一個政府做出魯莽無禮的行動時，我就不怎樣客氣。在這種情形之下，在這個外交家一出現我的辦公室門口時，我就想出許多方法用極端冷淡的態度來接待他，並且表示我個人和我政府的憎恨情緒，差不多到極點。這種情形，大抵是在後來幾年中發生於接見日本大使的時候。

在應付外國的大使時，在許多原則之外我又立下兩項原則。其一是不作恐嚇之詞，除非我們有實力和意志作後盾；沒有實力做後盾的恐嚇是虛張聲勢，虛張聲勢是可以招致害人的結果的。

另一是如無履行諾言的把握，就不作諾言。我時常講一隻故事給我的同事聽。故事是：在田納西州沿湖的某城，有一個人開一個小店。某天，他和一家食物公司接洽，願意出售一車的蛙腿。談妥之後，這個公司的代表來了，他們就簽了一個合同。幾個月之後，爲了蛙腳並未交貨，這個代表又來了。他在店中祇發現了兩隻蛙腳，於是就問店主爲什麼不守信用。這個人就說：「哦，湖的周圍青蛙的聲音是如此雜鬧，我想至少一定有一車呀！」

一俟一個大使或者公使離開了我的辦公室，我的速記員之一就從另一扇門中自動地走了進來。我立刻把討論的經過概要地念給她聽，把剛才他同我講和我同他講的話，儘量準確地記錄下來，並且把我們中間一人交給另一人的任何書面文字附在一起。我就把這個備忘錄的內容，用電報通知我國駐在剛在來訪問我這個外交家的政府所在地的大使或公使，使他充份明瞭這方面的種種發展。其他的電報發往我國駐在其他國家首都的代表，假如當時發生的情形對於這幾個國家也有關係的話。

#### (四) 踏進國務院後第一樁工作

當我進國務院的時候，我國政府已經在準備將在倫敦舉行的經濟會議了。由國際聯盟召集的籌備會議，已經在日內瓦舉行過，並且擬定了一個繁複的議程。爲了作更進一步的準備起見，總統就邀請和我們有重大商業關係的十一個國家，遣派代表到華盛頓來和我們討論經濟問題。

總統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七日發表廣播演說，列舉會談的四項目標。它們是：縮減軍備；減低貿易壁壘；穩定通貨，藉使商業公司可以事先簽訂契約；在所有國家間重建友好關係和更大的信任。此外，總統和英首相麥唐納會就戰債問題舉行過一次特別會議，未獲結果。

關於戰債談判，我很少參加。總統將該項工作托付助理國務卿莫萊（Raymond Moley）。我認爲這個問題，牽涉財政部的方面較多，牽涉國務院的較少。此外，我相信戰債問題已經變成一頭死馬，我倒以不牽入其中過甚而引爲滿意。



大約就在這個時候，莫萊有一天早晨到我的公寓來。他面部的表情是嚴肅的。他繼而就對我說，他並無意於佔有我國務卿的位置，和外邊所流傳的謠言相反。在他走了之後，我對另一個訪客說：「莫萊的腦筋中至少有這個念頭。」這點以後在許多方面獲得證實，而在倫敦會議時達最高潮。

一九三三年五月初，我在總統同意之下，訓令當時駐在倫敦的戴維斯(Norman Davis)向倫敦經濟會議的組織委員會建議臨時關稅停戰。其他的國家起先反對，但是最後接受了，不過附帶各種的保留和解釋。

五月二十日，莫萊突然發表了一篇廣播演說，事前或事後都沒有和我商量過。在這篇演說中，他肯定地否認可以在倫敦會議中得到有益的收穫，就是會議成功，也無裨益。他說國外貿易極少重要性。這篇演說，以美國政府實際立場的形式，向美國全國廣播，和以後發給派往倫敦的美國代表團的訓令中所採取的立場，顯屬不符。而且這篇演說又屢屢在歐洲轉播，以致損害了美國代表團的立場，尤其是我的立場。在這種情形之下，莫萊例應由總統加以嚴厲的訓斥，但不幸羅斯福先生有時候往往以過份的自由給予他的密友，而沒有顧到其他的友人。

直到五月底，當我率領的代表團準備乘輪前往倫敦的時候，即將在倫敦討論的減低關稅壁壘問題，以及全國復興局和農業調節局(尤其是前者)所主張的高關稅要求之間的矛盾問題始被提出，祇不過簡單地討論了一番。我對於出席倫敦會議的幾個目的，立場堅定，其中主要的一個就是減低關稅。直到我們啓程之後在遠渡重洋時，並沒有採取過相反的行動。

五月三十日，總統接見除了我自己以外還有其他五個團員的代表團。總統在任命這幾個團員時，事前並沒有和我商量過。

羅斯福先生給我們一個備忘錄，其中說明在倫敦應該遵循的政策。他要求我們在會議中立即提出的幾項重大問題，乃是：在會議期間實行關稅停戰；爲一種協調的貨幣財政政策，訂定若干一般原則；取消外匯限制；就逐步消滅人爲貿易壁壘和減低關稅，獲致基本協定；同意若干種基本商品的生產和分配。我帶有概括這些題材的六種決議案，準備在倫敦提出。

五月卅一日，當我從紐約乘「羅斯福總統」號首途之時，我袋中懷有一份互惠貿易協定法案的副本，這個法案當時正在總統的辦公桌上。我預期可以把這個法案給在倫敦的其他代表團傳觀，用以證明我們爲減低關稅而作的努力，是具有誠意的，並且力能做到。我希望在會議進行到相當階段時，總統可以將該項法案向國會提出，而能獲得通過。但是事態的發展，使我無法在大會中提及，僅能作爲參考而已。

在旅途中，我開始一種習慣，這種習慣，以後幾年爲出席各項會議而乘輪往返時，我一直予以保持——那就是在船

上努力的工作。我從不暈船，此點頗堪慶幸。縱使在氣候最惡劣的日子，我還是能够閱讀書寫，隨心所欲。我往往沿着甲板，作長時間的散步，作爲一種運動，偶而在甲板上玩一次高爾夫球。每天，我在船上和我一起的代表和專家舉行幾次會議，並且隨時以無線電和華盛頓保持聯繫。

我細想在當時對較大國家具有興趣的三個經濟問題中，我真正能够在倫敦提出討論的祇有一個。這三個問題，就是戰債問題，立即穩定通貨問題，以及減低貿易關稅壁壘問題。戰債問題完全置之不談。穩定通貨問題是預備討論的，但僅由財政部和聯邦準備銀行的專家負責處理。此事與會議無關，不在美國代表團工作範圍之內。僅餘的一個問題，就是減低貿易壁壘問題。

就在那時，我在輪船上開始從華盛頓接到無線電訊，傳來關於提高——不是減低——關稅以及實施進口限額新立法的消息，顯示總統將不以貿易協定法案向國會提出。在乘輪航行一星期之後，我於六月七日向總統發出一個無線電報說：

「聽說總統將不要求國會授權政府，根據相互關稅讓步，談判互惠商業條約，由國會保留否決權，猶如國務院的法案草案所擬定的。我誠懇希望這些消息並無根據。我經過深思熟慮之後，覺得這種辦法，除了可以對我國出席倫敦經濟會議的代表團的任務發生最重大的阻礙之外，並將遷延談判此類商約的權力到一九三四年，實屬重大錯誤。」

總統回答說：「我對於你爲了在本屆國會中關於關稅問題應採取的行動而表示的焦慮，我完全理解，並表贊同。但是在國會將近閉幕的幾天，局勢是如此之緊張，致使立即休會成爲必要。不然，分紅立法，紙幣膨脹等等……可能被通過所以有關關稅的立法不但似乎極不相宜，並且是不可能有所成就的。」

「你具有充份權力，可以根據相互的關稅讓步，在倫敦談判一般性的互惠商業條約。此外，並無理由說你不能籌備在華盛頓召開會議，以與個別國家從長計議肯定的互惠協定。」俟國會重開，所有這些協定，不論是一般性的或者是兩邊性的，都可以向國會提出，要求通過。」

這個消息是一個可怕的打擊。它從根本上打消了我到倫敦去的基本原因之一。本來，我希望靠了這些基本要點，可以在會議中獲得真正的結果，謀使各國——雖然是逐漸地——從世界不景氣中自拔出來。在我的立場和總統在他電文中所倡議的意見之間，根本的異點是如此：

在我看來，國會必須授權政府，談判互惠貿易協定，包括減低關稅在內，並在某種限度之內，這些協定可以生效，不必經由參院核准。這一點，後來在一九三四年六月間是做到的。但是總統所建議的辦法，是在舊的基礎上談判關稅條約，意思就是說它們必須提交參院，由三分之二多數加以核准。這種辦法既不給我幫助，也不給我鼓勵，因爲從來沒有一個美國參院，曾經核准過經由政府談判主張大事減低關稅的貿易條約的。至於事前未經國會授權而談判的貿易條約，

更不必說了。

當我抵達倫敦的時候，其他國家的代表團已經深知美國代表團極困難的處境。總統於六月九日宣佈，說他不將以關稅立法提交國會。其他的代表團立即避免商討任何條約，因為他們相信這會無限期的在國會中被積壓起來的。

六月十一日，在倫敦會議開幕的前一天，總統打電報給我說：「關於減低關稅和消除貿易障礙，你不必為此間的情勢擔憂。國會中為內政問題所作最慘的爭論，使有關關稅的一般辯論，對於我們的整個計劃成爲危險。」

「我堅決地支持你，此間所說的或做的，不會妨礙你的努力。你的政策或者我的政策沒有變更之理。並且還記着，假如我們能使條約簽字，我可以在秋季單獨召開參院的特別會議，考慮批准。」

但是我在這裏沒有什麼希望。總統在口頭上支持我，但是假如我要在倫敦有所成就，我也需要用行動來支持我。

但是有一樁極重要的事實，不應予以忽視，就是幾乎所有的國家之間對於一種可以接受減低貿易壁壘的辦法，意見懸殊。英國正向往限額制度方面走。若干金本位國家像法國，比利時，荷蘭和瑞士，在考慮減低關稅之前，要求暫時穩定通貨。其他的國家提出其他的先決條件，像戰債救濟之類。

從來沒有一次會議像這次會議那樣纏繞不清的。在大部份時間中，似乎一直在濃霧中摸索。在這裏，挑撥家，煽動家，乖戾的人物，和奸刁的評論家，可以大起忙頭。

這種表現於倫敦會議的矛盾見解和態度，也伸展到美國代表團中間來。美國代表團中有主張高關稅的團員像參議員畢德曼 (Key Pittman) 等。對於穩定通貨問題，事實上對於其他一切問題，意見大相逕庭。出席一個世界會議的代表團團長對於全體團員人選，竟無機會和總統事前協商——或者讓代表團人員獲有此等清楚的印象——實屬錯誤，其不幸程度，實少有甚於此者。因爲這樣一來，若干團員就缺乏忠誠協力的意識，其他的團員竟表示公開的蔑視。這是我的經驗。

### (五) 莫萊！「控制總統的人物」

倫敦經濟會議固然令人失望，但也有幾個比較輕快的場面。赫爾夫人和我曾出席過英王喬治的宴會。事前，我們已經計劃好作一次郊外的閒遊，需要我們離開宴會到離城幾英里的鄉間去。我設法想使會議有所成就，苦無充分條件，當時的緊張情緒，使我疲乏異常，處境如此，我覺得無論如何應該休息一下。出席英王宴會的貴賓雲集，包括六十六國的代表，備形熱鬧。我等待了相當時間之後，覺得再等下去要使我們的旅行不可能了。於是我就建議，主張我的同伴和我應該悄然離開，不給任何人注意。我無法獲得一條捷徑走近英王。後來我得悉當我剛離開的時候，英王就派人來召我，但是曉得我已不在場了。

於是我就通知適當的英國官吏，說明假如英王同意，我希望去晉謁他。我立即接到答覆，表示贊同。我發覺英王極民主，他誠懇地接見我，並且對美國人民深致讚揚。繼而我們就倫敦會議及其目標約談三十分鐘，空氣和諧友好。我們同意議程上所列各項題目的重要性，以及每一題目必須儘致適當解決的必要。英王表示在會議的較後階段，希望再遇見我一次；不幸此一時機終未到來。

會議的一籌莫展，已經呈露明顯的徵象。就在那時候，我得到消息，說總統正派莫萊到倫敦來，作為聯絡人員，以便將華盛頓方面最近的發展通知我們。關於莫萊乘坐飛機到羅斯福先生的遊艇上去見總統的戲劇性演出以及關於莫萊離開華盛頓和紐約的種種喧鬧和猜測，開始在報紙上紛傳，彷彿在使各地民衆獲得一種印象，就是說他到倫敦來，是帶有總統的新訓令或者一種新意見的，甚至可能接管美國代表團。從那時候起的以後七天中，他正在海上，會議也在等待時機。倫敦報紙以大號頭條標題刊登消息，說莫萊——「這個控制總統的人物」——正在到倫敦來照顧美國在那裏的利益。巴黎報紙渲染得更厲害，對我極爲魯莽無禮，指出我未能替我的政府處理當前的局勢。

倫敦方面對莫萊的招待空前熱烈，其程度僅次於招待帝王。高級官吏的代表團，新聞記者和其他人物。感情衝動，急忙到普里穆斯去迎接他，爭相致敬。他到倫敦之後，就到辦事處來訪問我，和我握手，向我致意，並且和代表團會晤。報界希望他招待記者，我就伴他前往，但是甘自退縮在後，而在新聞記者的眼中，莫萊彷彿是美國人中唯一值得見一見的人物。其後，我就極少遇見莫萊，直到最後的危機到臨。我決定把一切他所需要的工具放在他手裏，看他在倫敦這種局勢之下，能够維持多久。

他到倫敦不久之後，莫萊就傳言給我，要我向代表團傳達一項消息，說他想集中注意力於穩定通貨問題。他立即開始和財政大臣張伯倫 (Neville Chamberlain) 以及英國財政部經濟顧問李滋羅斯 (Frederick Leith Ross) 進行談話。據說第一次會議是在美國大使館舉行的，莫萊就就擱在那裏。

在其後幾天中，各國政府的首相，總理和其他最高級官員，爭欲與莫萊會晤，好比他是一個「具有魔力的吹簫者」。我繼續退縮在後，彷彿我是最不重要的人物，猶如會議的一個累贅。

有一次麥唐納首相問我：「你能不能叫莫萊來見我？我想同他談話。」其後他轉了一個念頭，加上一句說，「假如你高興，也可以來。」

幾天之後，麥唐納叫我進去，對我說話的神氣，彷彿是先生對一個小學生講書。他說，「在這樣一個會議中，習慣上是不宜向報界發表聲明的（我發表了一兩個），你知道嗎？簡直不行。」

我反駁說，「另一個代表團的領袖，越過了，我，跟着和我的一個屬員直接商談，習慣上也不見得更通常。」

但是從各方面說，麥唐納是一個可敬愛的人物，能力極佳，談吐流暢。在任何團體之中，不久就能引人注意。他是一個博覽羣書的學者，一般常識，驚人豐富，特別是有關政府的常識。

若干主要外交代表和若干外國報紙隨便在講莫萊到倫敦來，不僅是以聯絡人員的身份，而是以總統代表的身份來的，賦有充份力量，其程度猶在代表團之上。莫萊對此，早有所知。當這種消息迅速在英倫傳佈，歐洲大陸的態度對代表團尤其是對我顯屬不利時，莫萊在各國首相，總理以及高級權貴角逐之下，在行動上彷彿他是完全代表美國政府的；雖然他表面上對於他佔有這種地位的說素，屢表抗議和否認。

莫萊談判好了穩定通貨的一個協定，並且用電報報告總統，請他批准。他自信甚強，以為總統一定會接受他的意見，所以他竟通知英國和其他政府的高級官吏，說他將在六月三十日下午某時在唐寧街十號和他們會晤。不久，他就打電話到我旅館來，極懇切地要求我到唐寧街十號去，以便簽字於他認為即將成立的協定。我迅速而直率地拒絕前往，並且堅決地說明，以我倫敦會議代表的身份，對於穩定通貨問題並不相干。他不斷懇請，但是我打斷了他再作談話的嘗試。這種離奇的情形不能長久，勢必要來一次攤牌而告結束。這種演出，隨着總統的一個電報回來，他拒絕了莫萊所建的協定。那時候，我正準備出發到克里維登去，當我走出門來到旅館的石級附近時，莫萊匆匆地趕下來見我，並且說：「華盛頓來了一個電報，對穩定通貨是不利的。我們必須設法才是。」

於是我就對他怒目而視。我知道他已經黔驢技窮，一切都完了。我開始同他講話。我開頭說：「你還是以回去為宜。第一，你在這裏沒有應該幹的事情」。我在這幾方面翻覆說明。於是我走到我的汽車上去，到鄉間去度週末，因為在友好屢經敦促之後，我已經答應赴約了。

當我回到倫敦的時候，總統有名的「炸彈演說」已經傳到，其中對莫萊的穩定通貨建議力予拒絕，並且用堅強的口吻向倫敦會議申述意見。總統說，假如會議任命它自己把注意力從更廣泛的問題轉移到一種純粹是人為的，臨時試驗性質的，僅足以影響少數國家貨幣轉換的建議，他認為「這將是一種災禍，不啻世界的悲劇」。這個消息，使會議中羣情喧騰。

在這個演說到達幾小時之後，我國代表團副團長柯克斯 (James M. Cox) 州長趕到我的辦公室來；他的工作的一部份，就是我規定好的他每天應該會見麥唐納。他來時感情極為激動，說：「英國和其他國家爲了總統的演說，憤慨到如此程度，決定在今日下午召開指導委員會會議，再由該委會於明日召開全體大會，然後在大會中宣佈會議無限期休會。在決議中，它們將以破壞會議的全部責任，完全套在總統的頭上。」

我集中全力去阻止這種發展，以謀在尙未到不可收拾的程度之前，使形勢恢復寧靜。

我去見麥唐納；我最懇切地勸他修正態度，並且說幾句贊成會議常會繼續召開的說話。他極銳利地說他無意出此。他痛苦不堪地訴說總統的演說在破壞會議之餘，也使他的——麥唐納的——政治地位摧毀殆盡。在他，本來想冀會議的成功而使他的地位增強的。我已經得到消息，就是麥唐納在私人談話之中，曾經說過現在或許不得不辭去首相的職位了。

當指導委員會重開之時，縱使略有好轉，希望依然極爲渺茫。

我設法獲得發言的機會，致開會詞約二十分鐘。我維持我原來的立場，力言世界六十六國對於召開此次會議以及由會議採取行動解決亟待改善的許多金融財政問題，已一致同意其絕對必要，除非任令整個國際機構更接近完全崩潰的程度。

各國代表繼起演說，有支持麥唐納的，有支持我的。加拿大首相貝納特(Bennett)，日本的石井，和瑞典代表，堅決支持我的立場。張伯倫也贊成我的意見。

我們反對休會的論據，相當動人，頗有擊破英法計劃的力量，所獲結果，使我覺得很突兀，猶如使我覺得驚奇一樣。甚至麥唐納首相也游離了他原來的立場，和我們一起向反對方向行動。經過二小時的辯論之後，大會同意會議應繼續開下去。

其後的三星期中，都是紙上談兵，當時我們搜尋可以討論的零星題材。

莫萊回國去了。事前，他發一個電報給總統，就性質上講，是對代表團作一嚴厲檢討的報告。他隱言整個代表團未能在會議中代表總統，僅畢德曼爲例外。事實上，畢德曼是貢獻最少的一個人。他對於白銀問題的決議案雖屬例外，但是極少數人對它發生興趣。莫萊很天真地把這個電報用國務院的密碼發出，內容被美國代表團所獲悉。除了畢德曼之外，每一個代表對之不勝憎恨。

七月二十七日夜，我乘「哈定總統」號返國。在離開倫敦之前，我接到總統一個電報：「在你啓程之前，我希望你再曉得一次我對你的敬愛和信任。你應付了重大的困難，精神可嘉，並且經由你自己的勇氣和誠意，挽救了國際繼續討論世界複雜問題的原則，免於瓦解，未使更進一步的考慮成爲不可能。當你下星期抵達紐約之時，我將在海德公園，極希望你和赫爾夫人當夜就來。」

我應該說明，從那時候起，總統決定他不擬再以任何特權給予莫萊，至於管轄美國代表團的權力，更不必說了。這是出諸總統自己的意志。他說他的意思，祇不過叫莫萊以聯絡人員的身份到倫敦來一趟，把代表團可能希望獲得的消息帶來，並在幾天之後返美，把總統可能希望從代表團那裏獲得的消息帶回。他告訴我，各界對莫萊到倫敦的消息大吹大擂，以及莫萊對外界傳說加以鼓勵或予以默認，或者兩種心理兼而有之，用心昭然若揭，此點使他極爲震驚。總統派

給葛萊一些次要的工作，不多幾星期之內，把他調出國務院。

## (六) 每一筆在我心上寫上喜訊

一個從事政治的人，他的生命是由一連串的矛盾所構成的。我深嘗個中滋味，但是沒有比爭取貿易協定的鬥爭，來得更冗長，而同時又是更成功，更重要的。當我第一次在國會發表演說，籲請減低關稅和減少貿易限制的時候，時年三十六歲；其後，在一九三四年我們最後獲得勝利的時候，我已經六十二歲了。按在一九一三年通過恩德荷特法案 (Underwood Act) 時，減低關稅曾獲得暫時的勝利，終因世界大戰爆發而大受影響，一俟共和黨在一九二二年執掌政權之後，他們立即把它撕成粉碎了。

當我從蒙吉維多回來的時候，我發現了兩件事情：一方面，總統對貿易協定計劃，表示贊成；但在極端相反的另一方面，他又在我離職期間任命匹克 (George M. Peek) 主持一個委員會，以謀調整國外的貿易關係。匹克曾經擔任過農業調節局局長，不信任減低關稅的措施，贊成在全國周圍樹立禁止通商圍，藉以實施全國復興局和農業調節局的政策。他的理論假如一旦實施，意即貿易協定政策的壽終正寢。此項任命，適發生于商業政策執行委員會成立一星期之後。我立即會同商業政策執行委員會開始工作，起草貿易協定法案。我發覺委員會中意見一致，主張國會應該指導並授權總統，成立互惠貿易協定。大家認為唯有這種政府可以付諸實施的協定，可獲成功。假如條約中含有大量減低關稅的規定，而須提交參院核准，則萬無成功希望。

我相信在我國外交政策經濟的一方面之上，乃是政治的一方面，但是兩者又密切相關。在我看來，我們一日不放棄在經濟領域之內挑撥別國的敵意，欲謀與其他國家在政治領域之內發展友好關係，實際上似無可能。當我們正在經濟上和它們作戰之時，何能和它們協力促進和平？在我進國務院的時候，我發覺在國務院的檔案中有三十四件正式而強硬的外交抗議，這些抗議是在史莫德—哈萊高關稅法案 (Smoot-Hawley Act) 通過後，由不下三十四個國家提出的。它們的抗議也不以文字為限。它們認為禁止它們的輸出品進入美國幾等於禁止通商。盛怒之下，它們以實際行動相報復。

當我從蒙吉維多回來的時候，我即單刀直入，準備把貿易協定方案向國會提出，並予以通過。一九三四年二月末，我們已經完成貿易協定法案。頗有諷刺意味的一點，就是我們的對手匹克，竟對我們頗有實際的助益，草案原文太長，太複雜，匹克建議：「將法案縮成二二三頁，機會可以較佳。」我們遵照他的意見，他是對的。

三月二十日，該法案以二百七十四票對一百一十一票獲得衆院通過；六月四日，又以五十七票對三十三票獲得參院通過。在參衆兩院中，輿論方面對史莫德—哈萊法案的嚴厲反對，對於我們頗有助益。

六月十二日夜九時十五分，我親自看到總統在白宮中簽字於法案之上。總統的每一筆觸，彷彿在我的心上寫上一個喜訊。多年來我爲確立互惠貿易政策以及減低關稅壁壘而作的長期鬥爭，終獲最後勝利。

貿易協定法案是什麼？根據我在國會和國務院的經驗，覺得大眾對於我國政府在外交方面的許多廣泛政治行動，較易把握，也更有興趣，不若經濟行動的難以捉摸。要明瞭一個外交上的抗議，一個政治性質的條約，一個大使的被召回或者一個新政府的被承認，並不太困難。然而要明瞭國外商業，關稅，通貨匯兌和債務的交互關係，的確是困難的。

貿易協定法案本身是簡單的，根本上包括三個要點：貿易協定可以談判，不必先行提交國會；關稅可以減低達一半之多，唯以我國須自別國獲得同等的讓步爲條件。凡是對我們不加歧視的國家，減低關稅辦法一律適用。

開頭兩點毋需說明。第三點是引起不少爭論的題目。這就是所謂無條件最惠國條款。這個字句並不是最切當的。它給人的印象，彷彿是獲得或者給與優惠的或者特殊的待遇。實際上，它的意義不過是：「我不會對待你，比我對待得最好的人壞些，祇要你不對待我，比你對待得最好的人壞些。」

至於減低關稅，含義很簡單，就是當我們對從A國輸入的若干種物品減低稅率時，我們對從B—Z國輸入的同樣貨物稅率也同樣予以減低，祇要B—Z國對從我國輸往的物品，也給予我們和它們給予其他任何國的同樣低的稅率以及同樣多的自由（所謂B—Z國，係指除A國以外的其他國家——譯者）。假如B國對我國的產物，比對從任何其他國家所輸入的產物課以更高的稅率或予以更多的限制，那麼B國對我們的輸出品也須付出根據史莫萊—哈萊法案而定的高稅率——這在美國歷史上是登峯造極的。

在實踐上，我們一向以有條件形式施行最惠國原則，直到一九二三年。這就是說，當我們和A國簽訂一項關稅條約時，我們減低關稅的辦法並不適用於B—Z國，除非B—Z國同意給我們與A國給我們的同樣讓步。哈定總統時代的許格國務卿，開始以無條件形式施行此項原則。

最惠國原則的有條件形式，證明是一種失敗。爲什麼？任何兩國之間的貿易與其中一國和其他一國的貿易，無論在產品上或者數量上，事實上是永遠不會相同的。假如我們對A國減低某幾種關稅以交換A國對我們減低某幾種關稅，要說明A國對我國某一項稅率的減低，究竟以什麼作爲交換，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就無法到B國去，並且說：「我們願意把給予A國的幾種低稅率給予你，假如你能够把與A國給我們的幾種相同的低稅率給予我們。」B國可能對於我們和A國所訂協定中規定的貨物，並不發生興趣。這種制度同時也造成和許多國家進行永無休止的談判。

所以貿易協定法案特別聲明必須實施無條件政策。但是有些人反駁說，這樣，等於我們給予人家一些權利，並無相對的收穫。他們會說，「你對從A國輸入的馬匹，蕃薯種子和威士忌酒，減低了稅率，而你則從A國得到了對我國輸出



的汽車，小麥和豬油，減低了稅率。這固然很好！然後你就到B—Z國去，把我們給予A國的低稅率，也給予它們——你却得不到任何東西作為交換條件！這是不行的！」

但是事實是我們可以得到許多交換條件。B—Z國可以得到我們給予A國相同的低稅率，假如它們對我們不加歧視的話。B國一向或者祇以最低稅率適用於Y和Z國，但是假如B國要享受我們的低稅率，它就必須以它給予Y和Z國的相同稅率，給予我們。所以，使用無條件最惠國這個名稱，頗有引起誤解的可能。其他國家獲得我們的低稅率，並不是沒有條件的，而是以它們給予我們平等待遇為條件。

實際上，此一原則使美國出口商獲得了數千百萬的金元。

在貿易協定成立後的最初兩年中，由於我們從別國獲得的平等待遇以及不受歧視的保障，我國的輸出量，估計價值達二億六千五百萬美元之多。

其他的人會說反駁，將減低關稅的辦法，除適用於與我國業已簽訂貿易協定的一國外，再擴充到其他國家，如是做去，勢必使輸入品大量湧到。他們說，「減低自A國輸入的鞋子的稅率，可能是得當的，但是，假如B—Z國也按照同樣稅率把鞋子運到我國來，鞋子勢將充斥我國市場。」

答案是B—Z國並不都製造鞋子，以供輸出。或許僅有一二國輸出鞋子，並且可能較A國為少。

A國在某種商品上是我國的主要競爭者，而我們竟能允許A國減低關稅，不致損害我們自己的生產商，如此看來，我國的生產商極不致於因B國或C國的輸入品的競爭，而受到損害。因為從供應上說，它們究竟是次要的。

實際上，凡是向我國作輸出貿易的國家，總是某種或者某種商品的主要輸出者。由於氣候，傳統的技巧或者原料出產地的關係，它們最宜於為我們生產這些物品，較其他國家為美，為廉。

所以，在談判貿易協定的時候，我們特別注意減低這一類產品的關稅，而對於其他產品，則予以忽視，因為這些產品，它們對我國並不是主要輸出者。如此，我們可以替我們自己的輸出品，從A國獲得最大的關稅讓步，同時我國從A國的輸入，則集中於它擁有最多存貨的物品。至於我國對A國加以忽視的產物，則可經由與其他國家談判而獲得，一切總以主要輸出國為目標。這種辦法，就是所謂找尋「主要供應者」的辦法。

自從一九一六年起，我一直認為經濟戰爭足使政治戰爭滋長，而貿易止的不相歧視則足以減少戰爭的可能性。貿易協定法案係於一九三四年通過，然而翌年戰爭在非洲發生，三年後在亞洲發生，五年後在歐洲發生。所以，有人可能會說，「你看，貿易協定並不能防止戰爭。」

當然，我從沒有揚言貿易協定是防止戰爭的萬應藥。再者，在貿易協定通過之時，希特勒已掌握政權一年有半，正

在瘋狂地實行武裝；墨索里尼掌握政權幾已達十二年，正在計劃阿比西尼亞戰爭；日本進入滿洲幾已三年，正在準備退出海軍限制條約。貿易協定中所提倡的自由商業，對於這些國家並無用處，因為它們已在把它們的商業去適應戰爭的需要。

假如在一九二二年能够通过像貿易協定之類的東西，而不是通過福特奈——麥克肯勃法案(Fordney-McCumber Act)，猶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我所發表的幾次演說中所教促的，情勢可能改觀。

當我在田納西州農家做孩子的時候，我們有兩個鄰人——我且稱他們為琴金斯和瓊斯——他們互相敵視。許多年來，他們之間一向懷有惡感——我不知道為什麼。當他們在路上或者鎮上或者教堂裏相遇時，他們總是冷冷地互相睜一眼，從不交談。

其後，在一個春天，當琴金斯最需要驢子耕作的時候，他的驢子之一竟蹣跚起腳來了。同時，瓊斯却缺少玉蜀黍去餵他的豬。巧事來了，瓊斯已經耕作完畢，有一頭驢子閒着，而琴金斯却有一倉玉蜀黍。一個友好的第三方面使他們兩個人碰頭，於是瓊斯讓琴金斯使用他的驢子，用以交換餵豬的玉蜀黍。

結果，這兩個懷有宿怨的敵人，不久變成最要好的朋友了。一種普通的交易和通常的鄰居關係，使他們明瞭了彼此的經濟需要，終於言歸於好。

是的，貿易協定雖告發訂，戰爭還是來了。但是戰爭並沒有在美國和我們可以和它談判貿易協定的任何國家之間發生，這是事實。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凡與我們簽訂貿易協定的國家都和我們聯合一致反抗軸心，這也是事實。政治的聯繫，是以經濟的聯繫為依歸的。

### (七) 恪守原則像恪守宗教信仰條

當我跨進國務院的門檻之時，拉丁美國諸共和國本身之間，就在進入一種游離狀態，此一事實，使西半球的惡劣情勢更見緊張。新世界（指南北美洲）中歷來最激烈的戰爭之一，即察科戰爭，正在巴拉圭和玻利維亞之間的荒山叢林中猛烈進行。哥倫比亞和秘魯已經發生了邊境衝突，頗有演成真正戰爭的可能。此在古巴，馬却杜將軍(General Gerardo Machado)的獨裁政府在安度十二年之後，開始搖搖欲墜；革命在醞釀中。

展開在我面前的，就是預定於年底在芝加哥多舉行的泛美會議。這次會議早應在一九三二年十二月舉行，但當時由於西半球有效合作的希望是如此渺茫，決定延期一年。現在又有人一再講着再度延期了。

整個展望，惡劣已極，似乎令人心灰意懶。因此，我明白，假如要實行羅斯福總統所倡導的善鄰政策，在西半球方

面殊非易易。但是此項事實，也是一種挑戰，足以鼓起我們的勇氣。

早在三月四日以前，我就決定我們應付拉丁美洲的原則之一，應該恪守不干涉原則，像恪守宗教上的信條一樣。古巴的情勢，的確有使我們擔憂的理由。民衆對馬却杜將軍的暴戾獨裁，憎恨益甚。除非馬却杜辭職，不然革命就會強迫他離開，此種情形，已經極爲明顯。炸彈案和槍擊案，在哈那伐層出不窮，糖廠和甘蔗田被焚燬，學校關門，而在一九三一年因革命未獲成功而遺留下來的游擊隊，正在山區活動。政治犯源源湧入美國。政治不安之外，還加上經濟艱難，其一部份原因，乃由美國的高關稅政策。整個局勢，千鈞一髮。

根據一九〇三年條約的所謂潑拉德修正案，美國具有干涉古巴的權利，以謀保全古巴的獨立，或者維持一個力足以保障生命，財產和個人自由的政府。但是總統和我決定我們決不干涉古巴的內政。我們雖有合法的權利，但是此種行動，適足使整個拉丁美洲對我國的關係更趨惡劣。它會推測我們以前一切的不干涉聲明，並且替我們傳統的敵人製造口舌，而我的希望，就是要使這輩敵人找不到藉口。

羅斯福總統和我同意以大使的資格遣派韋爾斯到古巴去，假如古巴各黨派表示願意的話，他可以用總統調停人的資格，努力斡旋。根據總統的建議以及我的贊同，韋爾斯於一九三三年四月六日被任命爲助理國務卿。他有良好的能力和經驗，頗有野心。在後來幾年中，我們在判斷上十分相左。在最初幾年中，對於政策上的重要問題，我也覺得我和其他同事意見一致的情形，比和韋爾斯來得多。當然，我應該負一切決定的責任，而在每一情形之下，我總努力以赴。

一九三三年五月，韋爾斯啓程赴古巴，隨身帶着我五月一日頒發的訓令，其中說：「你應該時時牢記美國政府和古巴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存在於自主，獨立，平等國家之間的關係，不應該採取任何步驟，致使美國政府似乎更有行使正式干涉的權利之必要，這種權利雖爲兩國間現行條約中規定給予美國的。」我訓令他在能力範圍之內，應以一切援助給予古巴，改善經濟狀況，和古巴談判貿易協定，提供友好的調停，並且向馬却杜總統誠懇表示一點，就是我們希望他採取步驟以結束恐怖狀態。

八月十二日，馬却杜將軍請假離職，翌日，前國務卿凱斯貝蒂斯(Dr. Carlos de Céspedes)組成了聯合政府。馬却杜出走後，混亂擴大，到處發生襲擊生命財產的事件。羅斯福總統派了兩艘巡洋艦到古巴領海去，但是聲明，此一行動絲毫不含有干涉或者干預古巴內政的意味。

我們決定毋需給予凱斯貝蒂斯總統正式的承認，因爲政府的更迭，根本是照憲法的程序達成的。韋爾斯在努力工作，和各黨派保持接觸。八月十二日，國務院以總統和我個人的名義發電給威爾斯，向他表示熱烈的賀意，並且「對你的工作表示讚賞。」

我時常就古巴問題，和重要拉丁美洲國家的大使進行談話。這是和我所決定的原則相符合的，那就是說，凡是需要我們對拉丁美洲採取外交行動時，不論其性質如何，必須和我們南方的有關國家先行磋商。我們不願意採取單獨的行動。

局勢迅速地向高潮猛進，古巴陸軍中騷動擴大，叛亂日亟。軍隊在巴蒂斯泰軍曹部下領導之下發生叛變，凱斯貝蒂斯政府終告崩潰。就在那時候（九月七日），我從韋爾斯大使那裏接到一個很長的電報，建議遣派相當數額的美軍在哈那伐登陸，並且派較少數部隊在古巴其他城市登陸。

他在電報中說：「我所建議的辦法，將屬於極有限的干涉，性質如下：凱斯貝蒂斯政府應准予自由發揮其功能，恰如它未被推翻前一樣，具有充份控制政府每一部門的能力。當然，在大部份軍隊發生叛變的情形之下，它是無法以任何滿意的形式維持其權力，這一點是很明顯的。如欲使局勢改觀，除非美國政府願意予以協助，以維持公眾秩序，直到古巴政府獲有充份時間……組織一個新陸軍，假如「凱斯貝蒂斯政府」如此要求的話。我們要執行這樣一種政策，勢非以相當數額的軍隊在哈那伐登陸，並以較少數軍隊在該共和國若干比較重要的港口登陸不可。」

韋爾斯大使還說：「在我看來，這個政策的缺點，完全在這一方面，那就是我們將招致古巴境內過激派和共產團體的非常敵視……但是在我看來，又覺得此間局勢的詳細情形，既已向拉丁美洲各國代表充份說明，遣派軍隊在古巴登陸極明顯的在「善隣」政策範圍之內。這種政策在過去五個月中，已在我們對古巴人民的關係中儘量使其表現出來。」

我在細讀這個電報並加以消化之後，我就親自帶了它到白宮中去見總統，請他一讀。其後，我就堅決向他表示意見，說明我們不能夠並且不應該想到干涉古巴的局勢，縱使是有限程度，亦所不取。在我看來，韋爾斯過份受了當地局勢的影響，未能顧及在我們徇其要求之後，將在整個拉丁美洲引起的嚴重反響。根據我和總統先前的談話，我知道他干涉古巴局勢的決心，像我一樣堅決。羅斯福先生迅即對我的觀點表示同意。他說他僅將派一艘巡洋艦到古巴領海，那裏我們已經停有幾個小編隊。除非爲了撤退處在古巴政黨衝突夾縫間的美國公民，海軍船隻嚴禁派遣軍隊上岸。

在我和總統會議之後，我就回到旅館中去起草致韋爾斯的覆電，那時已近傍晚。一俟草擬完竣，我再到白宮去。總統和我迅即對電文章稿意見一致。於是我就回到國務院，而在晚上八點鐘的時候發出了我們業已同意的覆電，內容如下：

「我們充份欣賞你在電報中所列舉的各點。但是，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總統決定發給你如下的電訊：「我們深切感到任何諾言，不論是含蓄的或是坦白的，凡是牽涉到在任何情形之下美國將有所行動的，都不可能。這將被認爲破壞中立，在許多黨派中偏愛一個黨派，以及企圖成立一個政府，而這個政府，在全世界特別是拉丁美洲看來，乃是美國政府

的一種產物。」總統和阿根廷，巴西，智利和墨西哥代表的談話，已經獲得美國和整個拉丁美洲的廣泛贊同。任何行動，凡是和規定的政策相反背的，將造成嚴重的後果。

「上面所述，當然不是說你應該去阻止，更不是說你應該去影響任何派系的動態；換言之，嚴格的中立係屬必要。」

凱斯貝蒂斯政府垮台之後，馬丁博士（Dr. Grau San Martín）出任總統。我們暫緩承認他的政府，看它能否建立秩序，黨派間的戰爭繼續進行。就在這種情勢之下，我乘輪前往出席蒙吉維多會議，在我啓程兩星期之後，總統發表了一個聲明，表明我國政府願意重行討論一九〇三年的條約，這條約是給予我們軍事干涉古巴局勢的合法權利的。因此，在蒙吉維多會議揭幕之時，我們的干涉態度已爲世界所明瞭。

在整個這一年中，古巴是我國對拉丁美洲新的積極政策的中心。我們對古巴的行動，可以向拉丁美洲其他國家證明我們的不干涉聲明，是否具有誠意。在我返華盛頓途中（從蒙吉維多），古巴的馬丁政府已經消聲匿跡，國民黨領袖孟蒂泰上校（Colonel Carlos Mendieta）擔任了總統。我在基爾斯特和卡弗萊大使舉行的談話，就是討論承認孟蒂泰的問題。

在談話完畢之後，我就通電話到華盛頓，向總統說明我支持卡弗萊大使的見解，就是孟蒂泰應予以承認。同一天，我從代理國務卿費里普那裏接到一個電報，其中說明總統將邀請在華盛頓的拉丁美洲各國代表，於下星期二或三在白宮和他會晤。總統將告訴他們，就是我們規定的承認古巴政府的先決條件，業已獲致，因爲孟蒂泰已經獲得了民衆的政治支持，並且在古巴武裝部隊的協助之下，政府顯有維持公衆秩序的能力。

現在，國務院就忙於準備一個新條約，以代替一九〇三年的條約。談判於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九日開始，我以及助理國務卿韋爾斯和古巴大使史端林簽字於新條約上。韋爾斯懇切地請求我，要我允許他和我一起簽字在上的特權，雖然這種辦法並不是慣常的。但是他既已參與談判的一大部份，所以我也就同意了。

羅斯福總統於同日將條約送呈參議院。在兩天的短時間，參院就票決贊同。批准書係於六月九日交換，古巴民衆爲了這件事宣佈休假三天，以誌慶祝。

## （八） 真實的論據最後說服總統

對貿易協定最大的威脅，並非來自外國，亦非來自共和黨方面，亦非來自若干製造商或種植家，却來自羅斯福政府內部，以農業調節局前局長庇克（George N. Peek）爲代表。

一九三四年三月，總統任命他做國外貿易顧問。假如羅斯福先生用大鐵錘當面打我一記，那麼使我暈眩的程度也不會比這個任命來得更厲害。單就做人講，庇克和他人相處的關係，是最可親可喜的。他在見解方面很忠實，抱定之移決不放鬆。但是我相信他的經濟觀念是不健全的。假如把它們來代替我們貿易協定所依據的健全經濟政策，勢必造成最深刻的悲劇。他和他同道所作的努力，時而獲得總統的協助，結果，幾乎排擠掉我的整套國際經濟政策和實施計劃。在我，是想靠了這些政策已和計劃推行到全世界去，從而改善經濟幸福與和平的。

庇克時常帶了整籃的統計材料到白宮去，總統支持他對報界的聲明。他給總統一個備忘錄，力促總統把管理全部國外貿易政策和談判的權力交給他。假如如此做去，他將把國務院以及商務，農業，財政各部對國外貿易任何方面的真正發言權，剝奪殆盡。幸而我能够阻止這種發展。

繼而，庇克就去和外國談判物物交換協定——這種辦法，歐洲正在行使，而我們就希望經由根據平等待遇原則的貿易協定而最後加以消滅的。他的出發點，無疑是忠實的，因為當時的確有美國的剩餘物資，必須在國外加以處置。但是他完全沒有看到此類物物交換協定，是和貿易協定不能同時並存的。

貿易協定法案以廣泛的政策和廣泛的貿易方法為對象，並不是以個別的物物交易為對象。我們的貿易協定政策的一個基本要點——就是商業待遇平等以及反對各種各樣的歧視和優先權——勢將被庇克的物物交換建議公開加以破壞。我們的計劃，是想經由減少國外的歧視和優先權以及促進貿易待遇平等的辦法，廣泛地提供輸出上的便利，尤其是輸出這些剩餘過多的東西，像棉花，烟草，豬油，小麥，汽車之類。依我看來，在世界各地維持這種政策是極端重要的。

在一九四三年整個夏季中，國務院的同事和我曾費去許多時間去反駁庇克的理論。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中，庇克和德國談判一項物物交換協定，於是矛盾達到了頂峯。德國一方面公開延宕對美國已經到期的二十億美元債務，因此對美國的債權人維持着最惡劣的信用，而另一方面它却裝着要和我們成立一個公平的貿易協定。同時，它又設法去撫慰別的國家，暫時償付它的債務以及貿易方面的欠款。

希特勒的經濟魔術家派了一個代表團到美國來，庇克和他們談判，獲得了一項協議。這項協議，具有德國待人接物的一切標準特色，猶如希特勒和沙赫特握住了別國的咽喉強迫它們接受的一樣。我們應經由進出口銀行以棉花八十萬包售予德國，德國則以全部代價中的四分之一用美元付給進出口銀行。至於其餘的四分之三，則以德國通貨償付，外加利息百分之廿二·五。進出口銀行可以把這筆通貨打一折扣，售予採辦德國貨物的美國進口商，以使用以償付這些貨物。

當這筆交易正在進行談判的時候，我竭盡力之所能跟總統爭辯，表示反對。我覺得總統對於國外貿易政策的興趣，已經大不如前，猶如他在競選和受任總統之前所表現的。在他致力研究國內改革之後，他已經極少時間去研究國際經濟

關係了。從我和他的接觸中看來，我不相信他正在密切注意國外經濟關係這一方面。

十一月十九日，我從他那裏接到一個非正式通知，其中說：

「猶如許多年中你和我曾經辦理過的大多數問題一樣，論據總是有兩方面的。在純粹的理論方面，你和我意見一，但是有些時候，我們必須修改一項原則，以便應付一樁硬性而沒有辦法的事實！且看在過去六個月中大批的日本棉布湧到菲律賓去。」

「我心裏想，假如你，和從極現實角度看待貿易問題的庇克，能够在某一晚上費去一二小時的時間，就最惠國條款這個問題商談一下，在許多方面一定是極有助益的。」

照一切實際的意義講，這種辦法無異要我把庇克請來，事實上放棄我的計劃，讓他在經濟領導方面取我而代之。我澈底相信總統和庇克對這個極端重要問題的見解，是錯誤的。在待遇平等這一點上，決無妥協辦法。或者你獲得平等，不然你就獲得不平等。你不能使兩者同時行得通。貿易協定法案爲貿易協定奠定了平等待遇的原則。假如這個原則被修正了，那麼總統所說起的「硬性而沒有辦法的事實」，勢將成爲更硬性和更沒有辦法。

我的確請庇克來了。但是，猶如我早就完全料到的，我們就他所提出的建議而進行的談話，完全沒有結果。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寫一封信到喬治亞州的溫泉去給總統，送給他有關商務政策的三個備忘錄。我說，「據我所知，政府若干部門對於此中所說明的見解，完全和諧一致，唯有我們的好友庇克是例外。報界方面，一般是支持我們的，猶如我在火車上向你說過的。」

幾天之後，我離開華盛頓到田納西州的那希維爾城去，預備在那裏發表一篇有關農業和貿易協定的演說。當我在返歸華盛頓時，我的助手麥克勃雷特在浮吉尼亞州的夏洛丹斯維爾城和我會面，帶來副國務卿費里普於十二月十三日所發的一封信緊急函件。這封信開頭就說：「在過去二天中，以一種出人意料之突兀姿態，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據我所知，對你一定是很難受的。」他把事實再敘述一番，說在十二月十二日庇克和總統進行會商，之後，白宮就通知國務院，聲稱總統已經核准了和德國商定的物物交換協定。費里普和白宮通電話，從總統那裏獲得了一個保證，就是說在我回來之前，暫不作最後的決定。

在我一回到國務院之後，我的同事和我立即把反對和德國進行物物交易的論據，搜集在一起，由我呈送給總統。我告訴他我們的貿易協定計劃將遭受嚴重的危險。目前我們正在和巴西談判協定，現在已經接到巴西的抗議了。巴西也是一個棉花輸出國，它說假如我們和德國成立了這種具有優先權性質的協議，它將被迫採取同樣措施，並且延緩和我們簽訂協定。

我指出這種交易，等於補貼德國輸入美國的貨物。由於用折扣的辦法把德國通貨售予採辦德國貨物的進口商，讓他們用以償付輸入的德國貨物，結果他們可以從德國以較低的價格獲得貨物，較從其他國家獲得同樣的貨物為廉。

這筆交易，規定按照舊的金元匯率把馬克折合成美元，如此，無異推翻了美元的貶值，至少牽涉德國的一部份是這樣。

我說我們的棉花輸出商事實上可能不能因為向德國出售貨物而獲得美元外匯。他們不致於被迫出售棉花以致蒙損失一點，並無保證。美國政府可能經由進出口銀行而蒙受其他損失。

我還說，物物交換辦法是以庇克的一種信念為根據，就是他以為我們除此以外別無辦法把棉花售予德國。實際上是適得其反。我覺得德國需要棉花如此之殷，它至少要買五十萬包，而將設法羅致美元外匯來償付它們的。

除了這一切論據的細則之外，還有一樁事實尤為重要，那就是這筆交易是歧視性的，而不是平等待遇性質的。德國輸往美國的每一種貨物，因此獲得了一種特殊的利益，每一個向美國輸出這一類產物的國家，必然會提出抗議，可能採取報復措施。智利大使對我們說過，假如德國的肥料在我們市場上享有優先待遇，猶如這個協定中所規定的，那麼智利將被迫把硝化物到這裏來傾銷了。

我說：「這筆交易對美國人是極大的歧視，對於德國却是一筆極好的物物交換生意；美國收穫極少，而冒險極大；建議中的計劃，在激烈反對希特勒政權的美國大部份民眾中，幾乎一定會引起極端的憎恨。」

幸而總統看到了這些論據的真實性。他撤回了对庇克這筆交易的核准。這也就是庇克意圖和別國談判類似交易的終結。從那時候起，包含于貿易協定原則和計劃中的新建議，不斷地削弱庇克的計劃，終於使它粉碎。我不斷向總統說明我們這個計劃的健全性，尤其是平等待遇的非常必要這一點。一九三五年二月十五日，我在致總統的一個備忘錄中說：「我國可以和其他國家採取舊辦法，把它的貿易活動僅限於極狹窄的範圍之內，祇做一些物物交換和兩邊買賣的交易，但是明白了在過去幾年中，我們的輸出增加了四億五千萬美元，而歐洲全體國家，運用了這種狹窄性物物交換協定和兩邊買賣條約中數以百計的方法和措施來增加輸出，所獲也不過如此，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能這樣做。」

我向羅斯福先生指出，我們第一個步驟，就是要消滅或減低過份的稅率，凡足以完全或者實際上消滅競爭的稅率，或者是實行了相當時期結果並沒有使國內生產量能夠滿足國內總消費量百分之十至十五以上的稅率，都在其內。同時，凡是適用於極無效能的商業或工業的稅率，或者對各色各樣的新奇製品，奢侈品，半奢侈品，實質上和本國生產品不同的東西，或者用途上不同的商品所課的稅率，祇要不致於對美國產品引起嚴重的競爭，都應該消滅或者減低。

兩個月之後，庇克的辦事處被取消了。貿易協定得了救，而以後的結果充分地證實了我們反對庇克的思想，是確有



根據的。

## (九) 卅年代的一個凶事預言者

羅斯福在政府的最初幾年中，德國正在武裝，日本正在從事戰爭，義大利在準備衝突。當時最不幸的一點，無過於西方三大民主國家——美國、英國和法國——之間的許多爭論，致使它們的關係蒙受不良影響。在我一進國務院之後，我立即發覺唯有上述三國採取相同的立場，才能使這三個好戰國家恢復理性，蘇聯倘能參加在我們一起，當然更好。但是實際上，我們之間的不協議和歧視，時常多於協調，呈現出一片慘慘景象。

在我們的對英關係中，西門外相時常是煩惱的根源。自從日本侵略滿洲時起，我似乎總覺得西門缺乏一種堅定的基本主張。根據一切得到的消息，我相信他替日本人考慮得太周到；我至今還這樣想。當總統在受任之後立即決定重建我國海軍，使它的實力達到條約所限定的程度時，西門要求我們放棄這個計劃，深恐它引起海軍的軍備競爭，但是他並不提出放棄建造當時正在動工的英國軍艦。在倫敦經濟會議中，西門是不合作的。他個性冷淡。

一九三五年三月間，西門對國際實地檢查軍火生產的原則表示反對，此點使總統極為震怒。我們應該同意這個原則，羅斯福先生和我意見一致。我把威爾遜公使於三月八日從日內瓦發來的一個電報送給總統，其中列舉了西門所以反對的三點理由：檢查將使英國軍備的危急情形，透露給大陸各國知道；假如英國人同意了，它們勢將對法國人放棄他們的「王牌」，因為法國人並無向該方面更向前進一步以謀成立限制軍備條約的意向；將軍火定單詳細公佈將給不公允的競爭提供一個基礎，而使英國的軍火工業受不利。

翌日，三月九日，總統在給我的一個短簡中表示意見，認為這是「極重要的一個電報。我想你應該留置一旁，將來可能有用。」他繼續說：「這個電報說明了兩點：第一，以傳說中的軍備薄弱為理由，英國不願意接受國際公開檢查軍備的原則，因此，使我們認為必要的一着，就是把這個原則適用於德國這一點——也無法進行。換言之，使德國軍備維持在一個相互同意的水準之下的唯一切實辦法，就是搜查德國的軍火供應，英國本身拒絕檢查，無異粉碎了這個希望。電報中最後一節，乃是公開承認英國所以拒絕接受詳細公開軍火定單的理由，是爲了它會使他們的軍火工業蒙受不利。」於是他總結一下說：「將來到一個時光，或許可以把它真相宣佈出來，證明現在的英國政府對於限制或縮減現行世界軍備或現行世界軍火貿易，並無誠意。」

「我感到非常懊喪。」

在華盛頓，當時的英國大使林特賽（Sir Ronald Lindsay）是難應付的。他和美國人的接觸，僅限於少數極高等

社會人士，他們大部份是反對羅斯福政府的。我們極難使他明瞭我們的觀點。我和他更有能力和更可親的繼任者洛齊安和哈里法克斯，相處得好得多。

應付英法的主要困難之一，就是它們互相之間沒有好自應付的能力。

英法之間的爭執，肇始於巴黎和會。法國希望把它的軍略國境移至萊茵河。它放棄了這種意向，用以交換英美公約，給予保障，但是這種公約從來沒有具體化。從那時候起，法國覺得英美一方面在依賴它抵擋德國，而同時又要求它削減實行這種防衛用的陸軍。英國希望一個更強有力的繁榮的德國。法國希望德國的實力在它之下。鑒於德國優越的工業實力以及對任何德國政府的不信任（不論其成份如何），法國對於使它自己和德國的軍備接近平等的任何辦法，不能同意。在另一方面，英國不喜歡法國在大陸上佔有一個高踞雄視的地位，更希望歐洲造成一種均勢，而使它自己的實力可以成爲決定的因素，舉足輕重。但是，法國雖然堅決反對英國對於大陸的觀念，還是不斷地企求和英國成立一個銅澆鐵鑄的安全公約，以防德國。

許多人將不斷提出的問題之一，乃是當時英法的實力既如此之優越而德國的實力又如此之處於弱勢，那麼爲什麼它們會允許德國獲得優勢而威脅它們自己的生存呢？此中道理，就是英法兩國都不想採取防止戰爭的措置。在英國，孤立主義的情緒，差不多和在美國一樣強。法國在一九二三年侵入魯爾區的時候，是想嘗試過預防措施的。結果引起了英國的激烈反對，而使波登卡萊（Poincaré）倒台。從此以後，沒有一個法國政府願意再從事於防戰爭了。

這裏，我們面對着民主國家的一個基本弱點，也就是人民具有重要發言權的政府所免不了的一個基本弱點。它們在許多許多方面固然享有上帝一切豐裕的祝福，但最不幸的是當它們面臨國外的危險時，不論是即將發生或者已經形成嚴重威脅的，一向行動很慢——簡直太慢。純粹的民主政治是雅典人對文明的貢獻，但是這個小國在面臨來自國外的某種威脅時，還要舉行公民投票來決定雅典是否應該作戰。這種缺乏領導以及對適當政府官吏的能力缺乏信任，結果使他們自己落入無法無天的侵略者之手，後者的目的無非是要俘虜和奴役雅典人。這種弱點，導致雅典民主政治的瓦解和最後毀滅。

假如在一九三〇年代，我們一方面能夠對於這裏以及其他愛好和平國家的個人和團體的各種矛盾意見予以適當的尊重，而同時爭取和平各國又能採取一致行動實行適當的武裝，我確信它們可以要求和德義日這羣盜匪國家攤牌，因而避掉最近這一次世界大戰的。

我們一方面努力改善對英國和法國的直接關係，以謀增進歐洲的和平機會，同時我們也不斷設法增進國際聯盟的威信，兼收並蓄，不謀而合。總統和我，都是威爾遜的信徒，對於國際聯盟，始終寶愛。自從一九二〇年以來，我們倆人

會屢次努力嘗試，企圖以勸導的方法和實際的行動來維護國聯，使它發展充分的力量，無結果。

有一次，總統對我說，他想到任命一個美國大使留駐於國聯的可能性。但在這方面，障礙過多。沒有別的非會員國家派有這樣的一個代表；我國對國聯的各種任務，正由我國駐瑞士公使充任予以執行。此外，國內的孤立主義者一定會借題發揮，拼命來攻擊政府的。

歐洲和亞洲方面，對於和平的威脅氣燄萬丈，但是在美國引起的反應，恰與情理相反。照事理講，這種威脅應該使美國民衆中的一大部份更願意和國外思想正直的國家團結，向顯在準備戰爭的國家用壓力。但在事實上，它們却使這些美國人慌張退縮，誓不和世界其餘部份的事情發生關係。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的信念是忠實的，但是懵懂地沒有看到一點，就是任何一處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戰爭，是不能不在許多重要方面影響我們的。

我自己以及和我合作的許多其他官吏，不斷向我們的國人以及外國政府指出，就是破壞和平的危險已經很大，並且還在擴大中。甚至在今天，還有許多人顯露着驚奇的神色，完全不明瞭或者忘懷了過去似的，高聲向當時我們中直接負責外交工作的人說：「一九三三年後的幾年中你們在做些什麼？你們爲什麼不發覺正在國外不斷滋長的危險？你們爲什麼不把這種危險以及奮起準備的需要通知美國民衆？假如孤立主義的觀點大大地妨礙了去發現以及使美國明瞭這種危險和威脅，那麼你們爲什麼不把這個異常重要的問題促使大眾注意？」

對於這些顯屬天真的問題和叫囂，已往的記錄提供了充分的答覆。當侵略的危險日益成爲明顯時，單在我任職國務院的最初二年中，我就發表二十次以上的演說和聲明，其中以英語所能表達的一切方法，提出強有力的警告，闡明危險的日益迫近。

我在其後幾年中繼續提出這種警告。我在準備這種公開演說時一直是很注意的。我知道它們一定會被國內廣泛引證，而外國政府大致也會把全文閱讀一過。它們不僅是表示我自己的觀點，而是表示美國政府的政策和觀點的。

有時候，爲了寫一篇演說要費上幾個星期。我會把一羣重要的顧問叫到我的辦公室來。我會對他們說：「我預定於某某日在某某城發表一篇演說，我心裏想到的如此。」於是我就把腦筋中形成的觀念，說一個輪廓給他們聽。我的面前可能有幾頁摘記，是在上一夜某一時光在公寓中寫的。其次我要他們提出意見和建議。最後我就在同事中挑選一人，叫他把這些意見草就一篇演說。一個重要部門的首長簡直天天要發表各色各樣的重要聲明，事實上的確沒有時間來草擬原稿了。

當演說的初稿送來之後，我就加以修改和重寫。於是我就把這份稿子分發給我的顧問，請他們把建議和附加的意思寫上去。

有一篇重要演說前後會寫過十五篇初稿，然後我給它一個最後的「O.K.」。

在我發表一篇有關政府某種政策的重要演說之前，我總先把原稿送給總統看過，信守不易。我常常親自送給他，一則因為在他沒有讀過以前，我不願它落入他人之手，二則在他閱讀之時我希望親自在旁，以便隨時有說明機會，並且可以目睹他的反應如何。總統靜靜地讀我的演說，但是在他發現特別引起他興趣的東西時，時常會發表意見。但是他提出建議或批評的情形極少，縱使有，也並非屬於根本性質的。

除了這些演說之外，我繼續用相同的語氣私下和大國的大使們談話。

人家回然聽我，但是不加注意。在二十年代，我在國會中一向是一個凶事的預言者，不意在三十年代，竟在外交方面重演。

### （十）孤立主義者不斷自尋煩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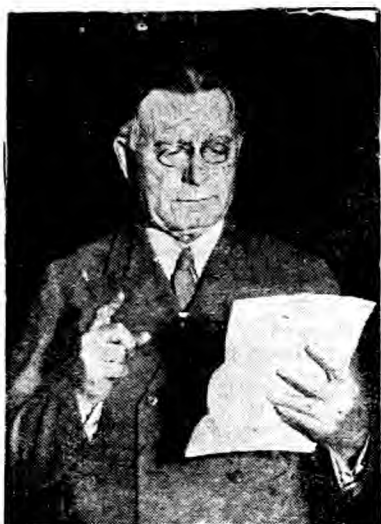
通往美國成立中立法案之路，是因聽取那埃委員會（Nye Committee）的意見而鋪起來的。這個委員會是由參院所成立，目的在調查軍火的製造和出售。我懷疑任何國會委員會有比這個委員會對我國外交關係產生更不幸的影響的，除了先前考爾威爾遜總統所提凡爾賽條約的參院外交委員會，其堪與以比擬。

北達柯泰州共和黨參議員那埃（Gerrit P. Nye）在發表了聲稱主張透露美國製造商向外國政府出售軍火詳情的論文之移，就在一九三四年二月提出一項決議，主張成立委員會進行調查。

在參院推許此項決議案通過之後，少數黨共和黨議員那埃由副議長茄納任命為調查委員會主席。那埃是一個孤立主義色彩極濃的人物，而決議案的通過簡直是隨便的結果，並沒有經過稍為審慎的考慮。這是一樁重大的錯誤，應由參議員畢德曼負責。畢德曼本人在好多方面也是一個孤立主義者。照例，為某種目的而成立一個特別委員會時，應該由多數黨——當時是民主黨——而不應該由少數黨的議員擔任主席，此在一個調查委員會，尤其如此。畢德曼雖然是外交委員會的主席，但是忙於其他方面的工作，決定讓那埃出來擔任。假如畢德曼推薦另一個主席，副議長是會接受的。

假如我能夢想到一個孤立主義的共和黨員會被任命主席的話，我是會迅速加以反對的，但是我總以為按照通常的習慣一個多數黨的議員會被提名，並且他曾把調查工作限於合法和合理的範圍之內，不致於使它成爲一種大規模的宣傳運動。

任命那埃是一個致命傷，因為委員會在他主持之下，開始擴大調查的範圍，企圖證明美國之被牽涉第一次世界大戰，是由美國銀行家和軍火製造商所造成的。它忽視了或者反駁我們參加這一次戰爭的重大理由，那就是德國潛艇不法擊



員 議 參 拉 巴



員 議 參 埃 那



有貼碼兩隔每意注  
單保色褪不永貓白

# 白貓印花布

大衆花布

- 紗泡泡
- 紡洋花
- 紗麻花
- 綢府花

花樣鮮艷  
永不褪色

上海新豐紡織印染廠出品

自紡·自織·自印·自染

沉美國船隻和毀滅美國人的生命，以及德國假如獲勝對於美國和它立國原則的危險。我們不得不倡導自衛的原則。我們這輩人抱有一種國際觀點，就是假如世界和平要以維持的話，美國必須參與此項努力；我們會就此斷據理力爭。所以這個委員會的大部份人，事實上在摧殘我們立論的基礎。他們的見解是：假如出售軍火和對交戰國的借款能予制止，美國可以自動地避免戰爭，不需要和別國合作來達到這個目的。歐洲和亞洲的危險日益增長，對於他們祇不過是我們應該退入我國海岸以內的一種迫切理由，因為他們是反對以任何援助給予別國，以謀解決此等危險的。

這個委員會侮蔑威爾遜總統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抱的動機和誠意，挖苦我們的前戰友英國和法國，並且替德意志帝國洗刷罪狀，因此對於我們何以參加一九一七年戰爭的理由，給予美國人民一個完全錯誤的觀念。委員會對於軍火的交易，無疑會作有用處的宣露，但是影響所及，却使我國落入最深刻的孤立主義之內，而撥諸當前局勢，却正是亟需運用我們的努力來協力避免國外日益迫近的戰爭威脅的時候。

委員會發覺全國熱中於反對大銀行家和軍火製造商的消息。它頗受大眾的注意，因此好勝的慾望更形提高，希望獲得更多的注意。它的首席調查官魯欣布希（Stephen Rauschenbush）在大體上說是委員會的主體，一般地指導它的活動。他渴望委員會登入頭條新聞，至於他的消息對於別國政府——不要說我們自己的人民了——究竟有什麼影響，却少極顧及，而消息本身又往往不過是謠言和半真實的真理。

更有進者，委員會的參議員，簡直太讓他們的首席調查官為所欲為了，猶如在這種情形之下往往發生的。委員會中的人物很整齊，頗有有能力者，有幾個人是一向以攻擊大銀行家和軍火製造商作為消遣的。這輩人物，對於委員會的實際工作以及對銀行家和軍火製造商的猛烈攻擊，是應該負大部份責任的。它們的宣傳主任不斷把所謂新聞，源源不絕地流入本國和其他國家的報紙。

政府方面，顯然沒有一個人可以抵擋獨立主義的旋風。祇要一提起調查，就會引起廣泛的歡迎。總統和我，當然同意和委員會合作，特別是為了它的原來目的，即調查軍火交易，是值得讚揚的。

委員會費去了一九三四年的整個夏季去審查文件和彙集證件之後，開始在九月四日陳述意見。我們和其他國家的困難也幾乎立即開始。布伊諾艾里斯政府抗議委員會有關某一阿根廷海軍上將的若干傳說。英國代理外相望西泰德（Vassiloff）對於有關英皇喬治五世的謠傳性質的指責，提出抗議。墨西哥政府抗議涉及羅特里哥士總統各點。其他拉丁美洲政府對於牽制它們若干高級官吏受賄的責難，表示反對。中國政府提出了一個備忘錄，否認從我們那裏獲得的一千萬美元小麥借款，會用以購買軍火。

結果我在九月十一日親自去看那埃委員會，同他們談了兩小時。我指出一點，就是由於公佈牽涉其他政府的首長或

高級官吏的謠言，我國的外交關係正蒙受損害。因此，那埃參議員就撥了一封信給我，承認委員會記錄中的若干聲明可能造成一種錯誤的印象，此點他深表遺憾。我自己也發表了一個聲明，闡明委員會或我國政府的任何官吏決無對任何其他政府或其官吏有絲毫得罪的意思。我把那埃的信札和我自己的聲明送給曾提抗議各國的大使。

但是，當那埃委員會開始公開涉及國務院的文件時，情勢更形惡劣，而這些文件的公佈，根本是沒有被核准過的。根據全世界所接受的外交禮儀，一個政府從另一個政府接到了一個文件之移，通常是不予公佈的，一直接等別國政府正式核准其發表。所以，爲了那埃委員會的原故，我們開始和其他許多政府進入緊張的關係。委員會這種疏忽的異常有害的消息，我覺得極難加以遏制。我費了不少時間，忙於向其他政府解釋或道歉，因爲它們正深感不快。

但是，當那埃委員會着手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戰背景，開始吊查和協約國有交往的紐約各銀行的記錄時，我們的困難甚至變成更尖銳化。英國和法國大使屢次抗議。

我已經在設法使總統支持我的努力，謀使那埃委員會的活動限於合理的範圍之內。三月十五日，我交給他一個備忘錄，敦促他召集那埃委員會到白宮來舉行會議，勸他們「對足以妨礙我國政府和別國政府關係的問題公開陳述意見時，應該避免任何不必要的挑撥。」總統的確在四天之後和那埃委員會各委員會晤，但是爲了某種理由，並沒有把我的要求提出。

我希望那埃委員會各委員明瞭的一點，就是希特勒已經推翻凡爾賽條約的軍事條款，墨索里尼正在完成侵略阿比西尼亞的計劃，而英法和美國爲二十年前的文件激烈爭論的場面，是決不能逼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計劃的。就在這個時候，英國和法國正設法使德國接受軍備限制協定，勸誘墨索里尼放棄侵略非洲，而那埃委員會所引起的反英和反法浪潮，決不能有助於英法的努力。

可是那埃委員會處事疏忽的最惡劣例子，尚在後面。一九三六年一月十五日，委員會在公開陳述意見時，提起了英外相巴爾福（Arthur J. Balfour）於一九一七年五月十八日向國務卿蘭辛（Lansing）所提出的一個機密備忘錄的內容，其中涉及英國和其他協約國政府的秘密協定。那埃聲言當威爾遜總統和蘭辛國務卿說明在巴黎和會前他們對於英國的祕密約定並無所知一節，係屬謊言。我們事前曾徵詢過英國政府的意見，問他們是否准許發表這個備忘錄，他們加以拒絕，並且我們曾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廿三日把這一點通知那埃。因此這種行動，尤其是一種嚴重的失信。我向那埃委員會竭力抗議，結果它同意把巴爾福備忘錄的全份交還國務院。

一月二十日，我向報界發表了一個聲明，闡述國務院對公佈檔案中機密文件的態度。我說我國政府顯屬不能在未經有關政府的准許將機密文件發表，因爲這個政府是信任我們可以保守秘密的。」



我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說：「我在威爾遜政府曾任職工作。不用說，我和美國的大眾一樣，對於他的愛國心和誠實審慎具有最高的敬意——已往如此，於今亦然。」

那埃的意見陳述，給孤立主義者提供了我們這時代中第一個中立法案的跳板，並且就爲了這個理由，我不厭其煩，予以詳述。

事實是我不希望中立的立法。當然我不希望由孤立主義者像那埃這樣的人所提倡的中立法，因爲它會束縛政府的手足，並且會告訴可能的侵略者像德國，義大利或者日本說，它們可以向它們預定中的被犧牲者宣戰，而我們在那時候會注意我們的公民不致以軍火供給這個被犧牲者的。

我不希望看到一種立法會事前告訴世界說，假如戰爭發生，我們不致有所行動，因爲這樣，就會妨礙我們運用我們的努力來防止戰爭。我也不希望看到一種立法，規定假如戰爭發生，我們不得以最少量的援助給國際聯盟這個世界機構，幫助它使戰爭結束的努力。

### (十一) 「數量的」和「質素的」爭論

倫敦海軍會議在一九三五年召開，直至一九三六年三月底結束，羅斯福總統對於會議的進展情形，具有強烈的興趣。簡直從幼年時代起，他對各色各樣的船隻，一直具有廣泛的經驗。甚至在孩提時代，經過新英格蘭海岸附近的海軍船隻，就特別吸引他的注意。當他到華盛頓來担任威爾遜政府的海軍部長時，即以精通有關海軍的問題，戰術，事實和管理而見稱於時。他在離開職位的時候，對於一切重要的海軍問題，已有深刻的研究，並爲海軍而神往。

當他出任總統之時，他對於海軍的知識或許比他任何一個前任爲多。在他整個任職總統的時期中，我發覺他對於有關海軍的每一個問題，總予以優先的注意。凡是海軍事務方面比較重要的決議，大多數由他親自定奪。在倫敦海軍會議中，總統對於技術的各方面，表現罕有的知識。他極有資格討論最偏屬於技術方面各種發展的優點，並且提供建議。就是最老和最富經驗的海軍上將，對於他海軍方面的湛深知識，也具有極大的敬意。

在我發給總統的電報中，以及我們在倫敦會議席上的口頭討論中，關於限制海軍軍備，我們曾經使用「數量的」和「質素的」這兩個字句達數十百次之多，前者指限制總噸位，後者指限制各種船隻的大小和噸位的口徑。有一天，總統耐不住性子。他喊清說，「數量的，質素的，數量的，質素的，我對於這幾個字句聽得厭煩了。我們能不能找尋些字眼來代替它們呢？」但是，我們並沒有找到。

二月二十八日，總統對於海軍條約提出了一個建議。他把它以備忘錄的形式送達國務院，繼而我們就用電報發給當

時在倫敦的我國代表團團長戴維斯(Norman Davis)。這個建議，結晶於倫敦條約中的一部份，而成爲會議中最重要發展之一。總統說，「假如我們發一個電報給戴維斯，叫他設法從英國、法國、義大利（並且經由英國從德國）甚至獲致一個君子協定，藉使每一個國家同意在決定建造超過一百噸的任何形式的海軍船隻時必須通知其他國家，你對於這個辦法，以爲如何？假如這樣一個君子協定可以獲致，那麼這四個或者五個國家就可以聯合起來，或者由它們中的幾個邀請日本同樣辦理。」

德國應否成爲條約簽字國的問題，是一個微妙問題。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八日，英國和德國簽訂了一項協定，規定德國的海軍爲英帝國海軍的百分之三十五。因爲這個數字，較諸凡爾賽條約准許德國保有的海軍實力達三倍之多，法國和義大利提出強硬抗議。至於我們這一邊，則繼續不願有所表示，因爲英德協定，本質上是關於歐洲的，同時因爲我們並不是凡爾賽條約的簽字國。當英國建議召請德國參加倫敦海軍會議時，法國表示假如邀請德國加入，法德就萊茵區問題必須獲致協議，以及英法就互助問題必須獲致協議。

希特勒對於萊茵區問題的討論，予以直截了當的解決，德軍於一九三六年三月七日，違背凡爾賽條約和羅加諾公約，佔領萊茵區。那時候，倫敦會議正在草擬最後協定的內容。萊茵的侵入是歐洲的一種發展，並不牽涉我們，華盛頓方面並不應該有所行動。但是，這顯然是走向戰爭的另一大踏步。三月九日，我發電給戴維斯，要他就歐洲所出現的新形勢以及可能牽涉美國的種種謠言或新聞，表示見解。我還說：「無論如何，我們毫無疑問地在走進歐局日益緊張的一個時期。」

至三月二十日，我們已把條約的最後草案送呈總統。

總統核准了這個條約，但是提出了一個建議。三月二十日，我們就把這個建議轉給戴維斯，其中說「戴維斯應表明一點，就是美國政府及其代表對於新條約中對於數量的（全部噸位）限制未能規定，深表遺憾。」

三月二十三日，我把總統的思想電告戴維斯，就是說戴維斯和史丹萊海軍上將應臨名向英國代表團團長艾登修函，「對於會議期間的相處情形表示愉快和感激，並借此提起一點，就是新條約猶如以前的海軍條約一般，並未規定數量上的限制，我國政府希望在海軍建設方面避免和英國競爭；英帝國和美國應接受艦隊相等的辦法，作爲公認的確定的原則；目前以情形和環境證明兩國政府應繼續恪守艦隊相等的原則；恪守此項原則的結果將有助於兩國政府的友好關係和世界和平。」英國人是可以同樣的口調答覆的。

此事方告辦竣，新聞走漏立即隨之發生，於是英美海軍合作已成立「秘密協定」的各色新聞，到處紛傳。威爾遜公使從日內瓦告訴我，這個「走漏」，係出自出席倫敦會議的日本觀察員方面，他隨時由英方告以機密的消息。因此，



。備軍軍海減裁遍普來要，行遊衆民，間期議會軍海敦倫

# 牌洋雙 牌球地



## 線絨毛羊純



品出 廠線絨毛民裕海上

我們就準備把這兩封信一起發表。

一九三六年四月，當戴維斯從倫敦回來的時候，他和我曾就世界局勢進行長時間的談話。在我們的面前，呈現着一種重大的問題和責任，我國政府必須加以應付。它牽涉到一種確切的決定，就是說鑒於世界許多地區的混亂情形，我國根據實際情形，究竟應該在什麼時候放棄經由裁減軍備藉以維持和平的嘗試，而迅速開始充份武裝，俾能抵抗德日義顯然在走向軍事征服方面去的行動。

十多年來，世界的傾向大體上是向着裁減軍備的方向走。但在最後幾年中，我們看到日本、德國和義大利的言行顯然透露出侵略的意向。我們看到這些國家違背一切裁減軍備的工作和每一種維護和平的條約。同時，我們看到瘋狂的毫無約束的軍備競爭，益以實行征服的喧鬧和無恥的威脅，而這些侵略國家，當然是此中要角。

當戴維斯和我討論這些發展時，一點是非常明顯的，就是要竟裁減軍備來維護和平，接近不可能。所以當時的問題，乃是奉公守法的國家爲了遏制迅速發展中的軍事侵略計劃，究竟能否作適當的合作，並且能够合作到什麼程度？但是，猶如衆所共知的，我們的政府事實上不得不忽視這一個可能維護和平的方法，其理由很簡單，就是輿論方面大多數是強硬地甚至激烈地反對我們參與這一類的聯合行動。

美國一方面繼續勸導和推行和平，敦促各國——尤其是決心從事侵略各國——採取類似的政策，而另一方面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即注意侵略者的行動，並且武裝我國，不再遷延，傳達足以保障我國安全的程度。

一九三五年初，我已經把我的熱烈信念告訴總統，就是說我們應趕快建造一個更大的海軍，尤其爲了遠東的局勢，更不得不然。一九三五年一月廿二日，我送給他一個備忘錄，附以駐東京的格魯大使所發的一個極好的報告，其中把東方的展望分析得很清楚，並附以國務院爲遠東問題擬就的一份備忘錄。

國務院的備忘錄有一節說：「我們應該加緊努力，以謀擁有一個如此堅強的海軍，藉使其他國家中沒有一國敢真正想來攻擊我們；我們應該表明，就是我國人民一方面不想作戰，也沒有攻擊任何其他國家的理由，同時不但不爲可以作戰而太驕傲，而在具備某種條件之下，將因不作戰而太驕傲」。

若干官員爲國務院建議建造海軍而覺得奇怪。總統和我都很熟悉的一個朋友巴魯福有一天對我說，總統對於我孜孜希望建造一個較大的海軍，深表驚奇。

一九三五年，我開始計劃怎樣積聚錫金屬，因爲錫是一種軍用原料，美國所產不多，而在戰爭一旦發生之時，對於陸軍部和海軍部都是必要的。國務院的經濟顧問范斯和我一起草擬計劃，並且經由他，我把這個意思傳達給英大使林特賽並且把計劃放在他面前。其中的要點，就是英國應該獲得某一規定數額的錫，交給我國政府，其代價則可以劃入英國

所欠我國債務的賬上。

林特賽把這個計劃研究之後，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來看我，並且說他已經把這個建議送到倫敦去了。

林特賽的神情極陰鬱。他說英國人民認為債務已經了却，要英國政府獲得款項去償付移交給我們的錫，頗有困難。我提醒大使說，世界上錫的主要供應是在英國首都的控制之下。少量的實物償付，猶如我們所建議的，可以復活以前的象徵債權辦法，並和這種辦法的精神相符合。以前，英國政府曾經很高興做過的，直到約翰生法案（Hirani Johnson）的不幸影響發生之後，始告停止。這一行動，對於我國人民對英國政府的觀念，可以產生良好的影響。

但是林特賽並不以為這個建議甚至可為英國外交部所接受。他是對的。倫敦來的答覆是完全拒絕。直到四年之後，即歐洲戰爭爆發的三個月前，我們方能和英國談妥了一個協定，規定以棉花交換橡膠和錫，如此，我們才開始積聚重要的軍用原料。

事實上，假如國務院這種努力能够像我們希望的這樣早和這樣充分地獲得成果，那麼戰爭在珍珠港發生時我們可以

## （十二） 白宮中盛大和平大會流產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羅斯福總統在芝加哥發表他著名的「隔離演說」。自從他受職以來，羅斯福先生一直在為恢復國內的正常情形而拼命掙扎，結果他有時候無法充分注意我們外交方面的事務。在我，則對美國國內孤立主義情緒的滋長愈來愈擔憂，此種情緒，可於許多和平組織的活動，信件，請願書和民意測驗見之。我對於這些事實在國外各國可能發生影響，也非常憂慮。

九月間，我知道總統擬提早作橫越大陸到太平洋的旅行。於是我就和戴維斯商量，並且表示堅決的意見，認為總統應該在他的旅途中，發表一篇有關國際合作的演說，特別應該在一個孤立主義根深蒂固的大城發表。因此我就帶戴維斯一同去訪問總統，並且我們向他提出了這個意見。他當即表示同意。他說，假如我們預先為他準備演說的必要材料，他會在旅途中加以發表的。

我們回到了國務院，並且用初稿的形式準備了這篇演說。在我們的草稿中，並沒有這個著名的「隔離」字句。總統本人負責把這個字句插進去，因為在他發表這篇演說之前，曾加以最後的修飾。我並不知道其中有這樣一個字句，直到他講了之後才知道。

總統說，「百分之九十的世界民衆的和平，自由和安全，正被其餘的百分之十所危害，後者正以破壞國際秩序與法

互相威脅。當然，希望在法律之下遵照許多世紀來幾乎爲全世界普遍接受的道德標準而生活的百分之九十民衆，能够並且必須找出一個方法，以謀貫徹他們的意志……

「世界上無法無紀的疫病正在蔓延，這固然不幸，但是似乎是準確的。當人體上的一種流行病開始蔓延的時候，民間社會贊成並且會同意把病人隔離起來，藉以保護整個社會的健康，防止疾病的蔓延。」

對於隔離觀念的反應，是迅速而激烈的。據我看來，它對於我們爲培養和增強輿論傾向國際合作而不斷進行的教育運動，至少有使它倒退六個月的影響。我們中間負責在任何可能情形之下經由演說，聲明和行動來推動這個運動的人，努力工作，竭盡所能，但是我們又一直謹慎，不要走得過遠，深恐孤立份子的猛烈進攻，反而使我們倒退過原來的地位。假如我們逐漸進行，不去激起不必要的反對，那麼我們的說話和行動，雖然並不能像我們希望的那樣有力或者影響深遠，但是對世界而言，可以有更大的效果；反之，假如我們發表驚人的聲明或者採取戲劇性行動，倒反而會爲了我們所引起的激烈反對，而把國內本身就是分裂的這種景象，早露在世界之前。

六個主要的和平組織發表了一個宣言，譯稱總統「指引美國民衆走向通往世界大戰之路。」美國勞工聯合會通過決議，聲言「美國勞工不願牽涉歐洲或者亞洲的戰爭」。衆議員費許和丁克漢以要求彈劾總統相威脅。費城「徵詢」報以電報徵詢國會意見，結果顯示二個以上對一個是反對和國際聯盟採取共同行動應付遠東問題的。民間並且發動一種運動，要二十五萬萬人簽字在一個「防止美國牽入戰爭」的請願書上。

所有這些反應，當然紛傳一時，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軍閥聽來是悅耳的。這無疑使侵略國家更大胆，而使歐洲民主國家懷疑我們除了在言語上和它們站在一起之外，是否再有其他。日本更大胆的行動則隨之而來，而以二個月後日本飛機炸沉美國砲艦「潘南」號而達最高峯。

一九三七年十月這個月中，副國務卿韋爾斯想起了「一個世界和平計劃」的念頭。他擬就了一個很長的備忘錄，親自跨過街去給總統。他要總統在十一月十一日歐戰和平紀念日召集駐華盛頓的所有外交代表在白宮舉行一個盛大的會議。就在那裏，總統要發表一個戲劇性的呼籲，要求各國共同在會議桌旁坐下，擬定和平的基礎。總統將就這些基礎提出一個大綱。其一是就國際行爲的原則獲致協議；<sup>2</sup> 另一是裁減軍備；<sup>3</sup> 第三是經濟穩定。他將提出一個結論，就是除非轉取和平政策，和平不可能維持多久。

幾乎在我曉得這件事之前，我發覺總統已經完全贊同這個計劃了。在白宮上演這樣一個有聲有色的節目，對他很有意。幾年來，他早就想邀請各國的首長，同他在海上舉行一次會議。在一艘戰艦或者巡洋艦上的圓桌周圍，他將和他們擬訂一個持久和平方案。他沒有達到提出正式建議的程度，但是他曾經試探過幾個人。有關他這種思想的說話於是就

傳佈開來，可是反應並不見得太好。駐羅馬大使費里普在第一次覲見墨索里尼之後，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寫信給我說：「顯然的，羅沙（義駐美大使）曾和他（墨索里尼）講過總統希望會晤歐洲各國首長的意思。他談及這件事時，微微地笑了一下，未作肯定的表示，對我露齒而燦笑，並且聳了聳肩。」

（我個人覺得像總統所設想的這種會議，結果將為一種損失。要想靠圍坐在桌子之旁一兩天互相商談而就各國政府商定複雜的辦法，是不可能的。）就爲了這個理由，別國政府對於這個觀念不表歡迎。它們知道總統不能成立秘密協定，而秘密協定或許是這種大西洋中的會議所能產生的僅有的協定。

類似韋爾斯所設想的東西，會由德意志銀行總裁沙赫特於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向戴維斯（Joseph E. Davis）大使提出，當時戴氏正道經柏林前往莫斯科。戴維斯打電報給我說，沙赫特曾經告訴他，說他已由希特勒授權向法國和英國提出建議，藉以保障歐洲和平，固定現行疆界，裁減軍備，成立一個可以發揮效能的國際聯盟的新形式，取消裁制並且替德國獲得殖民地。他說法國表示贊同，英國則否。

沙赫特於是說，他希望總統能够在華盛頓召集一個國際會議。當戴維斯表示除非有若干成功的保證總統可能不願意牽涉這種事情時，沙赫特回答說，除非事前確已獲致協議，會議不應召開。會議不應稱爲「經濟會議」而應稱爲「和平大會」。

當我發覺總統一意準備在白宮中舉行歐戰和平紀念日會議時，我懇切地反對這個計劃，認爲它是不合邏輯的和不可能的。我就我所看到的情勢，概要地講給總統聽。在一九三七年之末期，德國，日本和義大利已經加緊武裝到如此程度，這種行動，無疑是以進攻爲目的，不是以防衛爲目的，不是以征服爲目的，不是以和平爲目的的。正當民主國家應以最大努力來武裝自己以供自衛的時候，來一個和平大會使它們留戀在一種安寧的感覺之下，實屬危險之極。我看到軍事侵略的危險已有幾年，現在似乎更迫近了。所以，由和平國家發動一個新運動以謀單在它們自身之中再進一步裁減軍備，而軸心國則繼續瘋狂進行武裝，似乎完全不切實際的。任何消息靈通一點的人都知道在五年之中，每一種努力都會做過，謀使軸心國家參加裁減軍備協定，但是它們故意拒絕，並且以龐大規模重振軍備。軸心國家對於和平國家這種失之過遲的裁減軍備要求，是會大笑不止的。

縱使協定獲致了，又有什麼價值呢？所有三個軸心國早已屢次表示不願它們所作的諾言以及鄙視條約。「條約」這兩個字，已經成爲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人的不值一提的東西和笑柄。軸心國對他作呼籲的反應如何，總統已有所認識。墨索里尼曾經回答說，在動員了一百萬人費去了二十億里拉之後，他簡直一定要侵略阿比西尼亞，不然他的威信將掃地，他將招致其他國家的鄙視了。他的確反映他軸心伙伴的情緒的。它們也已動員了數百萬人，費去了數十億馬克





，式兵閱行舉尼畢張靈與勃特希，德立成心勳馬羅一林柏

雙塔牌◆

模範調味粉

龍蝦牌◆

精美調味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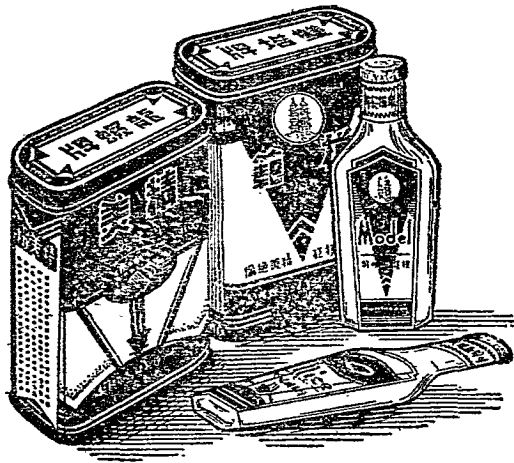
品質出類拔萃

鮮味勝人多許

模範味粉

味粉模範

各分聽裝及  
瓶裝兩種



各大南貨號  
食品店均售

上海模範味粉廠精製

總公司 愚園路一三五五弄電話二二四一九

製造廠 愚園路一二二一弄電話二〇六七八

和日圓，它們是要拿可以拿的東西的。

韋爾斯的多少有些眩耀性質的計劃，將在歐戰和平紀念日出現，事前並沒有和其他國家商量或者試探它們的意見。最低限度，不先徵詢一下英國和法國的意見，似乎是不聰明和不公允的。那時候，它們正在和德國及義國進行微妙的談判；它們正設法使西班牙不干涉委員會繼續存在，發揮功能。所以，突然間把如此誇炫的一個計劃向他們提出，事前又未會有所警告，可能使它們非常難堪。

一九三七年六月，當時在倫敦的戴維斯試探出張伯倫首相可能訪問華盛頓，來會晤總統。羅斯福先生願意發出請柬，但是認為張伯倫最好在九月間國會休會之後再來，他並且認為在訪問之前，外交上應先作慎重的準備。

張伯倫在七月八日寫信給戴維斯，戴維斯把信轉給總統和我，其中說他必須拒絕在秋季和總統舉行會議的觀念。他說他並不以為時機已經成熟。假如一個必然會引起極大注意的會議而不能產生完美的結果，影響之嚴重沒有更厲害的。目前，他並不認為我們可以達成預期的目的。

此在東方，日本已明白表示它不願西方來調解中日關係。它出席和平大會以謀獲致任何重要協議的可能性，是非常渺小的。

在我和總統就此一題目所進行的幾次談話中，他並不接受我所提出的見解。最後這個計劃被放棄了，於是我們就繼續我們的努力去重振軍備，並且促使輿論方面理解世界烽火即將燃起的嚴重危險。

### (十三) 不發一顆子彈得到了一切

一九三八年八月，當捷克斯洛伐克的危機再度成爲緊急之時，驚人的消息不斷地湧到我的辦公桌上來。急切的和平談判主要是在英國和德國之間進行。我於一九三七年曾在華盛頓看見過的倫雲曼 (Walter Runciman)，已由英方派到普拉格去，在捷克人與蘇台德納粹份子之間進行調停。同時希特勒似乎正在準備侵入捷克斯洛伐克。

在九月十五日，英首相張伯倫離英赴德和希特勒親自舉行第一次談話之前一刻，英國外交部向肯奈蒂大使建議，說他們喜歡總統能就此一發展表示意見。就在那一天的記者招待會上，我說：「英國首相和德國總理今日舉行的歷史性會議，凡是深切關心維護和平的國家，當然是以最大的興趣加以注意的。」

當電報源源不斷地從歐洲流來國務院，緊張情形愈來愈甚的時候，我屢次到白宮去訪問總統。我同時還時常派副國務卿韋爾斯和助理國務卿貝爾帶情報和批評到白宮去。蒲立特和肯奈蒂大使幾乎每天和我通電話。

張伯倫於九月二十二日再到德國去見希特勒。由於英法政府正以堅強壓力加諸捷克政府，迫使它對希特勒讓步一點

已經成爲很明顯，美國報紙中的批評愈來愈多，認爲捷克斯洛伐克正被出賣給希特勒了。

九月二十四日，肯奈蒂從倫敦打電話給我，說明英國內閣網已發生分裂。他說張伯倫相信「必須以任何代價寬致和平」，而若干其他閣員則說他不願意「再和希特勒私下商談了」，並且相信他們「總是要戰的」。他說，曾爲戈林的空軍造成深刻印象的林白上校，已被英國人請去商談。林白已經向我們報告過，說他相信德國極容易應付其他一切歐洲國家的聯合空軍力量。

就在那一天，蒲立時從巴黎打電報給我，他認爲我們應爲維護和平而作若干努力，縱使不成功，也應該有所表示。他建議由總統向英、法、義、德、波各國首長提出呼籲，請他們派代表到海牙來解決危機，並且我們應該表示願意派代表出席。

翌日，二十五日，我們駐普拉格的公使卡爾（我進國務院的時候，他是在擔任助理國務卿）用電報打來貝奈斯總統的一個呼籲，希望總統敦促英法不要丟棄捷克斯洛伐克，讓它毀滅，致使一個不但牽涉捷克斯洛伐克並且牽涉世界的大衝突，更其接近。

總統和我一直在討論究竟應該採取什麼行動。總統準備向歐洲各有關政府的首相提出他個人的呼籲。我的思想則是：我雖不反對提出這些呼籲，但是不相信結果可以證明其有意義。我對總統說，我覺得我們接到的證據是如此衆多，充份證明德國已武裝到極端的程度，決意不顧一切進行廣泛的侵略，除了對方具有充份的兵力或者完全投降之外，決不能阻止希特勒去追求他的計劃。這意思就是任何步驟，凡是沒有適當的兵力去對付希特勒的，一定是屬於緩靖性質和純粹是臨時性的。

我深恐總統採取過份熱烈步驟的結果，會使我們和張伯倫落入同一的緩靖營陣，而遲早會引起和張伯倫一樣的名沒有不彰。我想這種步驟，可能使和平國家誤信我們以爲沒有其他可能的辦法了。更有進者，縱使這種努力獲得成功，也是危險的，因爲那時候這些國家可能以爲戰爭的危險已成過去，並以爲應付無可避免的德國威脅所必需的大規模軍事準備，已無迫切的需要。我的見解是：以希特勒的計劃和決心言之，局勢真是千鈞一髮。另外一種危險是，愈是向希特勒提出狂熱的呼籲，愈足以增強他已經是的驕傲得了不得的自我，致使他以爲沒有一個人是敢反對他的，他是全能的，他是可以一步步獲得他需要的一切的。此外，我對希特勒的任何保證毫無信心可言，割一大塊重要的土地給希特勒而從他獲得一種保證的思想，在我看來似乎是自欺欺人。韋爾斯不斷催促總統向前跑，我却不斷勸他慢行。

但是總統相信蒲立時的說法，就是縱使不成功，也應該做一件事。他對我說，「這是沒有妨礙的。不妨敦促和平到最後一分鐘。」

總統既已決定提出他的呼籲，我們就努力選擇一個最有利的時刻發表它們。有好幾天的時間，我們在準備稿子，一次又一次。韋爾斯和貝爾擔任大部份的起草工作，總統自己也相當參與其事。

九月二十五夜，我們對總統的文告作最後的修飾。我們竭盡力之所能，在文字所許可的範圍之內，使文告儘量有力。甚至在最後的稿子議定之後，總統還用鉛筆稍爲改了幾下。於是在九月二十六日早晨一點鐘，總統用同樣的文告直接給希特勒和貝奈斯，並且經由我送給張伯倫和達拉第。我們並把它送給我們駐華沙和布達佩斯的外交代表團，並且訓令它們把它轉呈波蘭和匈牙利外交部。波蘭和匈牙利爲了要求捷克斯洛伐克內某數部份，使危機更深一層。

總統說，「代表美國一億三千萬民衆，爲了世界各地的人類，我最懇切地向你們呼籲，不要使談判破裂，而去尋求對當前問題和平的，公正的，建設性的解決。」

「我懇切地再說一遍，就是祇要談判繼續，異見總可能和解的。一旦談判破裂了，理智即告喪失，暴力就此抬頭。」於是我們就屏息等待答覆。其中有三個答覆我們沒有等待得很久。在同一天，九月二十六日，貝奈斯，達拉第和張伯倫對於總統的見解表示完全同意，並且願意談判和平。這幾個答覆立即加以宣佈，因此可以在希特勒預定於那天晚上發表的演說之前，公告大眾。但是希特勒的答覆並沒有來，而這個答覆，却是我們最懇切期待的。

歐洲正在動員。肯奈蒂從倫敦用電話告訴我說，英國政府已保證法國，就是戰爭倘使發生，英國決予支持。同時，張伯倫已通知希特勒說，他的要求——張伯倫看見他一次便提高一次——是不能接受的，但是要求繼續談判。我問肯奈蒂英國人是否相信法國人頗有作戰準備。肯奈蒂不能給我一個正面答覆，但是他說英國人，猶如他們一向表現的，覺得他們能夠及時而起，他們正在命令他們的艦隊隨時警戒，並且已經召集各領地的軍隊入伍。

蒲立特用電報告訴我說，達拉第說他希望召集會議以組織歐洲真正和平的時機，不久能夠到臨；他以為召集這個會議應由總統出面。

現在，張伯倫首相想在下一個晚上，九月二十七日，向美國人民發表廣播演說，但是總統說不。他以為由英首相向美國人民直接演說可能引起誤會。

希特勒答覆是在九月二十六日晚上到的。這是對捷克政府，凡爾賽條約和國際聯盟的一篇冗長責難，最後把和戰的責任放在捷克斯洛伐克身上，不放在德國身上。

現在我們必須決定下一步驟應該採取什麼。蒲立特打電報來建議，主張由總統再發第二個電報給希特勒，請他同意派代表一人到海牙參加會議，猶如蒲立特先前建議過的。他說達拉第對這個意見表示「欣喜」。

許多其他國家已經來電支持總統上一天的呼籲。九月二十七日下午，我們把訓令發給我國駐於別國政府的代表，請

這幾個政府向德國和捷克斯洛伐克發出類似的呼籲。十九國政府，其中十七個是拉丁美洲的，對此項建議表示贊同。

我並且發一個電報給駐羅馬的費里普大使，其中附有總統個人致墨索里尼的一個機密文告，要求墨索里尼「協助繼續以談判或其他和平方式，就當前問題努力獲致協議，而不訴諸武力。」

羅斯福總統決定再發一個呼籲，這一次是單給希特勒的。此項呼籲，係由韋爾斯起草，於九月二十七日晚上發出，其中建議對捷克爭端直接有關各國在歐洲某中立地點立即舉行會議，並稱「繼續談判依然是在任何永久基礎上解決當前問題的唯一辦法。」

當我們正在緊張中等待希特勒的答覆之時，英大使林特賽在送給我們一份張伯倫最近接到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電文之後，復詢我之語，前來看我。我對大使說：「我請你來，是要告訴你，假如目前所習性已經很大的戰爭真正發生了，我希望你的政府知道一點，就是我國政府決無什麼政策或目的想來代替英國在世界各部份的現有貿易。不論我們對於獲致其他許多國家的貿易方面做些什麼，我們決無意於利用戰爭對英國貿易所造成的不利情形以及英國的參戰而奪取其貿易」。大使似乎頗為感動。

於是，在九月二十八日下午，當世界局勢正在進退維谷之際，希特勒邀請張伯倫，達拉第和墨索里尼於次日和他在慕尼黑會晤，以謀解決捷克危機。戰爭至少是暫時延緩了。

至於是否總統採取的行動造成這種結果，却不能說。它們會發生相當大的影響，則毫無疑義。十月二十日，英大使林特賽帶給我一封英王喬治五世致總統的信件，答覆總統邀請英王英后於一九三九年訪問加拿大之時來美訪問，英王寫道：「我覺得我必須說，我對於你于最近的危機是何等歡迎。我毫不懷疑它們對於維護和平大有貢獻。」

但是對於我，慕尼黑固定似乎祇是一種暫時的解決。保持和平有兩種方法，或者是以實力對付希特勒，或者是投降，現在採取的是後者。希特勒所以沒有發動戰爭，乃是因為他不發一槍一彈得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現在，捷克斯洛伐克在他面前毫無防衛的了。他可以等待時機，並且隨手可得，彷彿在籠中的禿鷹一樣。英國和法國在他面前退縮了。張伯倫首相的忠於和平以及為謀和平而作的極大努力和個人犧牲，雖然錯誤，但也有若干英勇性質在內，可是對於希特勒，這却是軟弱的表現。所以我相信從這種步驟，祇能產生「暫時的和平」，猶如我在一個月前向法國大使所說的。張伯倫稱呼它「我們這個時代的和平」，但是這個時代是短的。

#### (十四) 鑼鼓聲中到歐洲去走一遭

一九四〇年二月初，總統在白宮中對我說，他想派韋爾斯到歐洲的重要首都去跑一趟，看看有沒有和平的希望。他

問我對於這種辦法是否表示贊同。

（稍後，總統明白地對我說，索爾斯貝經秘密地到他那裏來了好幾次，懇請准他負着特別使命到國外去。原來索爾斯貝要求總統在一九四〇年派他出去的，總統不過問問我對索爾斯貝這個任務是否有所反對，爲了這個理由，我覺得頗爲滿意。）

我當即回答說，假如他真正要索爾斯貝出去走一趟，我並不表示反對。但是，我說，我要說明幾點。

我把最近幾星期中向總統說過幾次的一種觀點，重申了一遍。我說，「戰爭的緊急關頭幾乎就在眼前了。三個軸心國家已經建立了空前的軍備。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的發言人已經無恥地在講，他們決心從事有限度的征服。他們堅定地毫無錯誤地向這個方向走，筆直像一顆槍彈。這種情形，是發生在從一九三三年到這一年，在孤立主義派反對的限度之內竭盡一切可能的努力去促進和平之後。」

我繼續說，在這種環境之下，世界既已着火，軸心國家既已準備就緒，簡直已經在用它們全副軍事力量向前推進，再談和平還加上去訪問好戰國家，勢將引起虛偽的希望。這種虛偽希望，對於目前正應該奮力準備自衛的國家和人民，特別來得危險；它們是不應該自滿於幻想中的地理安全或者中立的。

繼續彈奏從速實現和平的曲調，使一國人民留戀於一種虛偽安全感中的可怕影響，可以由當時英國兵士所唱的，「我們將洗好的東西掛在齊格非防綫上」這只流行歌曲清楚地加以說明，但是我的確感到某種可怕的兇兆正在醞釀之中。我並且說，對於索爾斯貝旅行的目的和結果，五百種不同的謠言必然會發生的。這些謠言，將在歐洲和國內造成混亂的。

在戰爭這一個階段，我個人是不會考慮派索爾斯貝或者和他官方地位差不多的任何人到歐洲去擔任這樣一樁任務的。索爾斯貝以爲在「假戰」雖在繼續進行的情形之下，仍能爲和平找到若干基礎的。但是希特勒顯然正在瘋狂地用他唯一的方法準備結束「假戰」，這就是全面的激烈戰鬥，而停止他作這種準備的唯一方法，乃是給他所要求的一切東西。但是這等於納粹控制歐洲，而另一次戰爭是會在幾年之內發生的。

二月九日，總統自己宣佈索爾斯貝的任務，說是在總統的要求之下，索爾斯貝將訪問義大利，法國，德國和英國，其唯一目的，乃是就歐洲現行情形向總統和我提供意見。但是總統有我所提出的意思存在於腦際，所以力言索爾斯貝並無權力以美國政府名義提出建議或者有所決定，凡是別國政府官吏他提出的聲明，一定要嚴守秘密，祇能由索爾斯貝傳達給他和我。

同日，我宣佈我們已經開始和其他中立政府開始非正式談判。我說明這種談判係就健全的國際經濟制度以及世界普

這數軍作初步的探討。現行戰爭情形並不牽涉在內，但是作戰國家也可以包括進去，因這些討論是牽涉未來和平的兩個共同問題的。

我們那時已經發動儘可能規劃一個戰後世界的形式，以謀向其他國家和我國自己的人民提出，這些談話，就是這種探測和研討工作中的一部份。

據我所知，韋爾斯任務的宣佈，引起了許多謠言。總統雖然力說代表團不得有所決定，許多孤立主義者就借此機會鬧得天翻地覆，聲言我們即將牽入歐洲的爭端了。另外些人同樣確信韋爾斯一定有一個確定的任務，就是由協約國或我們自己以任何代價在歐洲實現和平。還有些人猜測總統和我以及韋爾斯和我意見上發生了分歧。爲了鎮定這些謠言起見，我在二月十四日發表了一個聲明說：

「我想總統和我對於我國外交上的政策和方法，幾乎和担任我們同樣職位的任何兩個人一樣一致。在我們舉行討論和會議之後，先由總統宣佈派往歐洲的特別代表團，其後由我自己宣佈了有關戰後經濟恢復和裁減軍備的問題，當時並沒有發生失常的事情。」

其後，我向韋爾斯致意，表示讚揚。

韋爾斯由國務院歐洲司司長莫洪德 (Jay Piarrepoint Motfat) 作伴，訪問了羅馬，柏林，巴黎和倫敦。他看到了每一個政府的領袖們和教皇庇護十二世，和他們詳談。他把有關我們以貿易協定計劃爲中心的經濟政策，備忘錄，交給他們，這種政策，是我們希望在戰後採行的。他則接到了他們對於戰爭的長篇大論的意見，一味爲自己辯護。

雖然他信守總統的訓令，就是人家告訴他的一切東西都嚴守秘密，但是謠言總是跟蹤而起，沸沸揚揚。這些謠言使協約國和小中立國充滿了驚恐，深怕總統在韋爾斯回來之後會採取和平行動，而這種行動，在戰爭這一個階段，勢必會承認希特勒大部份的收穫並且使另一次戰爭無可避免。結果，總統和我同意，由他發表一篇演說，以謀驅逐這種恐懼。因此羅斯福先生就在三月十六日從白宮向基督教國外工作人員大會發表演說：

「今日，我們去找尋和平的一個道德基礎。假如不能理解兄弟之情，就不能有真正的和平。假如和平的結果是壓迫或者饑餓，或者殘忍，或人類生命爲武裝營陣所控制，就不能有持久和平。假如小國必須在畏懼強鄰的情緒中生活，就不能有健全和平。假如免於侵略的自由被出賣，作爲犧牲，就不能有道德的和平。假如否定自由交換思想，藉使人類寬致共同立場，就不能有符合理性的和平。假如崇拜上帝的權利被否定，就沒有正義和平。」

爲更進一步撲滅這些危險的謠言起見，我於三月十八日送給總統一個備忘錄，並附以我擬妥給當時在羅馬的韋爾斯的一個電報草稿，「促其特別謹慎。」總統在備忘錄上用鉛筆寫了「OK FDR」。就在同一天，我發實報給韋爾斯



，說我已向報界表明他的任務純粹是調查事實性質的，他不能在一個交戰國與另一交戰國之間担任調停人或者參加任何談判，不能設想他可以對根據武力威脅的任何和平建議或者有時限的哀的美敦書表示意見或者有所行動，我以爲除了向我們提供情報之外他不能接收任何和平條件。韋爾斯在離開羅馬之前向報界發表了一個聲明，說明他並沒有接受或者傳達任何和平建議，他的任務僅僅是在收集消息。

三月廿二日，英大使洛齊安來看我，對於總統和我在他認爲是能及時使政府採取行動，阻止並且驅除「以任何代價奪取和平」情緒的蔓延這一點，表示感謝。據他說，這種情緒，導源於有關韋爾斯可能在歐洲造成由談判實現和平的各種謠言，而如此的和平無異是德國的勝利。他說，凡欲經由談判而實現和平的努力，可能損害英國和法國的結局。我向表明一點，就是在最近幾星期中我們從來沒有忽視過整個問題的最細微方面，並且準備在適當的時光儘量把我們的立場表示清楚。

當韋爾斯在三月底回到華盛頓的時候，他把他和墨索里尼，希特勒，達拉第，張伯倫，教皇以及他們的外長所作的談話，向總統和我提出了一個極完備的報告。恐怕沒有一個人可以從他們窺探到更多的消息的了，但是他所獲得情報，並不能給我們任何行動的根據。和他談過話的領袖們，並沒有給他和平的希望。總統在三月二十九日發表了一個聲明，認爲當前祇使極少任何公允和平的展望，但是韋爾斯所彙集的情報無疑是有最大價值的，在將來可以樹立和平的時機到臨之時，當有用處。但是根據以移事實的證明，甚至這個聲明也太樂觀了一點。和平的時機有五年多沒有來，而來的時候，在一九四〇年領導英，德，義政府的人物已經死去，而當時法國政府的首長，也已經不再在職了。

## (十五) 秋季是歐洲最危險的季節

羅斯福總統同意在一九三九年七月十八日的晚上，召集參院兩黨領袖在白宮舉行會議。在這次會議中，總統和我，極爲支持（取消中立法案中軍火禁運——編輯人新聞服務社）法案而作最後的呼籲，如告失敗，則將以法案不得通過後所發生之事態，使反對派負其責任。總統和我，都覺得我們必須做一次最後的和最大的嘗試，俾使參院領袖充份認識清楚一點，就是假如戰爭在歐洲發生了，我國前途的危險是如何嚴重。

當會議在總統樓上的書齋中開始舉行的時候，表面上似乎頗爲融洽，但是內心的情緒是緊張的。在出席者中，有副議長勃納，多數黨領袖巴克萊，畢德曼，少數黨領袖麥克那利，少數黨副領袖奧斯汀以及外交委員會少數黨員巴拉（William E. Borah）。

總統在開始討論時首先提起參議員那埃的極端孤立主義見解，說明這種見解正在阻撓我們的辦法在參院中獲得通過

。巴拉相當快地打斷了總統的說話，把兩手一揮，說，「還有別人，總統先生」。總統多少有點驚訝，轉過來問他說，「你說什麼，巴拉參議員」？於是巴拉又說一遍，「還有別人，總統先生」。繼而總統和巴拉兩人就對談了一番，當時巴拉竭力反對取消軍火禁運並且努力表明他的見解，就是說至少在最近將來，戰爭不致發生。

於是總統轉過來對我說，「柯吉爾，你以為前途危險的可能性如何？」我儘量抑制自己的感情，懇切地回答說，「假如巴拉參議員能夠看見送到國務院來的有關國際局勢極端嚴重的電報中的幾個，我將因他修正他的見解而引為滿意。」

於是巴拉就用力和絕對無可變更的語調說，他從國外有消息可得，根據他的判斷，這些消息是使他滿意的。這就是說，在最近將來，歐洲不致發生戰爭。他意思彷彿說，這個消息比國務院所接到的，更為可靠。

最近我注意到發表了一些東西，內容據說是關於巴拉參議員對這次談話的備忘錄。我不想討論當時談話的確鑿字句，但是我必須說明一點，就是巴拉的文字，在我的頭腦中對於當時內情形造成一種確定不移的觀念，猶如我方才講過的。羅斯福總統也表明過不止一次，認為他從巴拉的說話中，也獲得同樣的觀念。

在我已往的經驗中，從來沒有發覺過如此難以抑制自己的感情如此難以避免感情不自然而然的發作的。從國務院堆得高的大量官方文件中，我知道巴拉澈底錯誤；我們很現實地看到大戰總爆發的迫切危險，可能在夏末之前到臨——並且我的確這樣說的。巴拉謬言對私人方面的消息比對國務院的消息更為重視，乃是對我們整個外交工作的一種誹謗。

在兩黨其他領袖一致表示見解，認為取消禁運無法在國會獲得通過之後，總統轉過來問我說：「柯吉爾，你對於局勢怎樣看法？」

在巴拉對我自己以及國務院表示意見之後，我的感情已到了發作的邊緣了。當我回答總統的時候，我情緒上的激動大致並沒有隱藏起來。我說，「在巴拉參議員隨便將國務院所有的全部事實堆在一邊這種情形之下，我簡直不曉得怎樣想法，而我們所有的事實，是完全否定他認為戰爭不致於發生的理論的。」我如此深信危險就在眼前，並且對於漠視一切事實和思考的無禮態度是如此憤慨，要我再說下去而又失却自制，簡直不可能。

午夜，當會議在這種氣氛中，結束之後，白宮就發表了兩個公報。第一個說明出唐的民主黨和共和黨議員一致的意思就定說在國會這一屆會議中，對中立法採取任何行動不能實現，但是此事可以在國會下一屆會議中考慮。另一個說：「總統和國務卿維持確定的立場，認為參院不能在目前採取行動，則歐洲新危機布於現在與明年一月間發生時，美國為在其他國家中維護和平而運用其潛勢力的這種領導權，將被削弱。」

僅僅在五星期之後，我們就必須運用這種勢力，以謀為防止歐洲戰爭而作最後的努力。在希特勒看來，我們的勢力

無疑已因國會拒絕追隨政府的領導而被削弱，同時他相信英法不能從美國獲得武器，藥彈或飛機，也是我們的勢力被削弱的另一個原因。

在會議一結束之後，參議員巴拉向我否認在何方面有損傷我或者我官方立場的體面之意，參議員麥克那利巴也跟著他這樣表示。但是要在損傷了我所領導的國務院的體面之後而致歉意，是不可能的。我冷冷地接待這輩否認者。我承認巴拉具有最好的用意，但是被被迫說他是如此感情用事，以致思想不清。

我曾時常邀請巴拉到國務院來，因此我可以把我國駐歐亞各地的外交代表團所發來的消息給他看，並且和他討論與外的一般局勢，但是他從來沒有屈駕過。假如在討論中立問題時他能夠到國務院來，我能夠給他寫些什麼呢？在其他幾十份的參考資料中，還有這幾種：

我國駐柏林代辦堪克在五月十三日打電報給我，說明許多其他國家的外交代表雖然並不預料德國會對波蘭立即採取行動，但是對於避免衝突的機會，極為悲觀。柏林外國軍界人士的一般印象，認為德國在軍事上能夠隨時向波蘭採取行動。六月二十四日，堪克報告說，有關德國境內出乎尋常的軍隊移動以及不斷的軍事活動種種謠言，已經造成一種普遍印象，就是德國為某種事變已在進行準備了。

五月十六日，蒲立特大使從巴黎打電報來，說達拉第已表示意見，認為和平或許可能度過六月，但是他在整個看法上並不樂觀。一個月之後，蒲立特打電報來說，龐納外長曾經告訴他，以為德國雖不致立即發動侵略，但是他確信在夏末之前必有一重大危機。六月二十八日，蒲立特把波蘭駐法大使的意見用電報打來，以為戰爭將在八月中旬在波蘭和德國之間發生的可能性，是百分之八十。六月三十日，蒲立特把法國外交部要員頹傑的信念用電報打來，以為在八月中旬，一種性質最嚴重的危機是無可避免的。

五月三十一日，波蘭大使卜托基對我說，希特勒在未來數月中將被迫在某一方面採取某種步驟。六月二十六日，卜托基通知我說，他的國家正在加緊作戰準備，以防德國發動戰爭。我向他表示意見說，歐洲的情形並不佳妙。凶險的徵象和情形，出現得愈來愈多。遲早——沒有一個人能夠說什麼時候——在歐洲如此高度配合在戰爭基礎上的情形之下，極嚴重的事情極可能發生，除非同時能做一些事情使其避免。

六月二十七日，肯奈蒂大使從倫敦把哈里法古斯的見解用電報打來，說明德國情形極為浮躁，在下月底之前發生困難的機會很大。七月五日，肯奈蒂打電報來說，哈里法古斯告訴他英國正在召集船隻和海軍人員的後備隊，表面上是準備在八月間舉行演習，但是實際上是想在困難到臨的一個月前使海軍有所準備，當時假定困難將發生於九月間。

六月三日，我國駐海牙代辦報告荷蘭海軍參謀長弗斯德納海軍上將的意見，認為希特勒可能在八月中旬至月底間在

完成收割之役從事戰爭。弗斯德納並且提起德國方面正在儘速收割農作物，此點已為荷方所知悉。

此外，我們從我國駐國外外交代表團不斷接到有關歐洲發展的報告，說明德國正繼續對波蘭施用壓力，並為掌握但澤而做出各種姿態，同時還說明立即簽訂英蘇協定的種種困難，雖然英國外交數年來一直為此一目的而努力。

所有這些消息，巴拉和他的同道是可以看見的，假如他們要看的話。但是巴拉却情願去信賴倫敦一家次要的新聞社，猶如後來傳出來給人知道的。

這裏是美國強有力的孤立主義運動最後一次有力的掙扎，它用一切可能方法繼續作戰而依然是一種危機。但戰爭在歐洲爆發之後，它就不再能阻撓政府任何一個建議了。

沒有一個人能夠肯定地說，我們未能取消軍火禁運乃是希特勒最後決定一戰的一個最後的，或者甚至是最重要的因素。但是我確信，假如軍火禁運能於一九三九年五月，六月，甚至七月取消，他必然會把這個因素估計在內。我同樣相信我們未能取消禁運鼓勵了他向前猛進，此外里賓特洛甫外長又保證英國和法國不能真正援助波蘭，縱使援助，它們也不能十分有效，因為美國不能以物質援助給予它，此點對希特勒也是一種刺激。七月二十日，蒲立特從巴黎發電給總統，說明倫敦和巴黎方面的意見，都認為希特勒決定在八月發動戰爭的可能性，已因國會延緩對中立法採取行動而見增加，英國副外相望西泰德以為戰爭將在八月間發生，正以二對一打著賭。

## (十六) 強硬而又不太強硬的外交

當國會辯論中立法的時候，東北歐方面凶險的發展，正在吸引我們的注意，情勢堪憂。蘇聯正從事於一種廣大的行動，以謀為它自己沿波羅的海劃出新的軍路邊界。它顯然在努力增強保衛，防備外國。但是以當時的軍事局勢估計，它的對象不可能是協約國，因為後者格於德國的力量，根本不能接近波羅的海。史達林顯然仍以德國為念，對於一九三九年八月所簽互不侵犯條約中希特勒的說話，並不比協約國更具信任。

我們對蘇聯為保護自己防備德國而作的努力，可以同情，但是我們擔心它的行動將使歐洲的衝突更見緊張。

蘇聯和德國簽訂協定之役，彷彿像躺在泥漿中的一條鱈魚，等待機會。他在九月底和十月，能夠不用兵力，一舉而使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三個波羅的海國家納入它的範圍之內。經由各種各樣的壓力，它誘使它們讓出了好幾個軍路根據地，並在三國中的每一國，留駐軍隊二萬人。可是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然在名義上還保持它們的政府和獨立，我們覺得並無採取外交步驟的必要。

但是同樣的壓力對芬蘭却没有發生效力。這個剛強的小國表現「與其讓步毋寧作戰」的每一種表徵。

我們對蘇聯的關係，不幸爲了當時美國貨船「礮石城」號事件而成爲很複雜。（這艘船，載有運往英國的各色貨物，於一九三九年十月九日爲德國袖珍戰艦「德意志」號所截獲，並被帶往挪威的托隆沙，其後復被帶往蘇聯的茂曼斯克港。該船之被停泊於茂曼斯克，使美國根據海峽規則提出照會。）

蘇聯和芬蘭的談判，就在「礮石城」號事件發生的時候在進行中，但情形頗爲不佳。蘇聯要求改變國境，和割讓芬蘭灣中的島嶼根據地，此在芬蘭看來，是勢將損害它的獨立的。談判於十一月十三日破裂，兩國的關係從此迅速惡化。十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浦立特大使從巴黎打電報告訴我說，蘇聯剛廢棄它對芬蘭的互不侵犯條約，將於最近將來進攻芬蘭。他建議假如我國政府在這種情形之下能够有所作爲，那麼還是從速爲宜。

我立即把這個消息帶給總統，我們當即決定願爲芬蘭和蘇聯調解爭端，出面斡旋，假如它們願意的話。我於是就發一個電報到莫斯科和海爾辛基去，其中我說我國政府對於芬蘇爭端的日益緊張，極表關切，並且說：「假如戰爭範圍再告擴大，致使國際關係更趨惡化，那麼在我國看來，是極端遺憾的。設若雙方同意，我國政府樂於出面斡旋，而決不在任何方面牽涉爭端，一切唯以和平解決爭端爲職志。」

芬蘭歡迎我們的建議，但蘇聯則覺得並無斡旋的可能。翌日，史達林發動了他對芬蘭的進攻，包括轟炸若干城市在內。

我們對於另一次戰事的爆發，極感失望。總統和我就此事商談一過之後，他在戰爭發生後次日向報界發表了一個強硬的聲明。他說：「所有愛好和平國家的人民，凡是依然希望在全世界繼續根據法律秩序來維持國際關係的，將一致責難這一個用武力來解決國際異見的新行動。」他並且向芬蘭和蘇聯提出呼籲，要求避免轟炸平民。

史丹因哈特從莫斯科發電報給我說，當他向莫洛托夫外長提出這個呼籲時，莫氏絕對否認蘇聯空軍曾經轟炸過平民或者不設防城市，或者具有這種意向。（我們駐海爾辛基的公使館會發給我們許多電報，列舉蘇聯轟炸不設防城市的許多事實。）史丹因哈特說，在他和莫洛托夫談話中獲得一種印象，就是蘇聯外長不希望第三者調停，蘇聯的開始戰爭，目的在儘速清算芬蘭問題，因此可以對巴爾幹和黑海區或者從德國方面來的發展，可以自由應付。

當時我們就決定向蘇聯實施道德禁運，不得以飛機輸往蘇聯，這種辦法，對日本是已經實施的了。

總統和我早就決定不擬以中立法案適用於蘇芬戰爭。在政府的立場，我們不能把軍火出售予芬蘭，但是我們不願意阻止私人出口商出售軍火，假如他們願意的話。再者，由於歐洲戰爭而宣佈的交戰地帶，我們的船隻已經不得進入波羅的海。最後，我們還設法避免使蘇聯成爲一個法律上的交戰國。我們深切感到共產主義蘇聯和納粹德國本質上的仇視是如此深刻，而希特勒的野心又如此漫無止境，最後蘇聯可能會到協約國方面來的。我們必須謹慎從事，不要迫它向另

一個方向走。

我國本身和蘇聯之間的不愉快關係，可於十二月初發生的一樁事情見之。自從我們於一九三三年和蘇聯建立外交關係以來，我們在那裏的領事官吏一直受到種種的限制，這種限制，我國是不會想到適用於類似的外國官吏的。他們的行動受約束，他們隨時被監視，他們在到達或者離開的時候，行李總是被檢查的。

最後，我決定想試試在我國也適用同樣的待遇，是否對於蘇聯的忽視禮儀，可以比外交抗議更能促使蘇方注意。當蘇聯外交部爲一個到紐約來的新領事申請一張「自由通行證」（領有這種文件的人可以不受海關檢查）時，在莫斯科的史丹因哈特大使就回答說，假如蘇聯政府對於來去的美國的領事官員，也能發出類似的文件，我們是樂於這樣做的。蘇聯加以拒絕。於是史丹因哈特建議當蘇聯領事到紐約的時候，他的行李應受海關人員檢查。

這件事情照辦了。於是，在十二月七日，奧曼斯基大使打電話給梅塞史密斯助理國務卿，提出強硬抗議。我們當即通知他一點，就是副領事行李之被檢查，乃是爲了來往於蘇聯的美國領事，行李也被檢查之故，我們是一向是應用相互的原則的。

奧曼斯基力爭這種問題應該根據最惠國原則辦理。這就是說蘇聯將對待我們的領事，猶如它對待任何其他國家的領事一樣；我們應該對待蘇聯的領事，猶如我們對待任何其他國家的領事一樣。

但是我們通知大使，我國政府許多年來處理這類事情，一向是根據相互原則的，意思就是說，我們將對待蘇聯領事，猶如蘇聯對待我們的領事。

奧曼斯基於是要求我們代表去確定他的政府是否慣於檢查我國到蘇聯去的領事的行李的。史丹因哈特大使徇其要求，送來了一連串的例子。

由於總統對於這件事情發生興趣，我就送給他一份由梅塞史密斯擬就的備忘錄。十二月二十二日，總統在一個備忘錄中回答說：

「十二月十六日你送給我的有關蘇聯對美國外交人員所加限制的備忘錄，極爲精彩，我想我們對於蘇聯所造成的每一種麻煩，應以類似的麻煩作爲答覆。

「但是當牽涉到史達林，加里寧或者莫洛托夫等人的魯莽舉動時，我們這裏却不能以同樣的魯莽舉動相對付。可是我以爲這樣的一天不久就會到來，就是說我們不妨把局勢直接促使奧曼斯基注意。我們很可以告訴他一點，就是他的政府未能答覆我有關轟炸平民的電報，以及未能允准我國大使和「巖石城」號運消息，頗有完全不顧文明政府間普通的禮貌和友好關係的樣子，因此總統老實覺得很奇怪，懷疑蘇聯政府是否認爲值得繼續外交關係。我們以此爲止，不必再進

一步，但是這已够使蘇聯政府感到一種負擔了。」

我們把這種思想傳達給蘇聯人，但是蘇聯官員幾世紀來遺傳下來的對外國人的猜疑態度，並無變更。

這種來自蘇聯方面的次要的麻煩，繼續使總統頗為頭痛。史丹因哈特發來了一個電報，告訴我們說莫斯科大使館今後將不再能打長途電話了，除非親自到中央電話局去。我把這個電報送給總統之後，他就在一九四〇年一月十日寫給我這個備忘錄：

「我在想我們是否能夠用同樣的規則，適用於這裏的蘇聯大使館——或者至少告訴奧曼斯基說我們想這樣做法。這也可以說是人情之常——FDR」

但是後來史丹因哈特又來了一個電話，說這種困難已經解決了。

雖然在需要向蘇聯直言的時候，我們從不猶豫，但是我規定一個基本政策，就是儘可能和蘇聯保持良好的關係，決不給它絲毫的印象，以為我們是一個當前的或者潛在的敵人。友誼之門一直是敞開的，至少我願意用折衷辦法和蘇聯相處。

### (十七) 戰禍蔓延令人想起梵蒂岡

蘇聯與芬蘭的戰事，在北部的雪山進行着。芬蘭的英勇已把蘇聯所預期的輕易進取，變成三個月的激烈戰爭。

這一戰爭，雖然在交戰國名單上增添了兩個，但是在一九三九年整個的最後數月中，歐洲却充滿着和平活動的謠傳。波蘭崩潰後的僵持時期，替和平謠傳與姿態造就了很好的理由。這些是我所關切的，因為它們一致把美國與外傳進行着的和平運動聯繫在一起。

早在一九三九年十月二日，美國駐羅馬尼亞公使根室打電報給我說：羅外長對於美國總統發起和平運動的可能性，表示深切的興趣。翌日，我回電說明並共進行此種運動的企圖，並且也未曾接到任何交戰國請求我們發動和運的表示。

希特勒在他十月六日的演詞中，提出空洞的和平建議——當然啦，這種和平將使他保有他在戰爭中所奪獲的大部份以及捷克和奧地利。在他發表演說之後，駐比大使戴維斯致電給總統與我，說是某種威方面（後來知道是比王李奧柏）請求他說明：祇有總統才能防阻德國進攻西歐，而比利時很希望總統能夠進行一種努力，和他在以前危局中所進行的一樣。

同日（十月七日），我們駐柏林的參贊堪克來電稱：接近希特勒的某人士表示，總統可以利用希特勒的演詞做機會，以秘密電文致達希特勒，贊同「他的和平努力」，並請求他闡明他對於建立和平的基本原則。兩天後，堪克電云：德

方新聞發言人稱：假使總統建議休戰並談判和平，德方決可予以接受，他並且表示德方或可參加一個距離戰區很遠的會議（若干人認爲是指華盛頓而言）。翌日，美國駐芬公使桑飛爾來電，轉達芬外長的建議，說是美國可以發動試探和平的可疑性。

在接到這許多同一性質的電文之後，我於十月八日星期日召集我的同事，在我的辦公室內舉行會議。我邀請戴維斯出席，當我特別需要他的高見和悠久經驗的時候，我時常都邀請他參與討論。對於美國此時是否可以在恢復歐洲和平方面進行合理的行動，我們之間已經有過很詳盡的討論。

在這星期日會議席上，我們會審查美國可能提出的建議草案。在這裏面，我們將請求交戰國說明他們的和平條件；聲明我們願意擔任中間人，把關於此問題的通訊，傳遞給交戰國的對方。在交換許多意見之後，我說明我並不以爲美國此時發起和平運動能够發生很大的作用。

因爲希特勒一直都是戰勝者，所以我們在和平方面所可採取的行動，祇會有利於他而使盟國沮喪。我們沒有理由去強逼英法兩國在如此條件下媾和。我們一旦向英法提出和平建議，就會使他們陷於錯誤的地位。假使他們接受，他們就必須對希特勒條件的大部份表示同意；假使他們拒絕，就會負起拒絕和平的罪名。

我們不採取行動的決意，並沒有阻止謠言的繼續傳播。我們似乎覺得許多此類的謠言都是來自德國，一部份目的在於使人相信希特勒一向都準備着和平，另一目的就是要把個別和平與侵略謠言使盟國迷惑。

十一月五日，參贊塔克自柏林來電稱：沙赫特表示，假使他獲得總統接見的保證，以便提出他對於解決歐洲糾紛的意見，他願意到美國來進行非政治性的談話。塔克並且報告說他最近注意到完全非官方性質的同樣努力，但是他警告我們不要過份重視，因爲和戰的決定，繼續定在希特勒身上。

在我們看來，沙赫特的行動，似乎是德國政府企圖經由非正式人員與其他政府接觸的整個努力中的一部份。這些非正式人員表面上好像是完全與德政府無關，而在若干方面講，他們還是反對德國政府。

當比王李奧伯突然到海牙去，與荷蘭女王威廉明娜共同斡旋結束戰爭的時候，戴維斯大使於十一月七日拍電給總統和我，說德國將於十一月九日進攻荷蘭，所以才促成他們的這種行動。荷蘭公使勞登九日來看我。他的情緒很是激動，他把他的政府的照會，呈給總統和我，裏面說荷比兩國的中立，將在數天甚至數小時內遭到破壞。十一月十一日，總統復比王李奧伯與荷蘭女王威廉明娜，重申他的友誼，但並沒有肯定的表示。

十二月十四日，駐法大使蒲立特自巴黎拍來法外交部李加對他說的話。據李加說：墨索里尼企圖促成時機未成熟的和平，以便維持德國的納粹政權，進而保護他本身在義大利的政權。李加以爲墨索里尼是要恢復一九三三年義總理所建



議的英法德義四強公約的基本原則。

同時，總統與我們討論和梵蒂岡建立關係的計劃。七月初，在戰事爆發前兩個月，韋爾斯會與我討論我們從這種關係中所能得到的益處，我們感覺到梵蒂岡具有許多方面的消息，尤其是關於在德·義·西（西班牙）方面所發生的事情，而這些消息，是我們所沒有的。經我建議之後，韋爾斯寫了一封私人信給駐羅馬的美大使費里浦，徵求他的意見。七月十九日費里浦的覆函建議建立外交關係，並委派新教徒擔任美方代表。韋爾斯將此函交給總統。

在與總統談話中，我力言我們不能遣派正式大使到梵蒂岡去，而祇能遣派總統私人代表與教皇洽商。我贊成費里浦的建議，這位代表應該是一位新教徒。英國遵循程序，委派新教徒擔任駐梵蒂岡的公使，另委天主教徒一人任公使館內的一等秘書。我又說假使他採取此一步驟，他將同時獲得其他教會美國領袖的同樣合作。

駐羅馬的費里浦大使於九月廿五日拍電給我，說是梵蒂岡「羅馬觀察報」對於總統向國會提出的中立咨文，已予以充分和客觀的記載。我把原電送呈總統參考。

然後在十月二日，總統以很長的備忘錄送給我。備忘錄開頭就說：「這是本人剛剛想到的見解，沒有和別人討論過。他預料在戰爭結束之後，無論是很快，或是另一夏天，或是三年五年，將產生大量的難民，包括基督徒與猶太人，來自各國，甚至於連英、法、義也在其內。」

總統繼續說：「因為這緣故不知你我是否應在戰爭進行時，就開始考慮到與梵蒂岡，美國教會聯合會，以及歐洲方面同樣性質的機構，討論整個問題。與猶太人的接觸，業已經由密朗泰來委員會予以實現。

「但是與天主教的接觸，應該直接以梵蒂岡本身為對象，因為這一問題對歐洲天主教的重要性，要比對美國天主教的重要性要大得多了。」

「因此，我以為雖然沒有倉忙從事之特殊理由，我們或者可以考慮在以後遣派一位前赴梵蒂岡的特別公使或大使，以便我們可以對歐洲天主教難民問題，具有一種直接通訊的系統。」

在他的備忘錄內，總統建議遣派外交代表到教皇那裏，完全是根據難民問題。關於梵蒂岡可以成為獲致和平的因素一點，他並沒有提及，雖然這一點以後對他是極為重要的。

十月十日，他以另一備忘錄給我，內容是關於費里浦大使報告「羅馬觀察報」刊載總統致國會的中立咨文一事。羅斯福先生說：由於各種原因，我以為你不妨依照下面的意思，拍一電報給費里浦：「閣下有便時，請向教廷外交部長說明：總統對於「羅馬觀察報」用公正的態度登載美國消息，表示愉快。」我照此意於十月十一日致電給費里浦，十月二十日，即接獲他的復電稱：教皇對總統的電文，表示欣慰。

梵蒂岡方面的宣傳進行了數星期之後，我在十二月廿三日打電報給費里浦，把總統致教皇的聖誕函件內容告訴他。此一函件將於第二天公開發表，同時並由總統宣佈戴樂被委為遣赴梵蒂岡的代表。原函是經由紐約總主教史班爾曼（現在是紅衣主教）轉交駐在華盛頓的戴樂代表。總統復以同樣的函件致給美國基督教會同盟理事會會長新教領袖白特里克，及美國猶太神學院院長艾達拉。戴樂的任命，沒有再比他更適當的了。他具有廣泛的智慧和非凡的知識。除了梵蒂岡的工作以外，他在我們發起與推動世界和平機構大綱的工作中，也成為活躍的一員。

戴樂於一九四〇年二月啓程赴歐，而我們與梵蒂岡的新關係，也就此開始。對於歐洲和平問題，戴樂似乎與我們具有同樣的現實見解。他決心不提出解決辦法，除非可以獲致永久性的和平。在德國未瓦解前這種時機是不會到來的。

## （十八）此時此刻談和平等於自殺

一九四〇年夜十時五十分，我公寓中的電話響了，駐布魯塞爾大使柯達希，用激動的聲音告訴我說，大批德國空軍正越過盧森堡，飛到比利時來，據說荷蘭上空也有出現。柯達希還告訴我，大批德軍正在比利時，盧森堡和荷蘭邊境集中，比利時方面預料德軍大致將於黎明進攻。

我打電話給總統，告訴他柯達希給我的消息，其後再打電話給國務院中的幾個同僚。我在剛過十一點鐘不久之後到辦公室，比其他的人稍早一些。我立即打電話到歐洲幾個軍要首都去。當我和柯達希接通時，他告訴我盧森堡已被侵入，德國飛機正在轟炸布魯塞爾附近的飛機場，德軍似乎準備同時進攻，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

但是比德軍進攻比，荷，盧成功更凶險的消息，就是浦立特大使在五月十五日打給總統和我的電報，其中說，德軍以大量的坦克部隊和俯衝轟炸機前導，業已在色當突破法軍防綫。雷諾總理打電話給邱吉爾說，德軍既已突入，戰爭在幾天之中即將無可挽救。照雷諾的意思，除非英國立即派它的戰鬥機隊從聯合王國到法國來，戰爭就完了。邱吉爾答應把這個意見向戰時內閣提出，但是堅決向雷諾說，戰爭不會無可挽救。雷諾回答說，邱吉爾應該知道，在雷諾擔任總理的時候，法國是誓必作戰到底的。

同日，五月十五日，肯奈蒂大使打電報給總統和我，告訴我們他剛才和邱吉爾所作的一次聳人聽聞的談話。首相說，假如義大利參戰，他認為協約國獲勝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了。邱吉爾說法國正在要求派更多的軍隊去，但是他不願意在此時此刻從英國派人出去，因為他深信在一個月之內英國即將遭受激烈的進攻了。邱吉爾還說他想要我們出借舊驅逐艦三四十艘，以及我們可以多餘下來的任何飛機。

總統和我對這一點毫無疑義，就是協約國的勝利，對於美國的安全係屬必要。

總統就此項問題迅速加以檢討，當即決定收集每一架可以動用的戰機運到法國去。五月十四日，蒲立特打電報給我，歐戰由法國派遣航空母艦一艘前來載運。我和總統商談之後，即於次日回電說，由於國際公法的規定以及美國的地位，在紐約裝運這些飛機勢不可能，但是可以先把它們飛到加拿大的東海岸某港，可能是哈里法克斯，然後再在那裏裝運。這一點是照辦了——但是已經來不及運到法國了。

總統知道我並且充份明瞭了一點，就是德軍在以閃電姿態佔領荷蘭和突破色當中所表示的優勢，需要我們在重振美國武裝方面修正全部估計。總統和我商量向國會提出一個特別咨文的計劃，要求將該年份的軍用撥款事實上增加一倍，此點我完全贊同。五月十三日，蒲立特打電報給我，要求轉給總統，其中力言由於飛機在德軍推進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實有增加飛機生產的必要。於是我就向總統建議美國應以每年生產飛機五萬架為目標。其前，我已向我的同僚提起過這個數字。羅斯福先生的反應和我同僚的反應相同——他簡直默然無言，因五萬架飛機比諸目前每年的生產量，達十倍之多。

但是我力爭說，如能定一個較大的數字和遠大的目標，最為相宜。這樣的生產量，在我看來並不像對於其他人看來那樣不可能。我覺得單是提起這個數字再加上我國舉世所知的龐大生產能力，對於激發我國自己的人民，安慰協約國以及使軸心國有所顧慮，已足以產生良好的影響。

總統即表示同意。五月十六日，在致國會的咨文中，他說他希望全國加緊生產，以期每年生產飛機五萬架。他要求追加武裝部隊各部門的撥款，總額達十一億八千二百萬美元。

繼而，雷諾總理開始向總統發出一連串異常尋常的幾乎是歇斯里的性的呼籲，法總理顯然為德軍驚人的勝利所震驚和激動，此點頗易設想。但是他要求的是不可能的。

五月十八日，法國外交部秘書長萊傑通知蒲立特大使說，雷諾據於那天晚上向總統提出個人的呼籲，詢問羅斯福先生是否可能從國會得到對德宣戰。蒲立特打電報給總統和我說，他曾答覆萊傑，認為這種呼籲不惟無用，抑且有更惡劣的結果，總統不會要求國會對德宣戰，國會幾乎會一致反對宣戰的。蒲立特率直地指出，假如雷諾一定要提出這樣一個呼籲，也不過純粹是記錄性質的東西，將來有一天雷諾希望可以表明他曾向美國總統提出呼籲，總統則加以拒絕而已。蒲立特向萊傑說，這種辦法，在他看來不但對英法甚至對美國都太不值得，而當前的情形又太嚴重，三國政府間除了坦白相處之外，實不宜從事徒有其表的事情。

總統和我同意蒲立特向萊傑所作的答覆，是反映我們的見解的。

那天晚上，蒲立特親自去見雷諾，雷氏說他地向我們提出一個正式的照會。

蒲立特把他的意見告訴我們，認為雷諾並沒有把這樁事情想出一個辦法，已經決定送一個照會來作為一種記錄。這

個決定，曾因那天下午蒲立特和萊傑的談話而加以阻止的。

在總統和我討論雷諾和蒲立特的談話之後，總統就和蒲立特通電話，告訴他說這一類性質的事情是談不到的。蒲立特當即向雷諾轉達。

五月二十二日，蒲立特再打電報給總統和我，說雷諾告訴他他不能讓這樁事情擱置不管。這在現在，已較四日前他最後一次討論這件事情的時候，更有重大關係了。法國已從義大利和瑞典接到消息說，假如德國在法國北部的現行戰役中再獲得一次重大的勝利，希特勒擬向法國提出一個單獨的和寬大的和平。

雷諾說，假如希特勒在法國國內極度失望之時提出這樣一個建議，法國大眾傾向於接受的危險性極大。雷諾本人承認這種接受等於自殺，猶如一九三八年捷克放棄蘇台德區一般。從那時候起，法國將生活在德國的鐵蹄之下，一俟希特勒認為便當的時候，他就會佔領整個法國猶如他佔領整個捷克斯洛伐克一樣。再者，德國戰勝英國的事情，也將在這星期內隨之發生。於是雷諾相信在這個月之中德國兵士和幾千架飛機將到南美洲，巴拿馬運河將遭轟炸，美國軍隊將不能作多少抵抗了。

除了宣戰以外，他認為美國其他的援助均不足以挽救法國和英國。假如我們不能超過官戰限度給予軍事援助，我們勢必要在美國對付德國人了。

法國的軍事局勢在迅速惡化中。在法國顯然在瓦解的情形之下，我在我的辦公室中和同僚舉行了好多次會議，要他們考慮歐洲戰局發展各種可能性，特別重視它們對美國和西半球的影響。我們得到一個一般的結論，就是協約軍的地位，已經艱難不堪，我們的注意力應集中於保全英法的艦隊，使其不致落入希特勒之手。

總統同意就海軍問題向英法政府提出一個直接呼籲。我們當即起草電報，而於五月二十六日發出。我在致蒲立特的一個電報中說，總統希望他立即向雷諾和達拉第說明一點，就是一方面我們依然希望德軍的侵入能予阻止，但是假如情勢愈演愈劣，我們認為法國艦隊的保持，對於法國和它殖民地的恢復和海洋的控制，實屬重要，而對於法國獲得較緩和的和平條件，也有重大影響。

我們在致英政府的文告中，就英國艦隊問題也表示同樣的見解。五月二十日，邱吉爾發電給總統，力言英國所面臨的危險，並且說，假如聯合王國為希特勒所征服，那麼唯一可以和德國作談判條約就是艦隊。總統在他致邱吉爾的電報中也提及了這一點。他向邱吉爾建議說，假如情勢愈演愈劣，英國艦隊可退至加拿大，並且保證他美國決不准德國或其他任何非美洲國家奪取加拿大或英國其他西半球屬地。祇要英法艦隊能保持完整，德國除了在歐洲境內之外，不能贏得戰爭。

雷諾的呼籲現在變得愈劇烈了。蒲立特於五月二十八日打電報給我們，說明雷諾建議由法國共和國總統和英王向總統發出聯合呼籲。當蒲立特看見雷諾的時候，他已經寫好了一句，說：「爲世界自由而作戰的軍隊，已在背上被刺。」雷諾說，他深知縱使我們於明日向德國宣戰，我們也不能把軍隊空運到法國來，因爲並沒有這種飛機存在。但是我們有艦隊在。大西洋艦隊應立即派到地中海。此一行動至少可以防止另一刺人之背的行動，這一次是從墨索里尼來的。在英國完成其鄧扣克撤退之後，它向法國表明它不能再派飛機到大陸上來了。英駐法大使對蒲立特說，作戰時飛機的破壞率是如此之高，假如英國派它尚餘的飛機過去，兩星期內將一無所留。目下既不再有挽救法國甚或法國軍隊的任何希望，似乎還是保留飛機在英國以備應付即將發生的英倫之戰爲上策。

爲響應雷諾幾乎是可憐的呼籲起見，總統敦促邱吉爾派飛機到法國去，但是首相拒絕了。蒲立特對此項決定憤慨異常，而於六月五日向總統和我報告說，英國可能在保存其空軍和海軍，以謀在和希特勒談判時作爲討價還價的張本。

但是總統和我不以爲然。我們知道法國已經完了，但是我們相信英國在邱吉爾不屈不撓的領導之下，是想繼續作戰的。

對德和平條件的思想現在佔據了法國內閣的注意。從蒲立特那裏來的電報愈來愈反映出法國的投降祇是幾天的事了。德軍正向巴黎猛進。六月十日，法國政府遷都多爾。

就在那天，墨索里尼向法國和英國宣戰。

### (十九) 乘人危急之秋來刺人之背

沒有一個政府爲了防止另一個政府參戰而作的努力，比我們爲了防止義大利參戰而作的努力更誠摯的了。在墨索里尼參加戰爭之前，我們曾向他呼籲和施用壓力，凡五閱月。

四月二十日，戴樂發給我兩個電報，轉呈總統。在一個電報中，他說墨索里尼參加希特勒方面或在新地區單獨進軍侵略，具有真正的危險性。他引證致廷外交部長瑪格里昂的說話，敦促總統在二三天內採取行動，最好是立即採取行動。在另一個電報中，戴樂引證教皇的說話，敦促立即由總統致電墨索里尼。教皇說在那時候他將採取平行行動，協力以赴。

在接到這兩個電報之後，我就通知總統，當時他在喬治亞洲的溫泉。他覺得在向墨索里尼表示了兩次之後（一次是經由我國大使，另一次是經由韋爾斯），他已經說得够了。檢討來自許多首都的致總統的電報，我們以爲墨索里尼的行動大致將在幾天之內發動。

可是在四月二十六日，戴樂又打電報來，說他又遇見了教皇和瑪格里昂外長，他們重申以前的建議。戴樂報告教廷方面的信念，認為墨索里尼採取突然的行動是很可能的，尤其爲了他必須迅速行事，藉以克服國外反對參戰的勢力，猶如外界所傳說的。

四月二十八日，星期日，總統回到華盛頓。我同他一起讀戴樂發來的電報，並且告訴他英國和法國政府也擔心墨索里尼將以武力參戰。於是總統決定他應該向墨索里尼發出一個呼籲，這一次是用書面形式的。

文告的起草工作，就在那天（四月二十九日）下午完成的，而在當夜用電報發給墨索里尼。

翌日，戴樂打電報給總統，教皇對於他以前所建議的平行行動，信守不渝，已將一個親筆書寫的文告，直接送給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於五月一日接見費里浦，把總統的文告讀給他聽。他說德國是無法擊敗的，希特勒的征服所造成的「新地理形勢」如不予以承認，歐洲的和平就無從予以考慮。至於義大利，他說它「幽禁於地中海內」的情勢不能容忍，並且痛罵英國之佔有蘇彝士運河和直布羅陀。

墨索里尼對費里浦口頭所講的說話，實際上比五月二日由柯隆那大使送到白宮來的墨氏致總統的書面答覆，要溫和得多。

次日，費里浦打電報給我說，他看見過墨索里尼之婿齊亞諾外長，後者告訴他說英國之決定撤退地中海商船隊，對於羅馬是一種出乎意料之外的行動，因爲義大利無意參戰，除非協約國攻擊義大利。

在德軍侵入荷比盧一開始之後，費里浦又於五月十日打電報給我，說他又看見過齊亞諾，當時齊亞諾剛見過墨索里尼。齊亞諾說，義大利並未因德軍的新行動，而決定或考慮改變方針。

但是剛剛在四天之後，局勢已完全改變了。費里浦把齊亞諾對他所作的聲明，用電報打給我，其中說，一星期前，他還認爲義大利不參戰的可能性是五十對五十，現在贊成參戰的是九十對十了。齊亞諾說墨索里尼業已決定主張。

在倫敦和巴黎接到這個消息之後，恐慌幾達極點。蒲立特大使發給我一個嘶聲力竭的要求，主張總統應以更大的壓力加諸墨索里尼。雷諾總理要求我們以若干過齡驅逐艦售予英國和法國，因爲他預料義大利的潛艇將在地中海方面開始攻擊。

當費里浦的電報一到國務院之後，我就把它送給總統。他當即決定再向墨索里尼作一次呼籲。我們於是再和他在國務院起草，而在當天（五月十四日）午夜由我用電報發給費里浦。

總統說，「以前我會向閣下說過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我知道，作爲一個現實主義者的你，一定會承認假如這次戰

爭擴大到了全世界，勢將超過各國首長控制能力之外，致使千百萬生靈以及人類自由文明的結晶陷於毀滅。並且沒有一個人，不論他怎樣全智全能，能够預料到他自己或者他自己人民的結果。」

費里浦想再度親見墨索里尼，可是這一次墨索里尼傳言說，他希望經由外交部接受總統的第二個文告。三天之後，五月十八日，費里浦把墨索里尼致總統的覆文用電報打給我，其中說：「義大利擬與德國保持聯盟關係，在歐洲命運正在賭注之中的時候，義國不能袖手旁觀。」

同時，在覆文到達之前的幾天中，蒲立特在巴黎設法和法國政府保持最密切的接觸，反映出他們對於戰爭的險惡轉變的一種自然的恐慌。他打了許多電報來，建議我國對義大利應採取的行動。他建議總統應要求教皇威督墨索里尼，說明假如義國參戰，教廷將與義國斷絕交往，並要求教皇以精神立場斥責希特勒的侵略，接近發出斷絕交往的命令。他又建議我們的大西洋艦隊應派往希臘作禮儀上的訪問，假如義國參戰，義國移民的匯款應予切斷，以及義國移民和美籍義大利應通過決議反對義國參加戰爭。

我曾就此類建議和總統談過。假如任何步驟可以有相當成功機會的話，我們是願意採取的。但是墨索里尼已立下決心這一點，已經是很明顯的了。

繼而，在五月二十五日，邱吉爾和雷諾邀請總統再向墨索里尼提出一照會。他們建議總統應根據下列諸點向他作一聲明：

○總統有理由可以相信英法明瞭義國對它們在領土問題上有若干不滿。

○目下英法充份準備考慮義國的要求，以謀達到協議，俾在戰爭結束之後滿足義國合理的要求。

○協約國將准許義國參加和會，其地位與任何交戰國相等。

邱吉爾和雷諾建議總統應附加說明一點，就是假如義國避免參戰以與英法為難，美國將竭盡所能使任何獲致協議，加以履行。

這些建議須由總統代表他自己提出，而非以協約國代理人的資格提出的。

總統對於此種辦法不久就表示同意，並無多大困難。但是他的確說過與其是照英法意思而行事，毋寧繼續他以前就一此問題和墨索里尼書電來往的辦法，這就是說一切是出諸他自己的主動，並非徇英法的要求而做的。

總統的文告是在國務院起草的，而於五月二十六日由我用電報發給費里浦大使。

現在，在墨索里尼的面前是有一個確定的建議了。根據這個建議，他可以得到任何合理的要求，不必訴諸戰爭，而由美國保證英法將信守協定。

但是下一天，費里浦把墨索里尼的「否」字打給我。齊亞諾對他說，墨索里尼的意思並不僅僅在實現義國合法的願望，並且要履行對德聯盟的責任。

墨索里尼的答覆雖然一次比一次更仇視，但是總統並不因此灰心，還要向義國的獨裁者再作一次嘗試。我們當即起草，而於五月三十日用電報打給費里浦。這一次總統說，由於義國參戰而使戰爭再擴大的結果，將立即使美國本身加緊其軍振軍備計劃，並且使美國政府加倍努力，俾予協約國在美國境內獲致一切必要供應品和物資的每一種便利。」總統還提醒墨索里尼一點，就是我們在地中海方面具有歷史性的利益，至今已維持幾達一百五十年了。

墨索里尼的答覆甚至比以前更確定，更仇視。五月三十一日，費里浦把齊亞諾的聲明用電報打給總統和我，其中說墨索里尼已經決定參戰，現在祇是短時間的問題——幾天的問題。當費里浦說明假如義國參戰美國大眾對義態度將發生重大變化時，齊亞諾回答說，此點已經考慮過了。

翌日，費里浦把墨索里尼自己的聲明打給我，其中說他願意履行對德國的責任，不願意「再受到任何壓力」，因為這種壓力，「適足以使他的態度更見強硬」。他說他並不相信義國的干涉一定會使戰爭在地中海方面擴大，並且質詢我們在地中海區的利益要求，聲言此等要求等於義國在加勒比安海區的要求一樣。

至此，法國直接向墨索里尼表示，願意解決義國的領土要求。但是，六月三日，蒲立特打電報給我說，齊亞諾回答法國駐義大使，聲稱墨索里尼對於經由和平談判方式接受任何法國領土一點，並不發生興趣。他已決定對法作戰，對於法國的照會不擬答覆。

總統和韋爾斯還想利用法國的意思作為跳板，再向墨索里尼提出一個呼籲。文告草案已在國務院中擬就。但是到那時候，我覺得對於一個決心以戰爭來滿足其自己的虛榮的匪徒，呼籲已經太多了。我極肯定地反對發出這個文告。我的反對發生了效力，這個在六月七日準備好的文告，並沒有發出。

當墨索里尼於六月十日向英法宣戰的時候，我們中間任何人都感到驚奇了。

那天晚上，總統在浮琴尼亞州夏洛德維爾城的浮琴尼亞大學發表演說。他申述他為防止義國參戰而作的許多努力。於是他說：

「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十日這一天，握有短刀的這隻手，已經把它的刺入鄰人之背了。」

這個字句，在我們在國務院起草的草案中是有的。韋爾斯向總統建議，將其取消，因為這樣一說將使墨索里尼對他如此存有惡感，致使在談和之時到臨之際，無法獲得他的合作。事實上，刺人之背這個觀念，早在五月二十日雷諾總理就會用過，此在蒲立特的電報中也提起了好幾次。總統把這個字句從他的演詞中刪去，但是在赴夏洛德維爾途中改變了



主張，重新把它插了進去。

## (二十) 權衡輕重不得不出此下策

雷諾總理在墨索里尼官戰後數小時借其政府剛要離開巴黎之前，用電報打一個戲劇性的呼籲給羅斯福總統，要求他公開宣布美國除不派遣征軍外將以一切方法支持協約國。

他說，「我們將在巴黎之前作戰，我們將在巴黎之後作戰。我們將局處於一省中作戰，假如我們被逐出該省，則將在北非立足繼續作戰，設有需要，將在我們在美洲的領地作戰。」

總理和我知道法國人是既不能在巴黎之前作戰，亦不能在巴黎之後作戰，亦不能局處於一省中作戰。（雷諾所想到的是不列侖尼省。）但是法國還可以保持對艦隊的控制，撤退到北非，而在那裏繼續作戰。

我們雖有世界上最好的善意和意向，但是也知道我們在援助法國方面是有物質的和政治的限度的。法國之戰，事實上已告完畢，我們簡直無法可以阻止希特勒征服法國。所以我們就設法發出一個答覆，以謀鼓勵雷諾和他的政府在北非繼續作戰，並且保持法國艦隊的完整。

德軍於七月十四日佔領巴黎，在總統發出答覆的前一日。蒲立特大使協助軍人市長把這個未予防守的城市移交給德國人，並未塗炭生靈。蒲立特依照他自己的意思，留在後面，而未與法國政府一同到多爾其後再到波爾多去。他以為在德軍佔領之下留在巴黎（至少暫時）比和法國政府一同逃亡對於協約國和巴黎民眾可以有更多的貢獻。他的腦筋中記着美國大使漢里克的行動，後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是留在巴黎的，並未和法國政府一同到波爾多去。

在我看來，這個決定是不幸的。在六月十日法國政府離開巴黎到六月十七日它要求停戰這緊急的一星期中，蒲立特無法和法國政府保持任何接觸。假如蒲立特能在這些具有歷史性的時日中能代表我們，那麼以他和法國政府領袖無比的密切關係，可能使這個政府帶了艦隊到北非去，從那裏繼續作戰的。

蒲立特的位置由皮德爾大使繼任，他先前在巴黎時是我們駐波蘭流亡政府的代表。皮德爾是一位優秀的外交家，但是以他對法國政府的關係和影響而言，是不能和蒲立特相比擬的。

當德軍進抵巴黎之時，蒲立特和總統直接通報，因為他知道國務院對他即將提出的建議是會反對的。所以他和總統親自接觸。於是他建議留在巴黎，不與法國政府同走。

蒲立特用電話和電報直接和總統通訊的情形有好多次。他還定了一個私人的密碼，專門和總統接好的。這種辦法的運用，在法國失敗的悲痛時日中達到了最高峯。結果是國務院有時候對蒲立特所想的和所做的茫無所知，雖然總統通知

我從蒲立特那裏來的許多消息並在我就某一特殊問題提出詢問時，他總供給我充份的情報的。羅斯福先生喜歡外交工作上戲劇性的一面，因而並不反對此種辦法。

當我知道了蒲立特的建議之後，我就去看總統。我對他說我反對這個辦法，認為我們的大使應諺和法國政府一起走。在我看來，蒲立特對德軍在巴黎的佔領當局的影響是極小的，因為他堅強的反納粹情緒向為德國政府所深知。但在另一方面，他對法國政府的影響，可能有決定的作用。

於是總統就親自打電話給蒲立特。他對大使說他（總統）和我認為他應諺和法國政府一起離開巴黎。他所提出的論據，就是蒲立特可能被共產黨或者納粹份子所暗殺，因為他是同為兩者所憎恨的。蒲立特說他不能逃避危險，竭力爭辯，終使總統放棄了反對。

在多爾，其後在波爾多，皮德爾大使繼續此項奮鬥，曾去看雷諾，貝當，海軍部長達朗海軍上將，達拉第和其他人士，一再向他們申述我們的見解，就是說法國在它的海軍尚告完整的情形之下，應諺繼續抵抗。皮德爾的電訊，對於法國內閣內部的爭執情形，提供了生動的敘述，當時雷諾反對停戰，貝當贊成停戰，而在內閣之外，惡劣的賴伐爾則已開始運用他的勢力準備投降了。

於是在六月十六日夜，雷諾辭職，貝當組織新內閣，由蒲杜安担任外長，達朗海軍上將担任海軍部長，設法停戰。英國和美國政府奮力想保障法國海軍的安全。邱吉爾派他的海軍部長，他的第一海軍大臣，他的殖民大臣到波爾多去代表他。我和總統商討局勢之後，向皮德爾大使發出了在我事業上是最強硬的電報之一，叫地向貝當政府轉達。

我說，「總統希望你說，就是根據我國政府的意見，假如法國政府在與德國人簽訂任何停戰協定之前不能注意到它的艦隊不致落入對方之手，那麼法國政府對於法國帝國的保持以及法國獨立與自主的最後恢復將造成嚴重的損害。更有進者，假如洪國政府不能採取此等步驟而准許法國艦隊向德國投降，那麼法國政府將永遠失却美國政府的友誼和善意。」

這個文告是近乎魯莽的，但是局勢如此，僅有一個強硬的文告或可發生一些作用。

六月十八日，當達朗即將去出席內閣會議時，皮德爾把這份電報交給他。皮德爾並在閣議正在舉行時去訪問蒲杜安，給他一個副本。雖然在皮德爾看來，蒲杜安對於照會中措辭的激烈顯極憤怒，但是他和達朗還是把它放在內閣之前。政府總已決定在任何情形之下艦隊決不移交給德國人，假如海軍投降包括在德方條件之中，停戰應予拒絕。

法國艦隊並不是我們唯一關心的東西。我們也關心對於英國艦隊可能發生的事情。現在，法國是已經屈服了，希特勒可以轉移其全部力量來對付英國了。總統和我，相信英國可以並且將能够順利地抵抗納粹的進攻，但是在美洲和歐洲

，有許多人與貝當及其類似人物持有相同的見解，認為英國將在數星期內被征服或媾和。

當英國大使洛齊安在六月十一日來看我的時候，他說從邱吉爾那裏接到了一個建議，主張由我們兩國政府的海軍官員舉行參謀會議，商討有關大西洋和太平洋的艦隊移動。我回答說我懷疑是否有舉行參謀會議的機會，但是我樂於將這個建議向總統轉達。

洛齊安問我們的軍事參贊能否和陸軍部的適當官員商討關於英法轟炸德國內部的效果。我說我確信我們的軍事人員在能力範圍之內將樂於以任何情報供給他的軍事參贊，雖然我們不能從事於此類情報的交換。其後，我就設法使他的軍事參贊就此一問題和陸軍部商討，並且要求我們駐德國的使領官員隨時通知我們英法轟炸德國的結果。

六月二十四日，我再和洛齊安談論英國艦隊的安排問題。他重又提出建議，主張我們兩國政府的適當陸海軍官員舉行參謀會議。假如一旦英國政府必須帶了它剩餘的艦隊退到加拿大來，這種會議是極爲重要的。但是這須在英國失敗的情形之下始能發生，而當時洛齊安和我根本沒有想到這一點。

我指出至少在這個階段，交換情報還是以經由外交官員較經由陸海軍官員爲宜。總統和我所關心的，乃是舉行軍事參謀會議的消息可能「漏出去」，而使反對政府者以及孤立主義者可以借此指責總統正設法使美國加入戰爭。

法國艦隊問題一個戲劇性的解決，終於在七月三日到來了，雖然解決是僅屬部份的。當時英方接收了停留在英國港口的法國軍艦，他們通知在亞歷山大指揮一個編隊的法國海軍上將說，假如他想要把他們帶到法國去而使它們落入德方控制之下，他們將予以擊沉。他們還把一個哀的美敦書送給在北非奧朗附近的梅賽爾凱勃指揮着法國艦隊一大部份的一個法國海軍上將。哀的美敦書要求在梅賽爾凱勃的法國軍艦參加英國艦隊，不然就開到英國，或西印度羣島或者美國的港口被拘留起來。當法國海軍上將拒絕之時，英方當即開火，使大多數的法國船隻失去效能，擊斃法國人一千名以上。

對於英法之間這種悲劇性的破裂，我感到說不出的悲痛，不能自禁。

一年半之後，將近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底，邱吉爾先生正來訪問總統。在總統招待這位貴賓的某次宴席上，我坐在首相和一位英國海軍上將之間。這位海軍上將問我對於英方在奧朗攻擊法國艦隊的思想如何。我因避這個問題，因爲我不願意在他和邱吉爾先生之間引起爭論，其理由是我曾聽到英國海軍曾反對進攻，英國政府內部曾發生相當重大的意見分歧。

可是在幾分鐘之後，我和邱吉爾先生本人提起這個題目。他概括地說維希政府是不能信任的，假如不予攻擊，它會把艦隊移交給德國人的。他並且說當時英國的威信正在最低潮，他想靠此一行動來在全世界提高它，表示英國還是要作戰的。

蒲立特在德軍進駐數日之後離開巴黎，於七月四日在維希會晤貝當，賴伐爾，蒲杜安和其他人物，這一天適為英國攻擊法國艦隊的下一日。他在五日打電報給我說，他們的反應極端激烈。若干閣員主張立即和英國作戰，但是貝當對超過斷絕外交關係的任何行動表示堅決反對。貝當說，唯有在希特勒被某一其他國家所擊敗時，始能使法國恢復獨立，所以他誠懇希望英國獲勝。他想減輕和英國破裂的嚴重性，說這是由於邱吉爾個人未能權衡輕重所致。

## (二十一) 政策在慌張中發生了轉變

一九四〇年間，我們的對蘇關係是為一種願望所左右，就是我們不願做什麼事情使它更投入德國的懷抱，同時又設法限制我們對蘇聯的輸出在某一限度之內，使它不致有剩餘的軍用原料可以轉運到德國去。

由於戰爭的關係，蘇聯已無法獲致好多種軍用原料，很想和美國保持貿易關係。但是它不明瞭我們為什麼不一直張開了雙手接納它。

有時候，它要求不可能的事情。它設法了好幾個月想從美國的造船商購買一艘戰艦。總統和我願意為它建造一艘，但是蘇聯堅持美國最新式的裝置和發明必須包括在內。海軍可以同意建造一艘至少和我們現在所有的一樣新式的戰艦，但是當然不願意把幾年來美國經精心研究後所獲得的最新秘密全部給予蘇聯人，其中一部份秘密正在裝置於當時我們正在建造的新戰艦之中。

一九四〇年四月二日，我和奧曼斯基大使會就美蘇關係作一次明白的討論。奧曼斯基是我們從來遇到的外國外交家中最難應付者之一。他的態度和言詞常帶侮辱性質，凡是碰到了我們中間的任何人，總是敵對的，彷彿他天生有這種能力一樣。他出言不遜，要求讓步時彷彿是一種當然的權利，抗議我們的行動時彷彿它們是極惡劣的過失。在我看來，他對美蘇關係會造成不少損害。

奧曼斯基這一次來看我的時候，是有許多的事情要訴苦的。他開始談話時就列舉了許多所謂不平之事。他指出若干美國公司拒不允許蘇聯工程師或準備採購貨物者視察它們的工廠；若干稍地位的蘇聯男女人士領了臨時護照到美國來被拘留於埃里斯島遷延不放；以及我們的道德禁運（有關蘇芬戰爭的）。於是他就直率地問我國政府究竟想繼續或放棄對蘇聯的商業關係。

我立定主意不表示任何意見。

於是，他就提出一點，說道德禁運是祇適用於蘇聯的。

我向他表明這適用於從事轟炸平民的一切國家。

奧曼斯基否認他的國家從事於轟炸平民。

我回答說，「我們有最滿意的證據可以證明蘇聯的確是轟炸平民的。鑒於你討論這件事情時所用的語調，我知道我不能使你相信我的說法猶如你不能使我相信相反的法一樣。」

大使每一次想說明他的政府之和平意向時，我總設法給他一種印象，就是我表示懷疑。

談話繼續近一小時。奧曼斯基總結說，他的政府無意干涉羅馬尼亞東部的貝薩拉比亞省，該省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戰爭之前是屬於俄羅斯的；蘇聯不大相信土耳其會參與協約國干涉巴庫油區；蘇聯對於近東任何部份並無企圖；但是他避免涉及有關芬蘭和德國的題目。

五月二十九日，我打電報給我國駐蘇大使館，要求搜集有關蘇軍向羅馬尼亞邊界移動的情報。美國駐羅公使根室曾打電報告訴我，說沿羅馬尼亞邊境有大批蘇聯軍隊集中。羅馬尼亞方面相信史達林為德軍在西方的勝利所震驚，正設法獲得羅馬尼亞的領土，俾在和希特勒談判時，可以有更好的討價還價資本。他們提到過羅馬尼亞東部的貝薩拉比亞省。

在我們駐莫斯科的代辦塞斯頓會晤莫洛托夫外長之後，他在五月三十一日打電報給我說，莫洛托夫對美國極表不滿。他對於美國公司取消蘇聯定貨一點尤為憤怒，說是不友好和不能容忍的。當塞斯頓說明爲了國防上的理由我們也在徵發其他政府的定貨所以並不對蘇聯有所歧視的時候，莫洛托夫的火氣更大了。他說我們沒有權力可以修改政府之間交往的正常方法，我們的行動是不合法和不可容忍的；我們對此必須負全部責任，這對我們不會有好處。

但在六月初，塞斯頓開始告訴我們蘇聯政府對協約國的態度有所轉變。莫斯科為德軍的迅速推進所震驚，現在希望法國繼續作戰了。先前莫斯科是支持法國共產黨阻撓雷諾政府的活動的。

蘇大使奧曼斯基在他最惡劣的時候簡直是侮辱的化身，他在六月十二日來看我。我知道他要就一樁事情提出抗議，那就是我們自己的政府爲了國防的關係正在接收先前由他的政府所定的機械工具。我對於他和國務院其他官員就此一問題所舉行的許多次會議以及他當時所採用的出言不遜的語調，頗爲熟悉，所以這一次我就自己來開始這個討論。

我在提起了我們爲求與傾向和平的每一個其他國家協力——特別是希望獲得蘇聯的協力——而作的許多努力之後，接着說：「當我們看到所有這些努力完全徒然的時候，內心真有說不出的失望和遺憾。在這種情形之下，我的政府已經開始一個武裝，武裝，不斷武裝的新政策，藉以保衛自己反抗任何可能的敵人。我的政府以此爲目的，毫不猶豫地收集必要的物資，不然就保存對於我們日以繼夜的軍備計劃所必要的一切商品。」

我最後說我們未能獲得蘇聯較在已往七年間更充份更廣泛的合作一點，極爲失望。

奧曼斯基開始講到在他說來是我國政府正在實行的貿易歧視。我當即打斷他說：

「鑒於現行的緊急局勢，我爲你的政府注意這樣小的爭執，不勝驚奇。你的政府在貿易方法上在優待其他國家，對我們實行歧視，我們一無話說。這包括以大量軍用供應品運到德國去。」

奧曼斯基指出這是通常的貿易。

我回答說，「無論如何其中包括戰爭所亟需的大量供應品，此點使它和通常的貿易大不相同。當然，以我國政府而言，蘇聯祇具有進行此種貿易的易充份權利的。但是在義阿戰爭的時候，我們對義國就採取了一個極不相同的政策，當時我們用道德禁運的方式把我們的貿易抑低到戰前的水準。但是我主要的論點，是在說明我們保存原料以增加軍備的現行政策。」

繼而我說，爲了我們極懇切希望蘇聯能對和平發揮重大的影響，所以總統在蘇聯侵攻芬蘭之前極願出面斡旋。

奧曼斯基用相當諷刺的口吻說——諷刺從大使的嘴裏會脫口而出猶如麥從打穀機中流出一樣——是的，但是他的政府對於當時總統某一次的演說，反映並不甚佳。他是指總統責難蘇聯侵略芬蘭而言。

我回答說，「當一個龐大的國家緊握了一個渺小無助的國家的喉嚨要它窒息而死的時候，我必須承認這個大國的政府對於我們的斡旋是不會有良好的反應或者有所行動的。在這種情形之下，唯一的辦法，就是儘量保持緘默。」

大使似乎有些不安，但是並沒有作答。

想起了幾天之前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對塞斯頓代辦所作激烈傲慢的談話，以及大使在華盛頓一有機會就高聲侮辱，我表示意見說：

「莫洛托夫先生似乎很「趾高氣揚」。我在華盛頓又不時聽到莫洛托夫先生的代表出言不遜的談話。七年來，我爲謀與蘇聯保持多少可以過得去的關係並望予以改善，受盡了尖刻的批評，而所得的酬報似乎就是如此。」

當奧曼斯基繼續申說其不滿時，我就說我可以列舉一大串對蘇聯衷心覺得不滿的事情，但是我不願意比我已經說過的說得更多了。他要求我——毋寧說是迫我——說出一些我所想得起的。剛巧史丹因哈特大使已經從莫斯科回到了華盛頓，替我寫了好幾頁關於對蘇聯不滿意的事情，而這幾頁東西就在我手頭。於是我就讀了史丹因哈特指責各點的第一頁，並且說我還可以讀好幾頁，但是不願讀了。

最後我再提到我爲求與蘇聯友好相處而作的冗長和誠懇的努力，並且說：「凡在蘇聯認爲適當的情形之下，我國政府將樂於恢復採取一套政策，以謀用每一種切實的辦法來更充分地發展和平關係與相互有利的合作。我們對蘇聯的貿易，比較上是小的，假如過份誇張我們對它特別重視，實屬錯誤，但是我們願意保持這種貿易並予以發展，祇要這種發展使我們兩國可以互相接受的關係之下進行就得了。」

幾乎就在進行這次談話的時候，我開始從我國駐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的代表收到電報，報告蘇聯要求由蘇軍完全佔領這幾個國家，各該國政府應實行改組俾對蘇聯更為友好。波羅的海各國不得不答應。蘇軍的佔領就在六月十五日開始。

此一行動的一個理由，是很明顯的；史達林為對付德國，希望獲得一個更好的防衛地位。我國駐拉脫維亞公使費萊於六月十九日打電報給我說，據可靠的消息靈通人士消息，克列姆林方面對於最近的發展異常担心，簡直有些不知所從。史達林的政策是建立在西方長期消耗戰的假定上的。法國崩潰之後，這個政策也隨之崩潰了。希特勒最近聲明他並不希望毀滅英帝國，目的在誘使英國提出和平建議，可是蘇聯却慌張不堪了，深恐西歐的問題將以蘇聯為代價而獲得解決。

在蘇聯佔領波羅的海各國兩星期之後，她又在歐洲採取另一防禦措置，佔領了羅馬尼亞的貝薩拉比亞省和布柯維那省的一部份。我國駐布哈萊斯特公使根室在五月間向我表示的恐懼，現已成爲事實。現在，蘇聯西南部國境的防禦地位增強了。波羅的海各國和羅馬尼亞領土的佔領，已經拉直了它西部邊境的弧形。

我國代表從各地發來的電報，指出一個結論，就是蘇聯此等行動事前簡直沒有通知希特勒政府。德蘇關係現在開始呈現緊張了。

## (二十二) 不屈不撓精神的一個例證

一九四〇年夏季，當英國在海上的困境益趨尖銳的時候，我們不得作新的決定了。

八月四日，在我前往白硫磺泉的前一天，英大使洛齊安來看我，並且表明他政府「迫切的願望」，希望從我們那裏購買若干艘鱗式的驅逐艦。他說英國需要它們來度過在他認爲是「目前的緊急關頭」。

在我出席哈伐那會議期間，總統會就此一題目以及英國可能以它在西半球的若干根據地讓與或租借給我們問題，一直在和洛齊安談話並和邱吉爾首相通電報。出售或租借驅逐艦的意見，是由法總理雷諾於五月十四日——僅在德軍侵入法國之後四日——首先倡議，而於次日由邱吉爾先生加以附和。

當時，總統是反對這個建議的。

但是一切的東西是比較的。當法國的崩潰使我們的危險大見增加之後，我們更傾向於同意出讓我們的過齡驅逐艦，假如因出讓而造成對我國國防的損失可以從其他方面獲得補償，例如獲得新根據地這種情形之下，那就尤其好了。海軍早就希望沿大西洋獲得更多的根據地。我們還覺得既然我們的驅逐艦可以增強英國海軍的實力，事實上等於爲我們自己

增加一層保障，因為英國艦隊是站在亡命的軸心國和我們之間的。再者，國會於一九四〇年六月廿八日通過了政府所提的一個法案，即國防法案，其中准許出售海軍配備，祇要海軍作戰部長確認對於國防並不需要就可以了。

當洛齊安於八月四日到我辦公室來的時候，我能够充份理解英國的危險猶如他能够描述的。他說單在上一個星期中英艦就失却五艘驅逐艦。他指出驅逐艦對於應付潛艇活動以及敵人在英吉利海峽中的其他活動，極為重要，因為在英吉利海峽中，大軍艦是不能充份發揮其效能的。

他說，當我在哈伐那的時候，他已經和總統討論過這個問題，現在希望把當前的情形放在我的面前，以冀在未來數星期中能够有所成就。他還說英國將願意讓我們使用接近中南美洲和在百慕大的若干英國島嶼上的海空根據地設備以及紐芬蘭的航空根據地。

我首先向洛齊安說明這種便利，當然對於美洲所有的共和國都有裨益的。我說，「遵照在哈伐那會議和以前其他會議中所獲致的諒解，美國如採取任何行動，須與其他美洲共和國合作。」

同日，我送給總統一個有關出售軍艦和輔助艦艇的備忘錄，其中包括一個建議的法案草案，以備提交國會，使它特別認可這種出售，在和總統討論這個法案草案的時候，我們共同認為向國會提出這個法案可能有一點不可取之處：其一是它將引起孤立主義派相當厲害的反對；另一是在可能獲得通過之前或需幾星期的討論。

這是我離開華盛頓時的情形。當我在白晝噴泉休息三星期的時間中，我有一個私人電話綫接在我的公寓中並且每天從國務院接到大量的郵件，因此對於當時由總統和韋爾斯在辦理的驅逐艦——根據地談判，我一直在密切注意並且隨時參與。八月二十三日，在我回到華盛頓幾小時之後，我就到白宮去出席內閣會議。

就在那裏，總統對我說，「我們和英國關於根據地和驅逐艦的談判，已經逡巡不前。請你看有什麼辦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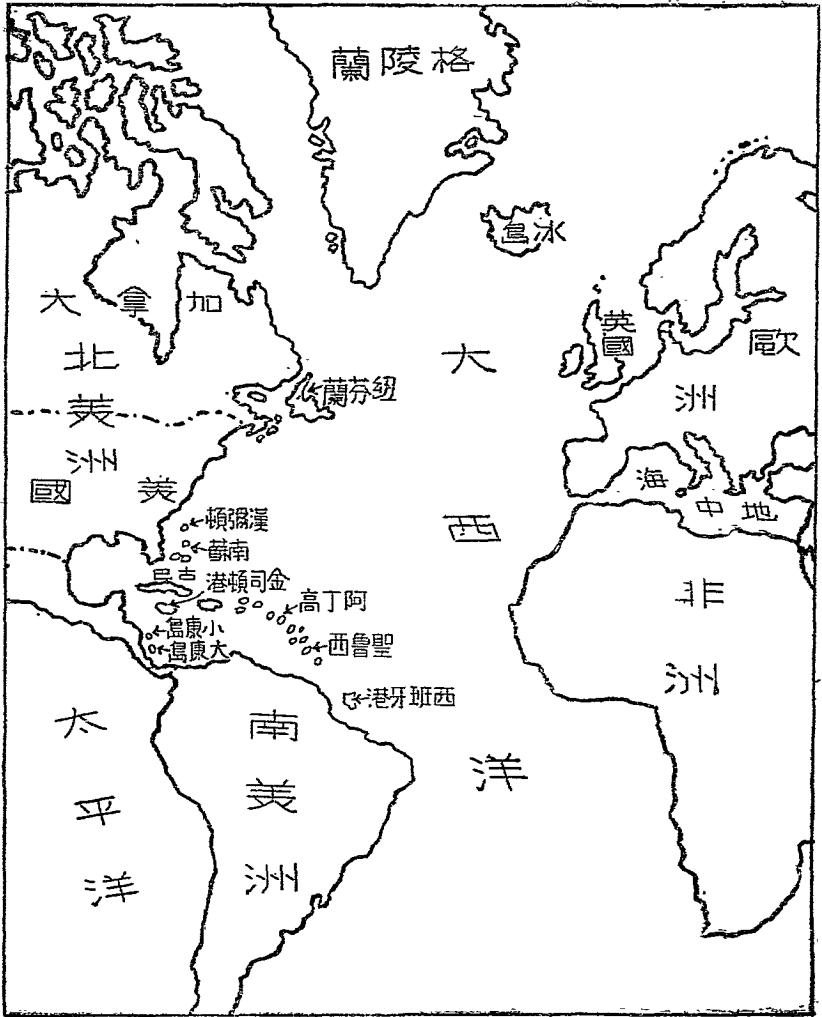
當我和總統討論根據地的問題時，我發覺他個人對於這根據地的幾乎全部都有驚人的知識。他在這些海港或者曾經巡遊過，或者曾經游泳過，或者曾經垂過釣。他知道它們有多少深，多少闊，能够容納多少船隻。

他也知道大部份島嶼上民衆的貧困情形，因此他不願意負起治理這些民衆的責任，所以，在我離開華盛頓的期間，他已經改變了原來直截爽快將根據地加以購買的主張，而想租借九十九年。我原先是贊成直截爽快讓與我們的，但是在願意同意租借的辦法。

於是我就着手辦理談判，決心使其儘速完成。

翌日，當我正在查閱談判的經過情形時，白宮通知我說英國大使於明日（星期日）晚上和總統有一個約會，羅斯福先生希望我出席。





地基軍海之國美予借租國英

南京路河南路口

大

綸

呢絨

綢緞

新穎

花色

低廉

定價

參觀

歡迎

洛齊安在星期日下午相當早的時光來看我，因此我們可以在他那晚上和總統談話之前，先就一般情形檢討一過。他對於八月十九日韋爾斯以代理國務卿資格交給他的建議，提出若干反對。他說他的政府不喜歡美國建議中規定我們有絕對的權力可以確定和選擇我們所需要的根據地，而英國方面則無任何發言的機會。他的政府反對建議中以驅逐艦交換根據地的辦法，而希望出諸禮物交換的形式。

後面一點所以成爲困難，乃是因邱吉爾先生在八月二十日的一篇演說中曾經明白講過以禮物的形式直截地出借根據地。他根本沒有提起驅逐艦。首相覺得互換禮物比斤斤較量的交換更能在大西洋兩岸造成一種合作的感覺。他並且說英國大眾對禮物不會像對交換那樣細細計較，而認爲英國出借有價值的根據地以交換五十艘舊驅逐艦並不值得的。

但是我們這方面也有困難。總檢察長傑克遜相信總統以我國武裝部隊總司令的資格，在法律上是有權以驅逐艦出售給英國的。但是假如總統並不經由國會特別授權而這樣做，他應該可以靠一種辦法來滿足國會，就是在交出驅逐艦之後，我們就可以獲得根據地方面的種種便利，而其價值，則較諸保留這五十艘驅逐艦顯然能給予我們更大的安全。

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總統並無權力可以把政府的財產以禮物的形式贈與別國。我就這樣告訴洛齊安。那天晚上，我在白宮遇見洛齊安。當我們坐着等待和總統的約會時，我重新向他申述總統沒有權力放棄政府的財產。

但是當總統接見我們的時候，使我很驚奇的一點乃是洛齊安似乎漠視我所說總統在法律上不能以公家財產作爲禮物的說話，仍舊提出了英國的建議。

在洛齊安把他的論據講完之後，我就第三次向大使而是第一次向總統說，總統並無任何權力以公家財產當禮物，贈與任何政府或個人。羅斯福先生當即和我表示同意。

於是總統就把這樁事情交給我，讓我和洛齊安來擬定一個解決辦法。

下一天的早晨，我請國務院的法律顧問海克荷斯和司法部的湯恩遜特法官到我的辦公室來，設法覓致一個兩全辦法。稍經討論之後，海克荷斯突然建議在邱吉爾所希望的互換禮物以及我國總統如不獲得交換的東西不能放棄驅逐艦的法律立場之間，終究可以有一個妥協的辦法。

既然英國人並沒有確切說明究竟想把什麼根據地出借給我們，那麼爲什麼不把它們分成兩類？第一類將包括紐芬蘭和百慕大的根據地。這些英國可以用直截爽快的贈與形式，出借給我們。第二類將包括加勒比安海周圍的根據地。由於接近巴拿馬運河，在軍略上對於我們更有價值。這些可以借給我們以交換五十艘驅逐艦。

我立即發覺這就是我要尋找的公式。

於是我們就着手重行起草建議。

那天下午，海克荷斯和湯恩遜特去見總統，他對於這種妥協辦法表示同意。

在擬定的草稿中，開頭是英國政府的一個保證，就是說，假如英國艦隊不能接近英倫三島的領海時，「英國艦隊決不投降或擊沉，而將送往帝國的其他港口繼續保衛帝國。」

邱吉爾在六月四日向議會發表的演說中，就曾提供過這種保證，但是爲了以驅逐艦移交給英國的原故，我希望正式重覆一遍。

八月二十七日，洛齊安送給我邱吉爾致總統的一個很長的電報。邱吉爾以「前海軍人員」署名親筆簽字，贊成先前由洛齊安提出的建議，就是以直截爽快的贈與形式出借英國根據地，這對我們是不能接受的。

邱吉爾並準備保證英國艦隊決不擊沉或投降，但主張由洛齊安和我交換函件的形式出之。

他用他一向的那種不屈不撓精神，聲言他不希望把交換的函件公佈，因爲「我想德國政府使其艦隊或擊沉殘餘部份投降或擊沉，可能性要大得多。他們已經行使過這種辦法，猶如你所知道的。你將記得數月前在我給你的一個私人電報中，曾經說過假如我們這樣做，將是一種卑怯的行動。我們中間每一個人都這樣想。」

邱吉爾反對公佈這種保證，在他於八月十五日致總統的一個電報中已經聲明過，當時他說：「……請你記着，從我們的觀點，或許也是從你的觀點講，任令一種印象滋長，就是說我們認爲英倫三島及其根據地的被征服並不是一種不可能的意外的，是何等有害。我們人民的精神奇佳。」

洛齊安把總統想到的根據地的所在地用電報打到倫敦去之後，邱吉爾當即表示同意，並且還無代價地加上加勒比安海中的安蒂可島，他說這個島可能用作飛艇根據地。

在八月二十七日那天熱烈的晚上，洛齊安，克魯克斯部長，史泰克海軍上將都在十時三十分左右到我的公寓來，發覺我穿着寬大的衫袴。我們四個人閱讀草案達一小時以上。洛齊安起先提出幾點修正建議，但是後來似乎頗表滿意，並且說他將以內容送呈政府。

八月二十九日夜七時，洛齊安到我的公寓來，留給我他的政府所提的反建議。我們在原文上略作修改，繼即打電話給洛齊安，他在十時三十分再到我的公寓來。他同意我們所作的修改。

翌日，八月三十日，我把修改的地方用電話通知當時在海德公園的總統，當即獲得他的核准。

洛齊安在波士頓度了週末，於星期一下午（九月二日）返抵華盛頓，而於當晚七時到我的公寓來。我們就在那裏簽署並且交換了照會，肯定了驅逐艦——根據地這筆交易。

洛齊安並且交給我他對於我先前給他的一個備忘錄的答覆，那是要求他保證英國艦隊的處置辦法的。

洛齊安在答覆中說：「英王陛下的大使受首相之命通知赫爾國務卿先生，就是說這個證明的確是代表英王陛下政府的既定政策的。但是邱吉爾先生必須指出這種假設性的意外之事，對於德國艦隊或其殘餘部份發生的可能性，比對英國艦隊爲多。」

最後一句話是邱吉爾自己加上去的。

至此，在我們歷史中最重要的一次談判，在一星期內宣告結束。

### (二十三) 在工作與榮譽間作一抉擇

羅斯福先生第三任出任總統，乃是希特勒征服法國以及英國獨處於征服者與我們之間這種驚險場面的直接後果。我們的危險地位，誘使羅斯福總統參加第三次競選。

直至那時候爲止，總統在和我以及若干民主黨領袖的私人談話中，曾表示希望我做他的繼任者。但是我曾採取每一個可能的步驟，來表明我並非總統候選人。在歐洲正在戰爭，日本正在準備另一行動以及美國在外交上面臨着無數問題的情形之下，我覺得在國家的立場講，我應該在總統之下繼續指導外交工作，實比自己去競選總統更屬重要。再者，有時候我的健康簡直完全不正常，所以我無意在一九四〇年被牽涉到國內政治的競爭中去。

從一九三八年底起一直到一九四〇年七月，羅斯福總統親自向我肯定表示贊成我在一九四〇年做他的繼任者。這樁事情，在一九三八年十月當我到白宮去和他討論外交政策的某一要點時，第一次被提起。

我說，「這一點在好幾年內將不得解決，直要到這一屆任期完了之後。」

他的面部顯出高興的樣子，他回答說：「哦，這很好啊。到那時候，假如我的努力成功，你將坐在我的椅子中，我可以加以應付了。」

我可以向他表示感謝，並且建議由我們着手組織我的競選工作。但是我沒有這樣做——適得其反。我向他表示我不擬被牽涉總統競選的政治工作。

我說：「我相信世界正直向深淵跑去，我想我在國務院中可以做更多一些的工作。」

在此次之後，總統還有好幾次提起同一個題目。每一次他提起，我不但不建議着手組織，而總統說相反的話。假如我們要着手做去，他是會得照辦的。

羅斯福先生並且向全國的許多參議員和國會議員和民主黨領袖，提起他希望我繼承他担任總統。

一九四〇年四月，在一次內閣宴會中，赫爾夫人坐在總統的旁邊。當時似乎有若干徵象，要我在宴會之後起立演說。赫爾夫人向總統說我不喜歡發表演說，他當即回答說：「哦，對他說他還是習慣於此來得好。不久他將有許多演說要發表呢。」

自從一九四〇年一月起，我向報界發表了幾個聲明，其中我說明我並無競選總統的任何意向。

一九四〇年春季，民意測驗的結果，顯示作爲下一屆的候選人，我較總統獲得稍多的票數，而較共和黨可能和我競爭的候選人，則多出票數甚多。

在我自己的黨中，這種情勢在新政派的極端左翼份子中，引起相當的驚慌，包括若干極接近總統的人士在內。

這一批人和其他人士決定總統應該參加第三任競選，他們對我做候選人不以爲然。

始自一九四〇年以前的幾年，這一派中的若干人物和幾個專欄作家相結合，開始向我發動一連串銳厲的攻擊。

遲至一九四〇年六月二十日左右，當我到白宮去看總統的時候，他還是提起自從一九三八年十月起提起過好幾次的意見，就是他希望我做他的繼任人。在這一次，他還沒有給我再參加競選的任何表示——事實上，適屬相反。

接近他的新政派不斷敦促他參加競選，但是他加以制止。不時有些評論家在說，總統對他若干密友講我是他在一九四〇年中想挑選的人物，事實上祇是我當做一個緩衝的東西，直到他自己參加進來，並且說他對我也並無誠意。但是我確信他所說的，的確是代表他的意思的。我既無意於這個位置，所以比在想得到這個位置的情形之下，更能判斷得清楚些。

在我看來，似乎他雖然保持在一九三八年十月向我表示的見解，但是可能有時候在他幾個顧問的竭力促請之下，或有競選第三任總統的意向。從他向我和其他人發表的說話來判斷，無疑地遲至一九四〇年春季，他還是希望我提名的。

繼而，在一九四〇年七月三日，我和他作一次談話。在那時候，法國已和德國簽訂停戰協定，英國正在奮力準備抵抗侵略，墨索里尼已經捲入戰爭，日本正在準備行動，我們自己的地位很嚴重。這次談話對於我造成如此深刻的印象，致使我在回到國務院之後，用通常的寫法，記了一些摘記（赫爾平常是用速記記的——譯者）。

總統曾請我吃中飯，我們祇有兩個人。在大部份吃飯的時間中，我提出了並且處理了若干國務院的事務。最後總統突然說：「哦，現在讓我們來談一些政治。你知道，有許多人在對我說，『你不能就這樣把我們丟了。』」

總統在說這句話的時候，用一種沒有耐性的，懷疑的口吻。

我說或許有極多極多的人呢。

總統說他曾經讀過華盛頓致瑪迪森的函件，其中華盛頓對反對他競選第二任總統的批評頗感痛苦。羅斯福先生說他想寫一封信給像參議員諾里斯這樣的人，最後說他想回到海德公園去。這樣，他說，民主黨大會就會把我提名。他問我對於這樣一封信有什麼意見。

我立即回答說：「當然，這樣一封信決不遲延把你提名的。」

於是總統就開始考慮在某種情形之下，他自己如何可以獲勝。他說話是輕輕的，時斷時續的，不相連接的。他的語氣是輕視參加競選的觀念。他說他他可以在十一月間獲勝，除非戰爭停止。在後面這種情形之下，共和黨候選人威爾基可能擊敗他，但是他除了爲了國家之外，並不估計其他。我沒有表示意見。

其後，他就開始談到我作爲一個總統候選人的優點和弱點。他說話的神情，較諸他以前直截認我爲他的繼任人的談話時的神情，要審慎不知多少。

我打斷他的說話說，無論如何，不必把我考慮。我所以打斷他的說話，一則是爲了我先前提起過的兩點理由，再則是爲了當時我明白認清他自己已決定出任候選人了。我力言我的健康情形不佳，並且說：

「好許多個月來，我的妻子和我已經同意我應該脫離公務，特別是政治。爲使我的地位不致絲毫妨礙有關你競選總統的談論起見，我會時常發表公開聲明，說明我並無加入競選總統的願望或意向。」

但是總統却繼續說下去，在他一般地講了一些我在全國的地位頗爲良好之後，開始指出他所發覺的我的弱點。可是他僅僅提出了一點弱點——就是在農業地帶反對貿易協定的宣傳。於是他還說我可以把華萊士或者農業地帶的某人做副總統，以求獲得勝利。

我重申我並無參加競選的任何意向。我不但謹慎地使我自己完全不影響他的政治領域，並且我一直注意到我們在國務院已經做的和正在做的每一樣事情應該歸功於他。他很高興地表示同意，認爲這是事實。

總統在我們這次談話中的整個語氣和言詞，和十天之前他還主張我做候選人的時候，完全相反。

總統那時候一定已經決定接受第三任總統了。的確，一個龐大的運動已經在推動中，敦促他這樣做法。鑒於我自從一月以來發表了許多公開聲明，表示我無意於加入一九四〇年的總統競選，以及拒絕允許許多州我的友人爲我進行組織工作，民主黨中若干部份，尤其是更極端的新政派和其他堅決支持總統者，由於國家當前的緊急情形，應該在全國發動運動贊成他連任第三任總統的情形，並不是不自然的。這個運動逐漸獲得力量，直到民主黨全國委員會和聯邦官員和其友友好份子態度趨於一致。現在事情是決定了。

幾乎就在這時候，總統開始敦促我和他一起競選副總統。他叫我到白宮去，勸了我大約二小時又四十分鐘。我加以

推却，始終不渝。

在我看來，做副總統等於一個人讓他自己做參院的主席，無權參加進行中的工作，甚至投票的權利都沒有，除非在雙方票數相等的時候。我記得傑佛遜曾經描寫過副總統的性質，對於他的說法我表示同意。他在一七九六年被選為副總統之後，曾經寫道：「……它在冬天給我以作哲學思索的晚上，在夏天則可以讓我到農村中去過日子。政府中的第二把椅子是光榮而閑適的……。」

我迅速而堅決地向總統說，以這種情形和我目前的地位相較，那麼在未來的艱難時日中，讓我留在國務院中，實在可以提供更有價值的服務。

對於一個閑適溫軟，其榮譽僅次於總統的位置，我並不發生興趣。

一二次之後，總統再叫我到白宮去，重新最懇切地提出他的建議。我堅決保持原來的態度。

一夜或兩夜之後，總統打電話到我的公寓來。他再度用力地要我接受，我再度拒絕。

於是他說：「讓我同法蘭西斯講。我可以說服她，她能說服你的。」

當時赫爾夫人就在我旁邊，不斷搖頭。她不願意牽入討論。

我對總統說：「赫爾夫人已經睡了。我不能叫他聽電話。」

他於是說：「假如你不接受，我將叫華萊士參加競選。」

我繼續拒絕。我說：「這對我無所謂。」

這個說法，並不是說我支持華萊士做副總統。事實是我被羅斯福迫得太緊，所以並不反對他提出任何人來代替我。就在這種意識之下，對於他提出華萊士，我表示「O.K.」的，而並非是我贊成華萊士，或者參與挑選他做副總統之意。

七月十八日，民主黨大會提出羅斯福總統競選第三任總統，我在那天到白宮去向他致賀。

我個人堅決反對第三屆總統的觀念，深恐創立了先例，使未來的某一個總統濫用託付予他的權力。我覺得祇有一個贊成的理由。這就是說當時我們正在可怕的國際危機之中，西方的文化似乎在最大的危險之內。假如羅斯福不參加競選，另一個民主黨候選人可能會失敗。在這種情形之下，在選舉和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新總統受職之間的二個半月，政府沒有一個真正的首長，將是極危險的。我覺得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會對於一個已被遺棄的政府具有任何敬意，也不能設想在這個過渡階段中，軸心國家將採取什麼行動，或者發生什麼結果。當時我想到的，彷彿是在諺時期中所發生的像珍珠港事件之類的事情。





•前空况盛，戴擁烈熱衆民，統總任三第選競福斯羅



襪業鼻祖

衫襪市場百貨總滙  
花式美備定價低廉

廣昇祥襪廠

南京路石路西街

## (二十四) 爭取勝利的前提決定一切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當希特勒侵犯蘇聯的消息傳給我的時候，我方臥病在家。我立即打電話給總統，繼即打給副國務卿韋爾斯。我對他們兩個人都這樣說：

「我們必須以一切援助給予蘇聯，無所不用其極。我們曾經屢次說過，我們將盡力之所及以一切援助給予任何抵抗軸心的國家。蘇聯將屬於此一範疇之內，毫無猶豫餘地。」

我知道若干軍事專家，無論在這裏或國外，都在預料希特勒在戰爭中，將以數星期之間消滅蘇聯。但是我不能相信這種說法，猶如我不能相信許多說法，就是說在法國淪陷之後，英國的崩潰將是幾星期的事情。在一九四〇年夏季，我們以大量的武器運往英國的時候，我覺得我們並不是冒着真正的危險，會使這些武器落入德國人之手的。我同樣相信我們可以把一切可能弄到的武器和供應品送往蘇聯，而不致有被德國人奪獲的真正危險。假如總統和我懷疑蘇聯抵抗德國的能力，那麼明明以為武器會落入希特勒之手而還要把武器送給蘇聯，未免太蠢了。

半年來我們有很好的理由，可以相信希特勒是會進攻蘇聯的，所以六月二十二日的事件，並不使我們驚奇。

一九四一年一月，我國駐柏林的商務參贊荷特接到一個秘密報告。荷特有一個德國朋友，這個人雖然是納粹的一個敵人，但是和德國各部隊，德意志銀行和高級納粹黨員有密切關係。早在一九四〇年八月，這個朋友就通知荷特說，當時希特勒的總司令部正在舉行會議，準備進攻蘇聯的戰爭。這個消息，在幾星期之後變成更具體，據說當時希特勒曾經說過他想「從海參崴到直布羅陀祇有我的兵士。」

荷特常常在柏林一家電影院中遇見這個朋友。這個朋友託一個機關定了座位，送兩張票子給荷特，設法坐在他旁邊，並且在半黑暗之中，把紙條塞入荷特的袋中。

從荷特來的消息，和希特勒正在計劃侵犯英國的不少證據，顯屬相反。但是和荷特的朋友接觸的結果，却說空襲英國乃是一種烟幕，藉以掩蔽希特勒真正的，估計周密的計劃，準備一個突然的兇猛的對蘇進攻。

其後，荷特的朋友通知他說，德國的戰爭機構正在組織俄羅斯沙皇時代的二十一個舊州政府，業已成立，這些地方的經濟工作人員，業已任命。成捆的盧布票業已印就。

最後，荷特經他的朋友和德國的總參謀部接觸之後，獲悉了希特勒軍略計劃的要點——就是說，分成三個銀形，北面的，南面的，和決定性的中路，直指莫斯科。所有的準備，在一九四一年春季必須完成。

當荷特有關於一切情報的報告送到我的地方時，這是如此突兀，起初我還以為是德國人的一個「詐局」。我把它交

給聯邦調查局局長何佛，請他發表意見。何佛認爲它是真實的。荷特告訴我一種方法，就是把這些報告向一個出亡在美國的著名德國人去獲得證實，於是我請助理國務卿朗格去看他，去獲得這種證實，結果他辦到了。我並且和總統討論過這個報告。

於是我就決定這個報告的內容應該通知蘇大使奧曼斯基。我相信這一步驟，是和我國對蘇應持的適當態度相符合的。當時，在我建議之下，韋爾斯正在和奧曼斯基舉行一連串的談話，以謀消除我們兩國之間的異見，所以我就請韋爾斯促使蘇大使對該項情報加以注意。韋爾斯照辦了。

當從同一的來源又有情報傳給我時，我再把它交給韋爾斯，請他向奧曼斯基轉達。這一點，他在三月二十日做了。奧曼斯基無疑是把這個情報送呈他的政府，猶如他說過他會這樣做的。它對於蘇聯政策的影響怎樣，殊難斷言。但是，僅在三星期之後，史達林突然和日本外相松岡簽訂了一個互不侵犯條約，當時松岡以爲這樣一個條約是不可能的。史達林簽訂這個條約，目的無疑是在遠東方面保護他自己，因爲他相信希特勒是在歐洲方面攻擊他的。再者，在希特勒企圖把巴爾幹國家納入軸心範圍的計劃之前，蘇聯對它們所採取的政策，比可能預料到的更爲堅強。

蘇聯在一九三九年八月間，曾刺激希特勒，使他從事歐洲戰爭，並且當波蘭正在拚命抵抗德軍的時候，協助他侵犯波蘭。但是自從一九四〇年六月以來，它却在許多方面干涉和阻撓希特勒的目的。

我們所獲得的希特勒正在計劃侵犯蘇聯的消息，對於我和日本人進行會談特別有用。它取消了蘇聯和日本聯盟的任何可能性，並且使我們對付日本，比在相反的情形之下可以採取更堅強的態度。

不幸得很，奧曼斯基和韋爾斯的討論破裂了，或者毋寧說是在一種尖刻的交談之中決裂了。奧曼斯基一向認爲堅決就是粗魯，所以是最難應付的。更有進者，他的政府派他到這裏來，是在要求向我們購買更多的重要物資，而希望奧曼斯基能够獲得，但是由於我們對英國的義務，我們是無法照辦的。

五月十四日，奧曼斯基來看我，神情陰沉。在我們談話的最初二十分鐘中，他列舉我們兩國政府之間的異見。這種異見，據他說自從夏季以來會和韋爾斯討論達二十二次之多而一無結果。於是他就交給我由他自己簽字的一個照會，講到一艘滿載物資的船被延緩啓程赴蘇。他的照會講到我們的「仇視態度」，並且威脅說他的政府將從我們的態度中「作一切必要的結論」。繼而他在口頭上重覆二三次說，我們的行動，乃是由於對他的政府實行仇視，並且是由於個人的仇視的一種個人的行爲。

我就在那裏制止他說：「當我想到一個國家的時候，我是想到它的人民比想到它的政府爲多。我和我的政府對於任何國家的人民，沒有絲毫的仇視。關於蘇聯和它的政府，我個人並無絲毫仇視之意，我的政府亦屬如此。把個人牽涉到

政府的行動，不但是完全不準確，並且是極不公平的。我並不希望你在離開我的辦公室時，以為把這種責難加到我國政府的頭上業已獲得成功，因為這是絕對沒有根據的。」

我在結束談話時說，在我們於一九三三年承認蘇聯之前或之後，我們一向是蘇聯人民的朋友。談論至此，稍爲有了點生氣。

在六月份的第一個星期中，我們從駐布却萊斯特和斯德哥爾摩的公使館接到可以令人置信的電報，說德國將在二星期之內進犯蘇聯。國務院把這些報告送給在莫斯科的史丹因哈特大使。

在希特勒進兵蘇聯八天之前，邱吉爾首相打一個電報給總統說，從他可以獲得消息的每一個來源，使他相信德國的大規模進攻蘇聯，好像立即就要發生。他說，假如新戰爭爆發了，英國根據希特勒是它必須擊敗的敵人這個原則，當然將以一切的鼓勵以及任何可以節省下來的東西，去援助蘇聯。他說他並不覺得在英國會發生階級意識的政治反應，相信德蘇的衝突不會使我們陷入窘境。

衝突並沒有使我們陷入窘境，而給我克服希特勒主義的新希望。我從白硫磺泉與總統和韋爾斯不斷保持接觸，敦促我們應以最有力的保證給予蘇聯，說我們將在能力範圍之內予以一切援助。總統派霍浦金從倫敦到莫斯科去調查蘇聯的軍事需要。羅斯福先生解凍蘇聯的資金，決定不使用中立法。八月二日，代理國務卿韋爾斯和奧曼斯基大使交換函件，我們允許「給予一切可能的濟運援助，以謀增強蘇聯反抗武裝侵略的鬥爭。」

八月四日，我晤見奧曼斯基，他帶着蘇聯的哥里柯夫將軍。奧曼斯基的態度，和我們上一次會晤時的態度大不相同了。我告訴他當我不在這裏時，特別是回來之後，我對於蘇聯獲得我們可以節省下來的一切軍用供應一點，深表興趣。哥里柯夫將軍說，他在兩星期前已把他政府的需要向國務院提出，但是唯一的結果，就是裝了六十架飛機到蘇聯去，而蘇聯最需要的是高射炮和攻坦克炮。我答應加倍努力援助，儘速裝出這些武器。

當我和蘇聯的來客談話時，總統正和邱吉爾首相在舉行大西洋會議。蘇聯對於此一會議，極爲重視。霍浦金也出席這次會議。當他就蘇聯抵抗希特勒侵略的能力提出樂觀的報告之後，總統和首相對於發給史達林的聲明獲得了同意。總統於八月十三日把這個聲明用無線電打給我，叫我用電報打到莫斯科去。

兩位領袖向史達林保證說，「我們目下正協力以你所最迫切需要的供應品，以最大量供給給你。已經有許多艘滿載物資的船離開了我們的海岸，在不久的將來，將有更多艘的船隻開出」。他們建議在莫斯科舉行會議，來分析蘇聯的需要，由英美派高級代表到蘇聯去出席。

大西洋會議的故事，在別的地方已經說過好幾次。這次會議是在我在白硫磺泉養病的時候準備的，當我回到華盛頓

的時候，總統已經啓程赴會。羅斯福先生想和邱吉爾親自舉行會議，已有好幾個月。我第一次獲悉此事，是在五月底。七月二十八日，韋爾斯寫信到白礁嶺泉給我說，會議已定於八月八日和十日舉行，並且告訴我，假如總統所想討論的超越純軍事問題的範圍，他想敦促他帶一個人和他一同去，因此可以把談話以及可能獲致的協議，準確的記錄下來。

在使總統和首相因親自密切接觸而獲致相互的理解上，會議的成就頗多。在英國戰艦「威爾斯親王」號與我國巡洋艦「奧古斯太」號上，兩大偉人開始了這種奇特而親密的關係，這對於加速戰爭的結束，極關重要。

### (二十五) 侵略之箭扣在弦勢在必發

一月二十七日，格魯自東京來電給我稱：駐日秘魯外交代表曾告訴他，說是他（秘魯代表）自許多方面（包括某日本方面）聽到，日本武裝隊伍在美日兩國發生「糾紛」時，將突然集體襲擊珍珠港，而且說在這次襲擊中，日本將使用各種武器。秘魯代表告格魯稱：他認為必須把消息傳遞出來，因為他是從各方面獲到此項消息，雖然這一計劃似乎有些荒謬。翌日，我們把電報內容轉給陸軍和海軍部。

大約正在這時候和這種環境下，有兩位天主教神父自日本返美，一位是紐約外國天主教協會會長華爾許主教，另一位是特勞脫神父。

他們報告說：曾與許多有地位的日本人（包括松岡）談過；他們知道兩國關係已趨緊張，更劣的局勢，將接踵而至。他們都具有可以使人讚揚的願望，以老百姓的資格盡其能力，防阻戰爭。

一方面，他們與美政府中最有權力的天主教徒郵政總長華爾克接觸，另一方面又與日本大使館的官員暗談。總統與我同意由華爾許主教與特勞脫神父以純粹私人資格，繼續與日大使館維持接觸，並設法把日方的想法用文字紀錄下來。但是我們覺得在日本新任大使野村未到達華盛頓以前，我們本身不能採取任何行動。

野村大使於二月十二日第一次訪問我。他是高大健康，具有誠懇的險孔，與普通日本人的體格大不相同。他的英語，有時候還好，有時候則不甚熟練。他的特質是嚴肅，但很多時候，他又作不快樂的笑容和鞠躬。我認為野村對於防免美日戰爭的努力，很是誠摯。

我於三月八日與野村在我的卡爾登公寓住所，作第一次長談。這是珍珠港事變前我們所舉行的五廿至六廿次談話中的第一次。談話都在夜間舉行，地點在我寓所開書室，起先在卡爾登旅舍，後來又在華德曼花園飯店。野村寧願到我的寓所，而不願到國務院，以便儘量使我們的談話避免刊載在報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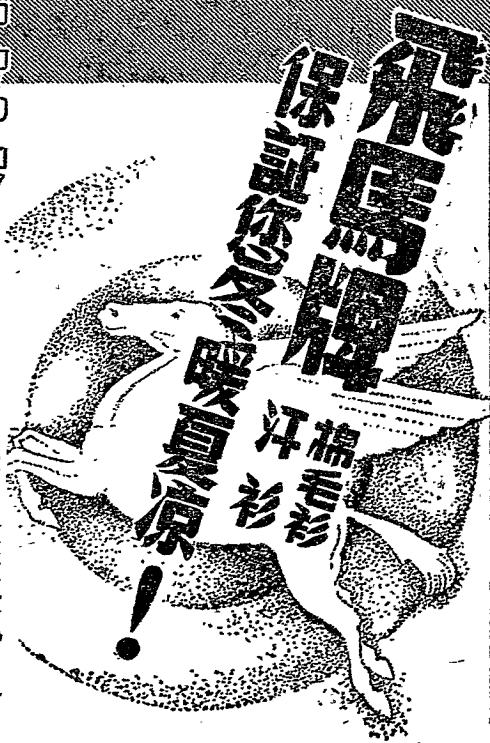


羅 邱 大 西 洋 會 議

熱天道是冷天好  
冷天又說熱天好

其實

冷天要嚴密保護體溫  
熱天要儘量放散體溫



品出廠衫襪福景



在這些討論中，會有許多直率的詞句，但是我們聲喉，從未超過談話聲調水準。野村彬彬有禮，我們留的私交很是融洽。

我們最初的幾次談話，祇限於我和野村兩個人，以後包括我的和野村的顧問。

國務院出類拔萃的日本專家勃倫丹，總是在晚間七點四十五分到我的寓所來，帶來各種需要的文件，與我討論。野村與他的顧問在八點三十分前趕到，談話時常繼續到十點，有時候十點半。勃倫丹然後回至國務院，準備談話的備忘錄。

由華爾許主教，特勞脫神父及郵務長華爾克主持與日方代表（包括野村大使）進行的非正式談話，至四月九日已有頭緒。在那一天，我從他們接到參加者所已經同意的建議草案。在以後數天內，我與國務院內的遠東事務專家細心的審閱其內容。

當我們研究建議的時候，我們的失望很大。建議並不是我們所想像的那樣易於容納；大多數的條例，都是那些激烈日本帝國主義者所能夠期望的。

由郵務長華爾克轉來的建議，經我們的遠東專家和我審查完竣之後，我的結論是：有若干點是應諺予以反對，還有若干點可以照其原意接受，另有若干點，則可經修正後予以接受。我覺得凡是促成與日方進行大規模談判的任何機會，都不應予以忽視。因此，我邀請野村到我新搬進的華德曼花園飯店寓所來看我。

我向野村聲明，我已接獲關於解決我們兩國間糾紛的非正式建議，並補充說我知道日大使本人也參加計劃，並獲悉其內容。

野村迅速答稱：他完全明瞭文件的內容。他雖然還沒有呈交其政府，但深信他的政府會予以贊同的。

兩天後，我在我的寓所把一個包括四項基本原則的聲明交給野村。我對他說明在我們可能達成的協議中，必須釐重這四項原則。四項原則的內容如次：

① 尊重每一及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和主權。

② 支持不干涉他國內政的原則。

③ 支持均等原則（包括貿易機會均等）。

④ 不更變太平洋原狀，但以和平方式改變原狀，則不在此例。

我對野村說：在這四項原則被接受之後，假使他把美日雙方私人所準備的非正式文件呈給其政府，而假使他的政府予以批准，並且訓令他向我們提出，那末，它就可以成爲開始談判的基礎。

野村把四月九日的文件，連同我的四點與其他意見，轉呈東京，於是我們坐候日方的答復。

五月七日，野村又到我的寓所來，他提出一個來自日政府的建議；主張美日兩國應即締結不侵犯協定。毫不遲疑的，我迅速把這問題擱置一旁。我說：「這與你的四月九日文件，完全是兩件事情。除了用作談判基礎的基本原則之外，我國政府不想考慮其他。」

野村又說他已接獲松岡的電報，他指出內容有許多是「錯誤的」。他問我他是否可以把電報交給我。我想了一會，然後對他說：「既然這裏面有許多錯誤，假使他有權力做的話，還是請他把電報保留為妙；因為，誠如他所顯示：松岡的電文已拒絕四月九日文件的大部份或很多部份，因此是不會有什麼進展的。」野村於是平聲收回了那封電報。

事實上，我們已經知道電報的內容。這裏面包括松岡給我的聲明，據說德義領袖深信必可獲得勝利，美國參加歐戰，僅能使其延長，造成文明的毀滅，並且又說明日本不能損害她的盟國的地位。

我們怎樣會知道電報內容的呢？事實上，我們陸軍與海軍的密碼專家憑其超越的技巧，已把日本密碼譯出，截接東京致給華盛頓及其他首都的政府電報，將其譯出，呈交國務院參考。

這些截獲的電報，把我們的密碼名稱做「魔術」。在最初談判中，這些電報所佔的地位很少，但在最後階段中，則甚為重要。從這些電報中，我們探悉日外相給野村和其他日本代表的訓令，同時也可審查野村是怎樣的把他和我們談話的內容，報告東京。這些電報顯示日本在與我們談判和平的時候，也仍積極推展它的征服計劃。我看到這些電報，正像我看到一個證人反駁他自己的案子一樣。我當然要非常的謹慎，不要使野村絲毫知道我們已具有這種特別的情報。我必須注意到，我們的談話祇限於我從他那裏或是正常外交方面所獲到的消息。為保證這些電文的安全起見，我委派本人秘書之一予以處理和保存，保證必須把它們歸還海軍部或是予以毀滅。

五月十二日，野村以完全新的文件交給我，這是日方所草擬的協定，並附有各項建議的「口頭解釋」。

我們現在已經獲得日方的正式建議。截至五月十二日，已奠定了談判的基礎，談判一直繼續着，直至珍珠港事件爆發，其中僅中斷一次。

從文件中放射出來的希望之光，是非常的少。日本所建議的，大多數都是對她本身有利。事實上，它要求美日共同在太平洋保持優越的地位，而日本担任的是男爵地位，囊括百份之九十的人口與財富，很少顧到其他國家的權益。

直率的拒絕，不啻放棄我們數月來所獲到的唯一的真正機會，從事與日方在基本上討論我們之間的懸案。結果，我們決定依照日方的建議，進行談判。

當日本政府發覺我們情願把五月十二日的建議，充作討論基礎之後，他們立即開始行動，不是依照我們的方向提出

更多和洽的建議，而却是與我們的方向，背道而馳。建議內容一改再改，以致更爲符合他們和他們軸心同盟的帝國主義野心。

對於日本所計劃的一切，我們具有極確實的情報。表面上，帝國會議已於七月二日在東京舉行；接着，驚人性質的軍事步驟也就開始。一百至二百萬人被召入伍，日本商船突然自大西洋召回，日本國內實施限制旅行，並嚴格檢查郵件與通訊。所採取的各種步驟，表示日本已在準備大規模的戰爭。

實際上，我們所截獲的日政府電報，也給我們同樣驚人的消息。七月二日自東京發至柏林的電報，包括關於政策的激烈節段如下：

○日本帝國決追隨促進世界和平的政策，不論世局如何變化，決心建立大東亞榮共圈。

○帝國政府將繼續努力，結束中國事變，並將採取南進步驟，以便爲本身建立鞏固的自存自衛基礎。

同日，松岡給野村的電報云：「南進的準備將予加強，對越南與泰國（暹羅）所已決定的政策，決予以實施。至於德蘇戰爭，雖然三個軸心的精神應予維持，但目前必須準備一切，以自己的方法，應付局勢。同時，外交談判應在極端謹慎下進行。雖然應該用盡各種方法防止美國參戰，但必要時，日本將依照三強公約行動，並決定在什麼時候和怎樣的使用武力。」

在此不久以後，日軍於七月廿一日進佔越南的南部，握有整個的法國戰略省份，好像一只巨大的大姆指，向齋菲律賓，馬來亞與荷屬東印度。

五月廿三日，韋爾斯在白硫磺泉打電話給我，說是野村請求與他會談，問我怎樣對野村講。

我告訴他：侵略越南南部，看上去好像是日本在太平洋大規模進攻前的最後一個步驟。我說：日本既然在談判聲中進攻越南，我認爲殊無繼續談判的理由。

韋爾斯很有力的把這些評語告訴野村，並告訴他我已決定結束我們的談判。

自此以後，我們對日本的主要目標，就是要給我們本身以充分的時間，從事準備防禦。

## （二十六） 戰神之刀已掛在我們頭上

我們既然不能期望近衛內閣有良好的表現，我們對於十月十七日以後成立的東條內閣，當然更不能期望些什麼。東條曾任陸相。在就任首相之後，依然繼續是一個現役陸軍軍官。他是一個典型的日本軍官，他的思想狹窄刻板而不會變通。他很頑固，一相情願（愚蠢的），硬幹，而具有相當的動力。

新任日本外相東鄉是一個典型的日本外務省的官員。在他的行業內，他是一個良好的技術人員，但是他的見解相當狹小而且不能獲得廣泛的觀察。

同時，我開始注意到東條對我們談話態度的迫切意念。近衛曾促使我們迅速接受他的條件，但是他的目標之一是想借助我們與他的協議，而繼續留于其職守。東條也是要迅速行事，可是他的目標却與近衛不同，我以為：假使不能協議，他就準備行動，也就是促成戰爭。

這種緊迫的意念，幾乎是一種瘋狂的行動，企圖迫使我們成立協議，把東京所想要的全部給它，這一緊迫的意念一直繼續至珍珠港事件爆發。在東條握權後的數天，我們就發覺了這種意念。在那時候，有一封十月二十一日給野村的電文為我們截獲，譯文送達我的辦公桌，內容略稱：「就發表意見和闡明我們的立場而言，凡是可以講的，我國幾乎都已說過了。我們覺得我們已經到達了一種程度，那就是說除了要求美國重新考慮其見解外，我們不能再有進一步的積極行動。因此，我們要求有一個適當的時候，你或是若山（日大使館參贊）應該間接向美國說明我國不能再化費時間從事討論這些問題」。

東條政府的緊迫意念，繼續增高。十一月三日，外相東鄉訓令前任駐德大使來栖到華盛頓來，顯明是要協助野村與我談判。我們依照日本政府的請求，立即採取各種可能的步驟，加速他橫渡太平洋的飛行。

同日，格魯大使把他的意見打一電報給我。他以為假使我們的談判失敗，日本或者會來一次不成功即滅亡的切腹行為。

在截獲的電文中，我們已第一次發現了限期。東鄉在他十一月五日致野村的電文中稱：「由于各種環境，所有本協定簽署的佈置，應于本月二十五日前完成，這是絕對需要的。我知道這是一個困難的命令。但是在目前環境下，這還是一個不可避免的命令。請你澈底了解這一點，從事防止日美關係陷于混亂的情形中。」

就我們看來：這祇有一種解釋。日本已經撥動她戰爭機器的大輪子，而且如果在十一月二十五日前我們不接受她的要求，日本決定不惜一戰。

因此，在十一月七日美國內閣常會中，我對當前的危機，提出嚴厲的警告。在這憂鬱的會議中，遠東的局勢，佔據了我們全部的腦海。照例，總統在內閣會議開始時，首先由本人檢討局勢，然後再向內閣適當人員徵詢意見或是請求閣員提出其估計。但是這一次他直接問我是否有什麼要提出討論。

我講了約有十五分鐘，指出整個國際局勢的危機。我並且詳述我們與日方談判的演進。

我作結論稱：「在我看來，關係已經是極端的危急。我們應該注視日本隨時隨地作軍事的進攻」。

沉靜了一會，然後總統走了一圈，徵詢每一關員的意見。他們全都同意我對危機的估計。

內閣一致同意：認為危險的局勢應由高級官員在演詞中予以強調，以便全國人民都能够爲這一發展準備一切。在以後的數天內，總統，海長諾克斯與副國務卿韋爾斯都就此問題發表有力的演說。

野村雖然繼續爲日本的和平意向喋喋不休，但是送給我辦公桌的截獲電報却另有文章。電報之一，日期爲十一月十四日，是從東京打給日本駐滬代表的，裏面說明假使我們的談判不能產生協議，中國方面可能發生的是什麼。電文稱：「我們將完全摧毀英美在中國的力量。我們將接收敵人在華的租界及權益（海關與礦藏）。

十一月十五日，來栖到達華盛頓，十一月十七日，野村陪同來栖來到我的辦公室。在我看來，來栖似乎是野村的反面。無論是他的外觀或是他的態度，都不能令人信任或是尊敬他。一起首，我就覺得他很是奸詐，我們截獲的電報，我們經常得到的情報，以及在我們以前的談話中對日方態度的分析，從這一些裏面，我們已知道了日本的意向。因此，假使說來栖在離開日本時還是不知道日政府的計劃和他所負的任務，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他被派到華盛頓的目的是在兩者之間選擇一種：一種方法是要使用各種可能的壓力與引誘，迫使我們接受日本的條件，另一方法是在這方面失敗後利用談判使我們鬆懈直至日本準備完成而開始進擊。

野村在介紹來栖給我的時候，同時以日政府的聲明一件交給我。我們會請求東條內閣證實近衛內閣所已同意的各點。日政府對此一聲明接受了我們的請求。

略談之後，我陪同兩位使節穿過街道到達對面的白宮，與總統會談。局勢不能再比這時倏緊急的了。祇在前一天，野村接獲東條的來電，證實了十一月二十五日的限期。我們也截獲了這一封電報。

電文云：「依閣下之見，我們應該忍耐等着戰局的轉變。但是我很抱歉的說：目前局勢已使我們無法辦到。爲了結算這種談判，我已提出限期，不能有所變更。請你了解這一點。你也知道時間是怎樣的短促；因此，不要容許美國轉移我們的注意而繼續拖延談判。迫使他們依照我們的建議謀得解決。爲促成立即解決，請儘最大的努力。」事情已變成了這種情形，那就是我們必須在日方指定的文件上簽字，否則就得接受一切後果。

不論是在那一次白宮會談或是在以後三天內野村，來栖與我的討論中，日本新任使節都沒有提出新的建議。

從東京發出被我們截獲的電報，已經毫無疑問的證明危機已迫眉睫。野村已接到訓令，撤退在美國的日僑，他又接到一種新的電報密碼，方法是這樣的：他可聽取日本的短波新聞播音，注意裏面關於風向的報告，從這裏，他可以知道日本是否將對美，蘇或英斷絕外交關係。電報又告訴他在聽到此一報告後，毀滅所電有碼，秘密文件等。

然後在十一月二十日——感恩節——，野村與來栖給我一套新的建議，就表面看，這些建議是很極端的。截獲的日方電

報告訴我們，這是日本最後的建議。這是一個哀的美敦書。

日本的建議，雖然其性質是如此的荒謬，任何美方負責官員都不能夢想到予以接受，但是我覺得我的反應不該過份激烈，藉以避免給予日方以中斷談判的藉口。

十一月二十一日，來栖單獨來看我。我問來栖他本人或是野村對於整個和平解決問題是否還有什麼建議提出。他回說沒有。

在來栖這次訪問本人並聲明對於這一問題已無進一步的提議之後，我在與華盛頓當局及個人談話時，（其中包括史丹克上將），加倍警告他們，指出日本或將隨時進擊。

外交上講，局勢可以說是等於絕望，但是在我們一方面，我們是要竭盡一切方法去尋求一個和平的解決，以便避免或是延阻戰爭。陸軍部長史汀生，海長諾克斯，參謀總長馬歇爾以及海軍作戰部長史丹克，都是我經常接觸的人物，他們都要求更多的時間，準備美國的抵抗。一方面，日本要求與我們攤牌。我們爲了我們的原則屹立不動。日方也不退讓，對於他們的要求，極盡威迫的能事。

十一月二十一日與二十二日，我們準備提出反建議，我們草就了一個臨時協定，在這協定上，將附有永久協定的大綱。

我們努力草擬一個包括十大要點的和平協定大綱，附在臨時協定上。大概的說，我的同事與我爲了挽救危局，都已到達了山窮水盡的階段。

財長摩根韜在他的部內草擬了一個解決方案，送給本人。這雖然是財長越俎代謀，企圖担任第二國務卿工作的另一例子，但是其中有若干點是很好的，因此也併入了我們最後的草案。

由我們截獲東京致野村與來栖的十一月二十二日電文，已把限期從十一月二十五日展延到二十九日。愈限就是戰爭。電文云：「堅持我們的既定政策，盡你們最大的能力。爲促成我們所需要的解決，你們應該不遺餘力的工作。我們爲什麼要在二十五日之前，解決美日關係，這裏面有許多原因是你能力所想像不到的，但是在未來三四天內，假使你能夠與美方完成談判，假使簽字能於二十九日前完成（讓我寫一遍——二十九日）假使能夠交換通電的照會，假使我們獲得英荷兩國的諒解，簡單的說，假使各種事情都能完成，那末，我們就決定等到那一天。這一次我們說得到就做得。限期絕對不能更變。在此以後，事情將自動的發生。」

「在此以後，事情將自動的發生」，在這一句話的陰影下，我們在以後的兩星期中拚命的苦幹，企圖爭取和平，或者最低限度是更多的時間。

在我與英·中·澳·荷使節（時爲十一月二十二日）晤談數小時以後，野村與來栖到我的寓所來看我。看到這些日本代表笑容可掬，彬彬有禮和外觀非常友好的來到我家中，幾乎是一種夢幻的環境。我既然從截獲的電文中知道了日本的惡毒計劃，而又明白來栖與野村也知道了同樣的情報，所以在我用同樣的語調和同樣的態度與他們談話時，就是一種痛苦。他們坐在那裏，鞠躬如也，野村有時候作吃吃笑，來栖也露齒而笑；但是在他們的腦海中却充滿了一種想法，他們以爲：假使我們不對日本的要求說一聲「耶斯」（是），他們的政府在數天內就會發動新侵略，遲早與美國交戰。

十一月二十四日，我們截獲東條給野村的電報，裏面說前次所提出的限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東京時間。因此戰神的刀劍已掛在我們的頭上，在預定時間到達後，即將爆發。

### （二十七）一言不發，向後轉，開步走

十一月二十六日我交給野村與來栖大使的建議（即包括十大要點之和平解決方案），是一種維持我們談判繼續進行的誠摯努力，在這上面我們寄以不絕如縷的希望，那就是：即使在這最後的一分鐘，希望有些微的常識能够滲入東京軍人的腦海中。

不久，日方的宣傳——尤其是在日本開始遭遇嚴重敗績之後——企圖曲解我們十一月二十六日的備忘錄，稱它做「哀的美敦書」。這正是日方的著名特質，利用完全虛構的藉口，迷惑他們的人民，並爲軍事劫掠獲得他們的支持。

野村與來栖大使本身也承認與我們破裂的責任是在日本身上。同日，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們有電報拍給東京，爲我們的陸軍與海軍截獲，這電報建議把責任移到我們身上。他們說：假使在這種談判中，我們故意開始我們預定的行動，那末，談判中斷的責任就有移到我們身上的危險。以前曾有好幾次，它（美國）可以因爲我們侵入越南而攻墮中止談判。現在假使在沒有闡明我們的意志之前，中斷我們的談判，並突然開始單獨行動，那就恐怕它會利用此點，作爲針對我們的反宣傳。

從外相東鄉給野村和來栖的十一月二十八日電文中，就可以看出將要發生的是什麼。這電文說與我們的談判，即將中斷，但又稱：「我不願意你們造成一種印象，使人以爲談判業已中斷。你可僅僅告訴他們說：你正在等候訓令，並且聲明：你們的政府的意見，雖然你還不得而知，但是照你們的想法，帝國政府所提出的要求，一向都是很公正的，而且爲了維護太平洋的和平，已經蒙受了很大的犧牲。」

換一句話講，來栖任務的第二階段已經到臨了。第一個階段是要迫使我們接受日本在東方的霸權。這個失敗之後，第二個任務就是要在日方武力進攻未準備完成以前，用談話使我們迷亂。

十一月二十九日，我看到了東條與東鄉預備於十一月三十日在大日本東亞同盟與大政翼贊會聯合主辦的大會中所發表的演詞節要。東條電報中有一段說：「蔣介石與英美及共產主義沉瀝一氣，爲了對日本作無效的抵抗，不惜犧牲壯丁與有爲的青年。這種事實，祇是爲了英美要在東亞的混水中摸魚，使東亞民族互相對壘，以便他們奪取東亞的霸權；爲了人類的光榮與自尊，我們必須把這種行爲逐出東亞。」

我在放慮之後，曾與我們軍事當局及遠東專家加以討論，並反覆研究以前我們所接到關於日方在越南新行動的各種報告；當夜（十一月二十九日）我打電話給總統，強調日本進攻的危機，並勸他提早返回華盛頓，總統表示同意。

羅斯福總統於十二月一日星期一早上到達華盛頓。在他未到之前，野村與來栖到國務院來訪我，問我總統爲何提早返至首都。日本使節顯然是恐怕總統趕返華盛頓將與他們用談判迷亂我們的訓令相衝突。我說原因之一，就是日本首相的大言。

十二月五日，我以訓令用無線電拍給我們駐於東京及遠東其他各點的外交代表，囑咐他們毀滅電碼，密庫，護照等，並關閉辦公室，將當地職員解僱，而在必要緊急時，與國務院斷絕通訊。

在第二天，十二月六日，我們似乎覺得，威脅已久的日本武力南進已在進行了。

總統認謂：他致電日本天皇的時候，已經到臨了。他把電文草案送給我，內容與我前一星期送給他的草電大致相同。我與我的同事閱讀一過，認爲其中若干詞句，爲了技術準確問題，應予修改。我們修正之後，把草電送回白宮，同晚，羅斯福先生又把它送給我，內容並無更動，並附函稱：「親愛的柯德爾：把這電報趕快拍給格魯，我以爲可用一灰色電碼」（按灰色電碼乃美國國務院最秘密的電碼），這可以節省時間，我並不怕電報爲人截獲——羅斯福。」

星期日早上，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我照例到辦公室。自從一九三五年我進入國務院之後，我幾乎每一個星期帝都辦公。

在這天早上，我接到一連串截獲的電報，包括計有十四節的由東鄉外相致野村與栖的來長電。這是對我們十一月二十六日建議的答復，在長電之外，附有短電，訓令日大使把原電呈交我國政府。如屬可能，時間應在當日下午一時。這已是最後關頭了。

日方的照會，比侮辱還要惡劣一些。電報說我們的建議，「藐視日本在四年中國事件中的犧牲，威脅帝國本身的生存，並損及它的光榮與尊嚴。」該電又說我們與英國及其他各國同謀，阻碍日方在建立東亞新秩序及和平方面的努力。該電的結論稱：「鑒於美國政府的態度，日本政府不得不認爲已無法經由進一步的談判獲致協議。」

此一照會並沒有宣戰，也沒有斷絕外交關係。日本是不需要這些預先步驟來開始進攻的。



將近中午的時候，野村大使打電話給我，請求我在下午一時與他及來栖會晤。我接受了他的請求。一點過了數分鐘之後，野村又打電話給我，請求將約會延至下午一點四十五分，我表示同意。

日本使節在兩點零五分到達國務院，直入外交等候室，大約正在這時候，總統從白宮打電話給我，他的聲音非常鎮定，但是也有些急促。

他說：「有一報告說，日本已進攻珍珠港。」我問：「電報已經證實了沒有？」他說：「沒有。」

我們都以爲這一報告，或許是真的，但是我建議他應該設法證實，其時我想到我與日本使節的約會。

與我同在辦公室的計有法律顧問赫克華斯及巴倫丹。在我與日方談判時，巴倫丹多數都在場。我向他們說：

「總統已接獲未經證實的報告，說是日本已進攻珍珠港。日本使節等着要看我，我知道他們要的是什麼。他們將拒絕我們十一月二十六日的照會，也許他們會告訴我們，聲明業已宣戰。我頗有不願接見他的意思。」

但是經過考慮之後，我就決定接見他們，因爲總統所接獲的報告，尙未經證實，也許在百分之一中，這一報告是不確實的。我與赫克華斯及巴倫丹約略討論我將要對日本使節講的話。當我傳令接見日使節時，赫克華斯離去，而巴倫丹則留在室內。

野村與來栖於兩點二十分時進入我的辦公室。我冷淡的招待他們，並未請他們坐下。

野村用過於謙遜的態度說：他的政府訓令他在下午一時以照會一件呈交我們，但是因爲譯電困難，所以遲到。然後他就將其政府的照會交給我。

我問他爲什麼他在第一次請求我接見的時候，要指定下午一時。他說他並不知道，但說這是他所接到的訓令。

我假做閱讀照會，我早知其內容，但是當然不能表示這一事實。

我讀兩三節之後，我問野村：他是否是在其政府訓令下，呈遞這一文件。他說是的。

當我略閱之後，我面向野村，並以目光注視他。

我說：「我必須聲明，在過去九個月，我與你的談判中，我從未說過一句不忠實的話。這點絕對可由事實予以證明。在我服務政府五十年中，我從未見過包括這許多無恥虛僞與曲解的文件——其無恥虛僞與曲解的程度，是如此的巨大，直至今日爲止，我從未想到目前世界中任何政府能够講得出來。」

野村好像是沒有講什麼。他的神色泰然自若，但我覺得他已處在很大的感情緊張之下，我用手勢解救了他。我向房門點了點頭，日本使節一言不發，就向後轉，開步走，頭往下垂。

用豐富的田納西山嶺語言來說，我已把日本使節「罵走」，但事實上我已把我上面說的告訴了他們。「罵走」的程

度，沒有再比這次更激烈的了。

巴倫丹把我說的話，紀錄下來。在日本使節走出之後，我立即喚我的速記員進來，用記憶讀出我對他們所講的話。這與我向報界發表的相同。

野村與我的最後一次會晤，與他歷次處理討論的方法，是一樣的拙劣。他的政府訓令他約定下午一時與我會晤，目的是在日方進攻珍珠港數分鐘前，將照會交給我。野村的使館胡說是因譯電遲慢之故。但是野村既然知悉限期的重要性，即使他祇拿到照會的最初數行，也應該訓令大使館接着把隨後譯好的送到國務院，而本人則準於下午一時來看我。

因此，日本是未經提出警告而進攻珍珠港，大概發生在野村與來栖提出照會的一小時有多之前。

在日本使節離去不久，我就在電話中與總統講話，將我告訴日本使節的話，向他重述一遍。他對我的講得這樣激烈，表示滿意，但在那時候，他已接獲關於日本進攻珍珠港的報告了。

下午三點多，我到白宮去，與總統及其他人物談了四十分鐘。羅斯福先生在態度與談話中，都很嚴肅。日方在出其不意進攻珍珠港上收穫的巨大，已經很為明顯。但是不論是他或是我們，都沒有一時一刻對美國應付危機的能力，失去信心。

## （二十八）「稱我總司令不要稱我總統」

在戰爭發生之後，我國的武裝部隊在總統以總司令資格指揮之下，開到前綫去，但是外交工作也成為戰爭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對敵國的關係固然已經停止了，但是對盟國和中立國的關係，却愈形複雜，使我們的工作大為繁重。

在和平時代，國務院是負責處理國際關係的，此外並就我國國外軍隊的調動問題，提供意見，例如我國駐華軍隊應予增加或減少等。當戰爭來臨之時，國務院不再和國外的軍事行動發生關係，因為它已僅屬於適當軍事當局指揮的範圍之內了。

幾乎在珍珠港事件一變生之侈，我就對我的同事說，從今以後，國務院的任務乃在對戰爭努力有所貢獻，我希望國務院中每一個人和陸軍部海軍部和一切與戰爭有關機關充份合作，並給予一切便利。

我不准國務院中的官員到我那裏來說陸軍部或者海軍部的某一官員做錯了事，已經成為慣例。我對他們說，「記着，他們是負責戰略和執行戰爭的人。他們有權獲得我們最充份的合作。」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我是軍事會議中一員，其中包括總統，國務卿，陸軍部長，海軍部長，參謀總長和海軍作戰部長；我參與各次會議。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我不再出席有關軍事問題的會議了。這是因為總統並未邀我出席這些會議之

故。我好幾次向他提出這個問題。在我看來，在許多重要方面，國務卿應該出席總統的軍事會議，特別是有關軍事外交聯合性質的會議，理由頗為明顯，因為極少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不牽涉到外交方面的。

我覺得國務卿不出席重要的軍事會議，乃是一種重大的錯誤。我時常有機會向總統指出這一點，就是無疑在這些會議中決定的某種軍事性質發展，亦有其重大的外交關係，當時我應該獲得通知。

總統沒有帶我去出席卡薩勃朗加，開羅，或者德黑蘭會議，這些會議主要是屬於軍事性質的。我也沒有參加他和邱吉爾首相在華盛頓舉行的軍事討論，其中一部份對於外交方面會有廣泛的影響。我對他說：「我並不是想增加自己的責任，但是我相信國務卿是應該出席這些會議的。」我提起英國的辦法，就是艾登外相是參加一切軍事會議的。

總統的答覆乃是我們這裏有一種不同的制度——這點我同意是事實——英國的內閣形成政府，艾登在他們的制度之下應該在我們的制度之下具有更強的理由去參加軍事會議，縱使外交的各方面也是值得考慮的重要因素。

我從總統以外的其他方面獲悉卡薩勃朗加，開羅和德黑蘭會議中所發生的事情。我沒有特殊的機會可以向羅斯福先生詢問有關這些會議的發展，但是假如我詢問他有關他所討論的問題，那麼除了少數例外之外，他總是馬上會坦白地告訴我最秘密的事情的。

（有一個軍事性質的問題我曾和總統及其軍事方面的助手討論過，那就是關於第二戰綫的地點。我同意我們主要的努力應該是橫渡英吉利海峽到法國去。至於軍隊將在何處登陸以及在征服希特勒的大軍事行動中軍隊將由什麼路綫橫越大陸的問題，我却從來沒有和總統或者其他高級軍事官員中的任何人討論過，雖然我早就獲悉業已獲致的決定。）

關於原子炸彈，並沒有人告訴過我。偶然，某一個人給我一個隱約的暗示，但是我並不迫着提出問題。我並不真正知道它，直到它投了下來並且加以宣佈之後。它在準備之中的最後幾個月以及在投下的時候，我已不再是國務卿，所以我是會知道什麼的了。羅斯福先生高瞻遠矚，決定費去二十億美元來發展原子炸彈，的確值得讚揚。

總統繼續不請我去參加他的軍事會議。他愛好大局軍事的一面，歡喜把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珍珠港事件之後，他喜歡被人家稱為總司令，比總統的名稱為甚。他樂於用這個銜頭。他可能覺得這個極重要的地位現在是比總統都更屬必要。

在一次內閣的宴會上，大約在一九四二年，我準備舉觴致意。在我起立發言之前，總統要求我：

「請你稱呼我總司令，不要稱呼我總統。」

在我和各國大使，尤其是我們主要盟國代表談話的時候，不提及若干軍事題目當然是不可能的。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當我和蘇聯新大使李維諾夫作第一次談話時，我提出一個問題，要求蘇聯准許我們使用蘇聯領土上的空軍根據地，以

便轟炸日本地區。我們也討論到用蘇聯船隻載運供應品到海參崴去的問題，因為日本顯然是不會准許美國船隻載運它們回蘇聯去的。

才維諾夫是蘇聯前外長，以前我會和他進行過初步的談判，結果在一九三三年建立了美蘇外交關係。

三天之後，當李維諾夫向我之請來看我時，他說他的政府已通知他認為它在當時不能和我們合作反抗日本。他說蘇聯正在進行反抗德國的大規模戰爭，不能冒險進攻日本。

我回答說我能够理解蘇聯的立場。我向他提起在這一年的初我們曾供給蘇聯有關德國即將向它進攻的警告，並且說我現在有同樣可靠的情報，那就是日本不啻日蘇中立條約的規定，對德國負有最嚴格的義務，在希特勒要求的時候，它就會進攻蘇聯以及對德作戰的任何其他國家。我還說，辦法彷彿是如此的：日本將先攻擊美國，由德國和義大利參加，其後，當德國要求的時候，日本將侵犯蘇聯。

雖然史達林早在那時候決定暫不參加我們反抗日本，我還是把這個問題放在他的面前有相當時候。在戰爭爆發之後，國務院的工作在許多方面發生了變化或者加緊了。

爲了和軸心國交換外交人員和平民，我們也在從事談判，消費了好幾個月的時間。在珍珠港事件之後幾天，當國務院就此一問題正在舉行會議的時候，我們從一個極可靠方面得到一個消息，說日本大使野村和他的海軍參贊已經接到命令，應該在大使館中實行切腹，因此日本政府可以說我們暗殺他們的。

假如這個計劃實現了，我們在日本的官吏究竟將怎樣使我們非常擔心。我們勸諸瑞士公使立即到日本大使館去，把我們已經接到的消息通知野村，並且要斷定他的意向。他們談了很久，但是並不能使我們的恐懼完全消釋，因爲野村說決定並不在他，而在高級當局。

## (二十九) 小事化大事大事再化小事

珍珠港事件之後，由於戴高樂將軍命令自由法國軍隊，強行佔領紐芬蘭海岸附近的法屬聖比安島和密克隆島的無理行動，我們和他的非正式關係轉趨惡劣。該項事件發生於聖誕節夜，當時總統正在白宮招待邱吉爾首相。

這些島嶼原在馬丁尼克島的羅貝特總督管理之下。我們已經和羅貝特總督獲致協議，因此我們主張維持聖比安和密克隆島原狀的主張獲得了保障。此項協議，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數日，重行加以延續。十一月和十二月間，我們並就聖比安島上一個電力強大的無線電台問題，和加拿大舉行談判，因爲加拿大和我們都深怕它可以指導德國潛艇的活動。我們同意加拿大應派電訊員去監督該電台所發送的消息，假如當地總督拒絕承認加拿大此一行動的話，我們將和加拿大一致

行動向該兩島施用經濟壓力。

加拿大政府在十二月四日通知我們英國政府的一個建議，認為這兩島嶼應由自由法人加以佔領。這個建議對於加拿大或我們自己都覺得不可取的。

十一月底，戴高樂派他的「海軍部長」墨賽里去觀察在紐芬蘭海岸附近和英方一同在活動的自由法國輕艦隊，並且設法使密克隆島參予他的行動。墨賽里到渥太華去徵詢加拿大政府的意見。加拿大外交部不予允准。

十二月十五日，英國外交部聲言邱吉爾首相認為自由自由法軍登陸並控制電台，較諸加拿大政府採取行動為宜，後者是可能造成窘人的政治局勢的。外交部還說，除非事前獲得美國和加拿大政府的允許，不致採取更進一步的行動。

墨賽里同日去見我們駐渥太華的公使莫法德，就自由法國軍隊在此等島嶼上登陸的問題，徵詢美國政府的意見，總統讀了莫法德的電報，並且說他並不贊成准許自由法人牽涉到聖比安——密克隆局勢的任何政策，於是就用電話通知了莫法德。

莫法德於十二月十六日把我們的見解通知了墨賽里。墨賽里對莫法德說，他覺得我們正在造成錯誤，但是他將接受這個決定。

加拿大駐華盛頓公使館參贊勞恩在十二月廿二日說，他可以通知我們一點，即自由法軍的任何行動，已被阻止了。但是同時墨賽里和戴高樂通訊，後者命令他照舊行事。

因此，墨賽里海軍上將事前並未警告加拿大或美國，於聖誕節夜在這兩個島上使少數部隊登陸，加以接管。我們駐聖比安的領事柏斯凱於十二月二十六日向我們報告說，墨賽里對戴高樂深表不滿，說他的行動像一個獨裁者。墨賽里說他想辭職，對戴高樂事前未獲美國和加拿大核准而向他發出片面的命令，表示抗議。若干時日之後，墨賽里的確和戴高樂破裂了。

在聖誕節日，我經過總統核准之後，發表了一個聲明，指出三艘「所謂自由法國船隻」所造成的事件，乃是「違背有關各方所訂協定的獨斷行動，美國政府事前確未在任何方面有所知悉或加以允准。」

不幸得很，在美國國內和國外的許多右勢力人士，未能理解該事件更廣泛的含義，而對國務院和我因就自由法軍佔領該兩島嶼而發表的聲明，猛施攻擊。少有如此次要的行動曾經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對的。

由於聲明中「所謂自由法國船隻」這個字句中的「所謂」兩字，我們遭受了特別的攻擊。攻擊我們的人以為我們用這個字，意思是在對自由法國人的存在表示懷疑，或者是懷疑他們是自由的，而事實上我們用這個字句的意思，祇是說「三艘假定是自由法國的船隻」而已。

以佔領此等島嶼的問題作為媒介，我曾在白宮就我們對維希法國的整個問題和邱吉爾首相進行了一次直率的談話。總統是完全同意我的立場的，當我和邱吉爾先生討論時，他也在場，但退居在一旁，讓我們坦白地交談了一番。

我指責戴高樂是一個以無謂行動妨礙他人的工作者，直接違背英國，加拿大和美國早已表明意志，措詞頗為銳利。我要求首相勸他從聖比安和密克隆島撤退軍隊，由加拿大人和美國人負責監督聖比安的電台。

邱吉爾先生說，假如他堅持這樣一個要求，他和自由法國運動的關係將受妨礙。

我回答說自由法國人停留在這兩個島上，而我們又一無作為，勢將影響我們對維希政府的關係。我重申繼續保持這種關係的重要性，因為這使我們可以運用我們的勢力，使法國艦隊和根據地不致落入德國人之手，並可使我們在維希法國和法屬北非與西非保有觀察員。

邱吉爾先生同意對維希的這種關係，對於英國是和對美國一樣重要的。

我直接詢問首相能否做一些事情來阻止戴高樂派在電台上和報紙上繼續攻擊美國政府。

當邱吉爾懷疑他是否可以對戴高樂行使這種檢查時，我說戴高樂反對我們的宣傳運動，是由英國的資金加以支持的，假如邱吉爾先生能够以停止津貼相威脅，戴高樂很快地就會毫無辦法。

邱吉爾先生同意考慮我所提出的各點。

就在事情發展到這個程度的時候，首相到渥太華去，而於十二月三十日發表了一篇演說，對維希猛施抨擊，而對戴高樂則備致讚揚。

在邱吉爾先生發表演說的第二天，我送給總統一個備忘錄，其中我說：「我們的英國朋友似乎相信全體法國人是堅決支持戴高樂的，而根據我以及我的同事所獲得的一切情報，全體法國人民中約有百分之九十五是反希特勒的，而在這百分之九十五中，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並不是戴高樂派，不會追隨他的。這個事實對於我們北非的計劃發生直接作用，因此不將戴高樂的合作估計在內。」

關於最後這一點，總統早就決定戴高樂不應該被包括在英美進攻法屬北非的任何計劃之中，他會就這個決定竭力向邱吉爾先生說明。他覺得將戴高樂包括在內可能影響計劃的機密性，而會在北非的法國人中自動地引起反抗。

邱吉爾在渥太華發表演說之後幾乎立即回到華盛頓來。一月二日，我在白宮看見他，並且毫不猶豫地說他有關維希和戴高樂的說法，是「極有刺激性的」，對於我和國務院造成了深遠的損害。

我懇請他說，既然我們對維希的關係，對於英國猶如對於美國一樣有重大價值的，因為他自己曾經屢次向我們承認過，所以假如他能够「稍為說幾句話」，表明英國雖不願意和維希維持關係，但是美國所維持的關係對於共同目的是有

價值的，這種說法，對於我們將極有助益。不然，我說，目前流行的美國正在直接違背英國意圖緩靖維希的印象，將繼續蔓延。

首相對於這個建議，並不贊同。

我於是要求總統運用他個人對邱吉爾的影響來處理這個異常的局面。但是羅斯福先生說他已經做了他可以做的事情，他不能再有所作爲了。總統和首相的態度和他們以後的態度是如此相反，因爲後來他們兩個人都對戴高樂極仇視，並且一直是如此。

我當即起草一個建議的協定，在我認爲對於美國，英國和加拿大是可以接受的，而使自由法軍從這兩個島嶼的撤退，對於戴高樂可以同意。這規定美國，英國和加拿大將聯合監督該兩島嶼，而使其中立化和非軍事化。

總統同意我所建議的解決辦法。我們於是就向邱吉爾先生提出。他表示接受，惟以戴高樂表示同意爲條件。同時貝當已表示同意。但是戴高樂加以拒絕。

戴高樂從不同意我們建議中的協定，以使爭端消除。

最後，當因該項事件而引起的騷動逐漸平寧下去時，我覺得最聰明的辦法是讓這樁事情擱置一旁，直至戰爭結束。總統同意我的建議，因此這樁事情就逐漸縮小爲歷史的註釋之一，而在當時極有演成整章歷史的危險可能性的。

我們對戴高樂的關係，並未因該項事件而有所增進。在總統或者我個人的腦海中，無疑有一種印象，就是戴高樂個人對於違背他對英國的義務以及直接背反美國和加拿大的意志，應負其責任。我們認爲他個人的野心太大，沒有我們以前所想像的那樣可靠。

關於我自己，總統拒絕對邱吉爾先生施用壓力以澄清因戴高樂與維希問題而引起的英美關係，乃是幾乎使我在一九四二年一月使我辭去國務卿職務的若干因素之一。我真想辭職，的確用鉛筆寫了一張條子，提出辭呈。

或許在這裏把我們對維希的政策總結一下，是適當的。不幸得很，這種政策在美國國內引起了如許的感情衝動，就是到了今天，還有些人還是認爲一無是處，祇是嚴悲慘的一片黑色。這輩人中，有些人彷彿像若干讀歷史的人一樣，總是注意馬上的戲劇性人物，盲目地追隨他，看不到他任何過失，並且把拒絕承認他權威的一切人都當死敵看待。很奇怪的，許多英國人和美國人把戴高樂看做聖女貞德（Joan of Arc），擁護他比一般追隨他的法國人還要熱烈。

第一點是羅斯福總統和我對於維希和對於戴高樂的看法一樣。

第二點是邱吉爾首相也堅決支持總統和我所主張的維持對維希的關係，有時候艾登也是如此，縱使他們自己責難維希而使維持關係成爲困難。

第三點是我們對維希的關係，使我們獲得確鑿的利益，這就是在維希法國和法屬北非保持接觸，假如我們和維希斷絕了關係，這種接觸勢將完全被切斷了。

此外還可以使我們的代表留在當地，設法使法國相信一點，就是戰爭無論怎樣長，協約國是會獲勝的，維希法國不應該和德國合作。同時還可以使法國人對自由的基本概念依然留在腦中並且希望法國的自由制度將獲恢復。再者對於防止一九四一年五月間以根據地和物資移讓予德國，亦曾發揮作用。這種關係，對於防止法國繼續落入德人之手一點，也有影響。

第四點是假如我們和維希完全斷絕關係或者迫使日當投入希特勒的懷抱，我們找不到出眾的法國領袖，可以和他發生關係。在外交上完全承認戴高樂等於在外交上不再承認維希。對我們的不利之點顯然超過有利之點。但是我們的確進至給予戴高樂以軍事援助的程度，而設法造成他為一個軍事領袖和法國軍隊的將領，猶如他應該是的，而希望他在日後脫離政治的關係，而專門在戰場上和德國人作戰。

第五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乃是我們對維希的關係，准許我們在北非設有領事，此點對於計劃和派遣英美遠征軍到西地中海去以及對於協助英軍在該區以東的活動，填鋪了一條道路，留下了餘地。

### (三十) 卜屬對上司不能同心協力

一九四三年八月間，羅斯福總統啟程赴魁貝克之前，他請韋爾斯辭去副國務卿之職。他叫韋爾斯到他白宮中的辦公室去，把這點向他說明。

在以前幾個星期中，總統和我曾經談過韋爾斯的問題不止一次。我們同意韋爾斯應該辭職，派他到國外去擔任一樁特別任務，負責有關這樁任務的新工作。

副國務卿韋爾斯所引起的問題中之若干種，我不願意詳細敘述，因為如此做法並無意義可言。這些問題，二三年來不斷地在增加中。一九四二年一月間的里約熱內盧會議，表現了他的一種態度，而這種態度對於我並不是新奇的——那就是他隨時準備作重要的決定，並不徵詢我的意見。

從我們最初相處之時起，我總設法給他合理的自由去執行他的工作。我常常叫他直接去見總統，特別是我在國務院中分身不開的時候，並且叫他去和總統處理正由他在辦理的事情。這是和我的方針相符合的，那就是接近我的同事，副國務卿，參事和助理國務卿應該自己去見總統，處理各種特殊事項，祇要我知識就可以了。我覺得這種偶然的接觸可以給他們更多的經驗，更大的威望以及對工作更深的興趣，並且可以減輕我繁重的負擔中的一部份，這種負擔，特別在我們





，統總福斯羅爲左：議會克貝魁  
。隆斯阿晉總領治自大拿加爲右  
。相首爾吉邱爲者立

# 永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所

上海(13)中正東路二五五號 電話掛號三六三九號  
電話八二五八八 八八八三九號 英文電報掛號 EVERCHINA

總製造廠

上海(17)開北西寶興路底  
民生路七一號

南京發行所

電話(〇二)六〇三六五號

南京中華路二六〇號

第一廠

上海(23)長壽路一四七號  
電話三六八六一號

天津發行所

電報掛號南京三六三九號

第二廠及油墨廠

上海(9)歸化路八二六號  
電話六〇四〇九號

天津梨棧大慶里二七號

研究所及製藥廠

上海(9)成都北路二九弄四號  
電話六二八五九號

漢口發行所

電報掛號天津三六三九號

香港辦事處

香港德輔道中東亞大樓一〇五號

漢口民權路八三三號

電話二六二四五 二〇三四一號

電報掛號漢口三六三九號

電報掛號三六三九號

台灣發行所

英文電報掛號 YUNDESCO

台北懷寧街五二號

正在經歷的困難時日中，沉重地壓在國務卿的肩上了。

但是沒發覺韋爾斯濫用這種特權，有時候到總統那裏去，並不給我知道，甚至想獲致一個決定，也不給我知道。這種傾向所以發生的一部份原因，或許是爲了羅斯福先生和韋爾斯在家庭關係上就是老朋友，在社會和學校方面，出身相同。

在歐洲戰爭日益走向爆發之路去的一個時期中，國務院中的公事一個月比一個月積得高，於是我就核准韋爾斯去接見希望到國務院來訪問的許多或者大多數大使和公使。當然，凡是要見我的所有外交代表，我總設法接見的，並且對於重要事務，我總和他們保持接觸。此外，爲了重要問題，韋爾斯應該把外國代表帶到我這裏來，或者叫他們自己來見我。最後這一點，我不久發覺他在許多情形之下並不照辦，雖然我曾經申說明白，就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務必接見這些代表，不管我怎樣繁忙。後來，當一位重要大使徇我之請來看我而我要他再來繼續討論時，他立即舉起他的雙手，並且說我要先同韋爾斯先生談過。這種情形逐漸地但是不斷地愈來愈深刻化了。

我開始注意到韋爾斯正和我們的外交人員以及其他政府的官吏作私人的通信，這種工作照例是應該經由國務院內官方途徑辦理的。他時常把個人的照會送給他們，請他們作個人的答覆，而實際上這種事情是應該用國務院的照會照常規辦理的。這種辦法的不良影響，乃是他把許多談判或者討論的項目，掌握在他自己手裏，而這種事情，照例應該讓我和國務院直接有關官員更明瞭其一般情形的。

一九四二年晚春，韋爾斯就外交問題發表了兩篇演說，其中有使我國政府走上外交政策新路線的傾向。更重要的一次，是在阿靈頓公墓紀念日發表的，討論我們戰後的計劃，當時莫洛托夫外長適在美國訪問。在這兩次演說中，韋爾斯事前對於他的新見解都沒有和我商量過。

一九四二年六月二十日，我叫韋爾斯到我辦公室來，向他指出這一點，就是沒有一個副國務卿或者助理國務卿曾經有過提出任何程度的新外交政策的職權的，這種職權，現在也絕不存在。要使國務卿和副國務卿當做兩個領袖互相協同工作，或者單由副國務卿來負責這種任務，這種嘗試所造成的情勢，我一刻也不能加以允准。

我還說，按照國務院明白規定的規則，沒有一個副國務卿或者助理國務卿可以爲了任何官方的事務直接去見總統，除非總統關照，或者是國務卿所知悉和准許的。對於這一點，沒有一個人比韋爾斯本人明瞭得更清楚。我說我給予他到白宮去的空前權利，可能是我這方面的錯誤，因爲據我所知，他的前任中沒有一個人，有過這種特權。

韋爾斯回答說，他不知道在他的演說中曾經闡述過新外交政策。繼而他說，鑒於我所說的話，今後他將完全停止發表演說。

我答覆他說，他發表的演說很精彩，我希望他甚至發表一百篇來支持戰爭；在他的演說中應該避免新外交政策這個問題，乃是我所唯一想到的東西，除非我們事前獲致同意的，則屬例外。

使我奇怪的是，韋爾斯直到談話終結時為止，還是把兩種完全不同的演說，混爲一談，並且堅持以後不再發表任何演說了。還有一點使我奇怪的，乃是他說在他某一次和總統談話時，後者曾表示他自己並不希望就戰後問題發表任何演說，但是政府中其他人員來發表幾篇作爲試探氣球倒也無妨。

我回答說，韋爾斯並沒有告訴我他和總統舉行過這次談話，再者，這一點和他最初所力辯的根本沒有覺得提起過新外交政策的說法，前後實不相符。

我們的談話暫時有澄清空氣的效果。後來韋爾斯仍舊就外交問題發表演說的，但是事前先和我商量。但是他並不停止越過我直接到總統那裏去的辦法。我對他不寄予同樣的信仰，猶如我對其他的同事那樣。

我覺得不論韋爾斯在外交方面的教育和訓練如何，他對於若干重要問題和政策的見解，比我其他的同事來得狹窄和不健全。在歐洲發生戰爭之前，我們對於武裝干涉古巴以及對慕尼黑會議結果的估量，意見不同。在戰爭發生之後，我們對於西半球中立地帶以及建議中的對日哀的美教書，意見互殊。這個哀的美教書是羅斯福和邱吉爾在大西洋會議中所同意的，在起草的時候，韋爾斯是一個顧問。我覺得這個文告可能在那時候就會使對日戰爭發生，當時我們還沒有珍珠港事件發生時來得有準備。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我們對於在里約熱內盧會議上處理阿根廷問題的辦法，他的演說的性質以及戰後國際安全機構的組織，意見不相一致。

這種意見上的出入，有時是由於思想不同，有時是爲了對處理重大問題的更切實有效的方法，意見納鑿，至於韋爾斯常常不願意和我同心協力，不必說了。這種情形，在他服務國務院的後半時期中，特別尖銳，而對我們這輩協力工作的人，頗有妨礙。

在若干年中，我希望韋爾斯以儘可能最有效的方法監督國務院的行政工作，這是副國務卿的正常任務，因此可以讓國務卿以更多的時間用於政策的訂定方面。但是韋爾斯似乎爲其他的事情大爲分心，國務院中可以表示意見的人，都對於他處理行政工作的結果，深表失望。在史坦汀紐斯担任副國務卿之後，我就責成他把國務院的行政工作完全改組。總統本人也開始體驗到韋爾斯對我不忠誠的程度。他對於韋爾斯發表阿靈頓公墓演說特別不滿，訴說不止一次，因爲他事前和我們兩人中的任何一人都沒有商量過。他對我說他後來曾就這篇演說，向韋爾斯勸導一番。有一次他告訴我韋爾斯曾向他提出一個建議，要求派他去担任一樁規定的任務，至於這樁任務的性質如何，總統並沒有提起。羅斯福先生對於韋爾斯提出這項建議之前未曾和我商量過這一點，予以嚴峻批評。



斯爾韋卿務國副

# 老狗牌頭

舞 蘇 線  
襪 紗 襪

優美絕倫

各處  
有售

上海鴻興織造廠出品

發行所：南京路密城大樓三二一號  
電話：九〇一七二號



我可以到總統那裏去解決韋爾斯問題，堅主他在韋爾斯和我之間作一抉擇。但是我一向是習慣與人家合作，不習慣於反對人家的。國務院的工作現在非常龐雜，韋爾斯是一個奮力工作者，假如他能在忠誠的基礎上服務，我寧願加以利用，不願加以丟棄。

但在一九四三年初夏，總統自己發覺國務院這種情形不能再繼續下去。他自己決定一點，就是依現行各種情形觀之——詳情無需提出——國務院的效能可因韋爾斯的辭職而提高。他和我同意韋爾斯的解職應該使他好受一點，那就是由總統表示願意派他以旅行大使的資格，到南美或者蘇聯去擔任一樁特別任務。

當總統要求他辭職時，就向韋爾斯提出這個建議，向他指出他因此可以離開國務院而不致引起無謂的猜測。

對於這個建議，韋爾斯並沒有給總統一個肯定的答覆。在他和羅斯福先生談過之後，立即到我的辦公室來。他表示他的信念，以為總統這樣辦法是出諸我的意思。我告訴他全部事實，包括總統是經過他自己深思熟慮之後才這樣辦的這一點在內，不管他這樣做法是否由於我任何建議的結果。

於是我就敦促他接受總統派他擔任特別任務的建議，特別提到在莫斯科的一次會議。韋爾斯用一種堅定的語氣立即回答說，這樣去跑一趟不能有所收穫。他不久就立起來，到我的辦公桌旁，和我握手，於是就走了。從此以後，我就沒有和他講過話。

我不久就去參加魁貝克會議。韋爾斯到緬甸去。他並沒有接受擔任總統特別任務的建議，寫了辭呈，從緬甸郵寄到白宮。

## (三十一) 七二高齡第一次乘坐飛機

大約在魁貝克會議的時候（一九四三年八月），一部份蘇聯報紙突然提出一個觀念，就是說，美英蘇政府首長舉行會議雖因史達林專心致志於指揮東方的抗德大規模戰爭而不可能，但是外長會議很可以舉行，而且可以有效果的。

總統和邱吉爾同時着手研究這個建議，並且問史達林是否他對在最近將來舉行外長會議也認為適當。史達林在八月二十四日答覆他們兩人，說他表示贊同。他還說這個會議不應該屬於狹窄的試探性質的，而應該是一種實際準備，藉使三個政府獲致肯定的決定。他建議一點，就是準備討論的各項問題的範圍，應該事前決定。

總統和邱吉爾交換意見之後，於九月六日再打一個電報給史達林，其中他說邱吉爾和他對於舉行外長會議階段的政治軍事會議這個觀念，深表欣喜。雖然首相建議倫敦或者英國的其他城市作為會議地點，總統却說他以為一個較為遙遠的地方來得好些。他提出卡薩勃朗加或者突尼斯，甚或西西里。他說他希望派我去參加會議，但是他不希望我如此重途

啟涉，所以他將派副國務卿韋爾斯去。

兩天之後，史達林建議莫斯科爲會議地點，日期爲十月初，而於九月十一日總統表示同意。

那時候韋爾斯還在緬甸，並且據我接到的可靠消息，他正在寫許多信給在華盛頓的朋友，說他已成爲不良待遇的犧牲者。

在這一類事實積聚了相當數目之後，我就去見總統。我提醒他說他和我會同意派韋爾斯到莫斯科去，是使他脫離國務院而不致刺激大眾情緒的最好方法。韋爾斯認爲參與我們的計劃並不適當，而到緬甸去，並且在那裏寫信給許多人，顯然在努力把他自己描寫成一個烈士。我並且向總統提起韋爾斯在我向他提出派他到莫斯科去的計劃時所說的話，就是說這樣去跑一趟不能有所收穫。我說我現在要反對由國務院承認他這個地位了，除非他收還應該是出他負責的這種嚴酷批評，並且宣佈對國務院和政府表示忠誠。

韋爾斯一點也不做這種事情，而繼續在遙遠的地方對我和國務院作一般的批評。當和韋爾斯有密切關係的一兩家報紙繼續這種宣傳，聲稱我是蘇聯的敵人希望它的血液流盡時，我於是就到總統那裏去，並且說我竭力反對韋爾斯到莫斯科去。

我對總統說，會議無論在何處舉行——在這裏和重慶之間的任何地方——我將親自到那裏去。

總統對我願意自己去這一點，立即表示滿意，並且用力地說了二三遍。同時他也頗爲驚奇。他知道我身體並不好，我已不再年輕——當時我正在七十二歲的前夕——並且我是從來沒有趁過飛機的。

他不知道另一樁事實——我是多少受着一種疾病之苦，就是怕留在狹小氣悶的地方。幾年前一個很熱的晚上，當我乘着臥車開着窗經過一條長長的隧道時，我醒轉來，發覺顯然爲炭氣或其他氣體所窒息。自從那時候，我一直怕留在狹窄悶閉的地方。我對於飛機就有這種感覺，所以以前我從來沒有趁過。

但是我現在決定飛赴在莫斯科的外交約會，猶如一個軍官必須帶了他的部隊去作戰，不管願意或否。

我自己已作此決定，並未和我的醫生或者蘇爾夫人商量。

在我啓程赴莫斯科之前，我在十月四日和五日與總統舉行會議，復於六日和他同進午餐，傳就大致將在莫斯科提出的各種計劃，檢討一過。五日，我帶史丹汀紐斯·哈克希斯·鄧恩·麥秀烏斯和柏斯伏爾斯基到白宮去和總統作一次明白討論，當時李希海軍上將也出席參加。

我們同意在這次會議中我們應該作每一種努力，以謀獲致英蘇同意中國參加一個四強宣言（這是一個有關戰後各項協議的宣言，包括建立一個國際和平機構在內。蘇聯曾反對將中國包括在內——編輯人新聞服務社）。我們認爲四強這



個觀念應予保持，縱使在當時因此不能獲致協議，亦所不惜。無論在現在和將來，由於它對它自己和它對英屬印度的影響，中國是太重要的一個因素，不能與之疏遠。

至於德國，總統說他澈底贊成將該國分成三個或者三個以上的邦國，各自完全自主，但由一個郵政，交通，鐵路，關稅或者電力網相聯繫，雖然他認為電力系統的佈置應該以大陸為基礎。他還說新的德國邦國，應該被剝奪一切軍事活動，包括訓練和軍火工業在內。東普魯士應與德國分開，民衆中一切危險份子應該強迫加以遷出。

我們中間其他的人提出論據，認為分治會產生許多不良的效果，關稅聯盟的辦法或者會證明行不通，或者會成為使德國恢復統一的一種有力工具。總統加以考慮。他說我們有誇大這些影響的傾向。

他說他遊歷過德國，能夠講德國話，認為他認識德國比我們來得清楚。他堅持分治是解決的辦法。談話轉移到了其他題目上去，但在相當時間之後，總統突然回到德國問題上說，他對於德國的認識，已經是許多年以前的事情了，或許他知道德國並不如他想像的多。於是他說整個過渡時期將屬一個嘗試錯誤時期。我們可能會發現在戰後立即實行的分治辦法終將予以放棄。他認為賠償應從人力和配備中提取。

羅斯福先生說荷蘭或斯干的那維亞各國的恢復似不致成為問題，但是比利時却可能引起困難。他說李奧柏國王是做著德國的俘虜，地位曖昧，英國是支持他的，因為邱吉爾相信王室可以恢復，但是他可能對比利時流亡政府引起困難。縱使此點不論，比利時是一個人為的由兩個邦合併成功的國家，而燕薩斯和弗拉孟茲傳統上是一向不和的。關於這一點，總統提出了一九四〇年間一個德國人所作的研究，其中建議由亞爾薩斯，勞蘭，盧森堡以及比利時的兩部份組織聯邦。

至於波蘭和波羅的海各國，總統說當他遇見史達林的時候，他想從高尚的道德力量向他呼籲。他會對他說英國和我們都不會在波羅的海打蘇聯的，但是為了蘇聯自己的利益，鑒於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它應該說在戰爭後二三年左右願意在波羅的海各國舉行第二次公民投票，這對它是有好處的。他認為蘇聯雖則以為它在那裏舉行的公民投票已成定論，引為滿意，但是世界的其餘部份似乎並不這樣想。他以為同樣的觀念可以適用於波蘭東部，但是該國的新疆界，將來應該稍偏於所謂寇松綫之東，以稜堡（爾伏夫）給予波蘭，並在戰爭的震撼減低之後，應該舉行公民投票。

羅斯福先生覺得波羅的海走廊——基爾和海峽——都可以設立一個自由地帶，由國際管理，類似的地帶也可以為蘇聯在波斯灣設立。

十月七日在一個陽光普照的中午，我到華盛頓飛機場，趁一架飛機到莫斯科——這是我第一次踏上飛機。這是一架四引擎的運輸機，後面隨着兩架類似的飛機，其中大部份是陸海軍人員。

在我上飛機之後，梅葉司令指給我幾個緊急出口，預備在飛機「觸着」水面的時候使用，他是由海軍派來管理飛機上的氧氣的。我說飛機上有好幾個出口的事實，使我想起田納西地方一個養三隻貓的老年人的故事。一天，一個朋友去拜訪他，發覺在前門的底下有三個半圓形的洞。

他問道：「這些做什麼的？」

答覆是「讓我的貓出去。」

「但是為什麼一個還不夠它們用呢？」

這個老年人用力地反駁說，「因為當我說一聲『一齊出去』，我的確是要它們『一齊出去』的？」

我們第一步是到威斯德柏姆海岸。在喬治亞上空，飛機必須飛到一萬英尺高，而在八千英尺我就被戴上了氧氣面罩。年老的人對於高空飛行的反應是不會良好的，容易引起心臟病發作，但是我並不覺得不舒服。

翌晨，我們的第二步就到了布托里科的聖約恩。我們就在那裏趁了「孔雀」號巡洋艦經大西洋到北非去。

我們在卡薩勃朗加上岸。我們的國外服務官員墨飛來接我，他是北非處理政治事務的。我立即被送到飛機場去。飛機已經同時飛過了大西洋，於是我們再上飛機。

在我到阿爾傑爾這一段飛行中，墨飛是伴我們一起走的，並且就他對於北非和義大利局勢的一般印象，給我一個概括的敘述。在阿爾傑爾，我和艾森豪威爾進餐。他是特地從義大利趕來的，他的人格和信心給我的印象極深。戴高樂也來訪我。我們舉行了一次長久而相當坦白的談話，並未導致任何決定。戴高樂比我想像中更友好些，但是他極大的政治野心在我看來似乎躍躍欲出。

我們在夜間從阿爾傑爾飛赴開羅。我睡得相當好。翌晨，我啓程飛赴伊朗的德黑蘭。

英國外相艾登打電報給我，建議在到莫斯科去之前他和我先在開羅舉行初步會議。我回答說我們的蘇聯朋友一般地說來相當會疑心的，而會認為在開始和蘇聯討論之前，英美彷彿在形成一個共同政策。但是當我到德黑蘭的時候，艾登依他自己的時間表，也差不多同時抵達。我們就互相致意，隨便談了幾句，並未進入真正的討論。

在德黑蘭，兩個蘇聯飛行員上飛機來。我們的駐蘇新大使哈里曼也來參加我們，一直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在十月十八日一個寒冷的下午抵達莫斯科，當時夕陽正在西下。莫洛托夫和李維諾夫，以及我國戰時生產局長納爾遜和大批其他官員在機場歡迎我們。莫洛托夫和李維諾夫向我熱烈問候。於是我就驅車赴美國大使館。

## (三十二) 在克列姆林閣談種麥結筏

十月十八日晚上，三國外長在克列姆林宮會晤，具有每一種誠懇合作的徵象，而能切實行事。我們迅即同意幾點，例如：不發表演說，參與我們開會的顧問人選，會議地點以及應該發表的第一次公報。

當我回到大使館的時候，我看到一個從國務院發來的電報，講到邱吉爾先生於十月十二日發給總統的一個電訊，其中建議三國首長就處罰會犯暴行的德國人，發表一個聯合公報。電報中說總統希望我考慮這個證明的措詞，以便在莫斯科會議結束時發表。

其中還建議一點，就是除了不影響我們對已往的犯罪者可能採取的行動外，對於現在和將來的暴行應該特別提出警告。這一點，是在防止迫使德國的犯罪者趨於極端，而在無路可走的時候，處殺無辜的犧牲者。

在預定於十九日下午舉行的第一次正式會議之前，艾登和莫洛托夫都個別地到史柏沙大廈（美國大使館）來訪問我。

和艾登偕來的英大使寇爾爵士（後來他成爲英國駐華盛頓大使）提出了蘇聯方面的願望，就是希望討論軍事問題，特別是有關第二戰綫的問題。我表示我將說明美國的決心，此即執行戰爭直至結束並予它的盟國以充份援助。我們同意我們應該就我們的計劃，我們所以作此項決定的理由以及所獲得的結果，給予蘇聯充份的消息，並且接受它希望提出的任何建議，但是有一點應該表明，就是軍事談判不能在會議中進行。

我向莫洛托夫提出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蘇聯的檢查制度。美國的特派員不准發表有關美國代表團抵達莫斯科這種富有人情意味的消息。我問他有關會議一般情形而並不涉及官方工作的消息，是否不准發表。莫洛托夫高聲說檢查員「愚蠢」，並且說他將注意及此。

剛在我們去開會之前（十二月二十三日），莫洛托夫說他已與史達林討論過總統送來的有關德方暴行的建議中的宣言。史達林在稍作修改之後，已表示同意了。

在會議中討論到暴行的時候，蘇方採取堅強的立場。他們在德國人手中受苦極深，他們希望對應負集體屠殺蘇聯公民責任的德國官吏，作嚴厲迅速的法律制裁。

艾登辯護說一切法律形式都應該注意到。

當輪到我發表意見時，我就說：

「假如照我的辦法做，我將把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和東條和他們的主要共謀者拿來，並且帶他們到戰地臨時軍法會議，在翌日旭日初升的時候，一審歷史性的事情就將發生。」

當這幾句話被譯出的時候，莫洛托夫和他的全體代表團高聲歡呼，表示贊成，會議的平寧暫時被破壞。

我在莫斯科時，關於此一問題心中所想到的主要之點，就是對於因強有力的獨裁者以其征服與奴役全世界的計劃以及野蠻的方法造成之情形，全世界應以激烈方式對付。我覺得世界上這一類亡命之徒應該直截痛快地加以對付，猶如他們直截痛快地對付世界上的無辜人民一樣。

我假定當我們碰到了三個軸心國的首長和它們的魁首的時候，我們也可以獲得他們的秘密文件，假如我們依照國際法審判的形式，我們多少要處理一番。但是我不願這種步驟會妨礙我們迅速處置這輩匪魁。

我會向羅斯福總統提出這個見解，並且在邱吉爾首相和艾登訪問莫斯科的時候，也會向他們提出。我並且在內閣會議中提出了好幾次。我直率地說我認爲德日義這輩煽動戰爭者應該全部予以絞決。

在我任職國務院期間，我的觀念並未肯定地被拒絕。但在我辭去國務卿之職以後，變成贊成正式審判了。

但是我不願意被認爲是反對紐倫堡審判的。當後來決定這樣辦時，我衷心予以支持。我的意見，祇不過是關於不同的審判方式而已。

在我到莫斯科將近一星期之後，我對莫洛托夫說我不知道怎樣議定覲見史達林大元帥的步驟；我不知道必須等待多久或者我是否已經等待得太久了；但是假如我能够看見他的「上司」，無論如何我認爲是一種光榮。我把這樁事情讓莫洛托夫去辦理。

艾登到莫斯科不久之後就見過史達林，但是他爲了覲見事前就接洽好的。我並沒有接洽過。我的理論是我應該和莫洛托夫辦理事務，不要讓他以爲我想越過了他，和史達林去接觸。

莫洛托夫極快地通知我說，史達林將在十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時在克列姆林宮接見我。

我知道我們談話的主要題目之一，乃是關於羅斯福，史達林和邱吉爾建議中的會議。在我抵達莫斯科之前和之後，總統一直就會談的問題在和史達林互通電報。在原則上，已經是同意舉行會議了，但是關於會議的地點，却出現了不可克服的障礙。

在十月十四日的電報中，總統建議伊拉克克首都彼格達，或東非刻由英軍佔領的義屬伊里德里亞首都阿斯瑪拉，或者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史達林已經建議過德黑蘭。總統建議十一月二十日或二十五日爲會議日期。

十月十七日，史達林回答說，他不能接受總統所建議的任何地方以代替德黑蘭。他說這不是保護的問題，關於這一點他無所顧慮，而是在蘇軍當前的攻勢作戰中和他保持密切接觸的問題。他說他的同僚認爲這些作戰行動需要他和最高指揮部保持個人的接觸。在德黑蘭，這種接觸是可以保證的，因爲那裏有電報電話直通莫斯科。

總統於十月二十一日發給我一個長的電報，聲稱他在審慎估計時間因素以及他自己已在憲法上的責任之後，認爲德黑

蘭對他是不可能的。他的意思是說他不能到一個如此孤立的地方，致使他不能從國會接獲法案，並在十天之內送回。由於高山之故，德黑蘭是飛機難以接近的地方，在飛入或飛出之前，可能要等待好幾天。

總統說史達林在答覆總統的幾個電報中，對於羅斯福先生所受的約束並不表示理解。所以他要我的一個電文交給史達林，並且向他口頭說明他想不到德黑蘭去的肯定和明白的理由，這不是爲了個人的好惡而是爲憲法所規定的。

所以他建議伊拉克的巴斯拉以爲代替。史達林可以從德黑蘭通一根特別電話綫到巴斯拉，由蘇聯人管理，如此，他還是可以同莫斯科保持直接接觸的。

總統力言他願意從美國到離開蘇聯領土六百英里以內的任何地方。他必須保持一個業已成立一百五十年以上的憲政政府而恪守其規定。假如不是爲此，他願意跑十倍的路來會晤史達林。他結語說，假如爲了幾百英里路而使史達林，邱吉爾和他自己不能會晤，未來的子子孫孫將認爲是一幕悲劇。

十月二十五日下午，當我在克列姆林宮坐在一只土色的台子旁邊面對着史達林的時候，我就向他把所有各點加以說明。哈里曼大使與鮑倫（Charles E. Bohlen）和我在一起，而莫洛托夫和一位譯員則坐在史達林的兩側。

當我走進大元帥的大辦公室時，他從另一個門裏進來，在一半路的地方和我碰頭並且握手。他極誠摯而可親。他指引我到台子旁邊的我的座位去，於是坐在我的對面，背向着牆。

我們的談話以私人的閒談開始。我們就如何種麥的問題交換意見。我告訴史達林在田納西麥要種得六英寸深，這對他似乎是新奇的。我們討論造木筏的方法。我描述在田納西地方我們怎樣用胡桃藤把木頭連結起來。史達林則描述他的人民怎樣用葡萄藤結筏。

我告訴史達林我到莫斯科來的欣喜情緒，多年來希望訪問他的國家這個願望，終得如願以償。

我說在我的一生中曾出席過許多國際會議，但是在所有的國際會議中，我沒有受到過更周到的招待，像我們從我們的主人蘇聯政府，尤其是莫洛托夫那裏受到的。史達林回答說他想不到會有這樣的批評。

我指出現行會議的最重要任務之一，就是要爲他自己，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的會晤，奠定一個基礎，對於這次會晤，所有我國人民，事實上世界上所有人民，凡從事反抗納粹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的戰鬥的，都表示最大的興趣。於是我把總統有關會晤地點的這個電報，面呈給史達林。

史達林在讀過俄文的譯文之後，就把它交給莫洛托夫，聲言必須加以考慮，並且和他的同僚商量。莫洛托夫外長在閱覽之後說，重要的軍事行動當時正在進行之中，蘇聯政府的所有高級軍政當局都一致認爲史達林絕對不能離開，但是在不得不如此時，至多也祇能到每天可以維持直接通訊的地方。

於是史達林就建議最好把會晤延期到下一年的春季，那時候，阿拉斯的凡朋克斯將是一個適當的所在。

我說總統和我都深深地感到國際的局勢需要這一次會議，如不能及時舉行，將在所有的盟國人民中引起深刻的失望，因為它的影響，將能團結我們三個國家，加緊合作，以謀執行戰爭，並在戰後時間實行合作。

史達林插進來說，他在原則上並不反對這次會晤。

我回答說，我理解他正在想的，僅僅是關於我們正在討論的切實辦法。

他力言在他這方面並無固執已見或者成信的問題，但是他不能理解為什麼國家的文書就擱一兩天應該如此被重視，而軍事行動上的偶一失着却不是一個文法的錯誤過後可以校正的，而須付出千萬人生命的代價。在他這方面講，在巴拉會晤的困難，完全是關於物質的佈置方面的，特別是通訊方面。

史達林說，他對於保護的問題，一些也沒有什麼顧慮。他提出這一點，是在哈里曼大使提出三國首長可以居住在巴斯拉山後自己的營帳中，由自己的軍隊保衛，因此可以保證完全的隔離和保護之後。

在我們的談話繼續一小時——實際上是半小時，因為需要翻譯的時間——由於會議的時刻已近，我就對史達林說，因為我是莫洛托夫的學生，現在該是上課堂去的時間了。大元帥對我微笑，希望我們有好的運氣。

當討論結束之後，他立起身，繞過台子，和我握手，並且說了些用俄文說的話。他的譯員還坐在台子上結束他的摘記，史達林的說話於是消失在稀薄的空氣之中。大元帥回過頭來對齊譯員，並且很銳利地對他說，一個譯員的責任就是一直要在他的旁邊（鮑命後來這樣告訴我）。繼而我得知史達林對於能夠看到我，曾表示極大的欣喜。

### (三十三) 請為盟軍在柏林會師乾杯

在會晤史達林之後，繼即舉行會議，在會議的休息時間，我硬和莫洛托夫談話，並且重申我會向史達林提出的有關三國首長在巴斯拉會晤的論據。莫洛托夫問在我所說的國際合作的計劃中，什麼應該在現在加以解決的。我把許多建議重新向他說了一遍，這些建議，自從我到莫斯科已經向他說過不止一次了。

莫洛托夫說，關於這些計劃，應該獲得一個協議。在想了一想之後，他突然說：

「孤立幾乎已經是貴國丟棄的東西，是不是，國務卿先生？」

我回答說，「是，的確如此。而且孤立幾乎已經是貴國丟棄的東西，是不是，部長先生？」

莫洛托夫微笑，並且承認的確如此。

我說，「在戰爭之後，假如你希望的話，你能够遵循孤立主義，並且吞取你的鄰人。但是你將丟棄這種辦法。當我

年輕的時候，我知道田納西的一個暴漢。他時常以暴漢的身份去強硬對付別人，獲得一些東西，但是結果在世界上竟沒有一個朋友。」

十月二十八日，總統通知我他預料不久將前往北非，勢須於十一月九日離開華盛頓。（這是爲了出席在開羅舉行的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會議）。他說他希望我保持我原來的計劃，就是在十一月七日返抵本國，因爲在他離開之前，他和我務必談過一番。

他建議說，假如史達林認爲無法和他會晤，大元帥至少應該飛到巴斯拉這樣遠的地方一天。這是極端重要的。在其餘的時間，總統希望史達林能夠讓莫洛托夫來出席，同邱吉爾和他舉行會議。

翌日，我答覆總統說，我留在莫斯科的時間較預料者爲長，並且樂於在大西洋的東岸和他會晤。我說史達林大致不會到比德黑蘭更遠的地方，這種徵象，愈來愈顯著，並且我懷疑莫洛托夫是否會被派代替出席，因爲他並不是軍人。

兩天之後，我被迫打電報給總統說，在赴莫斯科途中，我們一批人中已有四人患惡性瘧疾，不能回來，所以我認爲不宜到北非來等他，把自己暴露於瘧疾、痢疾以及類似的疾病之前，因爲我並沒有受免疫注射。總統同意轉緩行期，而在美國和我會晤。於是我再打電報說，我將經南太平洋飛返美國，不趁巡洋艦。

克列姆林宮的凱塞林女皇廳，是會議的最後一天——十月三十日夜——史達林大元帥設宴招待代表團的場所。這是我出席會議以來第一次的社交工作。

在一到莫斯科之後，我就對莫洛托夫說，鑒於我的健康情形，我不能對社交活動和工作同時顧及。起初，他似乎並不相信我，不斷邀請我去觀劇和出席宴會。當我堅決表示拒絕之後，他似乎頗爲感動。後來有人告訴我，這一點使他相信我目的之認真，因爲在我健康情形並不良好的情形之下，依然長途跋涉到莫斯科來，以謀有助於奠定較好的戰後世界的基礎。

我坐在史達林的右邊。這使我在進餐和餘興的一段長時間中，獲得和他談話的極好機會。我儘量利用它，以謀討論我們目前和將來的關係，深知這一次是我離開莫斯科前最後一個機會了。我多少用一種兜圈子的方法，逗引他發表意見。

史達林的心境極好。不管討論什麼題目，他似乎面面顧到，設法使我更明瞭他的目前的以及未來的立場。在開始談話時，他說，「你獲得了一次成功的會議」。我立即回答說一切應歸功於他，並且說他已核准他的偉大國家採取決定性的步驟，會同英國和美國來參加一個建立在合作基礎上的世界計劃。這一點似乎使他頗爲欣喜。在整個談話中，他表示無條件贊成廣泛的國際合作，軍事，政治和經濟都在其內，以謀和平。

我於是用儘量有力的方法，向史達林提出各點，說明需要他參與總統和首相之間個人的合作與領導。但是對於在巴斯拉和他們會晤這一點，他却肯定地說出了他的結論，就是說他目前不能離開他緊張的軍事局勢。他說我們應該相信他對於這一點是很誠懇的。

於是他說他可以派莫洛托夫代替他，因為在蘇聯的法律之下，他在政府中實在是第二位人物，在他自己缺席的時候，可以代替他的位置。他問我對於這個觀念，意見如何。

我立即回答說，當然，假如他覺得絕對不能去，那麼莫洛托夫是一個很好的代表。但是在總統和我自己的思想中，主要的一點就是：假如史達林自己能够去，對於全世界將有深遠的心理影響。我說假如可能的話，我還是懇請他自己去。

對於這一點我沒有獲得什麼結果。他的結論似乎是決定的。我猜想他已經和他的顧問談論過，他們覺得軍事局勢，或者質議的需要，尚沒有到可以讓他離開的時光。我決定不再就此點催迫他，因為這樣做法非惟無益，反足以損害我們的目的。

可是繼而，他却發表了一個絕頂重要的聲明。他清楚而毫不含糊地說，當盟國擊敗德國之時，蘇聯將參與擊潰日本，這使我驚喜非常。

史達林提出這個題目，完全是出於自己的意思，雖然他腦筋中可能記得我會和李維諾夫大使就此一題目所作的談話。他最後說我可以把這一點極秘密地通知羅斯福總統。我衷心向他表示感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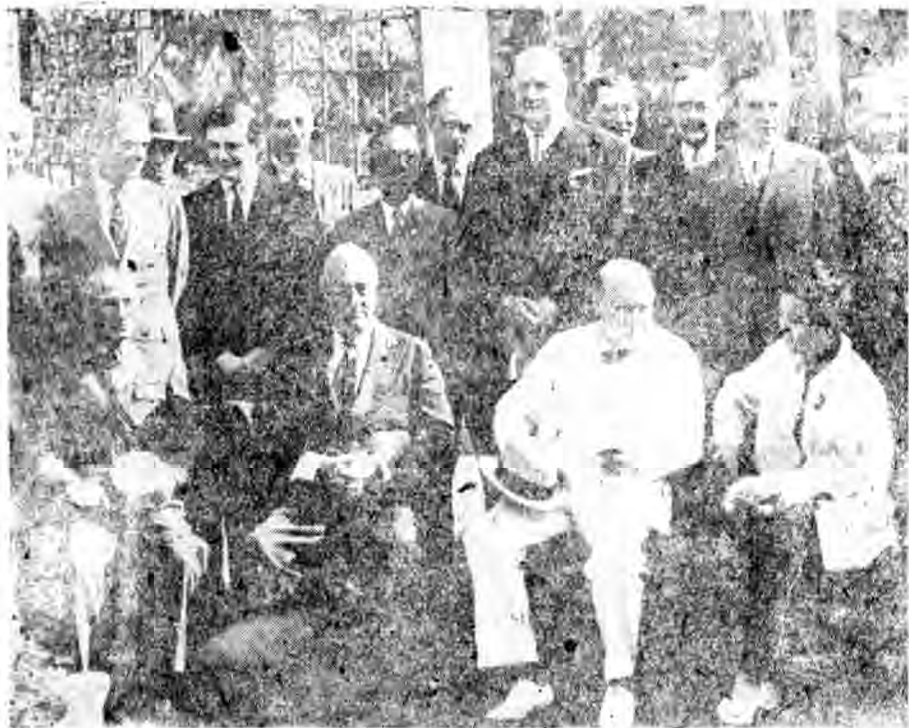
大元帥說明他的決心，是很爽直的。他說得很有力，完全不是出諸人家的懇求，並且他並不要求任何答謝。

在一九四三年的雅爾達會議中，史達林用書面方式向總統提供同樣的諾言，但是當時乃是總統同意在歐洲方面對蘇聯作許多領土讓步之後，包括千島列島和庫頁島的一部份在內。我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已經辭職，所以不知道什麼局勢上的改變可能使這些讓步成爲必要——但是當史達林向我提供諾言要我向總統轉達的時候，是一點也不拖泥帶水的。

在進餐的時候，會屢屢舉觴致意。史達林和我飲的是紅酒，而許多客人則喜歡飲伏特加酒。我們駐莫斯科軍事參贊堤恩少將爲大眾所注目。當他答謝史達林爲美國武裝部隊而乾杯時，他建議爲英美軍隊和蘇聯軍隊在柏林會師之日乾杯。史達林從我旁邊的椅子中立起來，繞過桌子去和他碰杯，這是唯有堤恩一人所獲的殊榮。

當我們離開餐桌的時候，在到另一個房間中去看電影之前，史達林領我和其他二三個人到隔壁一個房間中去幾分鐘。他開始自發地用最諷刺的口吻，講到以前所流傳的有關蘇聯和德國可能單獨媾和的傳說。我說凡是瞭解蘇聯人民以及在這一次戰爭中他們對德國的關係的，都知道他們不會和德國單獨媾和。對於這一點，他衷心加以首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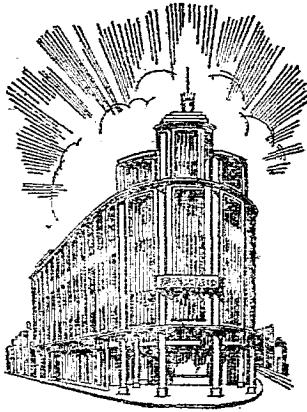




。人夫蔣，相首爾吉邱，統總爾斯羅，席主蔣，右至左自：議會羅閣

# 中法藥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趙棣華  
 總經理 許曉初  
 廠長 周夢白  
 副廠長 沈濟川  
 主任藥師 吳冠民



上海總店

## 總管理處

上海北京東路八五一號，自建鋼骨水泥大廈，電話九二三三一……三號轉接各部，電報掛號五六七三。

## 總製造廠

上海中正西路一七九〇號，佔地二十餘畝，設備完美，規模宏大，技術人員均為國內外著名大學畢業，經論證書。

## 分店分廠

本埠設有分店五處，聯號一處，國內外各大埠均設有分支店及辦事處，在重慶設有分廠一所，西南區分公司一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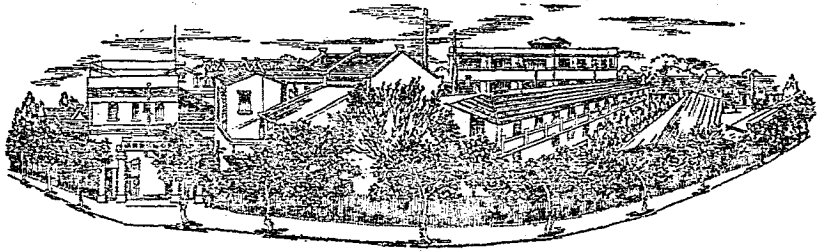
## 著名出品

賜爾神多延年益壽粉，艾羅補腦汁，艾羅療肺糖，羅威健身素，九一四藥膏，奇藥伏，胃養，果糖，滅痛，藥藥淨，肅疥，羅爾水東鹽，羅爾沙而，及百吉牌各種藥用針藥化學合成藥劑，嬰孩兒面，雙牌花露水等藥品化妝品不下五百餘種，創立於前清光緒十六年，迄今已閱五十餘載，歷史悠久，信用卓著，居全國新藥業之領導地位。

## 創設簡史

## 聯繫事業

中法化學製藥廠，中華製藥公司，申法油脂製造廠，申法血清菌苗廠，及中法化工實驗所，中法生物研究所等。



上海總廠

我們的主人於是領我們去看電影，其中描寫在一九一八年革命期間紅軍游擊隊爲反抗背信的日本人而在西比利亞進行的艱苦戰鬥。這張影片是在一九三八年攝製的，當它在莫斯科公開放映時，曾引起日本大使的強硬抗議。現在對於選擇這張影片的目的，並無加以隱蔽的嘗試，而在史達林剛對我講過蘇聯將參與對日戰爭之後放映，尤其雙重的意味。

電影之後再來一個音樂會，我一直到完了才離開，時間已是早晨二時左右——雖然我們已定於清晨五時起飛返國了。這次音樂會，是由最有名的蘇聯音樂家演奏的，史達林對於我自始至終留在那裏，似乎頗爲欣喜。

當我們告別的時候，我從史達林那裏得到一個深刻的印象。在說了一番通常的告別的說話之後，他和我握手並且用俄文說了一聲「再會」。於是他從我那裏定開了三四步之後，突然回過頭奪走回來，和我第二次握手，時間相當長，但並沒有說一句話。我自己心裏想，任何一個美國人能有史達林的人格和待人接物的方法，在我自己的國家中，也很可以達到很高的職位。

在我回到大使館之後，我發給總統兩個電報。我對於史達林告訴我的有關日本的決心，認爲是如此機密，所以我一半用海軍密碼發給總統，另一半用陸軍密碼發給總統。因爲我相信英國外交部有時候更容易透露出重要消息，比我認爲是應該的，我就讓總統自己去把這個消息傳達給邱吉爾。

關於計劃中的羅斯邱會議，我通知總統說，史達林在言行上顯然是百分之一百贊成國際間在每一方面合作的這種新動向，這種合作在四國宣言中已予以表明，但是同時，他對於在德黑蘭之外和總統與首相會晤一點，目下不願退讓。由於總統與史達林之間的僵局繼續存在之故，我意思中想使羅斯福先生的思想更贊成一點德黑蘭，因爲我相信史達林是不會到巴斯拉去的。在經過相當考慮之後，總統表示同意了。

當我乘坐飛機返國之際，我深深覺得在莫斯科已獲得重大的成就。我們已經同意成立一個國際機構，這在後來就成爲聯合國。蘇聯同意成爲該機構的一員，並與西方國家在其他許多方面密切合作。我們在對義大利和對奧地利的政策方面，獲得了協議。我們已經成立了歐洲顧問委員會和義大利顧問委員會。我們已經就戰後處置德國的辦法，對法國的態度以及戰後應遵循的經濟政策，交換了許多意見。此外，在會議之外，史達林還同意一點，就是一俟希特勒被擊潰，蘇聯將參加對日戰爭。

再者，蘇聯在目前對於解決戰後疆界問題，從來沒有提起過一次，而這個問題，在上一年曾頗使我們困惑的。

我們經德黑蘭，開羅，阿爾傑爾，馬拉克希，達加，福泰萊萊（巴西）和布托里科飛返本國，沿途並無意外。當我們接近巴西的時候，我們碰到了一個熱帶氣流，經過了二小時極難堪的飛行，致使我們中間若干人頗爲狼狽，但是對我似乎並無影響。在各處停留下來的時候我總和總統交換電報，並且很高興地獲悉他已決定和史達林在德黑蘭會晤了。

當我們在十一月十日抵達華盛頓機場的時候，總統在那裏歡迎我們。同他在一起的，還有一個國會代表團。在我們赴白宮途中以及在翌晨的談話中，我向總統敘述莫斯科會議的要事。他對於討論即將舉行的開羅和德黑蘭會議，更發生興趣。他彷彿用一個小孩子的熱情，期待着和史達林會晤，並且特別懇切地要我說出對於大元帥的個人印象。幾小時之後，總統就啓程赴這兩個歷史性的會議了。

### (三十四) 「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辦法

當蘇聯軍隊於一九四四年四月間開始進入羅馬尼亞的時候，蘇聯和巴爾幹各國的關係，開始在我們的外交上佔據顯要的地位。

許多國家的報紙中紛紛猜測，就是蘇聯的目的究竟是解放還是擾有。一九四四年五月三十日，英大使哈里法克斯突然問我，假如英國和蘇聯擬定一種辦法，使蘇聯在羅馬尼亞可以有控制勢力，而英國則在希臘可以有控制勢力，我國的感覺將屬如何。

我把他政府的一個書面文件交給我，其中詢問假如英國和蘇聯成立協議，因而在大體上羅馬尼亞的事務將由蘇聯政府照管，希臘的事務將由聯合王國照管，我們是否有所反對。英蘇這種諒解，祇適用於戰爭的情形之下，並不影響三大國中任何一國在和平解決時必須運用的權利和責任。

英國外交部說，聯合王國政府深知將巴爾幹各國劃成勢力範圍一點，應該予以避免，縱使是這樣印象，也應該予以防止。

在我告訴哈里法克斯說我對於這一點，將予以慎重考慮之後，就直率地說道：

驟觀之，聽於首先是一個政府繼而是另一個政府互相指責干涉巴爾幹各國和歐洲其他國家經濟，政治，軍事和其他內政事務，而這種責難在將來也一定會不斷發生，所以放棄我們廣泛基本宣言中的政策，原則，和辦法，是殊可疑慮的。假如在一兩重要方面異離了原來的主張，猶如你所建議的，那麼與此一行動有關的兩個國家中的任何一個，就將沒有先例或者任何固定的規則可循，或者堅持別國政府必須遵循的先例或者規則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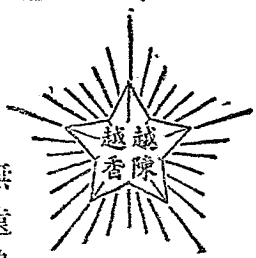
事實上，我是直率反對歐洲任何部份劃分為勢力範圍的。我在莫斯科會議中曾力予反對，在我看來，任何勢力地帶的成立，勢必播下將來衝突的種子。我覺得勢力地帶勢必剝削國際安全機構的最高權力，而這個機構，我是預料它會產生的。

用均勢或勢力範圍來維持和平觀念，我已往既不相信，現在也不相信。



• 相首爾吉邱，統總彌斯羅，帥元大林達史，右至左自：議會倫黑德

明星花露水



無遠弗銷  
到處可買

明星香水



明星香水皂  
用到底  
香到底

上海明星香水廠出品

總發行所

福州路三三號

電話九六五三三

翌日，五月三十一日，邱吉爾曾相直接打電報給總統，力主我們應贊成建議中的協定。哈里法克斯無疑已把我的意見用電報通知他。他申言英國並不想把巴爾幹各國劃成勢力地區，這種辦法，僅適用於戰時情形，而美國和英國政府已訂定和實施盟國對希臘和羅馬尼亞的政策方面，將繼續現行合作，並無變更。

他的電報多提供兩項消息，其一是這個協定是由英國政府的蘇聯駐倫敦大使哥塞夫提出的。其二是蘇方於五月十八日通知英方，說明他們是同意這個建議的，但在他們能夠給予最後的保證之前，希望知道是否已曾和美國政府商量過，以及我們是否同意這個辦法。

羅斯福把電報送給我考慮，並且要我起草一個答覆。

國務院中的同事，對於我原來對哈里法克斯所取的态度，表示同意，那就是說我們不能支持諸如此類的協定，事實上，我們應該儘量加以抑制。

當這個答覆正在國務院中準備之際，另一個電報又於六月八日從首相那裏來了。他重新說明此中並無勢力範圍的問題牽涉在內。但是他又說，雖然我們必須一起行動，可是總要有人動手。在他看來，蘇聯人似乎應該去處理羅馬尼亞人和保加利亞人，英國似乎應該處理希臘人，因為希臘是在英國的作戰範圍之內，是英國的舊盟邦，爲了希臘，英國並曾一九四一年犧牲過四萬人。他還說這對於南斯拉夫，也是準確的。

邱吉爾先生表示意見說，他一直設法把各種情形不斷通知總統，但是英國是在處理希臘的事務，必須極審慎地行動，藉使蘇聯可表同意。他指出巴爾幹方面的事態，是在極快地演進中。

他說英國在南美洲方面總是儘量追隨美國的領導的，祇要不牽涉到她自己自己的飯食問題就可以了。至於有關於自己的切身問題，那麼爲了一子女一關係，當然是要採取堅強的立場的。

這個電報有一點頗關重要，因爲其中提出了英方至今未曾提出過的兩個國家——就是保加利亞由蘇聯處理，南斯拉夫由英國處理。所以反對這種辦法，現在似乎比以前任何時間來得更迫切了，因爲如此做去，將使一批國家置於蘇聯之下，另一批國家置於英國之下。

六月十日，總統把我們的答覆送給首相。總統在答覆中承認在任何國家中負責軍事行動的政府——英國在軍事上對希臘負責，蘇聯對羅馬尼亞負責——爲了軍事發展上的需要，有時不得有所決定。但是我們相信，由於英方所建議的協定，將使這種決定擴充到政治經濟領域去的自然傾向，勢將予以加強。總統表示意見說，這種傾向一定會引起英蘇之間不斷發生異見並使巴爾幹各國劃分爲勢力範圍，雖然邱吉爾說這個協定是限於軍事方面的。

總統最後說，我們希望認爲巴爾幹設立一個諮詢機構來消除誤解，並且防止各自爲政的勢力地帶，不斷發展。

首相於翌日——六月十一日——發來一個强有力的覆電，隱稱總統的電文使他非常擔心。他說，假如在採取行動之前每一個人必須和另外的每一個人商量，行動將被廢棄了。巴爾幹方面事態的發展，常常比一般局勢的變化來得更迫切。

邱吉爾先生提出了兩個例證，當時他所採取的直接行動解決了局勢——那就是希臘軍隊在伊斯坦堡的叛變以及在埃及境內可能發生的困難。假如英國必須和其他國家商量，三四個國家必須互相通電，結果可能造成混亂和陷於無法處理了。

他表示意見說，在希臘危機中，總統給他的電報會發生驚人的效果。他和總統的意見完全一致，結果完全滿意。他詢問爲什麼這一切有效的指導應該分散給一個委員會中的低能的官吏，這一類官吏刻正分散在世界各地。他還詢問爲什麼他和總統不能把這種指導掌握在他們自己的手中，因爲他們對於一切的認識是比較親切得多。

首相最後建議將他所提出的辦法試辦三個月，之後，再由三強加以檢討。

當這個電報到達之時，我正在賓雪佛尼亞州的漢希休息幾天。總統並未和我或者國務院商量，在次日加以答覆，接受了首相所提試辦三個月的建議，但是說明一切必須謹慎從事，俾能明白表示並不是在建立戰後的勢力範圍。

總統並沒有把此一行動通知國務院。

我就在那時候回到了華盛頓。在我回來的那天——六月十二日，因爲不知道總統致首相的電報，我們把總統先前所核准的一個備忘錄送給英國大使館，其中我們列舉了反對建議中的英蘇協定的證據。

六月十七日，我還是不知道總統於六月十二日致首相的電報，於是就寫給首相一封信，其中指出邱吉爾先生把他的建議，公開地適用於整個巴爾幹區，因爲除了羅馬尼亞和希臘之外，還提出了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並指出他提出了我們在南美洲的地位作爲一種比喻。

我說，「邱吉爾先生雖就英國的立場再度予以說明，但是並不能克服我們的反對，或者似乎使我們對這個危險的建議，改變見解。」

我並就我認爲是「該一事件的極令人困惑方面」，促使其注意——那就是英方並沒有和我們討論此一性質的建議，直至向蘇方提出而在後者詢問事前曾否和我們商量之後。

英國外交部曾說明整個建議是發生於文登向哥塞夫大使偶然的一句說話，而邱吉爾先生在五月三十一日這個坦白的電報中却明白說明英國曾向蘇聯大使表示英蘇對於羅馬尼亞和希臘，應該自己鑄致協議。我說，「首相的電報，顯示我國政府將面臨英蘇之間一個業已成立的勢力範圍的協定，假如蘇方一下子就表示同意而並不提出我國立場問題的話。」

六月二十八日，我國駐希大使麥吉維（Lincoln MacVeigh）發來的一個電報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駐希大使館當時設在開羅），其中告訴我們說，他的英國同事曾經通知他一點，就是美國政府已經同意這個建議，准規定在三個月之後



應再予檢討。這是我們對於總統六月十二日的決定所獲的第一個暗示。

我寫了一封信給總統，於次日送給他，其中附有麥克維大使的電報內容，並且問他我們的立場是否已經有所改變。總統在六月三十日作覆，其中祇附了他和邱吉爾先生所交換的電訊中的幾節或摘要。

其中包括由國務院起草而由我於六月十七日送給總統準備送給邱吉爾先生的電報。這個電報是由總統於六月二十二日發給首相的，其中他說他對於巴爾幹的局勢稍爲有些擔心，國務院也是如此。他說英國僅在向蘇方提出此項建議而於後者詢問我們是否贊同之後，方始向我們提出此一問題，此點的確使我們感到相當困惑的。他說今後他希望能夠防止如此重要的事情循這種路綫發展。

首相於翌日——六月二十三日——答覆說，他不承認他做錯了什麼事情。他指出三國人民分散在世界的不同部份，假如一國人民向另一國人民提出任何建議必須通知第三方面的話，就無法一起有效工作。他舉出了一個例子，就是總統就他和波蘭總理米柯拉傑克所作的談話，發給D.J.一個電報，事前並未通知邱吉爾。（總統和首相有時用Uncle Joe的縮寫D.J.來指史達林的。）

羅斯福先生就此點於六月二十六日提出答覆說，在他看來，他們大家都在無意中採取了單獨的行動，而現在他們都同意這是出於當時緊急的需要。他力言他們對於有關盟國作戰努力的各項問題，應該一直保持一致。他於是把就他和米柯拉傑克的談話發給史達林的電報的一個複本，送給邱吉爾先生。

以後的事態，充份地證實了我們對英蘇這種辦法所存的恐懼心理，後者在總統認可之下，已經發生效力。當邱吉爾首相和艾登於一九四四年十月赴莫斯科去會晤史達林和莫洛托夫的時候，他們把這種辦法更推進了一步，甚至規定了英蘇在巴爾幹各國中所佔勢力的百分率。從我國駐莫斯科和安卡拉大使館來的電報，提起蘇聯在保加利亞，匈牙利和羅馬尼亞佔有七十五比二十五或者八十比二十的優勢，而英蘇在南斯拉夫則將以五十比五十平分秋色。後來蘇聯人信以爲根據一九四四年六月的協定英美已把巴爾幹的一部份，包括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在內，作爲他們的勢力範圍。這個假定，在一九四五年二月間的雅爾達會議中，曾產生不良的影響。

### (三十五) 「聯合國」的名稱從此誕生

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我幾乎立即開始考慮反抗希特勒和日本各國，究竟應該採取什麼方式團結起來。到現在爲止，把和我們一起參加反抗軸心的拉丁美洲共和國包括在內，反抗軸心國家排算起來已近三十國之多了。

我對於盟國團結的第一個觀念，是以有關西半球事務的里瑪和哈伐那會議爲根據的。這就是說，當危險發展開來的

時候，聯合的抵抗必須組織起來。在我的思想中，我想把這種政策擴充到全世界去，因為自從蒙古維多會議以來，我常常在講我們的泛美政策是可以適用到全世界去的。

我要求我的同事從一九三八年起追溯我們對拉丁美洲的關係，檢討總統戴反軸心各國間團結問題所說過的話，以及審查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所採取的各項步驟，包括統一指揮和軍事聯盟在內。

於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星期六，我就要求遠東事務司司長漢密爾登（Maxwell M. Hamilton）起草一個由反抗軸心各國發表的宣言，這將使它們團結一致，直到勝利，並且應該恪守我們所維護的基本原則。翌晨，星期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之後剛剛一星期，我和我一輩同事會晤，討論這一個宣言以及另一個有關成立最高軍事會議的宣言。

漢密爾頓為這個盟國宣言起草了兩份草稿，以待採用。這兩個草稿祇有一點不同，就是一個是把所有盟國都包括在內的，另一個是把宣言分開為兩個，第一個是由所有盟國簽字，惟蘇聯不在其內，因為它並不在對日作戰，第二個是蘇聯也簽字的。我們很快地決定把第二個草稿放棄，因為我們相信把蘇聯包括在其他盟國一起，要更有效力得多。在更進一步交換意見之後，我就請助理國務卿貝爾，經濟顧問范斯和漢密爾頓到另一個房間去，把建議中的修正包括入草稿之內，並且帶回到會議的地方來。他們就去照辦，而在半小時之內回來。

我們現在同意了後來變成聯合國宣言的要點。序文中首先重申羅斯福總統和邱吉爾首相在大西洋憲章中所同意的原則，繼即說明反抗軸心各國「深信它們在全世界的完全勝利，對於保衛和保存生命，自由和獨立以及保存人類自由和正義是必要的，不但是他們自己的國家中是如此，而在其他每一個地方都是一樣；它們現在從事的鬥爭，乃是反抗野蠻擴張暴力的共同保衛戰，因為這種勢力正圖征服世界。」

其下是協定的要點，共計三點。每一個政府必須保證：第一，「運用其全部資源反抗會簽字於一九四〇年九月二十七日德日義三國協定的一個政府或幾個政府，對於這些政府它是正在作戰或者可能要作戰的，並且要繼續如此運用其力量，直到這個政府或者這些政府最後已被擊潰。」

第二，「與其他國家在各方面儘量合作，在軍事努力和資源的運用上充份協調，以反抗共同敵人或者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

第三，「對共同敵人或者他們中間的任何一個決不停止作戰或者簽訂單獨停戰協定，除非是經由共同協議的。」

這裏，我覺得我們正從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立場向前走上兩大有益的步驟。第一，我們設法使所有和軸心作戰的國家聯合一起，接受在大西洋憲章中業已證明的若干原則。這些就是各國人民有選擇他們自己政府形式的權利；沒有擴

張；沒有爲有關人民所反對的領土變更；貿易和廢除原料的傾利；改善勞工標準，經濟進步和社會安全；國際安全；海上的自由；和解除軍備。

我國政府在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並不會努力使協約國受任何戰爭目標的約束。各種秘密協定早已由協約國政府所同意，根據這種協定，在戰爭獲勝之後可以作領土的變更。結果，威爾遜政府因爲未曾設法使協約國就戰爭目標達成共同協定而受嚴厲批評。就爲了沒有這種協定存在之故，他在和會中所遭遇的問題因此大爲複雜。

這一次，我覺得盟國應該事前約定若干原則，讓疆界調整的詳細辦法以及其他類似問題留待以後解決。假如這些原則能堅決加以闡明並予以恪守，那麼到解決細則的時候，就容易變得解決辦法的。

當然我們必須知道現在在盟國之間是否又有什麼秘密協定存在。當我們向它們提出這個問題的時候，它們保證我們並沒有這類協定。

第二，這一次我們願意和反抗軸心的其他國家充份聯繫。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們自認爲和自稱爲「參與國家」，不是協約國。現在我們準備的宣言是屬於聯盟性質的，其中包括一般的軍事聯盟的兩個要點，就是保證在進行反抗共同敵人的戰爭中充份支持和合作，並且保證不停止反抗共同敵人的戰爭，除非是互相同意的。

從十二月十五日到十二月十九日，我的同事和我費了相當時間去修飾這個文件的草稿，這個文件後來就成爲聯合國宣言。我們並且討論另一個文件，以謀成立一個最高軍事會議，由聯合王國，美國，中國和蘇聯政府的首長或代表組成。

邱吉爾首相到華盛頓來了。在其後幾天中，總統和首相檢討建議中的聯合宣言的內容以及成立最高軍事會議的建議。邱吉爾首相或者哈里法克斯大使把它們通知倫敦，請戰時內閣表示意見。

十二月二十七日，總統送給我對於這兩個文稿的書面意見。邱吉爾已經接到戰時內閣對聯合宣言的建議，總統說他已把它們考慮在內了。

他說，「我以爲應該作一切努力把宗教自由包括在這個文件之內。我相信可以導使（蘇聯大使）李維諾夫同意此點的。」

他以為保證繼續反抗軸心戰爭的字句，對於蘇聯人是難接受的。這是因爲他們並不在和日本作戰。他建議在字句方面稍爲改變一下，藉使這種保證適用於反抗正在實行征服的軸心武力，而和這種武力，簽字國是正在作戰的。

總統說他正在設想一種方法，使聯合宣言和最高軍事會議分爲兩個不同文件這一點，成爲無此需要。

他建議在聯合宣言開頭一節中所提出的各國名單，應該列舉和軸心作戰的全體國家，包括拉丁美洲共和國在內。他

說，「在宣言中把小國儘量列入，在我看來顯然是有好處的。」

總統認為中國和蘇聯應該從按照字母的排列法中提出來，和美國與英國置於名單之首。他表示意見說，「我有一種感覺，就是把蘇聯的名字放在若干在實際上貢獻較少的國家之後，蘇聯是不會高興的。」

他總結說，「我切盼對於宣言的文字應該予以最審慎的考慮，特別是有關我們作戰的真正目的的這一部份，因為它是要補充大西洋聲明的。」

「一俟你和哈里法克斯對聯合宣言意見接近之後，我以為你，哈里法克斯，首相和我應該迅速舉行一次會議。」其後，總統就在那天晚上六點鐘在白宮召集了一次會議，由這四個人參加。

在會議期間，總統和邱吉爾先生對於設立最高軍事會議的問題顯然還沒有獲致協議。大部份的討論都集中於這個題目。所以我們就同意採用聯合宣言的新草案，單獨成爲一個文件，將最高軍事會議的草案，留待繼續討論。

在會議之後，總統就請蘇聯大使李維諾夫進來，交給他一份稿本，請他立即轉呈政府表示意見。

兩天之後，李維諾夫到我的辦公室來，帶來了他政府所提的三項修正。

總統同意把蘇聯的修正容納在內。於是我就送給他一個新草案，後者他于十二月三十日送回我，在邊沿上寫了幾句話：

「CH·OK·現在蘇聯和WSC（邱吉爾）是核准了，中國還沒有核准。FDR·讓它在一月一日出來。意思就是要迅速。FDR。」

我們，立即把聯合國宣言向各國中各國政府發出。按照總統的要求，我請有關各國政府立即表示響應，以便這個文件可以一月一日公佈。我請中國大使胡適博士進來，親自交給他一份稿本，以便轉呈政府。

翌日，十二月三十一日，我把聯合宣言的最後形式送呈總統，要他自己和首相簽字。我建議總統可以請李維諾夫大使和剛才被任爲中國外交部長的宋子文也到白宮來簽字其上。

十二月三十一日晨，當邱吉爾首相在白宮沐浴的時候，總統到他那裏去，建議聯合宣言應名之爲「聯合國宣言」。這位顯要的沐浴者表示同意，於是「聯合國」這個名稱從此誕生。總統把我們最後的草案在白宮重新抄了一篇，因此可以用這個新名稱。

新年的第一天，羅斯福、邱吉爾、李維諾夫和宋子文簽署了這個歷史性的文件。

## （三十六） 對已對人合作總有好處的

一九四四年將近秋季時，我與我的同事們開始懷疑史達林大元帥及其政府，是否已開始在背離他們在莫斯科會議中所同意的合作政策，這個政策，除少數例外外，他們過去曾奉行迄今的。

我們開始獲悉跡象，蘇聯在對匈牙利、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和約中，將作強硬討價，使他們能幾乎掌握住這些國家。同時，我們對蘇聯在安全理事會中於投票問題所採的強硬態度，也正不得不密切注意。

於是，九月十八日，我致電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大使，提及在鄧巴頓橡樹會議中所發生的投票問題。我說，這件事情，加上哈里曼所報告的一些別的最新演變，使我們對於蘇聯將來長期的政策，引起莫大疑竇。我並且說，我已開始懷疑，史達林與克列姆林宮諸巨頭是否已決定改變他們在莫斯科和德黑蘭會議中所確定的政策，而另走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所以，我要哈里曼對蘇聯目前政策的趨向，作一種估量，使我們可以決定如何來應付蘇聯態度的這個可能的改變。

我對哈里曼說，他如能告訴我他的看法，何以蘇聯的對美政策發生這種轉變，何以蘇聯對英的態度轉為強硬，其原因何在，則我將更感有用。

第二天，哈里曼覆電來了，舉出了幾個蘇聯片面行動或顯然與英美不願合作的實例。他說：我們有足夠的證據，可以預料假使我們成立這樣一個國際組織，規定遇有任何國際糾紛，討論時必須獲得所有常任理事國之同意，不管它本身是否爲糾紛當事國之一，則蘇聯政府必將毫不留情地抵制安全理事會討論任何它認爲將影響自己利益的問題。蘇聯政府並將堅持，這種事情應由蘇聯及別的當事國本身直接解決，特別是有關它和鄰國間的任何糾紛。

哈里曼表示他的信心說，史達林及其主要顧問們把蘇聯與其他三強間大體上的合作，置於最重要的地位，但他們希望他們政治與軍事的實力能使自己左右這種情勢。他說，無疑的，蘇聯人民渴望和平，並且相信，在戰時與英美兩國所發展的密切關係，在戰後仍將繼續，並保證一種長期恒久的和平。

大使不信史達林能背棄了這種合作所具有的物质與心理上的價值，而不致在蘇聯人民間引起嚴重的不安。但是，接近史達林的還有些有力份子，他們不願在蘇聯利益有關的地區放棄自己獨立行動的權利，不願見蘇聯把自己的安全完全倚託在一個尚未嘗試過的世界組織上，和那些他們所並不完全信任的國家合作。哈里曼覺得，史達林是喜歡有備無患的，所以自然的，他會同時運用這兩個方法，以獲取自己國家的安全，並增強他所認爲是自己國家的利益。

當我離開國務院時，我所主張的對蘇政策建立於兩個基礎上。第一是：繼續與蘇聯維持經常的、友誼的協商。在任何事件上和他們商量。向他們解釋我們認爲促成國際和平關係所需要的原則，如果需要，解釋不惜一次又一次，儘可能清楚地使他們看出，蘇聯如和別的國家衷心合作可得更多的利益，而控制鄰國則只有很少的好處。讓他們清楚明白，我們並不反對一個國家宣傳其自身政府形式的優點，不管理是共產主義或是民主政治，但我們反對一個國家去干涉別的國家

的內政。

我希望，如果我的健康能允許我繼續任職的話，能促使蘇聯採取一種西半球所共同奉行的合作和不干涉政策，把這來作為一種確定的世界政策，所有國家都能信守不渝。在這種移植到歐洲去的泛美政策之下，蘇聯可以和它的鄰邦保有最友善的政治關係，和最旺盛的交換，而不必干涉到它們的內政。

我們對蘇政策的第二部份是：以我們自己的行動表現，來給蘇聯一個實際的榜樣，告訴他們，我們覺得他們應該怎樣做。所以我反對聯合參謀本部的意見，把從日人手中奪得的太平洋島嶼由美國保有。我強烈感到一切從軸心國家手中奪回的殖民地，都應置於聯合國統治系統之下，絕不能有所例外。這是很容易看出的，蘇聯不致反對我們對這些島嶼的立時的佔有；但這也是很容易看出的：蘇聯將以此作為先例，自己將來也作相似的佔有。我們佔有了這些島嶼，將來就無法再反對別的國家作類似的行動了。

所以，我也反對一九四五年三月，我辭職以後，在墨西哥城會議所通過的夏波塔貝克法案中的計劃，即美洲諸共和國事實上同意在某種情形下得於其中任何一個國家作軍事上的干涉。我們一同同意了這種新的干涉地位，那末蘇聯就更有了藉口可以干涉他們的鄰邦，而我們亦將無理由可以反對了。

同樣地，我也不願附和韋爾斯賓同陸海軍當局所倡議的計劃，即西半球軍備的標準化，這意思就是說，美國將在和平時期裝備好拉丁美洲諸共和國。我覺得，武裝它們，並在適當時須要它們作戰，這將是一件很困難也很不公的事情，因為我們知道它們不能打，而它們對我們的幫助，正如這次大戰中的情形所示，乃是在經濟方面以及基地的使用上，較之戰場上的幫助尤為重要。

同時，我也反對改變我們暫時對與酌粹聯合的阿根廷國家主義的不妥協政策。在墨西哥城和舊金山會議中的妥協態度，讓阿根廷加入了聯合國，削弱了美國與蘇聯間原可存在的互信之心。

羅斯福與我在對蘇問題上看法甚屬相似。我們都感覺，兩國關係的路途並非康莊大道，但我們也感覺，我們可以和蘇聯共同相處。就我記憶所及，我和總統在這一個基本假定上意見毫無不同，就是：我們必須且亦能够和蘇聯政府友善相處。

總統和史達林，邱吉爾在雅爾達會議中所商討的問題，事先他未和我討論，我也一點不知道在會中所給與蘇聯的秘密謬步，直至後來密約公開發表方才知悉。雅爾達是我離職以後羅斯福總統所參加的唯一的國際會議。我對於諸強國間各種問題的意見，皆詳細記載於國務院列次會議與談話的紀錄之中。至我離職時，我仍反對給與蘇聯的投票權可較我們自己的為多。我的見解是：每一強國，既有如此有力的願望與影響，則在任何時間要獲得其權利與利益的充分表達，皆

可毫無問題，毋需保有一票以上的投票權。

我辭職後，總統來醫院探視時，包括他逝世前數日最後一次的來訪，他都從未向我提及可能有任何恐懼，以為蘇聯將放棄我們為和平的合作運動，或者將阻撓破壞它。因為他和我自一九三三年以來即會共同努力，以獲致與蘇聯更進一步的瞭解，至於我們共同計劃的和平機構，自更不必說了。所以我深信，假如他已確實感覺蘇聯正在走着一條危險的路途，他必會向我提及此事的。

人家可以這樣說：總統和我都嚴嚴的諾言與保證做壞了，我們應該知道，和蘇聯打交道是不可能的，我們早就該看出，民主政體的美國不可能和一個共產主義的政府做朋友，所以，我們應該自始起即對蘇聯採取一種鐵拳政策。

但當我們回顧與莫斯科的種種關係時，我感覺，羅斯福總統也如此感覺，我們的採取這種友善政策，極有理由。自一九一七年來，蘇聯即曾與許多拒絕承認它的國家搏鬥，這些國家拒絕承認，多少是爲了蘇聯那種從莫斯科指揮煽惑變亂的政策。靠了長期的努力，它總算漸漸獲得了更多國家的承認，但是差不多每一次進行承認蘇聯的談判時，都使它不得不同意對它建立關係的國家，不再作煽惑變亂的活動。

它並沒有完全放棄這種活動，這是事實。但我們覺得，別的國家，只要堅定地組織，建立並加強世界抵制這種活動的輿論，必可促成蘇聯放棄這種干涉他國內政的策略。事實顯示，總統和我，在自一九三三年承認蘇聯起至一九四三年「莫斯科會議」這段期間內，對蘇聯政府曾數度採取強硬手段。我從不放過機會，對蘇聯指出他們放棄那種棘手干涉政策後對自己的好處。

總統和我相信，蘇聯能十足成爲聯合國安全機構之一員，全心全意與之合作，這對蘇聯自己最有好處，這個事實，蘇聯領袖們必可認清。我們那時相信，我現在也仍如此相信，聯合國組織最後必將成爲一個統一，有力的機構，有充分力量足以維持和平。我們也知道，困難是一定有的，有些並將由蘇聯而來，聯合國組織必須經過一段飄搖脆弱的時期；但至一九四四年底時，我們已確知，我們及與我們共同努力的國家，已爲這一計劃中的機構打下基礎，在這個機構中，蘇聯和我們可以共同合作。

在對蘇關係上，有數次時機，總統和我也時常接獲我們軍事高級將領們確切的意見，說是從他們軍事的觀點說，戰後和蘇聯的友善合作，也是十分必要的。

### (三十七) 嚴峻不一定是妥善的手段

一九四四年九月，當總統決定與邱吉爾首相會晤，舉行第二次魁貝克會議時，他問我，是否我願隨他同往參加。那

時我正身體欠佳，而鄧巴頓橡樹會議又正在進行中，所以我回答他說，我想留在華盛頓，但他如需要我時，我當即可抽身前去。

在會議將舉行前不久，總統正被迫須讓財長摩根羅爾同前往參加。摩根羅爾和他的友人們多時來曾在草擬一個處置戰後德國的苛刻的計劃，而憤於德國暴行的那些團體的領袖們要求總統，讓摩根羅爾同去慰貝克，提出他對處置德國的計劃。總統自己已有這種見解，覺得德國人民整體應該給予他們一個永誌勿忘的教訓。一九四四年八月廿六日，他曾有一個長的備忘錄給陸長史汀生，送給了我一個副本，其中反對陸軍部為指導佔領德國的軍政府官員們所編的那本手冊的內容。

他說：「這本書予人一種印象，就是，我們要把德國，和荷蘭，比利時一樣地完全恢復，把德國人民儘可能迅速地回復到他們戰前的狀況。」

「這一點是最最重要的，就是每一個德國人必須認識，這次德國是戰敗了。我並不是要他們餓死，但是，舉個例說，如果他們需要更多的食物，以保持身體與靈魂的合一，那末，我們應由陸軍的廚房中來燒湯，一天餵他們三次。這可以使他們身體完全健康，而他們將終生記得這個經驗。無論從整體或個人來說，他們已是個戰敗了的國家這個事實，必須使他們如此清楚認識，使他們將來不敢再發動一次新的戰爭。」

關於處置德國海軍的問題，總統提出了一個新的意思。

十月十三日，他寫給了我一個備忘錄，其中說，他贊同聯合參謀本部關於澈底毀滅德國海軍的意見，但他有一點補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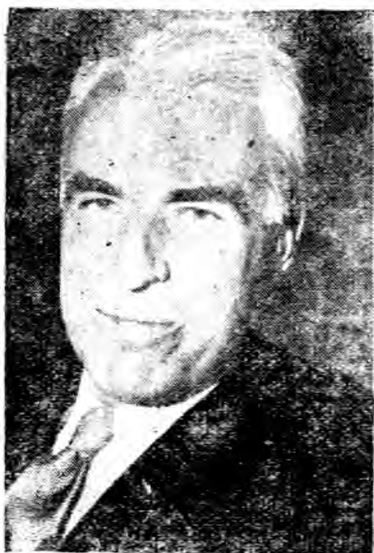
他說：「過去的那所謂毀滅，意思就是把艦隻拖到海中去沉掉。我想，有時候投降的艦隻是被弄成廢金屬，作為毀滅。我不贊同把數千萬噸鋼鐵沉入大海，作為澈底毀滅的這個辦法。」

「最近，已發現這些艦隻可有個新的用途。我們曾把沉沒的船來作防波堤，以築新海港，在義大利和在諾曼第海岸，我們都曾如此做過。這是一個築造防波堤的比較低廉的方法。我想，聯合國機構應可通過盟國的要求，把這些艦隻用於確定的目標，把它們沉於海灘作為防波堤，以改善或新築停泊設備。把它們用於這種和平的目標，是一個很好的意思。」

「在這種情形時，艦隻應儘速沉於指定的地點，並由聯合國機構的小組委員會在場監視。艦隻一沉下，將永不可能再把它們撈起來，重新用於戰爭的目標。」

一九四四年九月一日，霍普金來對我說，總統希望組織一個「內閣對德問題小組會」。





副國務卿史坦蒂紐斯



財長摩根索

「內閣小組會」於九月五日在我的辦公室舉行第一次會議，霍普金，摩根韜及史汀生亦出席。我提出了一個我與傑羅斯事先準備好的備忘錄，日期是九月四日，其中包括內閣小組會可能送呈總統的一些預擬的建議。

史汀生部長幾乎完全同意這個備忘錄，祇除出一點，就是德國人民的生計水準應降低至生存線上為度。摩根韜部長也似乎也同意備忘錄中的大部份，但不願確切詳言。霍普金在九月五日給了我一個短信，其中說，除一些並不致影響備忘錄內容的文字上的小小保留以外，他也贊同。

第二天，我們這幾個人是在白宮和總統會晤。我把九月四日的備忘錄送呈總統，並且說，小組會其他各委員尚未完全同意，但它可以作為討論的基礎。史汀生提出了一個陸軍部的備忘錄，與我們的大體極似。但摩根韜，却提出了財政部苛刻的原來的備忘錄。

討論無結果而散。國務院，陸軍部方面與財政部方面的意見是如此大相逕庭，其後即未再作討論。

魁貝克會議於九月十一日舉行之時，我們的情形就是如此。我們在意見方面未能獲得任何協調。我上文說過的，摩根韜誘迫總統讓他去參與會議，會中他準備向總統與首相提出自己這個極端的計劃。我叫駐加拿大大使安樂頓（Ray Atherton）代表我們去參加。

會議開始後四日，我接到總統九月十五日發給我的一個備忘錄，使我大為震驚。這個備忘錄顯示，他與邱吉爾已在大陸上接受了摩根韜的意見。備忘錄中說，總統與首相感覺，防止德國重整軍備的最好辦法，其要點之一，就是對於魯爾及薩爾區之將來處置。德國冶金，化學及電器工業自平時轉至戰時之迅速容易，曾予我們以極深的痛苦教訓。同時，我們亦應記得，德國曾破壞了蘇聯及其他盟邦的很大部份的工業設備，所以這是很公平的，那些受損害的國家應有權利把它們所需要的機器搬走，以補償已受的損失。備忘錄中續謂：

「所以，上述魯爾及薩爾區的各種工業必須停閉。吾人感覺，該兩區應於世界組織下交託一國管理，由世界組織監督這些工業的拆除工作，確使此等工業不致於某種掩飾詭遞下重整旗鼓。」

「這個去除魯爾及薩爾區戰爭製造工業的辦法，目標是在想把德國轉化成一個在性質上主要是農業和畜牧的國家。」

「首相和總統對此辦法已表同意。」

總統在備忘錄中附給我的信中說，他對此頗表滿意。他相信，我也必能同意不使魯爾及薩爾區復興這個大體的意思。

可是，我却覺得不能同意任何計劃，其「目標是在想把德國轉化成一個在性質上主要是農業和畜牧的國家。」

百萬的德國人不可能儘靠那一點德國的土地生存的。他們要因此餓死，要因此成爲別的國家的重負。這個方案將引起德國人永無休止的仇恨。這將是爲了一部份人的犯罪而懲罰了全體人民及其子子孫孫。這將不單是懲罰了德國，而且懲罰了大部分的歐洲。

總統在信中又說：他想，他已弄好了佔領德國軍隊所駐的地點。他曾希望以德國西北部作爲美軍佔領區，但後來和邱吉爾同意改由英軍佔領，美國則佔領南部大部份地區，包括巴伐利亞在內。

九月十五日，即總統送給我包括摩根計劃與決定佔領區的備忘錄的同一天，他又給了我另一備忘錄，其中告我，摩根計劃在魁貝克，和他的處置德國計劃一起，又提出了一個對英借債六十五億美元的計劃。這看起來似乎像是個交換條件，財政部長用這來使邱吉爾附和他那個對待洪水猛獸似的處置德國的辦法。

總統在備忘錄中說，他已同意在德國戰敗而對日戰爭仍在進行之時，英國可繼續從我國獲得價值三十五億美元的軍火援助，和三十億美元的非軍火援助。他同意邱吉爾的聲明，就是如果聯合王國要清理戰債，那麼它現已減縮至極小數量的出口貿易，必須重予建立。當然，自租借法案及其他類似借款中所獲得的物資，不得輸出或出售牟利，但有一點是必要的，就是美國不應於租借法案供給英國的物資下，附帶任何條件，因爲否則將使它的出口貿易無法恢復。

這使我似受攔腰打擊。這將使我們與英國三年來所進行的談判毀之一旦。這破壞了一九四二年我們和英國簽訂的租借協定第七條，該條規定英國戰後應採取不分軒輊的商業政策，意思就是說，它將取消帝國關稅優先權。

我相信，這在魁貝克的整個發展，使我憤激之甚，與我就任國務卿的整個時期中任何一事可以相比。假如這個壓榨計劃洩漏了出來，而洩漏又是無可避免的——後來果然洩漏了——結果將使德國拚命地作困獸之鬥，使美國多喪失數千數萬的生命。

### (三十八) 健康崩潰前最後一樁工作

摩根計劃部長自魁貝克回到華盛頓，總統則先到海德公園去，邱吉爾首相到那裏拜訪他。摩根計劃自己所完成的工作，興奮異常，拿着他的最新拷貝的計劃（係指將德國變成一個主要是農業國的計劃——編輯人新聞服務社），趕來找陸軍部長史汀生與我，和其他的人。

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日，我在我的辦公室中，召開了一次內閣小組會議，出席者有摩根，史汀生，財政部的懷特（Harry White），陸軍部次長麥克勞埃和國務院的馬秀烏斯等，以檢討這些發展。我並不掩飾，對於總統和邱吉爾先生，在摩根計劃堅持下在魁貝克所協議的事情，大感震驚。我認爲就一切方面說，這都是一個悲劇。我強調稱，我並不認

爲這件事已成定局。

摩根韜說，總統當初邀他到魁貝克去，對於他完全是一種意外，他不願意人們覺得是他策劃這件事。接着，他對於魁貝克會議的情形，發表了一長篇解釋。他說邱吉爾先生起初極力反對摩根韜所提的對德政策。首相曾率直地問，他是不是被邀到魁貝克來討論一種「把英國縛在死屍（德國）上」的計劃的。

摩根韜轉向史汀生，對他說：哈萊，他比你還要惱怒。對於摩根韜進行魁貝克商談的專橫方式，史汀生和我一樣的惱怒。因爲這主要原是國務院和陸軍部的事，他並沒有和我們預先商量，而他對此事也不作任何隱飾。

摩根韜說，後來他和首相的私人助理齊威爾爵士（Lord Chelwell）討論這個問題，顯然說服了他。齊威爾和邱吉爾討論後，就贏得了他的同意。這個建議，顯然是以英國從此可獲得許多德國以前所儲蓄的市場，消除一個危險的競爭者爲理由，而打動了首相。摩根韜說，他們嘗試多次想把這種諒解寫成文件，但沒有一次能使首相滿意，於是他把自己的秘書召了來，口述他對協議事項的諒解。這就是總統和首相簽署，並於九月十五日拍發給我的文件。摩根韜說，這全部是由邱吉爾先生起草的。

史汀生坦白地問摩根韜，邱吉爾接受這種政策，和他的急於想獲得摩根韜所應允他的借款，這其間是否有甚麼關聯。摩根韜加以否定的答覆，但是他說，這筆借款顯然是首相在魁貝克除軍事外的主要目標。

摩根韜說，次日外相艾登到魁貝克，對於總統和首相關於德國的協議，大爲驚訝。艾登和邱吉爾先生熱烈討論，邱吉爾首相叫艾登在他自己沒有返英之前，勿先在戰時內閣中提出，因爲他準備努力使它通過。

摩根韜說，艾登的反對出乎他的意外，因爲不久之前，在倫敦他和艾登討論時，他曾得到相反的印像。這句聲明使我們知道了，甚至在魁貝克以前，這位財政部長就曾和英國官員，討論過這件事主要是屬於國務院和陸軍部的事情。

關於借款方面，摩根韜說，他知道總統預備完全接受首相的意見。但是他，摩根韜，却堅持要成立一個委員會來擬定計劃。他似乎並不覺得這個委員會可以獲得英國的合作，來實現一種自由經濟政策，但他覺得這樣至少可以讓美國軋進一腳。他說，關於酬答我們的援助，英國應採何種經濟政策一點，總統沒有提出任何問題。

我毫不顧忌地說，對於決定這種重大問題，事前並沒有和我們政府中的適當專家商談，也沒有顧及到我們過去所推行的政策，我極爲驚異。

總統回華盛頓後不久，我到白宮去看他。我隨帶了他在九月十五日給我的備忘錄和摩根韜的計劃。（九月十五日的備忘錄中稱，總統和邱吉爾先生對於摩根韜計劃的內容已獲協議——編輯人新聞服務社。）

我率直地向總統說，摩根韜的計劃毫無道理，並沒有任何專家，也沒有我們政府中的有關官員，或總統，和其他國

家政府參預準備這個計劃。我又說，摩根韜的計劃將消除德國的一切，除了土地以外。德國人必須靠土地爲生。這就是說，僅有百分之六十的德國人，能靠德國的土地生存，其餘的百分之四十將死去。

我說，對於處理戰後德國問題，我將記住兩個要點。第一，德國必須在軍事佔領之下，爲時廿五年或五十年，看需要而定，直到他們完全消除了納粹的一切理論和觀念，以及德國是優越民族，有權利統治其他民族的荒謬觀念。第二點，德國人的生活水準，應該在鄰國人民平均生活水準以下，但應隨着他們改變納粹主義，民族優越感，轉向人類權利，個人自由，與和平思想的程度，而逐漸提高。

我最後說，我竟發覺英國人在魁貝克也贊同了這種極端的飢餓政策，其目的，無非是想得到摩根韜的援助，獲得財政部所建議的六十五億元借款。我特別指責這個借款。

第一個理由，我說，和英國商談，主要應由國務院主持，因爲這是政府所設用以和外國政府進行談判的機構。第二，因爲摩根韜的計劃，並未附有條件。而我們和英國之間，懸有許多問題，我們應該尋求解決或行動，而借款可以做爲我們對英國人討價還價手段的一部份。摩根韜擱置或忽視了這些問題，毫無條件地允諾六十五億元借款，並沒有和國務院或國會中有關的政府官員們事先商談。

我最後說，撇開反對這個計劃的其他重大理由不談，如果摩根韜的計劃一旦漏出而總統是贊同這計劃的，對於他在政治上的地位亦將是極大的損傷。當時他正在進行一九四四的總統競選。

在這次談話中，總統話說得很少，除了指出他實際上，還並沒有完全信從摩根韜的計劃。事實上，他還沒有覺察到他簽署過「O. K. F. D. R.」的，那份九月十五日備忘錄，是具有何等重大不利的性質。

這時我請我國務院的同僚幫助我準備好給總統的另一個備忘錄。這個備忘錄的日期是九月廿九日，我在十月一日親自交給總統，並與他討論其中主要數點。

次日，我收到總統在九月二十九日寫給我的備忘錄，這是我十月一日和他談話以前寫的這份備忘錄，充份表現出他沒有認清在摩根韜陰謀之下，他在魁貝克被牽累的程度。

他寫道：「局勢的主要癥結，是在防止英國在戰爭結束時完全破產」。他特別着重最後一句，在旁邊用墨水劃了兩條綫。

在過去一星期中，報紙上有好幾篇文章指出，在魁貝克所討論的，處理戰後德國的嚴峻性質。這成爲納粹宣傳機關的有力武器，激勵德國人硬打到底。

總統在他的備忘錄中說，「有人不僅過早地告訴了新聞界，或是說着（原文如此）根本上不正確的事實。」

「沒有誰要使德國再成爲一個完全農業的國家，但是却有人把它告訴了新開界，我希望我們能查出這個人來，予以懲處。」

（史汀生部長後來告訴我，總統以爲消息是由國務院漏出去的，史汀生說，他給總統看，第一個談到這件事的專欄作家的文章，而這位作家是和財政部某些官員有密切聯繫的，才使總統相信消息不是由國務院或陸軍部漏出去的。）

總統接着寫道，「你知道，戰前德國不僅獨立戰爭工業，並樹立了充份的國外貿易，使它有足夠的財力重整軍備，而仍能維持國際信用，不致在國際經濟間破產。」

「我不能同意這種觀念，假若大英帝國在財政上崩潰，而却讓德國構成一種潛在的重整軍備工業，它可能在二十年内再發動一次戰爭。僅僅審查工廠並不能防止這一點。」

「但是沒有誰要完全消除魯爾和薩爾區的德國工業生產力。」

「但我們可能在那兩個特殊區域內，實施全面管制。同時，還應記住，除了魯爾和薩爾以外，德國還有許多其他的（他在「其他的」下面劃了一個綫）區域和設備，能够生產大量的出口物資。」

說起蘇聯，關於我堅持任何有關德國的計劃，必須和蘇聯政府商談一點，他說：

「關於蘇聯政府，我們的確還不知道他們肚裏有些什麼主意，但是我們應該記住，在他們的佔領區內，他們多少總要照他們的意思做的，我們將僅能做到時時抗議的一點而已，除非有的抗議能得到注意。」

「我並不是想以此中止或延緩和蘇聯政府商談租借法案，不論是以全權監督爲基礎或以所提議的第四章案爲基礎，但是，這並不和德國的工業前途直接有關。」

我和總統在十月一日的談話，使我已經不必再對他的備忘錄採取任何行動了。但是這備忘錄使我了解總統採來的思想綫索。在他的思想中，英國的未來，是和德國的未來成敗相關的。戰後，英國必須恢復她的出口貿易，但是他覺得如果准許德國發展強大的出口貿易競爭，則英國的出口貿易就不能恢復。所以，他採納摩根韜的計劃，但是他忘記了，雖然邱吉爾在這協議上簽了字，英國是最不希望將德國變成一個農業國家的，因爲如果破毀的德國使歐洲經濟崩潰，將損傷到英國的生計。

總統的備忘錄還清楚顯示一點，就是他沒有了解他在魁貝克所協議的事項的意義。大約就在這時，史汀生部長和總統談過一次話，史汀生也得到同樣的結論。他告訴我，他曾讀了幾句總統九月十五日的備忘錄給他聽，結語是：「準備將德國變成二個主要的是農業和畜牧的國家。」

史汀生告訴我，總統聽到這些句子，坦白地表示懷疑，並且說，他不知道怎麼會在這備忘錄上簽字，他顯然是沒有

經過怎樣思索就簽字的。

總之，我和他談話以後，總統不再採納摩根賴關於德國的意見，他在收到我九月廿九日的備忘錄後三星期即十月二十日，給了我一個答覆。他在開頭說：「我覺得，我們來做處理德國的各種準備，全都合適，不過關於這種處理的若干事情，使我覺得目前並不急需辦理。這也許要在一个星期，也許要在一個月，也許要在幾個月以後，我不欲對一個我們還沒有佔領的國家擬具詳細計劃。」

他說，他同意我們解除德國軍備的計劃，並建議應把一切和飛機有關的都包括在內。他衷心贊同我們解散納粹黨和其有關組織，以及廣泛控制交通，報紙和宣傳的計劃。他同意我們的建議，對於將來可能的瓜分德國一點，不應有何決議。關於經濟目標方面，他說：「對於若干文字方面，我願意和國務院再討論一下。在原則上，我表示同意，但我不知道若干部份的意義。這一部份的問題，多半要看我們和盟軍進入德國以後，所遇到的實際情形而定，——但是現在我們還沒有到德國呢。」

我和我的同僚們，在九月四日和二十九日備忘錄中的意見，陸軍部方面大體是贊同的，後來英國和蘇聯也表同意，大致也就成了佔領德國後所實施的政策。摩根賴繼續支持粉碎德國的理論，他的意見對於盟國對德計劃有一種相反的作，結果成爲比我辭職前，我們在國務院中所想到的，更嚴峻的計劃。但是，佔領德國的數年經驗，加上事實，證明我們所稱德國的經濟和歐洲的經濟密切相關一節正確不誤；結果使英法政府放棄了那種理論。

我和總統在十月一日的談話，是我在任內最後的一件重要工作，當時我的健康已瀕於崩潰，不得不提出辭呈了。

### (三十九) 世界機構誕生前隱痛陣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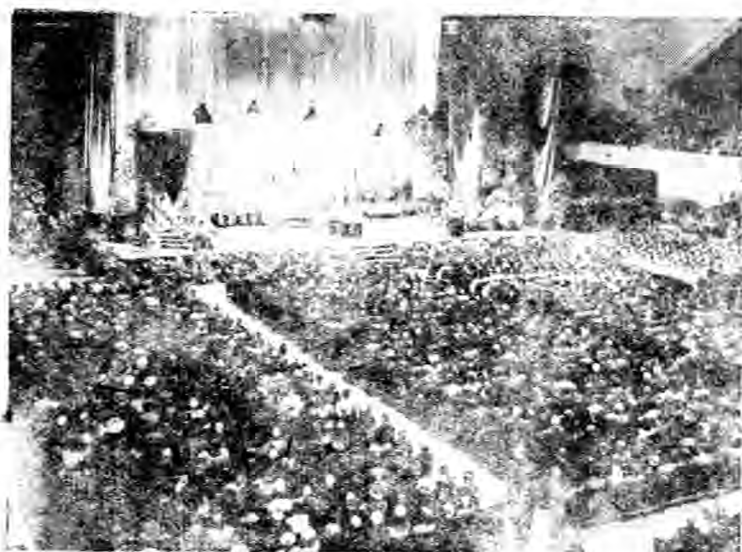
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鄧巴頓橡樹會議進入第二週時，蘇代表葛羅米柯突然在討論中，提出了一個新的令人吃驚的提案。

大會指導委員會的討論，正集中於應由那幾個國家作爲聯合國組織基本會員國的問題，蘇聯和我們都認爲，會員國應該是聯合國及其協同的國家。但是，這事在解釋上發生了一個基本的不同。

我們的意思是說，會員國應爲一切簽字於聯合國宣言的國家，加上雖未與軸心宣戰而在戰事進行中於物資上幫助盟國的八個國家。事實上，他們的貢獻較有些盟國本身還多。這八國是拉丁美洲六國，加上冰島和埃及。蘇聯則說，會員國應爲原來簽字於聯合國宣言的二十六個國家，而他們所解釋的「協同國家」，則是指以後也簽字於宣言的國家。他們不願把我們所舉的八國包括在內。關於後一點，我們的討論迄無結果。事實上，至會議結束時亦仍未解決。



(上) 聯合國舊金山會議會場前景。  
(下) 舊金山會議期間舉行之新聯聯合國成功大會。





同時，葛羅米柯大使事先未作任何通知，突向指導委員會提出一點，就是組成蘇維埃聯邦的十六共和國俱應作爲聯合國組織的基本會員國。所以，蘇聯可有十六個投票權。這個提案使史坦蒂紐斯和賈德幹（按即英代表團團長）瞠目不知所對。但他們立即告訴他說，他的提議將引起極大困難。

史坦蒂紐斯把公事報告總統時，總統堅決地說，美國無論如何不能接受此議。他叫史坦蒂紐斯向葛羅米柯說明，此事將引起說不盡的麻煩，若可同意讓組成蘇維埃聯邦的十六國加入，則我們要求美潔聯邦的四十八洲一加入，亦可一樣合乎邏輯了。

史坦蒂紐斯把此事報告我時，我說，聽見有此提議，我不勝訝異。我又說，我們從事戰後計劃的美國人員中，腦子裏從未想到此一問題。我結論說，我必以全力反對。

八月廿九日，史坦蒂紐斯把他跟總統與我談話的結果，告知葛羅米柯說，我們認爲這個提議係在議程以外，此時若予堅持，必將阻撓大會的成功。史坦蒂紐斯請葛羅米柯收回這個提議，並且說，如果蘇聯政府有此存心，應該在聯合國機構成立後於理事會中提出，當更爲適當。

葛羅米柯很能合作。他說，他的提出此點，只不過是告訴我們和英國，他的政府有這麼一個意思在腦中。他同意在會議期中不再提及此案。然而，他暗示說，在其他時機，蘇聯政府可能再度提出這個問題。

蘇聯政府竟有這麼一個多個會員國的問題在腦中，這個事實令人頗感煩惱。我於是請葛羅米柯大使於八月三十一日來看我，會晤時，我很坦白地告訴他，對於他代表其政府所提出的這個問題，我所持的反對的理由。

我對他說，他這個提議將使一切告吹。我說，大國於該組織中既將居領導地位並貢獻軍事力量，則必可毫無困難地使自己的見解受他國注意，不論它們是有一個投票權還是許多投票權。美國不想有一個以上的投票權，但我們感覺，由於我們的力量，必可於任何時機確表自己的意見。

同日，我們在國務院預備好了一個總統爲此事發給史達林的電報。總統核准了，但加上一句說，我們的立場並不影響以後聯合國機構成立後對於此問題的討論，那時，該機構可有充分權力處理這個問題。

這個蘇聯多要投票權的問題，至會議將結束時，葛羅米柯曾又提及一次，以後，直至一九四四年十一月間我辭職時止，迄未聞提及。蘇聯代表亦從未與我提起過他們後來所要求的讓白俄羅斯和烏克蘭人會一事，這一點，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中是同意的。如果他們先前曾向我提出，我定必反對。

在會議的一切討論中，我們竭力把這個提議嚴守秘密。即使在我們自己的備忘錄中，我們也只把它稱之爲「某事」。我覺得，這件事情是如此的富於爆炸性，如果洩漏於外，定必將被各處的反對勢力渲染利用，來損害蘇聯和整個會議。

的處境。

九月六日，我和史坦蒂紐斯與總統會晤於白宮，討論鄧巴頓橡樹會議中正在討論的各項主要問題。羅斯福總統首先提到新組織的會址問題。他認為該組織的各個機構應於世界各地舉行會議。

他覺得新組織的秘書處可設於日內瓦，但大會及理事會的會議皆不可在該地舉行，他相信大會應每年換一地方舉行會議，理事會則或需兩處固定的會議地點，一在大西洋中部的阿索爾島（Azores），一在太平洋中部夏威夷羣島中的一島。他感覺國際法庭仍應回到海牙。

總統於述說此等意見時是很認真的，他還說，準備於該月下旬去魁貝克舉行第二次魁貝克會議時和邱吉爾首相一談。國務院準備好了關於阿索爾島與夏威夷的尼霍島（Island of Nihoa）的地圖與節略，總統預備把它們帶到魁貝克去。

羅斯福總統對於聯合國會址的問題，曾煞費研究，他把自己關於此事的意見告我，這也並非首次。他覺得把理事會放在阿索爾或夏威夷羣島可有一種與世界保持距離的好處。總統本性上是個海軍出身的人，他喜歡從海中孤島上去看世界。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後期，他曾夢想舉行一次各國互頭的會議，在軍艦上，或是海島上，如阿索爾羣島之類。他覺得理事會若遠處海中，即不會受到任何一國壓力的影響。他回憶到巴黎和會，以及因在一個大國首都舉行會議而致遭受的壓力。他覺得國際聯盟在遷至日內瓦前，設於倫敦的時候，即曾受到壓力的影響。

他說，在性質上，他希望建立一個國際哥倫比亞區之類的東西。（我常發覺，總統於敘述國際問題的意見時，喜以美國本身的情形作比。最顯著的例子是他一九四〇和一九四一年間各次演講中，他把軸心國家飛機的可以輕易自達加飛至巴西，比擬為可自美國的一城輕易飛至另一城。）

但是，把一個國際機構四散設於世界各地，究竟是一件不甚合乎邏輯的事情，所以在鄧巴頓橡樹會議中，我們從未認真堅持過這些意見。無論如何，這不是四強可以決定的問題，而是應該由未來組織的全體會員國來決定的。

我們也和總統討論到蘇聯的這個提議，就是於聯合國組織下建立國際空軍，由安全理事會指揮。史坦蒂紐斯和我解釋美國代表團的立場說，我們應該反對建立國際空軍，而提出我們的建議，由各國自組空軍小隊，有事一經通知，即可到達混合的機場上執行任務。這個建議，是和總統六月十五日所作的擬成立國際空軍的聲明立場一致的。總統同意我們應堅持此一立場。史坦蒂紐斯對總統說，邱吉爾首相或將於魁貝克跟他提及此一問題，因為我們聽說，邱吉爾首相對蘇聯的這個建議似乎印象頗深。

我們又討論到另一個蘇聯提出的建議，就是凡不能貢獻空軍給安全組織的諸小國，應貢獻土地作為基地。總統和我

都強烈反對這個規定，因為這是侵犯了小國的主權。我們覺得這種行動應完全出於自主，小國不能被迫貢獻基地。但蘇聯的意見，曾於鄧巴頓橡樹會議的建議案中予以相當的承認，其中主張成立特別協定，規定供給「設備」，武力以及其他協助，由安理會處置。

其時我們提及此一新國際組織時，時常稱之為「聯合國」。在我們的某些草案中，我們早就一直用此名稱。總統認為即應以此作為新組織的名稱，我們也覺得，四十餘國在此名詞下共同作戰終獲勝利，這當是一個幸運的名詞，可在它們勝利以後仍在其下共同合作。但當史坦蒂紐斯在會議中提出此案時，我們却遭逢到了蘇聯和英國出乎意外的反對。葛羅米柯暫時建議用「世界聯盟」這個名詞。賈德幹說，他不信英國政府會特別喜歡「聯合國」這個名詞，並曾想建議一個名詞，其中包括有「聯盟」一詞的。（按數日後蘇聯與英國都接受了「聯合國」這個名稱。）

### （四十） 懷念故舊真令人不勝滄桑

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日，當羅斯福在芝加哥被提名競選第四任總統之前一些時候，他在白宮又建議將我提名為副總統。他說他知道假如我願意的話，我是可以獲得提名的。

但是總統知道我是不會接受的，因為戰爭尚在進行之中而我是埋首於外交工作中之故。猶如我在一九四〇年間屢次拒絕類似的建議一般，我覺得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擔任國務卿可以比擔任副總統貢獻多些。我對於總統的盛意表示感激，但是說我正專心致志於外交政策，並不覺得可以離開它。

第四任對於大家包括我自己內在內似乎比第三任來得更自然些。傳統是已經被破壞了。在一九四四年間，我們是正在作戰，而在一九四〇年却並不如此。總統覺得局勢困難，我們彷彿在汪洋大海之中，他是掌着舵。所以他應該對普遍的要求讓步，再度參加競選。

在其後的競選運動中，我並未參與其事。

總統送給我一個備忘錄，日期是一九四四年九月二十九日，其中他說：「我非常希望你訂定計劃的時候，能够在現在和選舉日之間設法廣播演說兩次。全國需要你這種清晰的思想，並且需要始終不落後。」

他於是說他現在當時和選舉日之間就外交政策發表一篇演說，假如我能够替他起草，他將「永遠非常感激」。

當我接到這個備忘錄的時候，我已經準備在下一個星期日到白宮去訪問總統，並且通知他我將辭職了。我照預定的日期去訪問他，並且在一種極深刻的失望情緒中告訴總統說，我已經勉力相當時光，現在我發現我的健康情形是如此，不得不辭職了。我說我將在下一二天內離開辦公室，直跑到床上去，而必須留在那裏，不知要多久。

總統似乎不肯相信我。在我離開他辦公室之前，我們相當隨便地談了一番。替他準備演說稿以及我發表兩篇競選演說的問題，當時和此後都沒有提到，雖然國務院後來是協助總統準備他競選中的主要外交政策演說的。

三天之後，十月二日，也就是我七十三歲誕辰，我離開國務院，已是一個百病叢生的人。我在公寓中過了十八天，努力想復元而終歸無效。在這一時期中，我繼續做一部份工作，其後我就被送到瑪麗萊州貝賽斯達地方的海軍醫院去，而在那裏留了大約七個月，有時候病情極為嚴重。在國務院將近十二年中的驚人緊張情形，使我完全精力之盡，因為當時適值我國生命中最嚴重時期之一，而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務卿的任期，甚至沒有我一半的任期那樣長的。

在抵達醫院不久之後，總統派白宮的醫師麥克萊蒂爾海軍中將來診斷我的病情，並且使我相信在一個合理的時間內，我可以充份復元恢復任職。於是總統來訪我，留了一個半鐘點，當時他力促我以不辭職為上策。他保證我可以請假若干時日，並且在一個合理的時間之後，回到國務院的辦公室去。

我毫不猶豫而是迅速地表示不願意不辭職。我說在我全神貫注的龐大計劃尚未被採用而被迫辭職，其痛苦僅次於要我的生命。但是我又說為了推行這些巨大的努力，我幾乎把我的精力消耗淨盡了，在我體力之梯上，已被摔至最低的一級。我說我不能一方面繼續任職負起其非常的責任而一方面又想恢復健康。

總統於是竭力敦促我不要辭職，直到他現在的一任於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任滿之後。我回答說，就我個人講，我是極度樂於這樣做法，但是我指出假如我如此辦了，批評家幾乎立即會注意到落在我和國務院身上的重大責任，而會一方面對我的疾病表示同情，而另一方面不久就會堅持一點，就是當前情形的緊急性質，需要一個國務卿坐在國務院中，結果他們就會批評總統處置失當的。

羅斯福先生於是要求暫時不要辭職，至少等到選舉之後。對於這一點，我是同意了。

十一月二十一日，總統寫給我一封精彩的信，開頭他說我的信「使我左右為難」。他繼續說，「我們十二年來密切相處即將結束，就是想到這一點，也使我極為難受。這不僅是爲了我們的關係一向是極和睦，或者我們的聯合工作在如此許多方面已經獲得了成功，而是更爲了我個人的感情，就是說從今以後我將不能再依賴你的幫助和你親切交換意見了。」

「我特別感覺如此者，乃是因爲在國際間友好關係之路上我們已經走得如此之遠，我是極想靠你的幫助，在當前依然是極複雜困難的情形之下，把這種工作在其最後階段獲得貫徹。」

「你的健康，的確是我所最關心的，並且我真正相信你是可以在比較短的時間中恢復過來，縱使將來你可以限於從事特殊的工作而避免國務院方面的日常事務。所以今日，你必須把全部思想集中於早獲康復，對於這一點，所有你的朋友

都會一齊來幫助你的。」

他於是重覆他的建議，就是說要我繼續留職，直到第四任開始，他說：

「假如你一定要這樣做的话，我當然是會接受你國務卿的辭呈的。但是我希望你同意一種變通辦法，就是允許我在一月二十日我們第三任期結束的時候，加以接受。或許這中間稍有一點感情作用在內，但是假如我們能够完成第三任期，將使我衷心快慰。這就是說還有二個月的時間，而在這個時間內我可以時常來看你，並且就我們可能碰到的若干事情，聽取你的意見。」

於是總統提出一個建議，而這個建議，假如我能够予以接受的話，的確是在我的心上最為親切的。他說，「我附帶講起，當聯合國機構成立之時，我將繼續祈求作為聯合國之父的你，能够在它第一屆會議中担任主席。這與此時你是否還是國務卿一點毫無關係，而命份中應該由你來担任，因為你是全世界中使此一偉大和平計劃成為具體事實貢獻最大的人。你曾在如此許多不同方面對國際間的友好關係具有貢獻，所以縱使你已經不在政府機關中任職，你將繼續以你的道德指示幫助世界。」

他用關切的說話結束了這封信。

總統的懇請是如此打動我的心，使我的確和為我診療的醫生懇切的談過一次話。他們的答覆是在未來長時間中我不可能回到我的辦公室去。所以我認為接受總統的建議留職到一月二十日，無論對政府或者對我自己都不是公允的。一個新的國務卿應該被任命來接替我。並且我覺得作為國務院的首腦，我是應該負外交政策之責的，而我在這些政策的訂定方面，却不積極參與其事。

所以我在十一月二十三日答覆總統，告訴他說我為他的來信深深感動，對於他懇切地關懷我的健康以及對於十二年間我們私人 and 官方密切關係的稱道，將永遠感激。在軍中我的健康情形使我不能繼續担任公務這種個人的悲劇以及將永遠珍視我們之間的友誼和深情之後，我說：

「我衷心希望能够滿足你的願望，就是說我辭去國務卿可以不在現在而在一月二十日生效。我會經再和我的醫師商量過。我恢復的速度肯定地和避免一切担心和責任相關聯。你一定能够理解在我担任國務卿一日，我就不能把國務卿的軍任置諸一旁。爲了忠於你和我一向從事的目標，忠於國家，忠於你以及忠於我自己，我覺得我的辭職必須在現在生效。」

我重覆說，一俟我的健康恢復，我將完全聽命你的指揮，凡是對於將來重大問題的解決我個人能够有所貢獻的，無不樂於從事。

總統現在接受了我的辭呈，而於十二月二十七日加以宣佈。他任命副國務卿史坦蒂紐斯繼承我。我的任期於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正式結束。

總統到醫院來看過我幾次。有一次，他的神情看上去非常疲勞——當時他離開死期祇有幾星期的時間了——我睡在床上，他對我說，「我應該在你的地方。」

在我留於醫院中的冗長的七個月中，我時常爲種種徵象而感到興奮，那就是我雖然已經不復在職，我的工作並沒有被遺忘。

我從雅爾達會議接到一個由羅斯福、史達林、邱吉爾、莫洛托夫、艾登和史坦蒂紐斯簽字的電報，其中說：「我們在這一次會議中沒有你在一起，謹向你懇切致候。我們希望你迅速康復，因此我們大家再能和你相處在一起。」

我在這裏應該說明在雅爾達會議之前或在會議期間，總統或任何人對於政策問題並沒有和我商量過。當總統剛要啓程赴雅爾達之前，他到醫院來看我，但是並沒有和我提起他預期和史達林與邱吉爾討論的任何題目或者他可能作的任何決定。在此後任何其他重要會議中，我國政府的目的，我事前也沒有被通知過，雅爾達會議爲例外。

雅爾達會議二個月之後，我於四月十二日爲羅斯福總統的突然逝世所怔呆。他在赴海德公園其後赴喬治亞溫泉之前一天，他來看過我。幾天之後，他就在那裏逝世了。在他這一次來看我的時候，我勸他注意健康，說他應該多休息休息。他說他在下一天要離開這裏，就爲這個目的。

在我看來，羅斯福總統是我們現代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改革家，縱使有許多人對於他若干改革可能不表同意。作爲總司令，他的成就在其他總司令的成就中是出衆的。根據我的意見，他在政治的技巧方面，當代並無匹敵。據我所知，他一直是個人自由以及其他基本權利和特權的誠懇的信徒，這些權利對於一般公民是必要的。這些包括正義，法律和秩序的理想。在見解方面，他堅強，一貫並且時常是極端自由主義的。他在軍事方面所採取的步驟，使我們直往勝利，同時這種步驟，在外交方面也具有最大的意義，因爲軍事上的成功，給予我們的外交以不可或缺的支持和力量。

## （四十一） 祈求持久的和平降臨人間

在我七十五年的生活中，我曾看到這一個國家從一個大陸的強國，生長成一個世界的強國，對地球上每一個角落，都有利害關係。

我們今日在武力上有力量，在和平與人的主義上也有力量。但我們有了龐大的實力，同時就有一種重大的責任。其中最重大的責任，是我們領導各國爲和平，正義，自由與進步而走向合作之路。

過去有一種普遍的觀念，並獲得傳統的支持，以為美國無所畏懼，前途確有把握，我們龐大的資源和組織的能力，保證我們的命運，我們的制度將持久不衰。這種信念再沒有更危險的了。

事實上，我們已到了一個我們應當站定，觀看和傾聽的時期。我們應當以銳利自省，來分析我們自己和我們在世界上的地位。

這一世代的人民是否真的比他們以前幾世代的前人境況好些？科學和發明已使他們有更多享受的東西，在這一點上，他們的確比從前的人好得多。他們有各種好的東西吃，和好的東西穿，並有好的娛樂，和從前有限的生活享受比較起來，果然幸福得多了。可是在其他若干方面，情形就差了。他們缺乏廣泛的教育，缺乏對自由和法治精神的熱誠，並對於公共事務的進行，不能保持深切的興趣和警覺。

據我的意見看來，有組織的社會在過去一世代內已經衰落了。

我們已看到國際整個政治組織的顯著的衰落，同時國際整個經濟組織有摧毀的威脅。在政治和經濟事務中，人類已受到一種逐漸的衰退，我們高唱科學和發明的進步來對每一個人催眠，這是沒有效用的。除非我們本國的公民和其他各國的公民對公共事務如同他們對私事一樣關心和注意，否則我們對付自己國內的事務和世界的和平問題，結果必然完全失敗，而世界和平問題將由於原子彈的發明而更加嚴重。

民主主義不是一個靜止的機構，像一座教堂或一座摩天大樓那樣。民主一經確立，不能期望它一代又一代的獨立下去。民主是一種活的有機體，所以必須加以看護，培養和引導。

我們不能以過去的成就和現在的財產認為滿足。我們今日所有的一切自由，都是由於抵抗國內或國外的暴政而得到的，其中大半是用血和鐵換來的。

自由的到臨，是由於那些願為自由而捨命的男女的努力。我們是他們的承繼人，所以我們必須留心保守我們的遺產。

讓我們選擇那些知道人民的需要的人，來做我們的領袖。我們的領袖中有幾位，像傑弗遜那樣，是爲了促進民主主義和給予人民以利益而進身仕途的。傑弗遜無意於權勢，更無意於地位或示惠於人，他甚至企圖使馬迪遜來代替他自己做總統的候選人。我們今日當然也有賦有同樣崇高精神的人物。

我們亟需要更多的宗教和道德，作爲政府的背景。這裏如同世界各處一樣，也需要加強思想和行爲的宗教道德基礎。再沒有比宗教和道德觀念更高的文明勢力。只有在這些觀念予以認識腐敗和暴政的能力並予以消滅它們的力量時，時候，這種腐敗和暴政方能從政府中驅除出去。

美國各州應時刻留心保護它們公民的公權。一切公民自由投票的權利應加以保護，而他們前往投票區的道路，不應受到阻礙。

我相信國會和行政當局必須在政府中遵守嚴格的經濟節約，而各州各郡和各市，也須這樣做去。在這個現代世界上，大多數官吏和個人，對於公衆或私人的經濟，往往不大顧到。

讓我們在情形許可之下，儘量依附個人創造力和自由企業的古老政策。政府須扮演一個監督和檢查的重要角色，保證自由企業的真正自由和公平，全體人民都受到保護，但政府切不可殺害我們民族所以成爲偉大的精神。

國會和行政當局有一個不可規避的責任，使我們的外交政策保持在一個非政黨的基礎上。當我在國務院裏的時期內，我對於任何一個問題的工作，從未有如對這一個問題的工作那樣辛勤。

我繼續相信：參院同意一切條約的核准需要三分之二的表決一點，應由憲法的修正案改爲：祇要多數表決即予通過。美國的人民，國會和行政當局必須密切注意，以免美國再回到危險的孤立政策。在一世代以內的兩次大戰，應使一切美國人覺悟：我們是世界的一個重要部份，海外的衝突必然影響到我們，而我們的福利和平及安全，與其他各國都有連帶關係。我們有一種欲罷不能的領導和合作的責任。」

過去，直至一九三四年爲止，我們對世界最顯明的不盡職，恐怕要算我們的經濟孤立主義。高稅率並不把繁榮帶給我們。它們帶給我們的是國內賣不掉的剩餘物資，和海外其他各國的憤懣。

華盛頓總統曾發言反對與其他國家訂立永久的同盟，雖然他默許暫時的同盟。但是現在我們是聯合國的一個會員國，這聯合國的性質是一種反侵略的同盟。我們不必對這種同盟表示震驚。這不是一種反對其他國家集團的同盟，而是一種反對任何侵略的同盟。這不是一種戰爭的同盟，而是一種和平的同盟。

聯合國機構包括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它的成立，據我的意見看來，是世界政治發展的一個轉捩點。

但是我們勿以爲聯合國能够表演一個奇蹟。聯合國的憲章是一種人造的工具，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工具。欲使這個機構的工作有效，需要時間，忍耐，和各國的合作精神。

尤其重要的是，這個機構需要蘇，英，中，法，美五大國的繼續合作。惟有這五國之間的共同友好合作，才能產生維持和平所必需的諒解與一致行動。

聯合國應得而且必須有美國人民不動搖的支持。我們不要因爲這新機構的各理事會中發表衝突的意見而就感到灰心。我們不要一方面認爲聯合國無法工作，所以我們必須恢復國家主義和孤立，而在另一方面認爲聯合國不適當，所以我們必須以世界政府來取而代之。



我們應當力圖促進普遍遞減軍備的計劃，由聯合國在各國實施監察，確保這個計劃的執行。經濟和軍事的武裝的瘋狂競爭，是一種對文明的控訴。主張加軍軍備的人，正在玩弄數千萬男子，婦女與兒童的生命財產。但遞減軍備必須是比較性的，我們切不可再讓美國減退到軍事上束手無策的地步。在我們解釋我們的外交政策時候，其他各國必須仍能看見我們實力的徵象。

美國人對於發表關於別國的意見，必需實行節制。我們這個民族，慣於指摘別的國家和統治者，輕用形容詞，諷刺，和譏笑。我們忘了我們這種尖刻的字句，並不就此埋沒在報紙的新聞欄中，或失落在廣播會或無線電廣播中。這些字句給被咒詛的政府和人民知道了，會使這些國家的報紙和無線電加以複印和批評，因為這些國家也許不明白我們的批評自由，而且這些字句妨礙我們的外交關係。在責罵別人之前，一個人應從一數到十，對於這一條舊規則，我願加上一條新規則：就是在責罵別的國家之前，我們應當數上十小時或十天，同時我們對於似乎值得證實的事件，應當確定其全部事實的真相。

我要請美國少數集團特別注意這一條規則，不論這些集團是屬於種族的，國家的，或宗教的。憲法的宗旨是保護一切人民，尤其是少數份子。但是近年來這些集團中有一部份，利用報導和宣傳方法的進步，對於外交事務，已提出一種與他們人數不相稱的呼聲和壓力。這些干涉外交的少數份子大半是左翼份子或反動的極端份子，也有些最近移民到美國來的人，他們是慢性的煽動者，他們所主張的意見，足以破壞我們政治和經濟的組織。有不少次數，當我們政府的國際關係需要最微妙和審慎處理的時候，這些集團中有幾個在一致侵略性的公共輿論支持之下，散播毒素，或用其他方法破壞國際關係。

我們必須承認並甘願負起我們對以前的敵人德國和日本的義務。如果在未來的數十年內我們對他們非維持軍事或其他性質的監督不可，那末我們應當情願維持這種監督。我們不應抱有迅速由歐洲撤退的思想。

在西半球，讓我們繼續在一切可能的方法之下發展和擴大陸隣政策。我們從這種政策中所得的結果證明我們應當再進一步培植這個種子。在我們艱難的時候，我們在南方的朋友，祇有一個例外，其餘都證明是我們的真正的朋友。

我們的國家和一切的國家，尤其包括上次對暴君勢力作殊死戰的各大盟國，如果不明瞭在不久的將來他們將面臨最嚴重的危機，那末他們只是自騙自而已。如果他們決心使和平，秩序和文明的勢力隨同統一和鞏固他們的政治和道

德力量的任務一時不斷進行，那末他們將有很大的威力，足以保持世界的永久和平，自由和文明，必要時不妨用武力保持。

一切國家必須不斷努力在絕對平等的基礎上共同合作，一方面不懷成見，另一方面不抱偏愛主義或緩靖態度。

關於國際合作的許多基本原則，每一個都是極其重要的，但一切國家和人民絕對不能逃避的一個最高的職責是維持和發展一種能永久維持和平的國際機構。這裏有一個近乎不易之理：凡是忠心履行聯合國機構會員資格的職責的國家，將得到平等而不可計數的利益，不履行這種職責的國家，將遭遇到愈來愈多的困難。爲了全體的利益，各國應一起合作，使這個世界機構永久延續下去，並使其成爲真正有效的機構。

我們這個偉大的國家，對於各附屬的民族，在他們準備就緒的時候，應該始終成全他們的自治和獨立，依照我們在菲律賓所定的成例。但是我們在這方面的政策，不能僅以贊助爲限，而且也須包括積極的經濟援助，以提高這種民族的生活水準。

我們還要主張輿論在世界上有自由的發揮。今日全世界沒有自由的報紙或無線電。恐怕有半數國家壓制或滲瀝報導，或加以着色。在各國民族的思想能完全自由彼此交通以前，我們不能希望獲得使戰爭無從發生的真正諒解。

我以下的信念結束這些回憶錄：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命運仍在我們的前面，不是在我們的後面。如果我們願意隨時歇下來檢討過去，估量現在和準備未來，那末我相信成功的水平綫仍在我們的面前，像無盡的平原那樣延長下去。而最崇高的成功，莫如和其他各國和諧合作，直至戰爭的鞭子從我們的背上取去，而一個永久友善的和平降臨到我們身上。

## (四十二) 無條件投降的有條件運用

無條件投降的原則，遮蔽了我們對軸心及其衛星國的政策，和我們對他們前途的籌劃。

這個原則本來並不是國務院所想出來的。當一九四三年一月在卡薩勃朗加會議期內總統在記者招待會中當英國首相面前突然第一次宣佈這個原則的時候，我們很感覺到震驚，如同邱吉爾一樣。有人告訴我，當時邱吉爾驚惶失措，愕然無語。

如同我的許多同僚一樣，我根本反對這個原則，有兩種理由。一個理由是這個原則也許會使軸心作困獸之鬥，負隅抵抗而使戰爭延長下去。

總統本人在卡薩勃朗加解釋無條件投降這句話的意思說（這並不是毀滅德國，日本和義大利的人民，而是終止以征服別的民族為基礎的一種理論。然而這句話的本身較之解釋傳佈更廣，以致在納粹宣傳家的手中，就成爲一種工具。

第二個理由是這個原則在邏輯上需要戰勝國家準備接收被征服國家的全國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每一個部門，並辦理一切政府方面的活動和事業。我們和我們的盟國並沒有準備負起這樣重大的義務。

早在卡薩勃朗加會議之前三年以上，我們在國務院中已開始討論戰後的種種問題，但我們並沒有想到無條件投降的意見。然而總統在卡薩勃朗加說明了這個原則以後，我們沒有辦法，只得至少在形式上遵循這個原則。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英國大使館交來一個備忘錄，通知我們說：和平的觸角已由德國外交部某一大員和希特勒的警察總長希姆萊經過瑞典而來到英國政府。這觸角的性質是一件聲明，說希姆萊預備派一位陸軍軍官和一位納粹黨員來會見英方代表，想獲悉「無條件投降」這一個名詞的定義。英國人通知我們說：他們的計劃是僅回答蘇聯合國要求德國的無條件投降，而不再加以進一步的解釋。我們同意這樣的一個答覆。

十二月卅一日在莫洛托夫和哈里曼大使談話的時候，蘇聯也向我們提起無條件投降這個問題來。因此，我和同僚討論之後，於一九四四年一月十四日向總統呈遞一件備忘錄，向他報告說：莫洛托夫曾自動向哈里曼提及「無條件投降」這句話的定義，並詢問我國政府的態度如何。

我說：「據我所知，蘇聯政府相信對敵國所施的投降條件的一種定義，不論如何廣泛和嚴厲，足以使敵人失去宣傳的利益，因而削弱其軍隊和人民的士氣。鑒於蘇聯對於這一問題的關心，閣下是否將准許我們和蘇聯及英國兩政府討論對各個敵國所施加的無條件投降的名詞，要不要加以一種公開的定義，作為宣傳上的利用？」

三天以後，即一月十七日，總統以備忘錄一件答覆我，他一開頭就說：

「坦白地說來，我不喜歡解釋「無條件投降」的定義這一套談話的意見。蘇聯、英國和美國已同意決不彼此未經協商而締造任何和平。我以爲每一件事都應照這個原則而決定其利益。」

於是他又繼續說：

我在聖誕節夜演辭詞中所說的話，德國人民一定能聽到了。事實上，我們並不想到毀滅德國人民，我們願他們世世代代活下去，像歐洲其他的人民一樣，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必須消除他們現在的征服思想。我當時所說的話，我已不能完全記得，但你可以覆查一下。

第二，德國人民和蘇聯也應該明白「無條件投降」的解釋真正的意義是什麼。（南北戰爭時）李氏向葛蘭特投降的故事是最好的說明。李氏要談各種條件。葛蘭特稱：李氏必須信任他（葛蘭特）的公正。於是李氏就投降了。李氏立即提出南部聯邦同盟軍官的戰馬問題，這些戰馬大多數是屬於他們個人的，葛蘭特對李氏說：他們應當把戰馬牽回家去，以備春耕之用，於是問題就此解決了。

（總統對於美國歷史，有一個很廣博的知識，他曾有一番深刻的研究功夫。但是葛蘭特要求無條件投降，不是在亞波馬托克斯，而是一八六二年在福特杜納爾澁，當時他接受布克納將軍的投降。）

總統末後稱：「像上面所說的這些小事，對於德國人，其效果更大於蘇聯人，英國人和我們自己。我想要解釋「無條件投降」而舉行的多次談話。不論我們同意的是什麼字眼，一等到有一個國家要投降的時候，大概就須加以修改或更動了。」

一月廿五日我把這備忘錄的要點，通知在莫斯科的哈里曼大使。

幾星期之後，蘇聯人和芬蘭人討論議和的時候，俄國人自己就修正了無條件投降的原則。

外交大臣艾登把蘇聯對芬蘭的辦法，作為向我們提出一個建議的基礎，他建議對於較小的軸心國家，把無條件投降的原則，加以緩和一下。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日，英大使哈里法克斯送給我一張由艾登打來的電報，內容就是上面所說的，電報的日期是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七日。

五天以後我向總統建議：我們應遵照英國所提議的辦法，以便對於軸心衛星國能得到更大的伸縮性。

當我在等候總統對於這一個建議的回音之時，我接到蘇聯大使葛羅米柯的一件備忘錄，表示他的政府同意英政府和國務院所取的立場：就是無條件投降的原則應加以修改。

在我有機會把這備忘錄送達總統以前我已接到他對於我三月廿五日的建議的答覆。

他說道：「我想這件事應有不同的處理，據我的判斷，放棄「無條件投降」的字眼或把它作為例外，將成爲一種錯

誤。事實上，我們的意思欲把這些字眼，向誰運用呢？顯然是我們的敵人囉。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成立大西洋憲章的時候和一九四三年一月舉行卡薩勃朗加會議的時候，軸心的衛星國是匈牙利，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芬蘭。他們雖則也是我們的敵人，但與德義兩國的意思義不同。這四個小衛星國是在德義強迫之下成爲我們的敵人。」

「我以爲作爲例外是一個錯誤。義大利是無條件投降的，但同時獲得了不少特別權利。如果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或芬蘭實行投降，也應這樣。李氏向葛蘭特無條件投降，但葛蘭特立即對他說：他的軍官應把他們的戰馬牽回家去作春耕之用。我要在海外看到的也是這種精神，但這種精神不適用於德國。德國只知道一種言語。」

收到了總統的覆文以後，我的同僚中有幾位用備忘錄向我建議，請我再與羅斯福提出這問題。經過了一番討論之後，我於四月四日寄給總統一封信。

這時候總統因患着厲害的氣管炎而躺在白宮的牀上，我不能和他親自談話。因此就有一連串書面的通話。

總統在第二天答覆了。他說，「我完全明瞭這個問題，但我無論如何要防避被人說無條件投降的原則已經放棄。如果在一個特種情形發生之前，我們對於一般的原則開始有例外，那末其中將有真正的危險。」

「我們都知道：如果我們對於以後將在一切情形中運用的原則，作成任何例外，那末這危險必將發生。」

「我完全明瞭以後隨時必有例外，不是投降原則的例外，而是在特種情形中運用投降原則的例外。這和改變原則是完全不同的事。」

「如果蘇英兩政府通知我有這種情形，那末我確定我們將同意它們。這一點應向這兩國政府說明的。那時候它們就不能指責我們使蘇聯的軍事任務更爲困難。」

羅斯福。」

但這個問題不會熄止的。僅僅兩天以後，從另一方面，即軍事方面，這問題又被引起來了。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三日我接到那時在倫敦的副國務卿史坦蒂紐斯的電報，他把艾森豪威爾元帥和艾帥的參謀長史密斯斯將軍向他所提的建議，轉交與我。史坦蒂紐斯說，這兩位將軍會和他提出這問題，並發表他們等懷的意見，認爲我們應宣佈對戰敗後的德國如何待過的原則，藉以闡明無條件投降的意義。

我把這封電報寄給總統，那時他正因小病而在南卡洛林納州喬治頓的巴魯樞莊上休養。

四月十五日我接到總統的一個簡短的消息，其中提及四月十三日史坦蒂羅斯的電報後說：「對於這電報的任何答覆須有我的核准以後方可寄出。」

四月十七日我打電報給費里普，請他通知一切有關的人：總統希望對這個問題，沒有他的同意，不再予以進一步的考慮。

總統於五月七日返歸華盛頓，我在三天以後，把關於這一問題的備忘錄一件，送達總統。我說：國務院已得到英大使館的通知，說明英政府認為盟國實行對荷屬東印度羣島的宣傳是很重要的。這種宣傳，特別是對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今後應刪去「無條件投降」的名詞，以便在加強對德抵抗中，獲得最高限度的軍事利益。對於總原則將避免放棄。

我說，一在提出這個建議的時候，英大使館指出蘇聯政府對芬蘭並未運用這原則，如果羅馬尼亞面臨着他們投降的建議而停戰的話，那末蘇聯政府對羅馬尼亞也可以不運用這個原則。一般推測宣傳機關在擬定它們的指令的時候，將考慮到這些問題。關於匈牙利和保加利亞，國務院認為在這個時候對宣傳工作採取有力的行動，確能得到益處。所以我很感激，如果你肯表明是否將准許我們和英蘇採取平行的行動，對於宣傳，特許若干自由行動。」

總統把這備忘錄寄還給我，上面寫了「OK」的字樣。

三大盟國領袖迭次發表的聲明，緩和無條件投降的聲稱，但並不能使德國提早投降。納粹的宣傳機構繼續到底，強調其對無條件投降的硬性解釋。

如果沒有宣佈無條件投降的原則，或聯合國所同意和聲明的條件較為寬大，那末德國是否較早就投降，這仍是一個問題。

無論如何，對德國繼續運用無條件投降，確有這樣的效果：就是將來的德國宣傳機構決不能再像一九二〇年代和一九三〇年代那樣自稱：德軍並未敗敗，德國的戰敗是由於後方民政管理和人民的衰弱。

至於我們東方的敵人日本，在三個月後，當她看到無條件投降的原則能加以有條件運用的時候，也就投降了。(完)